

世界恐怖组织的行动

顾 雨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恐怖组织的行动/顾雨著. — 2 版.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9

ISBN 7-5387-1304-2

I. 世... II. 顾...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076 号

世界恐怖组织的行动

作 者 顾 雨

责任编辑 张四季

责任校对 张四季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304-2/I·1262

定 价 26.80 元

“超级恐怖时代”会来临吗？

（代 序）

1998年8月7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相继发生强烈爆炸事件,至少造成200多人死亡,近5000人受伤,美国使馆人员12名死于非命。更惨的是,美驻肯使馆总领事巴特利和他20岁的儿子双双被炸死在寓所内。

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不禁要问:恐怖活动缘何如此猖獗?

近年最严重的恐怖事件是斯里兰卡发生的一次大爆炸,炸死90人,炸伤1400多人。其他重大袭击事件包括用卡车炸弹爆炸美军驻沙特阿拉伯宰赫兰基地,19名美国人死亡,大约500人受伤,这是自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班机被炸,189名美国公民身亡以来,在一次国际恐怖行动中死亡美国公民最多的一次。驻秘鲁的日本大使馆人质案,历时数月终归解决,也堪称恐怖史上的一个奇迹。东京地铁沙林毒气,纽约世贸中心爆炸物中的放射性钴元素和俄罗斯不断发生的核走私案,说明恐怖分子已把“生化战”、“核大战”付诸行动,这无疑给现代社会又敲响了警钟。

除传统的恐怖主义威胁外,核武器、生化武器的走私和扩散,信息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使恐怖主义活动具有重大

的危险性。美国一位情报官员说过 ,如果有足够的经费和 20 名能干的计算机程序专家 ,就能使整个美国停止运转。有人惊恐地称之为“21 世纪的政治瘟疫” ,下个世纪将进入一个“超级恐怖时代”。

制造原子弹最关键之处在于得到少量的武器级铀或钚 ,据有关报告显示 ,全球至今已有上千磅的钚失窃。据合众国际社报道 :1991 年 7 月 ,停泊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港的一前苏联船只上有 5 桶辐射力很强的浓缩铀被盗。不久 ,有数千克浓缩铀在当地黑市上非法出售。瑞士警方也曾查获了 19.5 千克铀 ,破获一个包括瑞士、奥地利、意大利和捷克 4 国公民在内的核材料国际走私集团。种种迹象表明 ,恐怖主义分子不但可以掌握制造原子弹的技术 ,而且手中说不定也有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原料。

目前 ,世界各国对恐怖活动反应强烈 ,纷纷谴责恐怖主义 ,也正在加大打击恐怖活动的力度。1996 年 3 月 13 日 ,在埃及、美国的倡议下 ,27 个国家的首脑在埃及召开了“和平缔造者高级会议”(即“世界反恐怖大会”) ;4 月 23 日 ,美洲国家组织 35 个成员国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第一届美洲反恐怖特别会议 ;6 月 23 日 ,阿拉伯国家首脑在开罗召开“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和颠覆活动”大会 ;7 月 28 日 ,西方七国和俄罗斯在巴黎举行反恐怖主义工作会议 ,通过了 25 项反恐怖措施。但是由于恐怖主义产生和泛滥的社会根源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 ,加之新型恐怖活动又具有高技术、分散化、机动灵等特点。因此 ,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任务还很艰巨 ,任重而道远。

目 录

上篇 :二十世纪恐怖行动纪实

拉登对美国宣战 超级恐怖降临	(3)
利马日本使馆惊魂	(23)
“孤独的狼”嚎叫——3000 人质受困小镇	(43)
邪教横行东京——地铁酿惨剧	(54)
“圣战者”丧天良——世贸中心被毁	(59)
死在和平日的“鹰爪”——拉宾	(80)
“猛虎”啸狮岛——斯总统壮志难酬	(93)
国际空难大调查	(101)
美国中校被绞杀黑幕	(118)
一条震惊世界的公告	(128)
三总统被暗杀之谜	(150)
刺穿瑞典深夜的枪声	(164)
萨达特开罗遇刺前前后后	(173)
在“红色旅”总部 ,总理被“撕票”	(184)
肇源电视机——费萨尔死因揭秘	(201)
达拉斯世纪谜案 肯尼迪死得蹊跷	(204)
印度三“甘地”被暗杀之谜	(210)

中篇 :世界反恐怖组织公布的恐怖组织名单

西班牙的“埃塔”和“非法突击队”	(249)
意大利的“红色旅”	(254)
意大利的“黑手党”	(261)
秘鲁的“光辉道路”	(266)
阿布·尼达尔的“恐怖公司”	(274)
盲教士谢辛的“哈马斯”	(278)
美国“三 K 党”	(285)
德国“红军派”	(291)
日本“赤军派”	(294)
法国的“直接行动”	(297)
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卡特尔”	(303)
1998 年公布的世界恐怖组织名单	(309)

下篇 :世界反恐怖特种部队档案

以色列“摩萨迪”	(313)
美国“绿色贝雷帽”	(322)
约翰牛之魂	(351)
“边防第 9 旅”	(356)
法兰西之鹰	(373)

上篇 :二十世纪恐怖行动纪实

拉登对美宣战 超级恐怖降临

1998年11月4日，美国国务院将悬赏金额从二百万美元提到五百万美元，征求线索在世界各地逮捕国际恐怖分子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阿提夫，或将他们定罪。

美国检察官4日下午已在纽约南区的地方法院将这两人提起公诉，指控他们以炸弹攻击美国驻肯尼亚及坦桑尼亚大使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在—项声明中指出，在过去三个月当中，美国执法官员在调查恐怖分子攻击驻东非的两个大使馆方面已有重大进展，今天则进一步指出采取这些懦夫行动的个人。声明中也说，在美国检察官于纽约宣布起诉拉登和他的军事指挥官阿提夫的同时，国务院也悬赏五百万美元征求线索在世界各地逮捕或将他们定罪。

鲁宾表示，拉登涉嫌策划和资助、并由他的追随者实施攻击美国大使馆的“怯懦”行动已导致包括十二名无辜美国人在内共二百人死亡，及五千多名毫无恶意的平民受伤。

声明中指出：“美国正坚定不移致力对抗国际恐怖主义，我们也有强烈的动机将这些与野蛮攻击有关的人，尤其是拉登绳之以法。

美国国会将总统克林顿提出的反恐怖主义计划中悬赏二百万美元金额提高到五百万美元。而且，美国国务院敦

促拥有线索的海外人士与距离他们最近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联系 ;在美国国内则应与联邦调查局联络。

美国国务院强调 ,美国保证对过去和未来的恐怖活动提供线索者完全保密 ,必要时还可以在美国重新安置提供线索者和他们的家人。鲁宾表示 ,美国比过去更加决心对抗在世界各地针对美国利益发动的恐怖攻击 ,并将与炸弹攻击美国大使馆 ,以及针对美国的其他恐怖罪行有关的所有人绳之以法。他又说 ,反恐怖主义悬赏计划是對抗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项有效工具。在过去的几年中 ,美国政府已根据此一悬赏计划的将近二十个案件中支付五百万美元 ,给世界各地提供可靠线索的人士。

本·拉登何许人也？竟惹得美国如此大动干戈呢？

一、惊天使馆大爆炸

8月7日 ,一个黑色的星期五。上午10时40分左右 ,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相继发生强烈爆炸事件 ,至少造成200多人死亡 ,近5000人受伤。死者中有美国使馆人员12名 ,美驻肯使馆总领事巴特利和他20岁的儿子双双被炸死在寓所内。

爆炸现场 惨不忍睹

几位受伤的人讲述了美驻肯尼亚使馆爆炸的经过。一辆卡车开到使馆大门口 ,由于没有使馆的外交牌照 ,门卫不准它进入。卡车马上转弯驶向专门用来装卸货物的后门。可后门门卫也不让进。此时 ,车上突然跳下几人 ,向门卫开枪 ,还可能向汽车扔了一颗手榴弹。随后 ,一声巨响 ,汽车内的巨型炸弹爆炸 ,美国使馆隔壁的综合商业大楼的配楼被夷为瓦砾 ,无情地倒压在行驶中的公共汽车和行人身上 ,楼内正在上课的一所秘书学院的100多名学生被活活埋在下面 ;近30层高的综合商业大楼的玻璃被震碎 ,许多受伤者血流满面 ,却被困在楼上不能下来 ;楼前空地上被炸出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巨大弹坑 ,周围的汽车和商店刹那间变成火海 ;方圆100米的建筑物不同程

度地受到损害，四处乱飞的玻璃碎片和瓦砾击伤了街道上的过往行人，数百名鲜血淋淋的受伤者哀叫求救……

一位目击者说，美国驻肯大使馆的玻璃被震碎，有的墙壁被炸塌，锅状的卫星天线被炸翻，美国国旗的旗杆被炸断，撕裂的国旗横卧在铁栅栏上。如果那辆卡车从正门开进去的话，那美国使馆的损失就更惨重了。

肯尼亚的爆炸声之后仅十几分钟，在邻国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又一起惨案发生了。炸弹装在使馆的运水车上，汽车在使馆门口爆炸，在当地雇佣的司机和助手以及 5 位门卫全部被炸死。

司机 40 多岁，已受雇 9 年。那天，他到属于美国使馆的一口水井去拉水。使馆人员猜测，可能是有人偷偷地把炸弹挂在运水车的什么地方。但这起爆炸比肯尼亚的要轻一些，使馆内的美国人全都安然无恙，楼顶上的监视装置也未遭破坏，估计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线索。但附近民房的屋顶被炸飞，街道上的汽车遭焚烧，正好驶过使馆的两辆小汽车内的乘客不幸遇难，一街之隔的法国大使馆的一名警卫也挂了花。

爆炸事件发生后，两个首都立即展开紧张而有序的救援工作。几天来，数百名抢救人员夜以继日地在爆炸现场寻找受害者。

二、使馆大爆炸现场报道

“狂奔的人群中传出惊恐的呼喊：‘大炸弹！大炸弹！……’

22 层的塔楼被炸成了空架。

被困者绝望地喊出：‘我要离开你们啦。再见。’

不可思议的是，从美国赶来的救援队装备精良，却迟迟没有参与救援行动。”

“黑色星期五？”

8 月 7 日上午 10 :35 左右，我们正在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中心以西 5 公里处的单位上班，突然听到“轰”的一声闷响，随即看见一股浓烟从市中心方向升起。数分钟后，就见窗外马路上“马踏途”

(当地话中的中巴汽车)和各色汽车,鸣着喇叭拼命地向西疾驰;一些行人也在狂奔。

站在路旁的一些市民不知发生了什么,好奇地喊着问到底发生了什么。飞驰的汽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只是惊恐地喊着:“大炸弹!大炸弹!……”

消息很快传来:美国使馆近旁的合作大楼被炸。紧接着我们看到飞奔的车流中有些车窗已被炸飞,有的车内还有浑身是血的乘客……几乎所有车辆都是向西,朝郊外方向飞驰。顷刻,就见一些军车和救护车飞速向市中心方向驶去。

从城里“逃”回来的人说,到市中心的路已经全被封死。

我们赶到爆炸地点时,见到美国使馆后侧的6层高的合作大楼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使馆后侧的玻璃窗已全被炸飞;合作大楼西侧22层的合作银行塔楼也成了一个空架。美国使馆周围一片狼藉,有些汽车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地上到处是血迹和玻璃碎片、破损的家具和衣物,被烟熏黑的美国使馆5层大楼前,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荷枪实弹把守大门,一个头上包扎着绷带的美国官员,手持大哥大,正在忙着指挥使馆其他人员和海军陆战队人员进进出出……

爆炸发生一小时后,肯尼亚电视台以“内罗毕悲剧”为题,在哀怨的音乐声中不断向观众播报救援工作的进展及有关信息。

到8日下午,肯尼亚外交部长公布的消息称,在这个被当地新闻媒介称为“黑色星期五”的爆炸惨案中,受伤人数为4257人,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

国际大援救

肯尼亚军方在爆炸发生后便立即紧急调集军队和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参加救援。

接到肯尼亚方面的救援请求后,由大约160名以色列军人组成的以军紧急救援队乘两架军用飞机于8日中午1时许抵达内罗毕。这些训练有素的救援专家带着7只救生军犬、气锤、冲击电钻以及其它一些专用设备。抵达后,他们迅速在被炸成废墟的建筑物前“安营扎寨”,成了救援工作的主力军。

据称 ,南非空军是在接到美国驻南非使馆的要求后紧急增援的。在代号为“红色警报”的救援工作中 ,许多内罗毕人也自愿加入了救援行列。

8 日下午 ,救援人员仍然能够听到瓦砾下的求救声 ,但到晚上 ,下面已经没有人的声音 ,可能是 30 小时的绝望和挣扎后 ,疲劳的幸存者已经再没有呼救的力气。但救援人员相信瓦砾下仍有约 20 名被困者还活着。

9 日早晨的消息称 ,死亡者中有 24 个美国使馆人员 ,其中有 10 名美国人和 14 名肯尼亚籍工作人员。但不可思议的是 ,在救援人员要求从美国使馆的后墙一侧打孔设法抢救困在合作大楼底层的伤员时 ,美方却坚决拒绝。

肯尼亚几家报纸随即刊登文章 ,说美国人太自私。人们没法不这样指责美国人 ,因为在爆炸后两天内 ,现场的瓦砾堆上只有肯尼亚人和以色列人在不知疲倦地抢救 ,美国海军陆战队只是在自己的使馆大楼内严加防范。随后赶来的美国救援人员虽然装备精良 ,但迟迟没有参与救援。

谁炸了美国使馆

这是过去 8 年来针对美国的第七起恐怖爆炸案。就在肯尼亚爆炸案发生大约 10 分钟后 ,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的停车场也发生了一起爆炸案 ,造成 10 人死亡 ,70 多人受伤。有消息称 ,一个自称“解放伊斯兰圣地武装”的组织声称对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使馆的爆炸案负责。这个组织声称其汇集了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圣战者” ,它强烈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从所有伊斯兰国家撤军 ,释放多名在押的伊斯兰激进组织领导人 ,否则它将继续打击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目标。英国的几家报纸近日称 ,一个叫奥斯马·拉登的沙特阿拉伯富商是这两起爆炸案的幕后策划者。据接近拉登的人士透露 ,他坚持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东事务的介入是对伊斯兰国家的一种威胁 ,所以对西方怀有深刻的仇恨。

据说 ,这位 43 岁的商人将自己财产的大部分用来支持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人们怀疑 1995 年沙特发生的造成 24 名美国人死

亡的爆炸事件和 1996 年在沙特的爆炸事件都是由他指使的。美国的情报人员正在设法追捕拉登。

目击者对内罗毕市中心美国使馆附近的大爆炸描述不一。据说,在爆炸前,有人发现 3 个阿拉伯模样的人,把一辆有篷的“标致”工具车开到美国使馆和毗邻的合作大楼附近,并将汽车尾部朝美国使馆方向打开,随即就发生了爆炸。也有人说,他们在爆炸前看到一辆“三菱”牌轿车从美国使馆右前方的交通转盘猛然向美国使馆前的停车处拐进。负责值勤的美国安全人员上前阻拦,并与车主发生了口角,随后又让这辆挂外交牌照汽车进入停车场。诸多说法,一时无法核实。但人们一致认为,爆炸是汽车炸弹所致。

肯尼亚总统莫伊先后两次去过爆炸现场,谴责恐怖分子,并气愤地说,即使有人对美国人不满,他们也不应该将悲剧转嫁给无辜的肯尼亚人民。

克林顿已经宣布不惜任何代价捉拿凶手,并致电莫伊总统,对肯尼亚受害人员及其亲属表示慰问。

美国发誓要捉拿凶手

在两个使馆爆炸之前,美国情报部门曾获得了有关情报,但没有当回事,“因为这种情报每时每刻都像雪片般地飞来,你不能每次都喊叫‘狼来了’”。可是这次真的“狼来了”。

消息传到华盛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立即把克林顿从睡梦中叫醒,通报情况。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专机刚刚在意大利着陆,就立刻调头飞回华盛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除商讨救援方案外,还决定派遣一个由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协助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当局进行调查,国务院立刻成立了一个危机处理小组,并命令美驻世界各国的使领馆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当天,克林顿总统发表讲话,强烈谴责这起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发誓要采取一切手段把肇事者绳之以法,不论付出多大代价或花费多少时间。为及早破案,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宣布,如有人能提供出最终抓住肇事者的线索,美国将悬赏 200 万美元。

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指出,爆炸事件属于战争行为,根据国际

法 ,美国可以向肇事者采取报复行动而无须经过联合国批准。

英国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所所长格特里奇说：“如果美国人民发现伊拉克涉及爆炸事件 ,那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也已到达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联邦调查局表示 ,在未来的几天内飞抵两个出事现场的调查人员将过 120 人 ,并有可能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事件现场确定到底用的是哪种爆炸物 ,以及用什么工具运送爆炸物。”调查局发言人指出 ,“查明炸药的类别和所使用的车辆后 ,我们就像找到指纹那样 ,知道凶手是谁了。”

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爆炸负责

爆炸事件发生的当天 ,肯尼亚警方在内罗毕逮捕了一个讲阿拉伯语的男子 ,怀疑他与此案有关。8 日 ,一个鲜为人知的“伊斯兰圣战解放军”组织的一名男子向埃及国家通讯社打电话 ,声称爆炸事件是他们干的 ,“一起由一名麦加人执行 ,另一起由一名埃及人实施。”这名男子有埃及口音 ,他拒绝透露详情。

伦敦出版的《生活报》报道 ,有人 7 日晚以同一组织的名义向报社打匿名电话 ,声称这两起爆炸案是他们按时按地发动的。上周 ,圣战组织曾公开声称 ,要对美国进行报复 ,因为美国协助阿尔巴尼亚将 3 名伊斯兰教徒引渡到了埃及。

圣战组织于 70 年代初出现在埃及 ,已被埃及政府禁止活动。该组织的信念是使用暴力除掉他们心目中所谓的腐败政府及其领袖。圣战组织领袖扎瓦赫里曾宣称 ,由于美国有意贬低伊斯兰国家 ,他们在没有选择的余地下 ,有必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圣战。

美国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认为 ,从爆炸事件的组织和协调水平之高来看 ,不是业余者所为 ,也不是这两个国家的当地组织能干得了的 ,作案者是个老手 ,“这就把矛头指向了中东地区 ,那里老手有的是”。

三、神秘的拉登宣布 :要攻击所有美国人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脑里 ,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的有 20 万人 ,恐怖组织 3000 个。奥萨马·本·拉登是这两起爆炸案的重点怀疑对象之一。当年 5 月 ,美国广播公司曾深入阿富汗山区 ,对此人进行了采访。拉登扬言 ,他将对所有美国人进行攻击 ,不分男女军民。他还在因特网上向美国宣战 :“美国一天天地推迟从阿拉伯半岛撤离的时间 ,他们将从穆斯林国家得到一口新棺材。”

拉登其人

●5 月 ,拉登扬言 ,不久将有震惊世界的暴力事件发生 ,果然不久就发生美国使馆爆炸案 ;

●拉登在 52 个兄弟中排行 17 ,貌不惊人 ,沉默寡言 ,甚至有些害羞 ,但却控制着 3 亿美元资产 ;

●拉登发誓 ,将所有美国人赶出伊斯兰的世界 ,不管他是军人还是平民 ,是男人还是女人 ,是老人还是儿童 ,这话令美国人“胆战心惊” ;

●拉登被指与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有染 ,还策划了谋杀克林顿和教皇等恐怖活动。

当年 5 月 ,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约翰·米勒在阿富汗的深山中采访了拉登。拉登说美国陷入黑暗的一天将会很快到来 ,不久将有震惊世界的暴力事件发生。

拉登做此宣布之后 ,美国设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风声鹤唳 ,一片紧张。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时隔不久 ,美国驻东非国家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两个使馆竟然同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怖爆炸事件。美国情报机构目前已将拉登视为这两起爆炸案的幕后最关键人物之一。

拉登倾心于暴力

拉登出生于 1958 年，父亲是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建筑业大亨。他在 52 个兄弟中排行 17。拉登年轻时才不出众、貌不惊人，平日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害羞。在他的家庭下属的建筑公司承揽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伊斯兰清真寺的重建和修复工程后，他开始对这些建筑和这些建筑背后的“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很快沉溺其间，走向极端。随后，他发誓要用暴力手段报复对伊斯兰教不敬的外国人，用炸弹和火箭把对伊斯兰世界构成威胁的外国人和外国军队赶出“伊斯兰圣地”。

80 年代，年轻的拉登离开自己在沙特阿拉伯舒适的家庭，参加了阿富汗伊斯兰圣战组织，展开了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斗争。拉登很快便成为在阿富汗参加战斗的阿拉伯人领袖，他领导的军队被称作“阿拉伯阿富汗人”。但在反对苏联军队的战斗过程中，他一直有意使自己远离美国的影响。那场战争使拉登成为阿富汗家喻户晓的人物。随后，他发表声明，对沙特王族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沙特王族允许美军队驻扎在沙特的基地，对伊斯兰来说是一种犯罪行为。他频频向广大教徒发出号召，使用暴力手段将美国军队赶出去，将沙特王室推翻。他领导的游击队也屡屡发起攻击政府和美军的活动。在此情况下，沙特政府取消了他的国籍，并将他驱逐出境。他先是逃到也门，后来被迫流亡苏丹。5 年后，苏丹政府迫于美国、埃及和沙特政府的巨大压力，将其“驱逐出境”。1996 年，拉登辗转返回阿富汗，寻求在那里“避难”。

拉登控制 3 亿美元资产

据报道，拉登家庭拥有 50 亿美元的资产，仅拉登本人能够控制的资金就在 3 亿美元以上。美国反恐怖专家说，拉登一方面为全世界的伊斯兰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也花费巨资建立了自己私人恐怖网络，并利用它展开各种各样的暴力恐怖活动。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上，拉登早已成为一个重头人物。

拉登说,他的毕生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的美国人赶出伊斯兰的世界,不管他是穿制服的军人还是布衣平民;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他是老人还是儿童。拉登的此番讲话不能不令美国人感到“胆战心惊”。

重大恐怖事件大都和他有关

美国情报人员认为拉登是过去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和幕后主脑人物。1993年10月,美国特种部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遭到伏击,损失惨重。数架美国军武装直升机被火箭击落,共有18名美军官兵遇难身亡。1995年,美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基地遭到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共有6名美国人丧生。两次事件均被认为是拉登的手下所为。拉登也被指控与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有染。在过去几年中他还涉嫌参与指使和策划谋杀美国总统克林顿、教皇保罗二世以及其它一系列恐怖事件等。

拉登的“事业”也包括为伊斯兰极端组织训练新一代恐怖分子。有报道说,拉登在苏丹境内的沙漠地带建立训练营地,专门为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等恐怖组织训练人员,增加“新鲜血液”。另外,他在菲律宾的丛林里、阿富汗的深山中也都设立了营地。他的“伊斯兰圣战组织”战士除了在世界各地搞恐怖爆炸之外,还被派往北非、车臣、塔吉克斯坦甚至波黑等地参加保卫穆斯林的战斗。

美国联邦调查局日前披露说,拉登最近又有新动向。他设立了专门用于恐怖活动的基金,伊斯兰极端分子一方面可以从这个基金中提取资金开展恐怖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获得酬劳。多年来,中情局和联调局为了将拉登缉拿归案,可谓费尽了心思,但拉登总能利用自己的网络轻易逃脱。就目前而言,即使美国的情报机构断定是拉登指使并策划了这两起爆炸事件,恐怕也对他无能为力。

拉登藏身阿富汗深山

拉登自1996年以来一直居住在阿富汗的深山之中。他极少与人相见,其间只是为了“让美国人了解他、害怕他”才偶尔接受几家美国电视机构记者(如ABC的米勒,CNN的阿内特)的采访。米勒是

最新采访拉登的美国记者，他介绍了自己当年5月进入阿富汗山区的过程，从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拉登的安全措施是如何严密：

由米勒率领的采访小组先是到达巴基斯坦最北部的村庄。在那儿，一位自称阿克拉姆的人先是检查了他们的采访设备，问了数不清的问题，他们单是在那里查验身份就耗了3天多的时间。在确信他们是事先约好的美国记者后，阿克拉姆方才“放行”。米勒等人被告知，他们将进入西方人不得进入的地区，为安全起见，他们必须换上穆斯林穿的长袍。

他们驱车抵达了巴、阿边境巴方一侧的最后一个小镇。阿克拉姆遇见了一位留着胡子、缠头巾的穆斯林老者，他似乎是那儿的负责人。一进入老者的室内，立即让人感受到一种紧张的战争气氛，因为墙上挂着好几挺机关枪，另外还张贴着一些坦克和炸弹的图解照片。米勒等人吃了顿便饭，并被告知先睡一觉，因为黄昏时分出发比较好，另外要进入阿富汗境内需要走好几个小时。

边境当时是由塔利班士兵控制着的。他们不允许外国记者进行拍照，而且米勒等人还被告知，塔利班不希望拉登多次公开露面并发表声明。

米勒等人只能另辟蹊径。他们将采访设备放到卡车上先行，然后他们顺着干涸的河床走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避开塔利班士兵，抵达了阿富汗境内的一座山脚下。运送采访设备的卡车早已抵达那里。米勒等人开着卡车在山谷中沿着崎岖不平的石子路前进，一路上都是检查站，卡车走不了多远就得被检查一次。米勒等人不仅被搜身，而且摄像设备也被拿走，检查人员说要进行彻底检查。原因是他们担心设备里藏有卫星信号发射装置，招致美军的空袭。

欲追捕拉登极为艰难

米勒等人不得不在拉登部队的一个营地苦苦熬了两天。第二天夜里，他们被告知，拉登准备见他们。卫兵只允许摄像师贝内特、米勒和翻译三人前往。他们被安排坐上了一辆带篷的小货车，两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人负责驾驶。小货车的篷就像一个闷罐，米勒等人什么也看不见。拉登显然不想让他们知道具体的方位。米勒等人惟

一能够感觉到的是 ,汽车先是在河床上行走 ,接着又一直在上坡。车子颠簸了三个多小时。途中 ,每隔一段距离 ,就会有荷枪实弹的卫兵从路边的石头后面突然跳出 ,用枪对准汽车 ,命令停下检查。在每一个检查站 ,拉登的士兵都会用步话机与下一个检查站以及拉登的基地进行联系。突然 ,他们的头顶上响起了机关枪“嗒嗒嗒”开火的声音。米勒等人吓得赶紧趴下 ,此举令驾驶者非常惊讶。后来米勒才知道那是士兵向拉登报告的一种方式。不久 ,拉登坐着他的那辆四轮驱动的卡车出现了。卫兵们又接连向漆黑的夜空发射了几百发子弹 ,巨大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中回响。据说卫兵们平日欢迎拉登的仪式都是这样。米勒等人在经历了几场虚惊之后终于见到了拉登。

据报道 ,日常对拉登进行保卫的人员共有 3000 多人 ,他们组织严密 ,装备先进 ,熟悉地形 ,形成了一个坚固的防护网络。美国特工人员根本无法从地面上进行袭击 ,而如果进行空袭 ,也会遭遇到其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的拦截。再说 ,拉登在深山中还有躲避空袭的山洞和撤退路线。因此 ,正如米勒等人事后所说的那样 ,美国特工要想抓住拉登 ,势比登天 !

四、用导弹打蚊子

美国早就盯上了奥萨马·本·拉登 ,大爆炸发生后 ,克林顿痛斥恐怖分子是“懦夫” ,并指控拉登阴谋刺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罗马教皇保罗二世 ,克林顿还下达指令 ,要所有的美国公司断绝与拉登经营的公司做生意 ,并呼吁世界各国的有关公司和金融机构停止与拉登的贸易 ,冻结拉登的银行账户。克林顿严正宣告 ,将组成国际统一战线 ,誓与拉登决一死战。在 8 月 20 日发起了对拉登的导弹袭击。

8 月 20 日当地时间上午 10 点 ,停泊在波斯湾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 7 艘战舰(包括一艘潜艇) ,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南 94 英里、靠近巴基斯坦边境上的科斯特小镇的 6 个地点 ,发射了 70 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据悉 ,这 6 个地点都是被怀疑策划本月 7 日发生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美国使馆汽车炸弹爆炸事件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奥萨马·本·拉登控制的恐怖主义基地、一个

以弹药库为主的补给基地以及 4 个训练基地。

同一天,当地时间傍晚 7 时 30 分,停泊在红海上的两艘美国海军战舰,向位于苏丹首都喀土穆附近的被美国怀疑为拉登出资研制 VX 神经毒气“化学武器工厂”的一家叫“希法”的制药厂,发射了 6 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将这家工厂彻底摧毁。美军战舰“战斧式”巡航导弹军事打击结束 20 分钟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他休假的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举行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军战舰对苏丹和阿富汗境内与“恐怖分子拉登有关”的恐怖主义目标进行的导弹袭击,是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的反击”。

世人对美国突然动武感到意外,但据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查尔斯·鲍勃参议员透露,美国当局早在 10 天前就已经在策划这一军事打击行动了。据分析,此前美国政府关闭驻巴基斯坦使馆,并要求在巴基斯坦的侨民撤离,就是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作准备。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美国决策层之所以决定在 20 日上午 10 点左右,从美国战舰向阿富汗城镇科斯特的 6 个地点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突袭,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掌握的“可靠消息”表明,由拉登资助或由其控制的多个恐怖主义组织的头目,将于当天从世界各地赶到 4 个训练基地中的某一个召开碰头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将军透露,这几个训练营地平时聚集有大约 600 名左右的恐怖分子。“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穆斯林逊尼派极端主义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一位未透露姓名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说,“从本质上说,它就像是为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组织培养骨干的一所综合性的恐怖主义大学……”

美军导弹袭击另一个与拉登有关的恐怖主义目标,位于苏丹境内的“希法”制药厂,是因为美国情报人员确认这家工厂正加紧研制生化武器,以供拉登发动新一轮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主义袭击活动。

在美国国务院 1997 年的一份报告中,拉登被称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活样板”。不过,在涉嫌制造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美国使馆汽车炸弹爆炸案之前,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暗处出没的拉登,并不是世界各国的决策人士、安全官员、特工人中以及新闻记者时常挂在嘴边的恐怖主义分子的名字。但 8 月 7 日美国使馆爆炸案件发生的当天,在

卡拉奇落入巴基斯坦警方之手的一名嫌疑人供出了拉登的名字。随后,美国情报人员得知一个名为“反犹太人及基督徒世界伊斯兰圣战阵线”的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在美国使馆爆炸案发生后声称,该组织将“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对美国人发动新的袭击,而这一恐怖组织的后台老板正是拉登,一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我们以前还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几乎所有的情报和线索都在向我们透露出一个强烈信息,指向一个特定的恐怖主义组织(指拉登控制的恐怖组织)。但这位情报官员拒绝透露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情报”以及从哪儿以何种方式获得这些情报等关键细节。

美国官方宣布,发动此次导弹袭击的目的并不在于击毙拉登本人,而在于有效摧毁他控制下的恐怖主义基地和设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柯里说:“我们并不清楚拉登在何处,也无法确定他是否就在遭到导弹空袭的那些恐怖主义基地中。”

中情局也一直在对拉登进行跟踪,他们发现,拉登的势力很大,而且行踪不定,并很少在一个地方连续住扎两个晚上。他们居住的那个山洞也十分偏僻。中情局曾就此辩论了很长时间,是否像捉拿诺列加那样,派一架直升飞机直捣拉登老巢,将其抓捕归案,但是由于考虑到难度相当大而放弃了这一计划。

事实上,美国情报机构对阿富汗和苏丹境内与本·拉登有关的恐怖主义目标,已达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从美国间谍卫星拍摄的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恐怖分子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基地中进行烈性爆炸物试验以及装甲车和坦克等重武器测试时的痕迹。美国情报机构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注意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南94英里处群山环抱中的那些准军事基地了。当时,拉登将这些基地用做抗击前苏联军事入侵的阿富汗抵抗武装的大本营,出入这些基地的作战人员有不少是拉登从中东招募而来的阿拉伯志愿作战人员。

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情报专家约翰·派克透露,美国情报机构获得的位于阿富汗境内拉登的恐怖主义基地的卫星照片,是由非常先进的“KH-11 织女星”间谍卫星拍摄的。这种卫星拍摄的照片解析度很高,可以轻易地将建筑物和机动车辆分辨开来。派克说,KH

- 11 间谍卫星具有红外拍摄功能 ,这使得即使在夜晚或是云层较厚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清晰的照片。除了间谍卫星外 ,美国情报人员很久以前就已经打通了从拉登的恐怖主义基地获取情报的渠道(包括特工人员打入以及收买基地恐怖分子出卖的情报) ,负责这一工作的主要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特工人员。据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杰弗里·理查森透露 ,特工人员能够对拉登的恐怖主义基地任何一个角落的电台、移动电话以及步话机通话内容进行窃听。此外 ,这些基地戒备森严的信息库 ,对于他们来说很多年以前就无险可守、来去自如了。“在基地信息奔腾来去的洪流中 ,我们能够很轻易地将‘我们将美国使馆炸掉吧’这样的句子同‘我们一块吃晚餐吧’区分开来。”理查森说。

“在最近两个月中 ,拉登的恐怖主义基地突然异常活跃起来。”美国国防部官员说 ,“一些用途不明的建筑接二连三拔地而起 ,其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但是美国情报机构并没有从这一基地获得的大量情报中 ,筛选出恐怖分子即将对美国使馆进行炸弹袭击的信息。直到惨剧发生后 ,他们才觉察到隐藏于其中的不少相关的蛛丝马迹。一错不能再错 ,美国在恐怖分子利用这些基地发动新一轮恐怖主义活动之前 ,抢先动手对其发动了袭击。到目前为止 ,美军对位于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目标导弹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还无法确定。据美联社报道 ,有 8 人在袭击中死亡。但据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家阿富汗电台报道 ,有 15 人在袭击中死亡。

美军导弹袭击的位于苏丹境内的目标 ,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地图上是一个生化武器制造厂 ,拉登向这家工厂投入了大量资金 ,用以研究制造 VX 神经毒气的一种关键化学品。据苏丹官方称 ,这家工厂并不是所谓的“生化武器制造厂” ,而是一家名为“希法”的私营制药厂 ,厂主是一名叫萨拉赫·埃德里斯的商人。据说 ,他在数月前从另一名苏丹商人那里买下了这家制药厂。

8 月 14 日 ,中央情报局长乔治·特纳特向克林顿呈交了一份正式报告 ,详细说明了他们的结论 :本·拉登与使馆爆炸案有联系 ,官员们称证据“确凿”。同时 ,中情局获悉 ,与拉登有联系的恐怖组织成员将在他的一个训练营地开会。情报报告认为 ,伊斯兰激进分子正密谋

对美国人发动新一轮的恐怖活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和国防部长科恩向克林顿提交了非常具体的导弹袭击计划,几个可能的目标都讨论到了。他们表示,一致支持采取军事行动,现在只需总统点头就行了。此时,许多美国人也许在想象,克林顿已经承认与莱温斯基的关系,即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现在他们两口子是不是正在讨论他们的婚姻是合是散。实际上,克林顿独自在一张借来的桌子上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这时候,伯格给他打来电话,对他说,现在改变袭击拉登的主意还来得及。但克林顿只说了一个字“打!”

五、拉登誓不低头

导弹袭击之后,拉登并没有被吓倒,而是通过代言人向外界媒体宣布,他将对美国的空袭进行报复,同时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抵制美货,并警告说,美国将面对另一个越南。近日有消息说,美国和以色列的特工已潜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等地,刺探拉登在阿富汗的活动场所……

建立卡伊达营地

80年代初期,奥萨马·本·拉登就选择了阿富汗为阿拉伯的圣战者们建立了名为“卡伊达”的大本营,卡伊达很快成为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里那些极端组织的领导中心。在伊斯兰圣战和抵御苏联入侵的旗号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青年来到阿富汗,加入到拉登经营的霍斯特、坎大哈、贝特安萨尔、贾拉拉巴德的训练营地。拉登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开设的公司为这些“志愿者”提供路费,当这些准备献身圣战的年轻人登上飞机之前,已经有一大把令他们心满意足的钞票拿在手里了。

据国际反恐怖专家估计,从80年代初到1995年之间,在阿富汗拉登大本营接受过训练的人有3万之众。这些人分别来自埃及、沙特阿拉伯、黎巴嫩、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苏丹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当时,这些训练有素的圣战者为阿富汗抗苏战争出了大

力。从 80 年代初至 1985、1986 年间，美国也给了这些反共斗士们以大量的援助，其中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便携式导弹。据估计，拉登团伙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获得的美国军事援助高达 2.5 亿美元之巨。那些年间，每个月就有 80 人到拉登营地受训。在这些受训者中，有各式各样的危险人物，例如被埃及政府于 1983 年判处死刑的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头目穆罕迈德·绍基等，这些“英雄豪杰”时常与拉登会面密谈。

拉登在选择阿富汗为最后落脚点之前，常在阿拉伯国家来往。他娶了一个菲律宾女人，在菲律宾有 3 家大公司。1995 年，蛰居苏丹的拉登因涉嫌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谋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闹得埃苏关系行将破裂，苏丹政府不得不奉劝拉登离开苏丹另攀高枝。

组织反美反犹国际阵线

据可靠材料证明，由拉登亲自指挥的卡伊达大本营被狂热的圣战者们视为反美反犹国际阵线的核心。当年年初，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恐怖组织曾在拉登的大本营聚会，宣布成立“反美反犹国际阵线”。这一阵线的创立者有：本·拉登、埃曼·扎瓦赫里——埃及圣战者组织头目，1981 年曾策划了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事件；拉法伊·艾哈迈德·塔哈——埃及伊斯兰团体负责人，去年 11 月在埃及南方的卢克索策划了杀害 58 名外国游客的事件；另外还有 2 名尚不知姓名的沙特反对派人士，以及分布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两个恐怖组织头目。阵线成立后，又从中派生出了一个新的军事组织——“伊斯兰圣战解放军”。据报道，正是这个“伊斯兰圣战解放军”，策划并发动了对两个美国使馆的爆炸袭击事件。

这些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恐怖分子，都在拉登的营地依据当今的国际高标准，即以实现最大规模的杀伤和破坏的要求，接受过高难度的特殊军事训练，尤其对携带和安放炸弹个个在行。这些人办事机敏，具有掌握和使用各种现代化复杂武器的经验。

拉登大本营的军事教官们多来自埃及和巴基斯坦，训练的重要科目包括如何使用诱饵皿和作汽车炸弹，以及怎样在远处用遥控装

置引爆汽车炸弹,这些爆炸极大的实际应用有以下例证:

1995年9月,埃及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被炸;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驻沙特阿拉伯的哈巴尔营房被炸;另外,埃及前总理西德基和前内政部长艾勒菲的遇刺事件也是他们一手策划的。除了爆破技术以外,受训者还要学会熟练地使用威力强大的各种新式枪械。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披露,这些在拉登大本营受训的人被称作“阿富汗的阿拉伯人”,他们对《古兰经》关于圣战和为真主献身的教诲刻骨铭心,并将其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准则。这些笃信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决意要用战斗、厮杀乃至流血牺牲去捍卫伊斯兰。在拉登营地的受训者中,沙特阿拉伯人最多,因为拉登的根基在那里,他在沙特的公司为他暗地里招兵买马十分积极。目前,各国安全部门一致认为,这个恐怖集团实施爆炸的材料、技术以及爆炸物的载体越来越新,并且先进和多变,很难预测和发现,这表明当今的反恐怖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昂贵的高效能的爆炸材料和装置、甚至需要用生化武器进行的这类恐怖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作为后盾,在许多阿拉伯国家拥有投资项目、银行和产业的拉登,为资助恐怖活动舍得花大钱,据最近的初步调查表明,仅在苏丹一地,拉登就注入项目投资5000万美元!

恐怖分子大聚会

1995年行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计划失败后,拉登领导的伊斯兰圣战组织被迫从苏丹转移到阿富汗。受到通缉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恐怖组织头目也纷纷到阿富汗与拉登聚会。这其中有“反美反犹国际阵线”的创始者们,以及该阵线军事部门领导人、策划在亚的斯亚贝巴刺杀穆巴拉克未遂的主谋穆斯塔法·罕姆宰。

那么,拉登为什么要建立反美反犹国际阵线呢?一位拉登大本营的知情者披露说,拉登想要通过这个途径把各国的极端恐怖组织纠合在一起,置于他个人的统一领导之下,以便集中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向伊斯兰的敌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袭击。另外,尽管拉登有钱,但现在要挑选甘愿实施自杀性攻击的敢死者越来越困难了。除了加强宗教的敢死说教之外,各路人马聚会后总会有为了一大笔钱而冒

死请战的“英雄好汉”。不过，现在拉登一伙财力雄厚，他们尽量减少自杀性的攻击行动，而是在当地物色和收买敢死者，并想方设法用钱铺路，使策划恐怖活动的主谋们在事发前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脱离险境。

就像这次他们在两起爆炸前后从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逃到阿富汗那样……

美国人麻烦不断

南非时间 8 月 25 日晚 7 时 20 分，位于开普敦繁华地段的一家名叫“好莱坞之星”的美国餐馆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一名妇女被当场炸死，至少 25 人被炸伤。据当地警方调查，爆炸是由藏在餐馆酒吧的一个爆炸装置引起的。这种爆炸装置是当地人称作“导管炸弹”的自制炸弹。

在爆炸案中，正在用餐的英国人吉丁一家三代五口有 4 人受伤。8 岁的孙女双腿被炸断，3 岁的孙子脊髓受重伤，儿子失去了一条腿，儿媳轻伤，惟一幸免的是祖母。

爆炸发生后不久，有人以“全球穆斯林反压迫组织”的名交打电话给开普敦一家广播电台，宣布对该事件负责，并称此举是对美国上周分别用导弹袭击苏丹和阿富汗的报复。美国国务院一位女发言人发表谈话，称爆炸案是“野蛮和卑鄙”的恐怖行为。她表示，美国政府目前还不能证实这起爆炸案是否与美国目前对阿富汗和苏丹境内被疑为恐怖主义基地进行的导弹袭击有关。

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已赶赴开普敦进行调查

英国国务秘书表示英国政府严重关注此事，并谴责任何借口穆斯林宗教信仰从事恐怖活动的行径。

开普敦爆炸发生数小时之后，在伦敦的“好莱坞之星”餐馆也接到炸弹恐吓电话，经警方搜索，没有发生意外，几小时后餐馆重新营业。

另据报道，乌干达时间 8 月 25 日上午 10 点 30 分左右，3 辆从首都坎帕拉驶出的长途客车分别在通往姆巴拉拉和古卢的公路上几

乎同时爆炸 25 人当场死亡 42 人受伤。当地警方认为 ,有人在这 3 辆车上安放了爆炸装置。

这一系列的恐怖行动 ,是否就是拉登宣称的“新一轮对美报复的恐怖计划”呢?美中情局对此无法回答。

利马日本使馆惊魂

1996年12月17日 秘鲁首都利马。

太阳西沉,夜色逐渐笼罩了利马这座充满南美风情的城市,晚风中处处洋溢着木薯酒浓郁甜美的芳香,利马这座现代都市开始了它的夜生活。

日本大使馆灯火辉煌,庭院里,各式日本宫灯闪烁着迷离醉人的光彩。大厅里,觥筹交错,笑语欢声,完全是一派热闹景象。

日本驻秘鲁大使青木森久正在官邸款待八方宾客。12月17日是日本天皇的命名日,每一年的这一天,日本驻外大使都要在驻在国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招待会。今年庆祝天皇63岁生日的招待会规模更为空前,出席宴会的人数高达800余人,被邀要人中除了秘鲁总统藤森以及他的众多亲眷外,还有不少国家驻秘鲁大使、秘鲁政府多位部长以及秘鲁的各界社会名流。青木森久穿梭于人群中,以特有的日本礼仪将晚会一步步地向前推进。尽管在晚会开始前,日本大使才得知,藤森总统因近几天要外出视察,这一次破例不能前来参加他每年都亲临的庆典会,但藤森的母亲、弟弟、妹妹及众多秘鲁内阁大员的来临同样使晚会声势不减,宾主都沉浸在日秘亲善的友好气氛中,青木森久的遗憾也很快消失了。从宾主乐意融融的笑脸与笑声中不难判断,晚会正步入佳境。

8点30分,似乎是为了使晚会的气氛更加热烈,官邸花园的围墙处突然连续响起6声巨大的爆炸声,硝烟弥漫处,只见一群头戴用五颜六色旗帜做成头套的蒙面人从洞口冲了进来,他们手提自动步

枪与 AK—47 冲锋枪 ,喝令人们原地卧倒 ,同时投掷烟雾弹 ,迅疾逼近了宴会厅。与此同时 ,宴会厅里的几个侍者也变戏法般从蛋糕里取出武器 ,对企图抵抗的警察和保安人员发起了攻击。里应外合 ,这群人在 15 分钟内便控制了官邸两层楼所有出口。爆炸 ,钻洞 ,射击 ,扣人 ,一连串动作干净利索 ,让人眼花缭乱。宴会厅里的宾客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呆了 ,他们还没有分清这是庆典精心安排的表演节目还是飞来横祸 ,就沦为蒙面人的阶下之囚。

“500 余名宾客沦为人质！这是秘鲁人献给日本天皇陛下的贵重礼物”。青木森久愣在那里 ,八方宾朋愣在那里 ,藤森总统的亲属愣在那里。他们都没有想到 ,本来是件喜事的庆典 ,转眼间成了一场祸事。而他们 ,本来是日本大使馆最尊贵的客人 ,现在成了绑架者手中最贵重的筹码了。

这是本世纪最大的一次人质事件。它是继 1979 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后又一次外交使馆被占。与伊朗人质危机不同的是 ,那次事件中沦为伊朗人人质的仅限于美国使馆人员 54 名 ,范围也仅限于美国一个国家 ,而这次危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劫持要人案件中 ,涉及高层人士数量最多的人质风波。身陷囹圄者有秘鲁政府的两位内阁官员 ,其中包括外交部长图德拉 ,农业部长穆尼亚斯特 ,还有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略·奇里诺斯 ,反恐怖主义警察司令 ,国家安全机构的将军 ,他们都是藤森政权的栋梁人物。此外 ,藤森总统的母亲、妹妹与弟弟也成了恐怖分子手中的筹码。除了中国、墨西哥、美国等国的大使因公事提前十余分钟退场外 ,前来出席招待会的德国、法国、巴西、玻利维亚、古巴、委内瑞拉、韩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大使被一网打尽 ,日本驻秘鲁大使青木森久自然也不例外。在献给天皇的“贵重礼物”中 ,130 位日本人和日裔秘鲁人也“有幸”作陪。

美洲 33 国、全世界许多国家以及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里约集团纷纷发表声明和讲话 ,强烈谴责这起恐怖主义行为。12 月 18 日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对秘鲁武装分子占领日本大使官邸事件发表声明 ,谴责这起恐怖行动 ,呼吁武装分子释放人质。安理会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这起恐怖事件 ,并称这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次攻击”。

在得知人质中没有美国人后,美国白宫发言人立即要求秘鲁不要与恐怖分子谈判。克林顿总统 18 日两次与藤森总统通话,表明他对事件的“关心”和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解决这一危机的决心。美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它正在研究派出一个训练有素的“反恐怖突击队”。美国国务院说恐怖分子不仅是对秘鲁的威胁,而且也是对整个世界的威胁。自 1981 年以来,美国驻秘使馆已遭到 10 次爆炸和武装袭击。日本政府对人质危机作出的反应最快。毕竟,事件发生在日本大使馆,被扣的大多为日本人,而且有迹象表明,恐怖分子这次是冲着日本来的,因此,日本各界对此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成立了针对此次事件的对策总部。桥本首相亲自挂帅,日本外相池田行彦 19 日乘专机飞往秘鲁,亲临前沿“阵地”,一方面与秘鲁政府进行协商,一方面与各国外交使团及当地日裔进行协调。从危机爆发开始,日本各主要电视台都把正常节目搁在一边,全力转播利马的情况,有的传播媒体一直在跟踪转播人质危机的全过程。被扣人质中日本人的名单、简历、职务都在电视屏幕上一一列出。仅确证人质数量就折腾了好几天。一向对自身安全很少担忧的日本人一夜间似乎成了惊弓之鸟,日本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加强了警戒。

自然,受人质危机影响最大的还是秘鲁。秘鲁政府的日常工作完全陷入了停顿,国会两个星期内停止了活动,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件事上。这次人质危机引发了秘鲁的经济危机与政权危机。从 12 月 18 日开始,秘鲁股市快速下跌,去秘鲁旅游的人数迅速减少。正对自己在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取得的成就志得意满的藤森真是吃了一闷棍,政治形象严重受损。1997 年 1 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藤森的支持率已经从人质风波前的 70% 下跌到 40%。在秘鲁对 2000 年总统候选人的民意调查中,藤森的支持率跌到了利马市长阿尔贝托·安得雷斯之后,仅有 26%。

策划这一震惊世界的人质事件的是秘鲁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它与“光辉道路”是秘鲁两个最主要的游击队组织,后来也成为著名的恐怖主义组织。

“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源起远晚于“光辉道路”,其影响也要小得多。如果不是因为这一起人质事件,人们大概不大可能想起还有

“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毕竟,连“光辉道路”都快被人们遗忘了,更何况这小小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影响虽小,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与“光辉道路”是同一个祖先的产物,走的也是同样的道路。

“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源起于1983年。其时,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早已消失,古巴革命也正经历着巨大的困难。因中央情报局的追杀,“游击战”理论的鼻祖、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也已作古。60年代那种火热的左派时代,已经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是,这个时候秘鲁却诞生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

“图帕克·阿马鲁”这个名字来源于印第安人何塞·曼努埃尔·孔多尔坎基。18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已经完成对印第安人的血与火的征服,何塞·曼努埃尔·孔多尔坎基率领印第安人揭竿而起,发动了反对西班牙殖民当局暴政的起义。他的母亲来自图帕克·阿马鲁一世家庭,图帕克·阿马鲁一世曾是比尔卡班印加王国的君主,后来在反对西班牙的征服战争中为西班牙当局所害。何塞·孔多尔坎基仰慕先人不畏强暴的精神,因此自号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不过,他的命运与他的祖先一样。1781年,起义失败了,他也死于西班牙殖民当局之手。图帕克·阿马鲁成了印加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象征,因此,当维克多·波莱·坎波斯和他的战友们在为新组织命名时,自然想到了自己光荣的祖先,因此,“图帕克·阿马鲁”也就成为新组织的名字。

由于“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主张改变现状,在秘鲁消除帝国主义的影响,因此,它对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下层人士、青年学生有一些吸引力。不过,“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吸引力远不如“光辉道路”,后者在全盛期曾达到1万人,而“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充其量不过600人。为了扩大影响,坎波斯曾想把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游击队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拉美游击队”,但没有成功。

秘鲁在80年代至1992年有3万余人死于暴力,平均每年达1800余起,但是这诸多的暴力行为,99%是“光辉道路”所为,能记到“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名下的大约只有1%。不过,“图帕克·阿马鲁

运动”的恐怖活动,数量虽然不多,但确实也有几件干得轰轰烈烈。如1984年,它袭击了美国驻秘鲁大使馆,从而一战成名。1988年1月7日,它占领了“利马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和美联社驻利马办事机构。1989年10月4日,它绑架了秘鲁某广播电视经理埃克托·德尔加多·帕克尔。三个月后,它又暗杀了前任国防部长恩里克·洛佩斯·阿尔宁。为了抗议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它又向美国大使馆发射一枚火箭。看得出,“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矛头是指向秘鲁的达官贵人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

至于为何选择日本大使馆,卡托列尼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大使馆得手后曾向新闻机构发送过传真,向秘鲁政府提出了四项条件:一、提高大多数国民的福利,藤森政权要保证重新研究现行的市场经济政策;二、释放关押在狱中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成员450余人;三、护送进入日本大使馆的游击队员,到其大本营所在地亚马逊地区,并保证其安全撤离;四、政府向游击队方面支付“战争税”,主要指在1990年藤森总统上任后对“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发动全面围剿中战死的游击队员的抚恤金;此外,卡托列尼还声称“日本一直对给秘鲁大多数人民带来悲剧的藤森总统给予支持”,对日本大使馆的占领也是对日本政府错误行为的“严正指责”。19日中午,“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还通过秘密电台发表了一则公告,谴责日本多年来干涉秘鲁的内政,以及日本对秘鲁经济的摧毁性改革。看来,选择12月17日在日本大使馆发难是早有预谋,其用意也昭然若揭。卡托列尼预计能在这里抓住秘鲁总统藤森,以其作为与秘鲁政府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最终使其同伙被释放,以便东山再起。日本大使馆被卡托列尼慧眼相中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不满藤森政府现行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贫富悬殊差距拉大的社会现实。藤森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恐怖主义,使秘鲁的社会秩序明显改观,为此藤森自豪地宣布:“秘鲁反恐怖主义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经济发展上,藤森的经济政策也卓有成效。秘鲁的通货膨胀由1990年的7600%下降到95%,经济增长率由5.4%达到7.7%,1994年曾创纪录地达到12%,与那一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奇迹遥相对应,成为当年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颗耀眼的“新星”。藤森本人也赢得了“恐怖分子的克星、穷人的救

星”的美誉。1995年藤森第一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以高达64%、42%的得票率获胜,成为秘鲁历史上第一位连选连任的民选总统。踌躇满志的藤森准备在新的任期内充分展示其才华,进一步实现其远大政治抱负,但积弊过深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却接踵而至。在藤森发动“自我政变”后,舆论进行了严厉谴责,许多西方国家均中止了对秘鲁的经济援助,秘鲁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即使藤森寄予厚望的1996年,预计增长率也只能是2%。而秘鲁每年超过20%的失业率却在等待藤森政府去妥善处理。此时,藤森把解决诸种问题的砝码押在与他有“血亲”关系的日本身上。实际上,自从藤森出任秘鲁总统以来,日本一直是秘鲁最大的经济援助国,1991年日本对中南美的援助中秘鲁所占比例最高。就在西方停止对秘鲁的援助后,日本对秘鲁仍是“不改初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秘鲁对日本的各种依赖关系也逐年加深了。藤森担任总统六年以来,几乎每年都要访问日本。日本驻秘鲁大使青木森久在秘鲁的影响之大、涉足之广、插足之深,也是其他国家的大使不可望其项背的。他是藤森总统的座上宾,秘鲁的重要庆典活动他都会参加,而且会作代表性的讲话,青木的这种地位,即使是美国大使也不能与之比肩。要知道,秘鲁是拉丁美洲的一员,与日本相距千山万水,而拉丁美洲却历来是美国的后院。当年,美国总统门罗通过一纸宣言把头号殖民帝国英国逐出拉美,它又怎能容忍日本对秘鲁的染指?可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华盛顿对日本的所作所为一直隐忍不发。这对那历来喜欢发号施令、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的美国来说,已经是够大度的了。

但是,华盛顿可以对藤森政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秘鲁人自己可忍不住了。在日本的经济援助问题上,秘鲁国内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一派认为,日本的援助有助于秘鲁的经济振兴,秘鲁的繁荣离不开日本的经济援助。另一派认为,日本的援助只是使秘鲁国内少数人受益,大部分秘鲁人依然贫穷,秘鲁原有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就这样,日本的经济援助分裂了一个完整的秘鲁,或者说使一个本来就不完整的秘鲁分裂得更厉害了。亲日派拥护藤森总统,视之为秘鲁的救星、秘鲁新时代的希望;反对派的态度正好相反,认为亲日派总统不能解决秘鲁国内的问题,反而会与“帝

国主义”勾结起来,镇压国内的反政府武装。为了对抗政府的亲日政策,反对派甚至拿日本人出气。1990年以来,秘鲁已经发生了12起袭击日本大使馆和日本企业事件。1991年7月,甚至有3名日本技术人员在利马被杀,杀手是谁不得而知。历来善于蛊惑人心、蒙蔽视听的卡托列尼显然是抓准了秘鲁人广泛但隐秘的深层心理,将“反帝国主义”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革命”大旗从美国大使馆移到了日本大使馆。从这一点来说,卡托列尼不仅是一个军事奇才,还是秘鲁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

卡托列尼攻击日本大使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日本被世界称为最容易在恐怖分子面前屈膝的国家。面对如洪水泛滥的恐怖活动,许多明智的国家早已达成共识: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挟,只能导致更多的恐怖事件,“绝不向恐怖主义屈服”成为全世界针对恐怖活动的通行做法。但是,世界上这么多国家,不可能在一个问题上的看法总是一致的,链条总是在它最脆弱处被击碎。日本,就是这根链条中最脆弱的一段。恐怖分子总能在日本人身上频频得手。1974年1月,一批恐怖分子冲进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将日本大使和其他28人扣为人质。日本政府马上遵从恐怖分子之命,调用一架日航喷气式客机飞往科威特,再到新加坡接回作案未遂逃入公海的5名同伙,将他们一起送到了南也门。1975年8月,日本恐怖组织“赤军”派出五人突击队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举占领了美国领事馆和瑞典大使馆,要求以50名外交官的生命换回7名关押在日本的“赤军”分子,并派一架DC-8型飞机将所有人员一起送往利比亚。最后,他们也如愿以偿,一个折扣都未打。1977年,美国第一流的银行家、卡特总统的密友约翰·卡市里尔在乘坐巴黎飞往东京的日航DC-8型客机时被“赤军”劫持,150名乘客与机组人员也同时被囚。事后日本政府乖乖地按“赤军”提供的名单释放了九名犯人,并交出了600万美元赎金。1986年11月,日本三井物产公司马尼拉公司经理在菲律宾遭绑架。136天后,恐怖分子从他身上勒索到了250万美元。日本一名高级警官曾无可奈何地总结道:“我们就像一群驯服的马驹,而鞭子却操在恐怖分子手中。”这句话颇具讽刺意味。对恐怖分子的要求,日本政府不敢说半个“不”字,恐怖分子只要挥挥鞭子就可

以任意驱使了。就在秘鲁人质危机发生前四个月的 1996 年 8 月 10 日晚,日本三洋电气公司美国公司的总裁金野卫在墨西哥蒂华纳参加了一场棒球赛后,返回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寓所时遭绑架,9 天之后他毛发未损获释。不是恐怖分子对日本人特别人道,而是因为日本人痛快地掏出了 3200 万美元。钱财是身外之物,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有一口气在,还怕有“经济动物”之称的日本人赚不到钱?对这些往事,作为恐怖分子的卡托列尼也是烂熟于心的。他心里最清楚,袭击日本大使馆意味着什么。这一次,卡托列尼又高高举起了鞭子,让日本朝野去折腾吧,仅这一点就够藤森受的。

人质危机发生后,大使馆附近的街道俨然成了堡垒森严的作战前线,武装直升机在低空盘旋,坦克炮直指大使官邸,官邸周围由沙包、铁簇篱交织成严密的封锁线,身着防弹衣、头戴钢盔的军警将大使馆围得水泄不通。使馆附近的制高点上,秘鲁警方的狙击手枕戈待旦,注视着使馆内的一举一动。这一夜,藤森总统更是难以合眼。事件发生后两小时,他即与三军司令和其他重要阁员进行了磋商。会上,主张用武力迅疾解决的强硬派与主张“和平谈判”的温和派争执不下,就是藤森本人也摇摆不定。他想起哥伦比亚 1985 年的一次事件。那一次,恐怖组织“四·一九运动”占领了司法大厦,300 名政府官员沦为人质。哥伦比亚政府决定采取暴力手段解决危机,两小时后军警发起猛攻。恐怖分子以为,众多人质落在他们手中,政府不敢轻易动手,思想极度麻痹。政府的行动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因此,营救人质的行动取得了成功。藤森觉得,攻其不备,虽不失为解决人质危机的“速效胶囊”,但仍是一个险招,而且付出的代价可能极为惨重。当时的哥伦比亚总统贝但库尔一边品尝 30 余名恐怖分子被歼灭的胜利果实,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死伤 28 名政府要员的惨痛现实,包括最高法院院长阿方索·雷那斯在内的 28 名高级官员在枪战中死于非命。他们是死于恐怖分子之手,还是死于哥伦比亚政府军之手?相信阿方索·雷那斯至死还在询问这个问题,但谁能给他一个答案?何况,藤森的胞弟、胞妹和母亲都落在恐怖分子手中,一旦政府军发起强攻,难保恐怖分子不会拿他们出气。更严重的是,这次人质危机,不仅仅是秘鲁的内政问题,被囚人质中,涉及 14 个国家的大

使,这个分量可不轻啊。万一这些国家的使节有个三长两短,他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如果惹出什么国际纠纷,他藤森可成就了千古罪人了。

如果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放了坎波斯等人,情况会怎么样呢?他自上任以来,就推行严厉镇压恐怖活动的政策,而且取得了不少成绩,其政绩蜚声秘鲁国内外。如果他在压力面前屈服,那不啻是自打耳光,肯定会严重影响其政治形象。藤森是无论如何不愿出现这种结局的。

可是,如果不低头,那就要采取武力解决,派突击队进攻大使馆。但是,根据国际法,大使馆是日本领土的自然延伸,秘鲁政府要采取任何行动,事先都必须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而日本向来是情愿妥协的。再说,恐怖分子要求释放的犯人与日本没有关系,而恐怖分子扣留的人质却大多是日本人,要让日本政府同意秘鲁的要求,确实是难上加难。

一夜未眠。藤森思前想后,反复比较与权衡各种可能的后果,还是难以下最后的决心。但时不待人。天就要亮了,恐怖分子还在等着政府的答复,而政府阁员还在等着总统的决定。无奈,藤森想出了一个“拖”字术,尽量与恐怖分子周旋下去,不让他杀人,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慢慢想办法。卫生部长多明戈·帕莱罗莫出马,作为政府的谈判代表,具体实施这项战术,争取和平解决危机,保证人质生命安全。

藤森竟然不亲自出面参与谈判,而只让一个无足轻重的卫生部长出面,这种姿态让卡托列尼十分气愤。现在人落在我们手里,你藤森竟然还这么强硬!卡托列尼气坏了。他气急败坏地说要首先处决外交部长,以示惩戒。后来,这个“惩戒”活动没有付诸实施。毕竟,双方都在僵持之中,都在摸对方的底,过早地亮出底牌,对自己不利。因此,卡托列尼隐而不发。

藤森遇到了麻烦,卡托列尼似乎日子也不好过。他没有想到这次出击会抓到这么多人质。人质多也有烦恼,十几支枪对着500多人,万一人质骚动起来,他们可应付不了。一旦枪杀人质开始,人质见没有生还希望,那肯定是要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的。到那时,局面

将难以收拾。而且,他们此次行动的目的不是杀人出气,而是为了营救关在狱中的坎波斯和南希。杀了人质,藤森还会让坎波斯他们活着走出监狱?思忖再三,卡托列尼决定,忍耐一下,不要冲动。他向急于杀人的同伴解释说:“我们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通过谈判释放我们的战友,所以不能执行死刑。”关的人太多了,使馆里难以容纳。而且,此次落网的有14国大使,卡托列尼不想树敌过多,因此,18日上午,卡托列尼首先释放了德国、希腊、法国和加拿大四国大使,一名秘鲁外交部的资深外交官也获得释放。他们获释的条件是组成一个“谈判团”,负责把卡托列尼的四项“建议”传达给藤森政府,实际上是让他们充当信使。8时40分,加拿大大使手举一张白纸,与他的四位同道走出了日本大使馆。他们立即被新闻记者包围了。迎着耀眼的镁光灯,他们宣读了卡托列尼草拟的声明。声明要求与政府谈判解决危机,并表示尽量不流一滴血,但这一切主要取决于藤森的态度。午夜时分,德国大使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两名成员的陪同下重返使馆,带回了秘鲁政府“放下武器,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的“反建议”。这个“反建议”又一次惹恼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武装分子,他们再次发出死亡威胁:“如果今晚藤森不来谈判,我们将拿秘鲁外长科德拉开刀。”

19日中午,秘鲁当局不得不让卫生部长多明戈·帕莱罗莫与卡托列尼指定的谈判代表进行秘密会谈。谈判结束,双方都声称已就如何释放人质及一些谈判规则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此后,国际红十字会的调停人在日本大使馆进进出出,穿梭协调。他们还为人质送去3500份食品、20台电风扇、一大堆卫生纸、10副象棋和一些药物。卡托列尼还允许红十字组织派一个医生给人质做检查,并让他为一个受伤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战士作了手术,此举大大缓和了使馆内的紧张气氛,很多人质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这一切似乎预示,这场人质危机有望得到解决了。

卡托列尼对此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一边命令敢死队员们把手榴弹与其它爆炸装置挂在身上,并在官邸内的重要位置安置更多的地雷与饵雷,以便能在警方的突然袭击中导致“规模空前的大爆炸”,一边也在寻求解决人质危机的“捷径”,他采取的方法是“视藤森态度”

而不定时地释放人质。这既可以让国际社会看到自己谈判的“诚意”，让一些国家去向藤森政权施加压力，争取“和平解决”，也可以缓解众多人质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看管压力，放掉一些与秘鲁当局关系不大的“小虾米”，而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人质中的“大人物”们身上，最终让秘鲁当局在国际压力下，为了保护显要人物的生命安全而选择长期等待而不是试图使用武力。

20日上午，卡托列尼又释放了第三批人质，让四名步履蹒跚的老弱病残者获得了自由。中午时分，秘鲁电视台宣读了藤森总统在人质事件后的首次公开讲话。藤森表示：“人质的安全是我考虑的首要问题，我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危机的和平解决。”电视台还宣读了藤森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一封信。信中说，目前他不会采取草率的军事行动。虽然已有一些外国的特种部队抵达利马愿意主动提供帮助，但这一危机将完全由秘鲁政府自己来解决。20日下午，秘鲁政府内阁会议作出决定：拒绝恐怖分子提出的释放“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全体被囚人员以换取全部人质的先决条件，但可以继续展开谈判，并为被关押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若干成员提供一些宽松条件。

21日，卡托列尼释放了38名人质，其中包括巴西、韩国、埃及大使和秘鲁国会议员哈维尔·坎塞科。坎塞科还带出一份卡托列尼的声明，声明敦促秘鲁政府加快谈判速度，以便人质危机能尽快得到解决。在双方“愿意坐下来谈判”的前提下，秘鲁政府与卡托列尼就“释放谁”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是恐怖分子先释放人质，还是政府先释放被囚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武装分子？22日上午6点16分，卡托列尼从日本驻秘鲁大使官邸一幢楼的窗口中丢出一个纸团，上面有“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武装占领人员所使用的便携式对讲机的频率，同时还要求与利马电视台4频道建立“热线”联系。在“热线”接通后，卡托列尼说：“今后的几天内我还将继续释放一些与秘鲁政府没有多少关系的人质，至于如何处置与秘鲁政府有关的人质，要看秘鲁当局的态度。”他重申，只要关押在监狱里的伙伴获释，他们愿意放下武器。从这个声明可以看出：卡托列尼虽然放弃要藤森亲自出面试谈的条件，但要求用人质换取其在押成员的立场没有任何动

摇,这也是他本次行动的根本目的。被关押的秘鲁外交部长和日本大使青木森久也通过对讲机要求秘鲁政府慎重考虑劫持者的条件,并婉转批评了秘鲁政府不与恐怖分子直接见面而只是依赖几个被释放的外国大使作中间人的谈判方式。被胁迫的部长与大使语调平静、稳定,仿佛是在进行日常的广播发言一样。

藤森总统迅速对“对讲机谈话”作出反应。12点,他突然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但此次公开谈话的内容却与20日大相径庭了。他态度坚决地表示,秘鲁政府决不与人质劫持者讨论和平与协议,人质在枪口下是无法商讨和平的,只有恐怖分子将武器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并释放所有人质,才有可能排除政府采取武力手段的可能性,才能研究如何给他们一条出路。秘鲁政府不能接受一支恐怖队伍强加给2300万秘鲁人的暴力行为。

藤森的这番讲话与卡托列尼的期望显然是南辕北辙。卡托列尼气急败坏,立刻给法新社驻利马的办事处发出一份传真:“如果秘鲁总统下令武力解决人质事件,游击队也将下令对整个秘鲁国土上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显然,卡托列尼又一次向秘鲁当局发出警告:“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力量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大使馆,在秘鲁的各个地区仍有一批游击队员们在伺机而动。

此时,被释放的人质先后已达200余人,可是使馆中剩下的300多人质的生活环境却严重恶化了。他们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而供水却不能按时保证,日本大使馆内许多房间都成了临时卫生间,卫生状况极差,随时可能爆发如霍乱之类的传染病。住房也拥挤不堪,闷热异常,胃病、心脏病等各种病症严重威胁着人质的健康。食品也不够,有时得四个人分一份食品。被扣押的人质纷纷从窗户中打出用日、德、英、西等文字写的标语,要求外面的人多送水和食物,恢复照明,恢复通风,让他们与家人联系,同时要求秘鲁方面允许日本记者进入使馆采访游击队员。在大使官邸外,一些人质的亲属试图自己将食品、药品及衣物带给亲人,他们的呼唤声和警察的威吓声混成了一片。不少人质的亲属甚至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政府正式声明放弃武力解决人质危机的想法。

迫于卡托列尼与人质亲属的双重压力,秘鲁政府重又通过对讲

机声明：只要恐怖分子不枪杀人质，秘鲁政府愿意就和平解决一事进行进一步谈判。

这次“硬碰硬”的谈判风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晚上9点左右，日本大使官邸的大门突然打开了，由秘鲁前劳工部长领头的四个人质出现在大门口。大约过了5分钟，200多名人质排成一列也缓缓地走出了大门，三辆大巴在夜幕中接走了这批喜极而泣、惊魂难定的人质。

当然，卡托列尼的“恩典”依然是有条件的。他说释放这批人质是圣诞节之际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是鉴于秘鲁政府22日发表声明的新态度。他同时指出，秘鲁政府必须安排他前往某个拉美国家，并将扣押的人质作为其俘虏与他们一道行动。除非他们被关押的同伙得到释放，他们将不再释放人质。至此，被扣在日本大使官邸的人质主要是秘鲁政府的几位部长和司法军警要员，以及拉美、亚洲国家的外交官和若干日本商业、企业界人士，藤森总统的胞弟也在其中。

随着大批人质的获释，藤森总统的压力更大了。通过释放人质，卡托列尼已经在这场危机中先得一分。在危机之初他是人人咒骂的恐怖魔头，但随着其频频摇动“橄榄枝”，他在公众舆论中俨然成了可以放心地与之协商解决问题的和平天使。不少公众对于“和平解决”秘鲁危机更寄与厚望。而对藤森来说，在危机发出之初，他本来是倾向于用武力制服的强硬派。他对《时代周刊》记者反复地诉说：“你怎么能让我去与这些罪犯谈判？我不会放过这些人的，永远不会。”但随着卡托列尼施展连续释放人质的怀柔政策，藤森却深感问题棘手。他不断警告国内外倾向于“和平解决”的人们：“如果你们熟悉恐怖分子，就不会对他们抱有幻想。”他反复强调不与恐怖分子妥协，声称要与恐怖分子打持久战，直至其疲惫时出其不意地制服他们救出人质，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对卡托列尼作出让步，从开始不谈判的强硬态度过渡到派出卫生部长去交涉，从开始决不与恐怖分子作交易转向公开表示，如有哪个国家愿意接纳恐怖分子，他可以让他们平安离境。他甚至亲自充当说客，出访玻利维亚，想劝说玻利维亚接受这批“出口”的恐怖分子，并责成秘鲁军方制定一个“紧急空运计划”，让恐怖分子安全离境。

藤森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实际上是国内外“强硬派”与“温和派”不断施加压力的结果。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不主张藤森采取任何激烈的、后果“可能是严重的”军事行动。桥本首相和池田外相一再表态,首要问题是保证人质的安全,因为人质所面对的是一群有刀有枪有炸药的恐怖分子。在卡托列尼多次释放人质之后,东京政府更是直接表示,希望秘鲁政府与卡托列尼达成幕后交易,释放被囚游击队员,确保他们重返森林地带,但藤森强硬的态度却使日本说客铩羽而归。池田几次与秘鲁方面进行商谈,但最后都是不欢而散。日本政府发言人尾三静六在2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说:东京和利马就如何处理秘鲁人质危机的立场相距甚远,这些分歧拖延了危机解决的进程。除此之外,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就如何解决这场危机也存在着微妙的分歧。尾三静六所称的“其他国家”显然是指美国。美国政府在对待人质危机的态度上与日本正好相反。危机之始,美国就把解决危机视为挽救美国对秘鲁影响渐趋式微的一个良机,从克林顿的口头发话到美国派遣的“安全专家小组”和从巴拿马迅速调动60名“三角洲特种部队”官兵待命,无不显示美国政府对此次危机异乎寻常的关心。值得一提的是,“三角洲”部队是1979年美国驻伊朗使馆被占领之后创建的,其任务主要是反劫持。自从1979年伊朗学生占领大使馆后,美国驻外机构一直太平无事,“三角洲”部队无所事事,没有想到18年后却在利马日本大使馆派上了用场。美国国务院在确认人质中没有一个美国人以后,就不断向秘鲁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藤森政府不要向恐怖分子低头,称美国将是秘鲁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强后盾。而对美国在人质危机上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日本政府曾公开告诉秘鲁当局“日本政府反对外国进行军事干预”,此指向再明显不过。

无论人质危机何去何从,藤森的前面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征途漫漫。不过,这种巨大分歧的相互掣肘也是有效果的,藤森与卡托列尼的谈判在一次次的妥协与对抗中拖延下来。藤森犹如手拿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时而应用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如果你的剑不够长,那么,请向前跨一步”的名言,与卡托列尼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时而他又将这原则灵活变通为“如果你的剑不够长,那么,请后退一步”,以真诚

得几近虚伪的态度与恐怖分子虚与委蛇。人质危机的谈判就这样一次次走向僵持，直到所持弓弦欲断时，新的妥协又出现了。进攻与防御、抵触与对抗、断然拒绝与主动求和使僵持实际上演变成一场斗智的持久战，一场狮子与狼之间的较量。

12月28日，秘鲁教育部长巴勒摩直接进入日本大使馆与卡托列尼进行了3小时15分钟的面对面交谈。这是双方自危机以来的第一次直接谈判，有关细节秘鲁政府与卡托列尼都避而不谈。但是到了29日，已经声明不再释放人质的卡托列尼又释放了包括马来西亚、多米尼加大使在内的29名人质。这一举动发生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许多人都有理由把它视作和平的呼唤。

1997年的开局也不错。卡托列尼又与秘鲁政府几度举行秘密会谈。此间，卡托列尼反复强调，“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准备以谈判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从占据的日本大使馆撤退，“我们愿意看到在秘鲁实现全面与持久的和平，为此，我们愿意负起责任，行动起来。”他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秘鲁新闻界冠之以“恐怖分子”的称谓十分恼怒，说他们这样看待他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

3月份，藤森在国内的支持率降到了他上任以来的最低点，但他与卡托列尼的交锋却略有所获。谈判出现了一线曙光，卡托列尼一度答应不以“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成员的全部释放为首要条件，但在秘鲁政府拒绝释放坎波斯与南希等“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骨干分子时，谈判又告破裂。这一结局令藤森形容憔悴，但在公开露面时，他仍然不失其誓不罢休、决意与卡托列尼周旋到底的本色。

在马拉松式的谈判中藤森终于迎来了他寄予厚望的4月份。4月历来是藤森高奏凯歌的月份，他就是在1990年4月和1995年4月两次胜出，成为秘鲁总统的。今年的4月份，藤森希望有所建树，为布满荆棘的政治前途扫除最大障碍。他决意与卡托列尼分出个胜负，结束这场马拉松式的心理煎熬。

4月22日正午，对于仍关在使馆内的人质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126天的囚禁已经让他们从一有风吹草动就躁动不安的惊弓之鸟慢慢变成了麻木不仁、百无聊赖的看客，整天只能或坐或卧的

姿势也使他们厌倦了宝贵的午睡时光。在一座古色古香的挂钟单调的嘀嗒声中,人质们照例又开始了他们称之为“松弛法”的节目——聊天。

被集中在二楼的人质谈兴正浓。他们从法律、政治谈到烹饪技巧,从私有化改革谈到体育比赛,常常是某一问题刚刚展开,就卷入了白热化的争论中。人质们争先恐后地参加辩论,往往是一方话音刚落,另一方宏论又起,当双方争执不下时还有人用即兴演讲来调和矛盾,赢得或多或少的一些掌声。时针这才走到了15点,时间漫长得如同过了半个世纪。

本来还对私有化话题颇感兴趣,间或也“贡献”宝贵意见的五个看管人质的恐怖分子打起了哈欠。他们向卡托列尼打了招呼后就到一楼的大厅里踢室内足球去了。126天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段不短的日子,每日24小时的监视使他们比人质更为疲乏。生命在于运动,要想保持足够的体力,打赢这场持久战,适当的运动是少不了的。

他们走后不久,秘鲁前海军少将路易斯·詹彼得却像得到什么信息似的紧急行动起来。他诡秘地对身边的人质耳语着什么,所有人质惊诧却顺从地匍匐在地。待所有人质准备就绪,他又快速走到室内的一个十字架前,对其大声地说道:“可以行动。”

15点27分,只见使馆大厅、餐厅、花园的三个隐蔽角落一阵阵白光窜出,随之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五个正在踢室内足球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游击队员还没有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被炸得身首异处。只见硝烟弥漫处,露出了五个大洞,200多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仿佛从地底下鱼跃而出,冲进了官邸大厅与餐厅,3名恐怖分子还没来得及拿出枪,就被从餐厅地道口冲出的突击队员当场击毙。卡托列尼慌忙集中起仅剩的6名恐怖分子,与正面闯入大使馆的突击队交起火来,但是突击队员的MPS冲锋枪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更不用说上楼去枪杀人质了。藤森的“拖”字术此时为人质赢得了最宝贵的生存机会。长期的疲倦消磨了卡托列尼的耐心,也使他失去了狼犬般灵敏的嗅觉与兔子般的谨小慎微。他忘了将一再声称的爆炸装置披挂在身,曾让人惊恐万分的使馆“空前大爆炸”

就这样错失“良机”了。15 分钟后，卡托列尼及六名恐怖分子横尸大厅，人质营救仅花了 38 分钟就获得了成功。72 名人质中，除秘鲁最高法院法官阿库尼亚因受伤流血引起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外，其余人质安然无恙。日本大使青木森久面带微笑，走出了大使馆，他与其他 25 名因轻伤和身体状况不佳的人质一起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

这次营救行动代号叫“查文—德万塔尔”行动。它是由特种警察部队的司令安东尼奥·克汀将军负责的。但是，这次行动的最高领导则是藤森总统，自始至终，总统参与了行动计划的制订。“查文—德万塔尔”是印加帝国之前一个著名的文化时代，取这个名字除了出于保密的因素外，还因它与“图帕克·阿马鲁”一样带有印加文明的神秘气息，因而安东尼奥·克汀将军认为它也许能成为克制后者、出奇制胜的法宝。也许真有神灵保佑吧，一开始藤森对这项行动并未寄予厚望，只是作为“和平解决”的辅助手段，在不得已采取武力解救时才采取的应急措施，但随着拖延战术赢得宝贵的 126 天，“查文—德万塔尔”行动也就紧锣密鼓地展开并一天天地完善起来。最初，安东尼奥·克汀将军把计划的重心放在训练狙击手上。他在利马郊区搭建了一座日本大使馆的模型，一次又一次地指挥士兵掌握营救入质的基本技巧：在恐怖分子松懈或者睡着时袭击；在袭击的头几秒钟用炸药造成混乱；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准确无误地判断恐怖分子的方位并干净利落地将他们消灭。所有步骤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但一个致命的难题是：这一次人质数量多而且集中，任何论证详细的正面袭击都难免出现漏洞。但是，四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为安东尼奥·克汀将军提供了新思路：既然卡托列尼能掘地 250 米从插翅难飞的坎多·格朗德监狱解救出坎波斯，那特种部队又何尝没有能力挖几条地道通往大使馆呢？从 3 月份开始，特种部队开始朝大使馆挖地道。这些地道共 5 条，深 3 米，最长的达 80 米，地道内有照明、空调和通信设备，供人在里面呆几天。毙命的卡托列尼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几年前天才般的“创作”会被“还治其人之身”。

卡托列尼无法想到，在他眼皮底下居然还真有詹姆士·邦德式的特工人员在活动。本来，在人质危机发生后，有一个恐怖分子的脚步

受伤,根据他的要求,秘鲁方面为他准备了一副拐杖,并在里面安装了一个精巧的窃听器。这个窃听器为秘鲁当局在人质危机发生后了解使馆内的动态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这个恐怖分子脚伤好了,拐杖也就给他扔了。秘鲁警方又成了睁眼瞎。后来,秘鲁警方在国际红十字会送进使馆的诸多应急与慰问物品中又藏匿了一个窃听器,让路易斯·詹彼得利用它直接和秘鲁情报机构联系。一开始,路易斯·詹彼得并不知道窃听器藏在哪里,他只能趁恐怖分子不在时不断地对着鲜花、灯具甚至便桶说话,想检查究竟是什么东西里装有“机关”,可是始终一无所获。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一名人质让他试一试十字架,十字架里传来了“福音”,里面安装的麦克风把他的声音及时传了出去。人质与秘鲁警方的“秘密联络通道”沟通了。就在此时,卡托列尼仿佛对连续一星期在使馆外一个扬声器内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军乐声有所怀疑了。他时不时地站在窗户前屏息聆听,躁动不安。这一反常举动非同寻常,路易斯·詹彼得赶紧通过“热线”将“信息”传递出去,附带着告诉对方他的寻呼机号码。很快,扬声器中借以掩盖地道挖掘声的高音量军乐换成了欢快高亢的墨西哥民歌。这些优美的曲调平息了卡托列尼的不安,也消除了他对军乐声的疑惑。就这样,幸运之神与卡托列尼擦肩而过并一去不复返了。

21日清晨6点30分,当所有突击队员进入地道待命时,藤森也准时守候在大使馆附近的一所住宅里。进攻时间定于下午3点50分,只见藤森时而走到窗前,对着不远处的大使馆凝神沉思,时而走到指挥台前用手指慢慢地摩弄着扬声器上纵横密布的金属丝。这已是100多天的较量中的最后冲刺阶段了。为了这一天,藤森和整个秘鲁等待得太久太久了,以至每一秒钟在他看来都似乎慢得让人难以忍受。等待,惟有等待才有机会。终于,机会来了:安装在地道内的高灵敏度窃听器测出,恐怖分子正在踢足球。机不可失,藤森马上命令向路易斯·詹彼得的寻呼机传出进攻的信号。几分钟后路易斯·詹彼得的答复传送回来。3点27分,进攻命令比计划提前13分钟发出。藤森在较量中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差。

历经四个月煎熬的藤森首次露出了由衷的笑意。他身穿防弹衣,快速抵达大使官邸,站在庭院内的一把椅子上,志得意满地向参

与行动的士兵和没被送进医院的人质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秘鲁不接受恐怖主义,秘鲁给国际社会作出了榜样,不允许恐怖分子进行讹诈。他说,这次胜利是一次人民的胜利。滑稽的是,就在藤森慷慨陈词时,使馆内又响起了爆炸声,原来是卡托列尼布置的饵雷被触及,发生了爆炸。随后,在德国避难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发言人拉科斯还打电话给巴拉圭的亚松森“卡迪纳尔”电台,指责日本违反《维也纳公约》有关大使馆享有治外法权的规定,允许秘鲁军队进入其官邸。当然,这无伤藤森的一根毫毛。

对于给予秘鲁警方进入大使馆权利的日本,藤森也表示不买账,这是史无前例的。在“查文—德万塔尔”行动正式实施时,藤森将行动计划通知了克林顿总统,而日本首相桥本是在行动开始后才被告知的。人质危机解决之后,藤森在向日本记者的发言中还余怒未消,指责日本为“胆小鬼”。他说没有一个日本人提出解决这次危机的具体建议,仅仅要求和平解决“意味着我们应该向恐怖分子让步”。同时,他还指责日本公司在过去发生的绑架案中只知道掏钱的做法。看来,藤森终于能挟解决人质危机之余威,吐出郁积心中已久的一股恶气了。

自然,藤森有理由出气。人质危机的圆满解决提高了他的声望,虽然秘鲁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但雄心勃勃的藤森显然在寻求第三度登上总统宝座的机会,由执政党控制的国会已经通过法案,重新解释宪法,允许藤森争取第二次连任,因为藤森第一次当选是在新宪法生效前,所以不应把其首次任期计算在内。藤森最终能否如愿以偿,还要取决于选举委员会,但如果他当选了,卡托列尼无疑功不可没,是他使藤森“反恐怖克星”之称号更加名副其实。这么大的功劳没有理由不为藤森争取到几张选票。因此,藤森似乎应该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危机的间接受益者可能是世界各国的反恐怖组织。对他们来说,秘鲁的成功无疑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借助于秘鲁的经验,他们可能打赢反恐怖主义这场跨世纪的战争。国际反恐怖组织高度评价了“查文—德万塔尔”行动。曾经多年担任美国国务院反恐怖活动领导人的保罗·布雷默说:“我认为这个行动非常了不起——堪称样板。”

秘鲁警方营救人质的大胆行动得以成功 ,是因为他们从世界其它地区发生的人质事件中吸取了教训 ,同时采取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创新做法 ,这就是创造性地将地道战应用于反人质劫持上 ,其辉煌战果堪与以色列 1976 年从乌干达恩培德机场救出 105 名人质的行动以及西德 1977 年从索马里摩加迪沙救出 86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行动相媲美。“查文—德万塔尔”行动表明 :政府的领导人在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需要耐心 ,不管要求迅速采取行动的压力有多大 ,即使泰山压顶也须记取 :谁拖到最后 ,谁就能笑得最好。

“孤独的狼”嚎叫 ——3000 人质受困小镇

一、基兹利亚尔大劫持

1996 年 1 月 9 日清晨。

清晨 5 时 45 分，一阵杂乱的枪声把基兹利亚尔市民从睡梦中惊醒。几十支冲锋枪喷射出一道道火舌，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在市中心医院和妇产医院，1000 多名在熟睡中受到惊吓的病人被戴着面具的持枪人赶到顶楼，肇事者首领头扎宽布条，身穿迷彩服，肩挎冲锋枪，他恶狠狠地高声大喊：“我们是车臣‘孤狼’战斗队，若不服从就毙了你们！”此人是车臣分裂主义分子首领杜达耶夫的侄女婿，名叫拉杜耶夫，27 岁。他曾因侵吞杜达耶夫的军火款受过处分，这次主动请缨，戴罪立功，率领 350 名恐怖分子超过车臣东北边界突袭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基兹利亚尔小城，恐怖分子占领医院后又占领了附近的两栋居民楼，被扣的人质增加到 3000 余名。与此同时，另一群‘孤狼’奔袭机场和火车站，试图炸毁俄军用直升机、包围俄军兵营。拉杜耶夫抓起电话，狂笑着对该市民警局长提出了条件：“俄军立即撤出车臣和整个高加索；要是我手下的弟兄死一个，我就杀 15 个人质！”

拉杜耶夫其人

人们对这位幽灵般的车臣军阀式首脑知之甚少，他把他的部下

称为随时准备为车臣独立而战斗到死的神风队。

据俄罗斯传媒说,拉杜耶夫年 27 岁(有的说是 28 岁),另有报道说,他已婚,妻子是分裂分子的领导人杜达耶夫的侄女或外甥女。像许多车臣战士一样,他也留着大胡子,扎着伊斯兰式的绿头带,显露出战斗疲劳症。拉杜耶夫在车臣历时 13 个月的反莫斯科的独立战争中成为一名献身于杜达耶夫的狂热指挥官。他的部下给他起名为“孤独的狼”。

“我们已经向我们的总统宣誓、保证我们是一支能战斗到底的神风队,我们将执行他的一切命令,”拉杜耶夫曾在俄罗斯电视台说:“我们的行动口号是——要么战死,要么自由。”拉杜耶夫的最大要求是俄罗斯撤出 1994 年派驻在车臣的军队,但俄罗斯对此不予理睬。

拉杜耶夫原是州共青团组织的干部,并担任过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杰尔梅斯市的负责人。在此之前,拉杜耶夫作为武装分子的指挥官,他的一次重大行动是攻占古杰尔梅斯城。大约 10 天以后,经过激烈的战斗,俄罗斯军队终于将最后一批车臣武装分子赶出古杰尔梅斯。

有一次他夺取了莫斯科作为人道主义援助运往古杰尔梅斯的柴油,并给了车臣反政府武装。

1994 年 12 月,俄塔社报道说,拉杜耶夫曾企图向驻在达吉斯坦的俄罗斯军队“挑衅”,当时他的口号是“让高加索着起火来”。

联邦安全局局长面临考验

事发的当天中午,叶利钦总统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救人质问题。他捏紧拳头宣布:“决不能让匪徒逍遥法外。”他严厉批评有关部门工作不力,让恐怖分子钻了空子。他责成上任不久的联邦安全局局长巴尔苏科夫大将领导解救人质的行动。

叶利钦 1 月 9 日委任巴尔苏科夫负责处理这场人质危机。巴尔苏科夫立即从莫斯科乘飞机前往五一镇附近,同包围车臣反叛分子的俄罗斯部队会合。

巴尔苏科夫是位上将衔情报军官。他 1995 年 7 月接任安全局局长,在那之前曾负责除叶利钦之外的克里姆林宫其他领导人的警

卫工作。虽说这场人质危机最后如何解决肯定要由叶利钦说了算，但叶利钦决定让巴尔苏科夫负责处理这件事，足以说明他是多么信任这位安全局长。但是叶利钦的信任也可能给巴尔苏科夫带来不幸——如处理不当，他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巴尔苏科夫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一般都身穿军装，目光总是冷冰冰的。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克里姆林宫里度过的，而且一直很不得志，直到1995年7月24日才被叶利钦提拔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

联邦安全局是1991年在克格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反情报机构。作为局长，巴尔苏科夫负责打击恐怖活动和黑手党，并负责清除警察系统内部的腐败现象。他还负责指挥“阿尔法”和“信号旗”特种部队，如果对扣押人质的车臣反叛分子发动进攻，很可能会动用这两支部队。巴尔苏科夫很少公开发表谈话，但据说他同总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将军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普遍认为叶利钦总统愿意听取和接受科尔扎科夫将军的意见。巴尔苏科夫对叶利钦忠心耿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1993年议员们造反时，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叶利钦。此外，在车臣战争期间，他也是一直站在叶利钦一边。

人们普遍认为，叶利钦之所以把巴尔苏科夫调任联邦安全局局长，是为了确保情报机构在6月总统选举之前忠诚地为他本人服务。

巴尔苏科夫也是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安全委员会是叶利钦亲自领导的一个权势颇大的机构，其成员包括政府高级成员以及负责国防和安全事务的部长。

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1947年11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南边的利佩茨克州。他毕业于军事学院，1963年调到克里姆林宫从事安全保卫工作。他的妻子叫塔季扬娜，有一个21岁的儿子。

俄军和达吉斯坦内务部立即调兵包围基兹利亚东市，边防军封锁了车臣和达吉斯坦边界，特种部队随时待命出击，一张铁网迅速张开了。

拉杜耶夫要求俄罗斯领导人会见杜达耶夫，要求俄军立即撤出车臣，联邦当局断然拒绝，并通过出面谈判的达吉斯坦领导人向恐怖

分子交代了出路 :只有释放人质 ,恐怖分子才能接受当地政府处理 ,否则死路一条 ,而且他们的家属和车臣无辜群众都会受到强悍的达吉斯坦人无情的报复。

拉杜耶夫明白 ,政府态度强硬 ,自己就处境险恶 ,只求保命。10 日清晨 ,他们释放了约 3000 名人质 ,挟持约 120 名人质分乘 11 辆大客车向车臣逃窜 ,俄内务部队官兵乘车紧随其后。

上午 10 时 ,“孤狼”车队到达离车臣边界不远的五一镇。发现通往车臣的公路桥已被炸毁 ,周围布满全副武装的俄军士兵和装甲车 ,武装直升机在头顶盘旋……“孤狼”退路已绝。拉杜耶夫气急败坏地要求当局提供一条安全走廊 ,并异想天开地要求盖达尔、亚夫林斯基、列别德等俄国政界名人护送。

双方僵持数日 ,谈判未果 ,巴尔苏科夫大将遂于 13 日向恐怖分子发出最后通牒 :14 日交出全部人质 ,听候车臣当局处置 ,如果胆敢杀害人质 ,必将全军覆没。

恐怖分子拼命在五一镇挖掘工事 ,准备负隅顽抗。他们接到杜达耶夫的电话指令 ,坚决顶住 ,援兵很快就到 ,所挟持的人质只有在队伍回到车臣山区后才能释放。如果联邦领导不妥协 ,就杀一两个人质施加压力。

侄女婿果然言听计从。14 日 ,拉杜耶夫令手下枪杀了 6 名被扣押的民警。

至此 ,已有近 40 名军人、民警和平民被恐怖分子杀害。联邦当局忍无可忍 ,安全局长巴尔苏科夫和内务部长库利科夫亲临前线指挥。15 日上午 9 时 ,给匪徒最后 10 分钟时间释放人质和放下武器。劫匪不予理睬。9 时 10 分 ,北高加索军区出动武装直升机轰炸恐怖分子盘踞的房屋和工事 ,与此同时 ,地面炮火齐射 ,五一镇上空顿时浓烟滚滚 ,俄军战士在装甲车掩护下发起冲锋 ,很快突破防线 ,攻入镇内。

然而 ,没想到车臣武装分子在镇内构筑了地下工事 ,镇内房屋有地道相通 ,并且埋设了地雷。

恐怖分子把人质集中在镇中心的几间房屋内 ,用火箭筒、迫击炮回击。为减少平民伤亡 ,俄军集合神枪手逐个消灭恐怖分子 ,并用武

装直升机的强大火力封锁关押人质的房屋不让恐怖分子靠近。

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其间俄军多次截获镇内匪徒的通讯联络。17日夜,雨雪交加。被围的残匪想趁恶劣天气突围,结果暴露在俄军火力之下,反而加速了灭亡,与此同时从车臣赶来增援的一小股匪徒在山谷中遭到俄军空中力量重创。

到18日凌晨,解救入质的行动终于完成,救出82名人质,击毙恐怖分子153名,活捉20名,俄军官兵阵亡26人。

孤狼的下场

拉杜耶夫最终从五一镇逃走了,但在2月29日夜,他还是没有逃脱复仇的子弹。在舍尔科夫斯卡亚镇枪杀杜达耶夫的支持者,袭击拉杜耶夫父亲的家和拉杜耶夫本人,这一切可能都是一些武装分子干的。他们开始报复战地指挥官,认为指挥官们背信弃义。拉杜耶夫和他的亲信逃出五一镇后,致使几十名同伙被打死。看来,死者的伙伴没有饶恕拉杜耶夫和他的亲信。有充分理由相信。杜达耶夫土匪武装内部发生了早就不可避免的分裂。

事情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一伙武装分子在深夜出其不意地接近拉杜耶夫戒备森严的家。看来,他们已经摸清那里的防卫系统,所以干得很顺手。几分钟以后,房内就浓烟滚滚,烈火冲天,后来,一些卫兵冲出去追捕袭击者,另一些人灭火。这时,一声巨响,房倒屋塌,尸首遍地。看来,有人在这所房子里埋放了大量炸药。几天后,即3月5日,拉杜耶夫在受重伤后丧命,同伙对他的报复完成了。

二、布琼诺夫斯克人质事件

杜达耶夫一伙在这次基兹利亚尔事件前,曾于1995年劫持布琼诺夫斯克市1000多名人质,在那次人质事件中,俄罗斯政府最后屈服了。因而杜达耶夫等尝到了甜头,敢于又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人质大绑架!可见,在与恐怖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不能有一丝的让步和退缩。

1995年6月14日,约100名身穿迷彩服的车臣武装人员,在车

臣武装力量司令巴萨耶夫的率领下,分乘两辆卡车闯入毗邻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布琼诺夫斯克市,他们肆无忌惮地向街上手无寸铁的行人和居民开枪,夺取汽车,焚烧民房,并强行占领市医院,扣留了以妇女、儿童、病人为主的上千名人质作为“活盾牌”,要挟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俄军立即停止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并撤出车臣”,“叶利钦总统、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立即与杜达耶夫谈判”等先决条件,并扬言:上述条件如果得不到满足,“将杀死全部人质”。当天傍晚,他们杀害 50 名人质,并把这些惨不忍睹的尸体从医院推出以向政府示威。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们又陆续枪杀了一些人质。布琼诺夫斯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

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绝非偶然,它是车臣反政府武装内部强硬分子在战场上失利后孤注一掷的表现。

从 1995 年 6 月份以来,俄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连连拔除车臣武装盘据的重要军事据点。6 月 13 日,俄军攻占了杜达耶夫最后一个堡垒——沙托伊村,随后宣布,俄军在车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任务已经完成。杜达耶夫本人也表示要到国外避难。持续半年的车臣战争接近尾声。但车臣反政府武装并不肯善罢甘休,杜达耶夫在事件发生前曾扬言,抗击俄罗斯的战斗将采取“新的形式”。包括巴萨耶夫在内的一些极端强硬分子,更是主张把战争扩大,在俄罗斯开辟新的战场,并长期开展“游击战”。巴萨耶夫在记者招待会上毫不隐讳地说,他原本打算“跑到莫斯科去,到那里打一下”,并发誓“要把战争扩大到俄罗斯的领土上来”。这些话进一步证明,这起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但杜达耶夫在这起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俄罗斯官方公开指责杜达耶夫是这起事件的策划者,而杜氏却一再矢口否认,并发表声明称,布琼诺夫斯克事件“只会给车臣的民族解放斗争蒙上阴影”,但人们普遍认为这起事件与杜达耶夫有一定的关系。据悉,现年 40 来岁的巴萨耶夫是杜达耶夫的得力干将。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陷落后,杜达耶夫委任他为车臣南部战线司令,后又任命他为车臣武装力量司令。作为一名穆斯林,巴萨耶夫尊重伊斯兰教法典,对杜达耶夫忠贞不二。他曾在 1992 年爆发的格鲁吉亚内战中率领“阿布哈兹营”作战,以勇敢和指挥有方而

闻名。返回车臣后 ,又组织了“侦缉破坏营” ,为消灭杜达耶夫的宿敌屡建战功。当俄军进攻格罗兹尼时 ,巴萨耶夫的队伍最后一批离开该市。此后 ,他辗转车臣南部 ,顽强作战。据他宣称 ,在车臣战争中 ,他的亲属有 11 人被打死。俄舆论界把他称为“复仇狂”、“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车臣经验最丰富、最残酷无情的战地指挥官之一”。显然。发动恐怖袭击是巴萨耶夫为挽救战场败局、争取喘息时间所作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

面对突如其来的人质危机 ,俄罗斯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俄内务部、国家安全局、特种警察部队、总统卫队立即派精锐力量赶赴布市 ,将该市围得水泄不通。内务部长叶林、国家安全局长斯捷帕申亲临现场指挥 ,远在加拿大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叶利钦总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一切措施营救人质。俄军在直升机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曾数次进攻市医院大楼 ,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尽快结束危机 ,但由于车臣武装顽强抵抗 ,并造成人质伤亡 ,最终放弃了强攻方式。为了解救人质并最大限度地保证人质安全 ,中断休假提前返回莫斯科的俄问题切尔诺梅尔金亲自与巴萨耶夫通话 ,经过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反复谈判 ,俄政府做出重大让步 ,在基本上满足了巴萨耶夫提出的条件后 ,双方达成三项协议 : (1) 联邦政府保证从 6 月 18 日起立即在车臣停止作战和轰炸 ,与此同时 ,被扣为人质的全部儿童、妇女、老人、病人和伤员应予释放 ; (2) 委派全权代表团于 19 日抵达车臣 ,就有关车臣的全部总理通过谈判解决 ; (3) 在解救全部人质的同时 ,联邦政府为巴萨耶夫及其小组提供交通工具并保证他们平安抵达车臣境内。到 20 日为止 ,在押的 800 多名人质全部获释 ,延续近一星期的人质危机终于解决。

“一石激起千层浪” ,人质事件虽暂告平息 ,但布琼诺夫斯克这座远离莫斯科达 1600 公里的偏远小市所掀起的涟漪却波及很远很远 ,并由此引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国际上 ,西方国家一直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颇有微词 ,指责俄军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践踏了“人权和民族自决权利” ,屡次向俄方施压 ,敦促俄军撤出车臣。布琼诺夫斯克市突发的人质危机出乎意料地给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叶利钦蒙上了一层“受难者”的悲剧色彩 ,大大改变了公众对车臣

事件的态度(叶利钦语)。但叶利钦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人质危机也“大大改变”了议会对政府的态度。去年下半年以来,议会对政府执行的改革政策未使经济形势出现根本转机一直不满,车臣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要求政府辞职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人质危机犹如火上浇油,终于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

事件发生后不久,俄议会下院(杜马)召开会议专门就车臣局势进行讨论,许多代表对政府、特别是对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和安全部长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代表们尖锐地指出:恐怖分子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长驱直入、顺利进入布市,占领市医院并扣押 1100 名人质,是有关部门严重失职的结果,大批人质伤亡与总统、内务部长、国防部长决定使用武力营救人质计划密切相关。21 日杜马在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出席的情况下,以 241 票赞成、72 票反对、20 票弃权顺利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23 日又以多数票建议总统撤销格拉乔夫、叶林和叶戈罗夫的职务。俄总统叶利钦做出反应,否决了议会的不信任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俄宪法规定,议会下院应在 3 个月内重新投票表决,如再次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总统必须在解散政府和议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为了尽快度过危机,保持政局稳定,为年底举行的议会选举创造必要条件,总统和政府分别采取措施,缓和与议会的对立。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主动要求议会就是否信任政府的问题进行表决,并向议会表示了希望合作、避免对抗的愿望。切氏称,他“不主张解散杜马,希望能够避免事态朝这一方向发展”,“不能让 1993 年秋天事件重演。”叶利钦也向国家杜马建议,彼此承担避免这场政治危机的责任。为了平息“众怒”。6 月 29 日叶利钦总统发布命令:解除了副总理兼民族事务部部长叶戈罗夫、内务部长叶林、联邦安全局局长斯捷帕申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库兹涅佐夫的职务。在上述背景下,7 月 1 日杜马再次投票表决时,不信任案未通过,从而结束了持续 10 天的政府危机。在俄罗斯议会选举日益迫近,各党派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并为 1996 年总统大选做准备之时,这场政治危机的尽快解决,对复杂多变的俄政治经济形势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

然而,这次俄政府妥协却留下了后患。

拉杜耶夫一伙手法与布市人质危机如出一辙 :占领医院、扣押人质、要求俄军撤出车臣。在那次解救入质的行动中 ,俄兵和人质死亡近百。政府最后被迫答应停止在车臣的战斗 ,眼看匪徒押着人质全身而退。匪徒们尝到了甜头 ,这回又如法炮制……

三、黑海劫船事件

在拉杜耶夫一伙劫持基兹利亚尔人质的同时 ,9 名车臣武装分子闯上土耳其“阿夫拉西亚”号客轮 ,配合拉杜耶夫等人的行动要求俄罗斯政府屈服。

1 月 16 日夜晩 ,土耳其东北部特拉布宗港口特别繁忙 ,许多国内外乘客已踏上准备 7 时起航驶往克里米亚索契港的“阿夫拉西亚”号客轮。6 时 20 分 ,一伙蒙面武装分子突然冲上去 ,劫持了这艘客轮。经过一阵骚乱 ,劫持者在交火中打伤了一名土耳其警官 ,并将 242 名乘客和客轮上的工作人员作为人质扣押在船上 ,乘客们个个胆战心惊 ,不知他们的命运如何 ?

这些亲车臣的武装分子劫持“阿夫拉西亚”号客轮后 ,马上去找船长 ,要求将船驶往伊斯坦布尔。特拉布宗有关部门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同劫持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结果失败。劫持者于 9 时 30 分强行要船长将客轮开出特拉布宗港口 ,沿黑海驶向连接欧亚大陆的伊基坦布尔。

土耳其许多记者乘车沿陆路紧跟“阿夫拉西亚”号客轮进行追踪报道。一名劫持者通过船上的电话对电视台记者说 :“如果俄罗斯武装人员不释放被围困在达吉斯坦基兹利亚尔的 250 名车臣抵抗战士 ,我们将把这艘客轮和船上的所有乘客一起炸毁。”

劫持者的这句话引起土耳其政府的高度警惕和重视 ,土耳其当局立即在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成立“危机处置小组”——由总参谋部、外交部、内政部和国家情报部门联合解决这起黑海劫船事件。土耳其当即派出数艘护卫舰、驱逐舰和海上巡逻艇跟踪这艘客轮。

17 日 ,劫持者头目穆罕默德·托克詹对记者说 :“我们是高加索国家的士兵 ,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是为争取自由的战士。我们

劫持客轮的理由很简单 ,我们不知道世界在想什么 ,但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拯救我们的祖国 ,与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活在一起……我们不认为武力能够阻止斗争 ,因为我们惟一的选择是自由和死亡。我们将继续斗争直至建立高加索民族邦联。”但他明确说 ,他们劫持这艘客轮不是针对土耳其的 ,而是针对俄罗斯的 ,希望此事能引起国际社会对车臣问题的重视。

托克詹以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语用船上电话同土耳其记者对话 ,使土耳其人感到惊讶 ,以为他是土耳其人 ,后经调查了解 ,得知年仅 27 岁的托克詹是高加索人 ,曾在土耳其念过书。1992 年返回家乡与他的朋友一起参加反俄罗斯的战斗。前一段时间他的未婚妻被俄罗斯军队打死 ,对此他怀恨在心。后来他移居土耳其博卢省迪兹杰从事木匠工作。

面临“政府危机”的土耳其看守内阁总理奇莱尔多次发表讲话 ,谴责这起劫船事件 ,竭尽全力和平解决这起事件 ,同时呼吁劫持者放下武器 ,向土耳其当局投降。她说 ,土耳其政府每人“24 小时”都在密切注意被劫客轮的事态发展 ,同俄罗斯当局保持密切接触 ,及时向俄罗斯通报被劫客轮和船上俄罗斯乘客的安全情况。奇莱尔还说 :“我们已经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以防止发生流血。我们将以劝说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将不诉诸武力。”当然 ,土耳其政府决不允许被劫客轮驶入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以防不测。

由于土耳其在历史和文化上同车臣有着密切的联系 ,车臣战乱从一开始 ,俄方就认为土耳其当局就对车臣持同情态度 ,土耳其舆论更是如此。俄罗斯当局曾怀疑有土耳其志愿者在车臣参加反俄罗斯的战斗 ,并认为还有车臣年轻人在土耳其接受军训。土耳其当局对此却予以否认。

19 日中午 ,当“阿夫拉西亚”号客轮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抛锚时 ,土耳其全国上下更加紧张 ,数家国家和私人电视台都实况报道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土耳其两家电视台记者说服了劫持者 ,乘直升机降落到客轮上 ,实地拍摄 ,并用手持电话机向电视台实况报道被劫客轮的事态发展。客轮周围的护卫舰和驱逐舰严阵以待 ,快艇、

海上巡逻艇和警察的直升机忙前忙后，将劫持者首先同意释放包括一名受伤警官在内的 13 名病人和儿童接上岸，转送到伊斯坦布尔医院接受检查。但劫持客轮的支持者在海峡岸边点燃着火，载歌载舞，“庆祝”这起事件将会引起世界对车臣问题的关注。

客轮抛锚后，土耳其政府派一名海军将领同劫持者进行谈判，车臣武装领导人杜达耶夫也派优素福“外长”赴土耳其劝说劫持者结束行动。优素福发表讲话说：“车臣当局没有指示劫持者在土耳其劫持这艘客轮，这起劫船事件是一种耻辱，”他又指出：“劫船事件不是帮助和支持车臣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希望不发生冲突和流血解决这一问题。”奇莱尔也针对俄罗斯说：“很明显，如果和平和令人满意地解决车臣问题，那么将不会发生这起劫船事件。”“只有实现持久和平，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海军将领和劫持者的谈判曾一度破裂，劫持者命令船长启动“阿夫拉西亚”号客轮驶向海峡。一名劫持者扬言说：“我们像炸药一样准备爆炸，我们将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因为没有其它选择。”这时，土耳其的全国电视观众顿时又紧张起来，但是经过再三劝说，土耳其当局和劫持者在当地时间 17 时 35 分终于达成和平解决的口头协议，到 18 时 15 分，劫持者将手中的武器扔向黑海，正式宣布向土耳其政府投降。被扣的共 242 名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土耳其和约旦人质获释了，伊斯坦布尔省长也宣布已拘留了 9 名劫持者。这起长达三天三夜的黑海劫船事件宣告结束。

邪教横行东京——地铁酿惨剧

从日本传来消息说，邪教奥姆真理教的大权已落入一名 15 岁女生手中！

而这名女生就是奥姆真理教创办人麻原彰晃的第三个女儿松本利加。

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教徒们却相信她的灵界很高，因为她是在麻原彰晃 1982 年受“启发”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

这名按照日本法令本该在学校念书的少女，却在她的父亲于东京地方法庭受审期间，代父向奥姆真理教教徒发号施令。松本利加就住在东京东部 80 公里处的上九一色村，离她父亲被关押的拘留所不远。她没有上学，因为居民都害怕她与他们的孩子接触。日本官员说，奥姆真理教正利用高科技电脑生意的收入重振旗鼓。奥姆真理教每年从属下的廉价电脑商店中赚取 40 亿日元，并利用这些金钱维持教徒的生活，扩充营业及购买房产。

难道这个曾制造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的教派又死灰复燃，重演当年惊世恐怖？

1995 年 3 月 20 日上午 8 时许，清洁整齐的东京地铁像往常一样，迎来了它一天中的营运高潮，一趟趟南来北往的列车里挤满了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此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灾祸正悄然降临到这些无辜人们的头上。

8 时 17 分，一列高速驶向筑地车站的电车中，乘客们发现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饭盒里流出一种汽油味的流体，并散发出刺鼻的恶

臭。列车到达筑地车站后，车厢里散发出的酸臭雾气顷刻间弥漫全站，人群在雾气中又咳又呛，许多人感到剧烈的头痛，呼吸困难，胸中发闷，甚至有人倒地抽搐。忽然一人惊呼：“有毒气！”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一趟列车停靠霞关中转站，这时站长助理高桥正和列车员菱沼恒夫发现车门附近也有一个塑料包裹的饭盒，里面流出浅色液体，酸臭味扑鼻，高桥弯腰拣起了它，和菱沼一起向站台办公室走去。液体沾满了高桥的手，使他还没来得及走完这段几十米路程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身旁的菱沼也随之倒地，人事不知，在送进医院后不久便不治身亡。

9时未到，东京都警视厅和消防厅内的红色报警电话铃声不断，日比谷、千代田和丸之内等东京地铁的3条干线46个车站频频传来毒气的警报……事态严重！当局立即下令消防部门关闭2条干线和26个车站，并紧急动用陆上自卫队的防化部队和消防队一起抢救中毒者，清洗发现毒气的16个车站和5列电车。

顷刻间，清洁有序的马路上呈现出一派混乱不堪的景象。

从车站里逃出来的人们或躺或坐，横七竖八。咳嗽声、呕吐、呻吟声响成一片，因毒气反应，大多数人都在流泪，有人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与此同时，一辆辆救护车鸣着尖啸的笛音在满路狼藉的人群中穿来穿去，将成批的中毒者送往医院，间或还有几架直升机掠过人们的头顶，把那些救护车来不及抢救、生命垂危的病人运走……

东京市区105家医院霎时间爆满，床位和医护人员空前奇缺。筑地车站附近的一家大型综合医院里，值班的小组只好临时改用海报大小的纸登记急救病人的名单。当天下午该医院一楼的一面墙就被12张这样的登记表贴满！

当天东京消防中心统计的数据更是令人震惊和恐惧：中毒人数不断上升，3500 4000 4700（最后多达5000人）。同时中毒死亡也从当场的4人增加到8人，再到12人！

一时间，日本震惊了，世界震惊了！显然这是一起罕见而惨烈的公众投毒案。对于日本人来说，一个多月以前的那场灾难性的阪神大地震仍余悸未消，尔后又突遭此横祸，到底是谁如此丧心病狂、滥杀无辜？

一个大大的问号打在日本和世界人民的心头！

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发生后，引起了日本民众和世界各国的空前关注，日本国内外的各种新闻媒介对此案报道的频度和密度屡创纪录，有关新闻报道甚至以不时计进展。有一家电视台居然为此动用了 800 人和 24 辆转播车。

压力沉重的日本警方迅速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侦破工作。案发的当天下午，东京都警视厅就成立了“特别搜查部”，并从各地抽调了 300 名警探参加破案工作。当天晚上，警方专家在对现场取样反复试验后宣布，毒剂是神经性化学战剂“沙林”。

于是，“沙林”——这个充满死亡和恐怖之感的名词不到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日本列岛和世界各个角落，为世人所熟知！也成了侦破此案的关键。

侦破在继续！警方进一步分析认为，地铁毒气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行动，作案的目标也不是普通市民，而是政府官员。因为发生毒气事件的 3 条地铁干线交汇点——霞关中转站附近正是日本的通产省、外务省、最高法院和法务省等政府机关所在地，而且毒气泄漏的时间正是政府职员上班的高峰期，而发案的 5 列电车几乎都是正处在驶往霞关站的途中，因此，警方判定该案与一些极端团体有关！

“沙林”、“毒气”、“极端团体”……警方面前的思路逐渐清晰了，他们很快想到了一个神秘的宗教团体——奥姆真理教！因为在警方的档案中有大量毒气与该教联系的记录。

1994 年 6 月，东京北面的松本县曾出现过毒气事件，当时有 7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事后警方化验是“沙林”毒气泄漏所致，此次遇难者中有 3 名是正在审理一宗涉嫌奥姆教案件的法官。

是年 7 月，富士山山梨县村民向政府投诉，称设在当地的奥姆教公社内两次发出强烈异味，警方随后在公社附近的泥土中化验出来自“沙林”气体的物质。

事实上。1994 年底，日本警方已注意到奥姆真理教并悄悄召集了曾发生沙林事件的各地警察负责人。研究采取相应的对策，1995 年初，却不料一场不期而遇的大地震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和计划。进

入3月,正当警方再次决定对奥姆真理教在关东地区的有关设施进行强行突击搜查时,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发生了……

此时,日本警方,不!应当说是整个日本社会面临的是一群丧心病狂的邪恶之徒,再进行丝毫的犹豫和拖延那真意味着死亡。东京警方决定全面出击!

3月22日,即东京毒气案发生的第二天,2500名身着迷彩服、头戴防毒面具的警察和自卫防化部队队员在装甲车的配合下对位于东京都、山梨县、静冈县等25处奥姆真理教的道场、医院及工厂设施进行强行搜查。顿时,呼啸而过的警车,全副武装的警察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家家户户的电视屏幕上,整个日本笼罩在一片紧张恐怖的气氛中。

3月26日,山梨县上九一色村,一群武装警察包围了这里的奥姆真理教的几幢建筑,当他们用焊枪打开三座大库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里俨然是一座大化工厂,各种化学药品和仪器应有尽有;一袋袋装有化工原料的白色塑料袋堆积如山,这些都是制造沙林的初级原料,600多个比煤气罐还大得多的金属密封桶整齐地排列着,里面装满可以稀释沙林的溶剂和其他化学药品,此外还有……这是无言的物证,也是铁的罪证!

3月30日,负责调查东京毒气案件的警察厅长官国松孝次在自己的住宅门口遭蒙面枪手袭击,身受重伤。事后,警察接到神秘电话,要求停止对毒气事件的调查。

4月13日,奥姆真理教一负责人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警告,4月5日将有一场比神户大地震更加严重的灾难降临日本,“预言”越传越邪乎,日本民众人心惶惶。

4月19日、21日,横滨火车站果然又发生毒气事件,又有三四百人中毒被送进医院……

搜捕在继续!随着一号号通缉令、一张张逮捕证的发出,奥姆教的上百名成员相继落网,但一个个闭口不言。

5月11日,东京警方收到一份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提供的情报,证实奥姆教成员曾在澳大利亚西部一牧场进行过毒气试验,证据进一步确凿!

5月12日,奥姆教被捕的“化学班”头目土谷正实承认自己曾参与制造沙林(或许因为是良心发现),这是该教成员第一次公开承认罪责!14日该教另一名被捕成员林郁夫也承认他受命在3月20日凌晨把装有沙林的塑料袋放入地铁……

终于,5月15日晚,东京警视厅以杀人嫌疑对东京毒气事件、祸首——奥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正式发出逮捕令。而在此之前,警方的搜捕工作一直是在调查一起绑架案件的名义下进行的。

16日凌晨,最后逮捕麻原的行动开始了。数千名武装警察在浓浓夜色的掩护下再次包围了奥姆真理教的老巢——山梨县上九一色村的一幢“真理6号”的建筑。这是幢设计复杂的3层楼房,它内部的布局简直如迷宫一般。厚厚的夹木板像屏风一样将三个楼层隔成众多的小房间,每个小房间面积不到两平方米,仅能容纳一人,这是奥姆教徒平时修道的地方。正是这些蜂窝式的小房间给搜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时间在点滴流逝,整幢楼被反复搜索了几遍,仍未发现麻原的踪影,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照射到每人身上时,已是4个小时过去了!难道麻原真能有遁地钻天的神通,还是掌握的情报不准。疲惫不堪中,大伙心里焦急了起来。这时,一位警察抬起手擦了下脸上的汗水,无意中他发现在3楼和2楼之间有一个小孔,是普通的透气孔,还是别有洞天?于是大伙用电锯锯开了夹板,奇迹出现了,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夹层,而在高度不及1米、面积不到2平方米的斗室里,端坐着一位身着紫色修道服,长发披肩,胡须齐胸的中年人,当警察问他是否麻原时,此人轻叹一声答道:“是的,我是教主!”就这样,约上午9时45分,麻原落网了。

几乎与此同时,东京街头的新闻荧屏上立即打出了麻原嫌疑犯被捕的快讯,几分钟后,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的相同内容的电讯也向世界各地发出。

至此,近两个月来几乎为东京毒气案而整日坐立不宁、战战兢兢的日本国民终于轻松地吁了口气,一个世界各国极为罕见的邪教组织也终于走到了它的末日。

“圣战者”丧天良——世贸中心被毁

震惊世界的俄城大爆炸

1978年,美国曾出版过一本红皮小册子《特纳日记》,它的作者是西弗吉尼亚州反犹太人运动全国联盟组织的领袖威廉·皮尔斯。从外表上看,皮尔斯是一个谦谦君子,外表文质彬彬,颇有些学者风度。但皮尔斯写的这本书可不谦和。这部颇具想像力的著作设计了这么一幅场景:美国政府正在为犹太人所控制,反政府的“恐怖抵抗运动”成员用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于某日上午9时15分袭击了联邦调查局总部,结果,700名特工人员被炸死。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黑道流行了十余年。书中皮尔斯策划的战斗计划被黑社会奉为作战计划的经典。正经书店因为考虑到此书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一直不愿销售。但是,人们能从街头的地摊上、枪支商店里买到这本书。十余年下来,这一本书竟然也销出了二十余万册。皮尔斯自己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教唆人们去犯罪,也并非出于娱乐目的。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实际上,皮尔斯设计的这一场景却经常在美国出现,恐怖分子根据皮尔斯制定的“作战计划”,上演了一幕幕惨剧。

俄克拉荷马城,一个有“古老的小牛仔城”称号的小城,一向平和、宁静。这里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首府,全城共有44万人口,这与国际性大都市纽约的千万人口当然不能相比。但是,由于这里是俄克拉荷马州的首府,因此还是有不少联邦机构在这里办公。尤其

是位于市中心第五街的俄城联邦大楼更是该城的要害地方,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特工处、药品管理局等政府机构在这里办公,每天的客流量大约有 500 人。同样,这个规模与每天有万余人进出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也不能相提并论。但是,1995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时的一声爆炸,却把这座牛仔小城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联系起来,而且,它对美国人身心的伤害,更是远在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之上。

9 时零 4 分,坐落在市中心的联邦大楼突然发出一声震天巨响,爆炸的声波一直传到 50 公里开外。在巨大的气浪冲击下,这座高 9 层的大楼顷刻间便倒掉三分之一。大爆炸产生的气浪挟着碎石和残肢断臂四处飞舞。由于爆炸发生在楼下,当时停放着许多汽车,因此,爆炸发生后,这些汽车一辆辆被掀翻,未来得及下车的人或是被烧死,或是被炸死。更悲惨的是,由于大楼里有很多政府职员,他们为了方便,将小孩带到大楼上班,因此,大楼的二层实际上是个托儿所。这些活蹦乱跳的花朵,转眼间也遭到摧残。小小的俄城,转眼间便被血雨腥风所笼罩。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悲惨、死亡人数最多的爆炸案,这次大爆炸,共造成 168 人死亡,其中包括 19 名儿童,850 余人受伤致残,财物损失大约在 5 亿美元以上。

当电视把这幅惨景传到千家万户的时候,美国震惊了,一向自大、自得的美国人这次也禁不住发抖了。恐怖分子已经把黑手伸向这些孩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克林顿总统愤怒地指责凶手是“邪恶的懦夫”,并说这是对美国及其生活方式的攻击。世界舆论也纷纷谴责这一丧失人性的恐怖主义行动。连科威特原教旨主义组织的一名成员也说:“这是一种极端的犯罪行为,任何宗教和法律都不会允许这么干。许多平民和儿童被炸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这种行径违背人权,毫无理性。”4 月 20 日,美国举国为死难者哀悼,政府部门降半旗致哀。此后,克林顿总统又宣布 4 月 23 日为全国哀悼日。在葬礼上,人们手捧着鲜花或受难者的遗像以示哀悼,受难者的亲属则相互拥抱,以示安慰。许多人戴着白、黄、紫、蓝相间的彩条。白色是对死者的追思,黄色代表对失足者的谴责,紫色是对儿童的悼念,蓝色则代表这一惨剧发生的地点俄克拉荷马城。俄城大爆炸一周年之际,俄克拉荷马城专门举行了悼念活动,美国副总统戈尔专程

前往致辞。他说：“恐怖主义不会胜利。在我们国家，我们是以对话和辩论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不以盗取宝贵的人类生命来表达我们的不满。”

踏破铁鞋无觅处

这个惨无人道的罪行是谁犯下的呢？美国人急于找出这个“外国魔鬼”，虽然还没有一点证据证明这件凶案是外国人所为，但美国人已经认定，文明的美国人自己不会犯下这种滔天罪恶，只有那些极端分子，比方说信仰真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两年前，他们不是就爆炸了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吗？俄城大爆炸肯定也是他们所为。因此，尽管调查还没有开始，凶犯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但美国人已经认定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了这种骇人听闻的爆炸案。一名约旦裔美国人（他也算是美国人，只可惜是约旦血统）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捕，并被押送回华盛顿，理由当然是可能与俄城大爆炸有关。在这里，西方法律界流行的无罪推定原则失效了。此外，美国人还想到，这件事可能是国际贩毒组织的杰作，药品管理局就在联邦大楼里办公，或许他们想借此泄愤。

像大部分美国人一样，克林顿总统也气极了，以致乱了方寸。他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坏家伙揪出来。他还征求幕僚的意见，是否应暂时关闭俄城机场，别让这个坏种逃了；同时，他又问是否应请以色列帮忙。在对付恐怖分子方面，以色列特工可能比联邦调查局还要厉害。以色列总理拉宾倒是自告奋勇，主动提出让以色列有关部门参与破案。但是，克林顿的幕僚警告说，千万不能让以色列插手。以色列一旦介入，美国人就等于明白无误地向世人宣告，此事系阿拉伯人所为，这样打击面太宽了，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克林顿这才如梦方醒，因此谢绝了拉宾的好意。总统接受了幕僚的劝告：谁也别相信，就让联邦调查局去干，养着他们就是为了今天的事。于是，克林顿下令，让联邦调查局火速破案。

对付这种事，联邦调查局可谓驾轻就熟。劫机、爆炸、犯人越狱，这些案件联邦调查局均称之为特别重大的案件。对付这种特别重大的案件，联邦调查局的特别行动队员都经过多次专门训练。就在俄

城大爆炸之前几个小时,特别行动队员还进行过对付恐怖分子的演练,因此,接到总统的命令后,联邦调查局迅速组织起一支阵容强大的破案队伍,其中包括四个证据反应小组和爆破机械小组。这些小组当中,有五名特工具有侦破此类爆炸案件的经验,另外还有来自波士顿、芝加哥、迈阿密、旧金山等地的炸弹专家。有关部门还动用了受过专门训练的警犬及机器人。破案人员携带着各种器具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勘察。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找证据。因为不管犯罪分子多么狡猾,他总会在现场留下种种蛛丝马迹。有了证据,破案人员就可以顺藤摸瓜,揪出凶犯。一般而言,他们并不相信所谓证人的证词。尽管这些证人在法庭上会手抚《圣经》对天起誓,但谁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因此,联邦调查局最重视物证。

现场勘察有了结果。爆炸发生在联邦大楼楼下,巨大的爆炸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深8英尺、直径20英尺的深坑,调查人员估计,恐怖分子可能动用了上千磅的炸药,用汽车运到楼下,然后引爆。一个调查人员沿着马路仔细寻找,突然在距现场两个街区的地方发现一块碎铁片,经鉴定,这是一辆卡车的车轴的残留物,肯定是被炸飞的。调查人员想到,这根车轴被炸得飞出这么远,很可能就是那辆运炸药的汽车上的,因此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块碎铁片上。铁片上刻有机动车辆识别号码,调查人员如获至宝,立即将它送到联邦调查局电脑指挥中心,将这一号码输入全国联网的机动车辆识别中心。与此同时,一盘录像带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俄城联邦大楼对面是一家银行的自动提款机,提款机上的录像设备录下了一辆赖特租车公司的卡车停在联邦大楼前的场景。机动车辆识别号码在电脑中心查询的结果表明,车轴就是从这辆卡车上飞出来的。于是,调查人员立即赶到赖特租车公司,该公司证实该车确系他们所有,是一辆1993年出产的福特车,但目前已经分配给堪萨斯州章克欣城的艾略特租车公司,该城距俄城270英里。调查人员当即赶到艾略特租车公司,得知车子是爆炸案发生前两天由两名男子租用的,但经检查,这两名男子留下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都是假的。这不由得让调查人员泄气。好在租车公司的老板还能大致描绘出这两个人的形象,因此,联邦调查局的肖像专家马上根据他的描述画出这两个人的头像,称之为“一

号”和“二号”嫌疑犯，并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此时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心中还是惴惴不安，不知道老板描述的肖像是否会牛头不对马嘴。能否根据这两张肖像拿住嫌疑犯，心里实在没有底。

不过，对凶犯的大致政治倾向，联邦调查局也不是一点判断没有。调查人员发现，驾驶执照虽然是假的，但执照上填写的日期1993年4月19日却可能是真的。调查人员想起，那一天是联邦调查局扫荡韦科庄园、剿灭邪恶的大卫教派的日子。大卫教派是美国600个极端主义教派中的一个，创建于1934年，是安息日会教派的分支。它的教主是弗农·豪厄尔，自称考雷什。他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他是耶稣转世，只有加入大卫教派的信徒才能在末日来临之际进入天堂。这种极端荒谬的言论在美国这个信仰自由的国度竟然也有不少人相信。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大卫教派不断发展，信徒越来越多，考雷什的影响甚至越出了美国本土，到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扎根。考雷什利用大卫教派欺压教众，践踏少女，聚敛钱财，引起了公众和政府的注意。1993年4月，联邦调查局对大卫教派采取了行动，由于考雷什在他盘踞的韦科庄园备有很多武器，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发动了进攻，结果考雷什自焚，整个韦科庄园化为灰烬，40名信徒陪着考雷什殉葬。这件事在美国反响很大，很多极端分子因此对政府不满。由于考雷什自称为“耶稣转世”，因此，4月19日也就成了“耶稣受难日”。最近，一些极端分子不正在电台等新闻媒介里大肆鼓吹要纪念韦科庄园事件吗？这个驾驶执照伪造者在作伪的过程中，是不是下意识地想到要为大卫教派、为考雷什复仇呢？极有可能。

不管怎么说，罪犯的肖像已经描出来了，是不是准确现在谁也不知道。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联邦调查局也只能将就这些条件，尽力去寻找凶犯了。于是，章克欣城里密布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手持“一号”和“二号”的模拟像，四处散发，并向人们打听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功夫不负有心人，调查人员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就在距城半英里的一家名为“梦境”的旅馆里，老板娘认出了“一号”。她说，他叫蒂莫西·麦克维，是14日住进来的，18日，也就是俄城大爆炸发生前一天，他退了房。老板娘说，这个“一号”长得眉清目秀，不像爆炸联

邦大厦的凶犯。在她心目中 ,制造如此爆炸案的 ,必是一个凶神恶煞之徒。

麦克维 ! 这个名字是真是假 ? 谁也不敢下结论。他的驾驶执照是假的 ,当然他的名字也可能是假的。但不管怎么说 ,调查人员总算找到了一点线索。那个该死的麦克维在哪里呢 ? 不管他是不是制造大爆炸的凶犯 ,联邦调查局都要先找到他再说。联邦调查局悬赏 200 万元 ,缉拿这个神秘的麦克维。无数个举报电话打了进来 ,其中有一人竟然是麦克维以前的同事。他从电视屏幕上看到 ,这个嫌疑犯正是自己的昔日同事麦克维 ,因此打电话进来。他说 ,麦克维是一个退伍老兵 ,对政府十分仇视 ,对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幻想。他还提到 ,麦克维对考雷什被剿一事耿耿于怀 ,曾亲自到韦科庄园去凭吊过考雷什的阴魂。联邦调查局大喜过望。原来还真有这么一个麦克维 ,联邦调查局的猜测竟然是对的 ! 看来 ,以前的努力没有白费。

既然麦克维是真名真姓 ,联邦调查局就不愁他飞上天去了。打开电脑库一查 ,联邦调查局大吃一惊 :原来麦克维已经落入法网 ,正关在佩里县的拘留所里 ,而且 ,再过一会儿就要被释放了。这还了得 ! 于是 ,一纸传真发到了佩里拘留所 :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正在你们手上。这下子 ,麦克维栽了。

那个麦克维是怎么落到警方手里的呢 ? 他怎么会在拘留所里的 ? 这还得从两天前说起。

那天 ,俄城大爆炸发生后 90 分钟 ,麦克维正驶在俄城北部 I—35 公路上。一路上他兴奋异常 ,就差没有放声高歌了。就在这时 ,一队巡警将他截下。原来是一群州警察。看到警察 ,麦克维并不心慌。他停下车来 ,问警察为什么截住他。警察告诉他 ,他的车没有牌照 ,他属于无牌驾驶。一位巡警透过车窗看到了他鼓鼓囊囊的衣袋 ,觉得可疑。于是 ,他出其不意地将手伸进麦克维的衣袋里 ,当场搜出一支半自动手枪 ,枪膛里已经压满了子弹。这个举动显然出乎麦克维的意料 ,他一脸惊讶 ,但还是故作镇静地问 :“这里出了什么事 ?”然后又安慰对方 :“不用怕。”他当然知道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说这句话只不过想把对方打发过去 ,自己好赶快脱身。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美国 ,无牌驾驶和无证持有枪支都是一种犯罪 ,警察完全

可以将他抓住关上几天。警察没理由照顾这个小伙子,这样,麦克维就被带回警署,拘留两天,外加 500 美元的保释金。这都是小意思,麦克维也没放在心上,因此,他在监狱里无忧无虑地过了两天。在拘留所的警察眼中,麦克维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他整天挂在嘴上的话就是“是,长官”和“不,长官”。身子挺得笔直,像一个军人。

狱方的判断没有错,麦克维确实曾是个军人。他今年 27 岁,是纽约州人,1989~1992 年在陆军服役,曾参加过海湾战争,当时他是机械工。他在纽约度过了郁闷的学生年代。10 岁时,他的母亲离家出走,心灵因而受到重创,从此他变得孤僻,古怪,喜欢怨天尤人,同学们曾挖苦他为“最健谈的人”。这种个性即使在他参军后也没有改掉,他的战友也认为他是个孤独者。退役后,他的思想进一步右倾,加入了抗税反政府的极右团体——密执安民兵组织。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如果提到美国的黑手党、三 K 党抑或光头党,可能还比较熟悉。在美国,三 K 党组织已经有近 100 个,光头党组织近 40 个。这些黑社会组织在美国兴风作浪,是美国国内恐怖活动的主要源泉。

联邦调查局从佩里拘留所取走了麦克维,并从他的身上搜到一些可疑的证件,从中发现了另一个嫌疑犯特里·尼科尔斯。警方包围了密执安州康克地区的一所民宅,宅主正是尼科尔斯的哥哥詹姆斯·尼科尔斯。根据詹姆斯的交代,特里在堪萨斯州的特林顿落网。与麦克维一样,特里也是密执安民兵组织的成员。这样,联邦调查局的“一号”和“二号”嫌疑犯均已落网。但是,继续调查发现,特里和麦克维可能还有同案犯,这就是“三号”。密执安州的一位地产商回忆说,一年前,麦克维和特里以及另外一个人曾与他有过接触。当时,麦克维守在门外的汽车里,特里和一个名叫罗伯特·杰奎斯的人走进店中,与他攀谈。特里不怎么说话,而那个“三号”则是滔滔不绝,像是一个头目。于是,根据他的描述,联邦调查局又绘出了“三号”的肖像,在全国通缉。这是一个身体壮实的年轻人,短发、方脸,可能有印第安血统,也可能是夏威夷人。存在“三号”的可能性也得到另外几条线索的证明。章克欣的一位居民说,他亲眼看到麦克维和一个人(不是特里)来这里租车,而这辆车就是爆炸前麦克维租的那辆车。

有一位老板回忆 ,爆炸前不久 ,有三个人光顾了她的店 ,点了咖啡。这三个人就是麦克维和特里 ,以及那个不知名的“三号”。联邦调查局给她看了“三号”的肖像。结果她肯定地说 ,很像这个人 ,三号。通缉令发出一年多“三号”还是不见下落。

恶有恶报

1997年3月底 ,经过两年时间的准备 ,麦克维和特里终于在丹佛受审。这是一场艰难的较量 ,这从审判地点就可以看出。照理 ,麦克维是在俄城造下的孽 ,因此 ,他应该在俄城受审。但是 ,麦克维的辩护律师偏说 ,俄城大爆炸死伤太多 ,小城居民的情绪太过激动 ,因此 ,麦克维不可能在俄城受到公正的审判 ,坚持要让他到千里之外的丹佛受审。仿佛换一个地点 ,麦克维的罪孽就会减轻似的。被告律师强词夺理 ,但也能自圆其说 ,麦克维如在俄城受审 ,说不定 ,俄城的居民就会要求绞死他 ,这不利于司法公正 ,于是 ,检察机关同意了他的要求 ,麦克维被防弹汽车送到了戒备森严的丹佛市联邦法院。为了防止极右民兵组织再次生事 ,警方把联邦法院大楼用混凝土障碍物隔开 ,大楼四周禁止停车 ,连垃圾箱也搬走了。

挑选陪审员又是一件难事。根据辩方的意思 ,在俄城受审已经妨碍司法公正 ,如果陪审员对案情过于熟悉 ,或是有亲人在爆炸中遇难 ,麦克维恐怕难逃厄运。因此 ,在他看来 ,陪审员离俄城越远越好 ,最好对俄城大爆炸一无所知 ,此外 ,他们最好对联邦政府和执法人员没有好感 ,这样 ,他们在审讯中能照顾到麦克维的利益。而检方的意见正好相反。挑选陪审员时 ,最好他们有亲人在爆炸中遇难 ,或者有亲朋在联邦政府机构中服务 ,他们本人最好是具有爱心的教师、护士 ,或是有同情心的人。这样 ,只要他们想到俄城那血淋淋的一幕 ,就不愁麦克维不被判处死刑。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决定 ,从1000名科罗拉多市民中挑选出64名陪审员候选人 ,他们将接受问卷调查 ,然后经过反复面试和盘问 ,从中确定12名正式的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12名陪审员 ,绝大多数是白人 ,其中5位是女性。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 ,有画家、护士 ,也有教师。他们中 ,年龄最小的20岁 ,而最大的已是70岁的老人了。

麦克维和特里被关在丹佛市联邦法院的地下室里，地下室的临时监狱里有厨房、厕所和淋浴间，麦克维在这里享受的待遇与巴拿马的军事强人诺列加相仿，只是，他们的命运是否一样呢？控辩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陪审团身上。

31日，审判正式开始。联邦大法官理查德·梅茨详细介绍了案情，要求陪审团全体成员严格按照证据定罪，切不可带有偏见和恻隐之心，从而妨碍司法公正。检察官莱里·麦基在其起诉书中指控麦克维为右翼极端分子，他之所以制造俄城爆炸，是因为他仇视联邦政府，并想为两年前覆灭的大卫教派复仇。检察官说，已经有多项证据表明麦克维就是制造大爆炸的凶手：首先，当俄城发生那场悲剧后，附近所有的人都赶往现场营救，唯独麦克维一个人驾车外逃。麦克维被捕时，警方曾发现他的衣服上有与案发现场相同的爆炸物残余，在购买炸药化学品的单据上有他的指纹。而且，麦克维曾在事发两周前告诉他朋友，他准备装置卡车炸弹，袭击联邦大楼。而俄城联邦大楼之所以遭殃，是因为在大楼里的人员有十几位参与了围剿大卫教派。发生爆炸案当天，又正好是韦科庄园事件两周年……麦基最后说，麦克维既有犯罪的动机，也有犯罪的证据。俄城大爆炸的凶手，确定是麦克维无疑。

听完莱里·麦基滔滔不绝的指控，麦克维坚决否认。法庭上的他面带倦容，但有时又故作轻松，以显示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证明自己能打赢这场官司。他的辩护律师史蒂文和罗伯特则口若悬河，为麦克维开脱罪责。他们说，麦克维是冤枉的，真正的凶手已经在大爆炸中死亡。清理现场时，警方曾发现一条无人认领的大腿，那就是凶手留下的，否则，怎么会没有人出来认领这条大腿呢？关于麦克维留在炸药化学品单据上的指纹，律师认为，那是警方实验室根据控方的要求捏造的，而麦克维朋友的所谓证词，则是他捏造的。他想编造一则故事，拿到警方提供的百万赏金，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总之，在史蒂文和罗伯特看来，麦克维是无罪的。

6月1日，经过几个月的听证，陪审员终于达成一致意见。9点30分，面带倦容的陪审员走进了法庭，他们谁也没正眼看一下麦克维，而是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前。麦克维本人表现出些许紧张，不敢

正眼看一眼旁听席上的听众。毕竟,这涉及到他的生死问题。

梅茨大法官毫无表情地念起了陪审团的判决结果:控方指控麦克维阴谋推翻政府、利用一种武器进行大规模破坏等 11 项罪名全部成立。法庭上出现一种难以置信的沉寂。麦克维只说了一句“这很好”,就被送出了法庭,而坐在旁听席上的受害者家属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激动。宣判麦克维有罪又怎样,他们的亲人反正一走不复返了,留在他们心头的创伤将永远无法抚平,痛苦将伴随他们一生。旁听席上传来了压抑的啜泣声。

根据美国法律,陪审团的判决是法官量刑的根据,但是,正式的判决必须由法官来做。因此,13 日,法庭正式宣布,麦克维罪名成立。坐在旁听席上的麦克维的妹妹詹尼佛哭了。而麦克维本人则坐在那里,双手紧握,一言不发。没有人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此时的心情。从旁听席后排的受害者家属席上传来相互握手与拥抱的响声,有的人脸上绽开了笑容,也有的人流下了眼泪。当判决的消息传到法庭外边时,大部分人保持沉默,只有一人因喜极而鼓掌。当坐在轮椅上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出现在阳台上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麦克维被判处死刑,这是美国自 1988 年有些州恢复死刑以来第 14 例死刑判决。如果麦克维不能上诉推翻判决,他将被注射毒药死去。相对于砍头和枪毙的刑罚来说,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文明”到了极点。美国人已经考虑到死刑犯伏法时的痛苦,但是,麦克维并没有想到死在他手里的那些无辜者的悲惨,更没有想到他留在人间的苦难。根据美国的司法制度,麦克维可以有多次上诉机会,每次上诉都要经过重新取证、陪审团裁决、法官宣判等一系列程序,因此,要真正执行死刑,还早得很呢。只要麦克维不放弃上诉机会,只要最高法院不作出终审判决,麦克维就可以太太平平地活在他专门准备的监狱里。不过,麦克维被判有罪,总算让受害者家属出了一口气,正义得到了伸张。

黑色星期五

星期五在美国不是一个吉利的日子,自 1929 年那个发生了经济

危机的星期五以来,美国人习惯用“黑色星期五”来形容他们不喜欢的日子。不过,自从上帝为人们规定了星期之后,星期五总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人惟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帝格外施恩,让星期五是别的什么颜色,而不要是黑色。1993年2月26日,又是一个星期五。这个星期五会是什么颜色呢?

2月26日中午,其时正是一天中最忙的时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里,人们正忙着办公。世界贸易中心,倒不是喜欢夸大的美国人的故作夸张,而是它的真实写照。整个中心由两座高达411.48米的主楼和一些辅助设施组成。它的高度在美国虽然算不上第一,次于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但是,它确实确实是世界第二高楼,其重要性远非西尔斯大厦可比。它有90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共有千余家商号在此设点办公。鉴于美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纽约又是美国的经济中心,因此,各国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都把进入世界贸易中心作为进入美国的象征,纷纷在此租地办公,中国也有数十家公司在此办公。因此,在世界经济圈中,世界贸易中心实有华尔街第二的地位。

2月26日虽然天气不大好,气温较低,外面还下着小雪,更重要的是,这一天还是一个星期五,但这一切因素都没有影响游人的兴致。中午时分,在整个大楼里办公、游览的人达到十万之众。然而,12点18分,一声爆炸惊天动地,原本坚如磐石的贸易中心大楼顿时摇摇晃晃起来……

爆炸声过,大楼里顿时一片漆黑。事后检查,爆炸发生在大楼地下二层的停车场,炸弹炸出了一个长60米、宽30米的大坑,把大楼的地下层都炸穿了。停车场内的汽车大多被毁,混凝土碎片飞得满地都是。巨大的冲击波使整个大楼的动力系统全部切断,大楼与外界的联系立即终止,电话中断,电梯停驶,不少人被困在电梯内。大楼内多处起火,浓烟一直冒到400多米的顶层。

由于事发突然,再加上通讯联络中断,许多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8个残疾人被困在94层的电梯里绝望地呼救。

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来说,10个亿并不算什么,只当是国会多掏出几个亿对某国反政府武装进行了援助,但是,这次大爆炸造成的精神损失对心高气傲的美国人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长期以来,

美国以天堂著称 ,虽然恐怖主义肆虐天下 ,但美国人总认为炸弹不会扔到美国 ,现在 ,这个美梦一下子化为镜中花、水中月。纽约州州长寇姆惊呼 :“这是恐怖分子有史以来对我们的首次袭击 ,从现在起 ,美国也无法逃脱这一灾难了。”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由于美国到处伸手 ,到处树敌 ,国际恐怖组织早就把美国当作一个袭击的目标了。1984 年 3 月 16 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中东情报站站长威廉·已克利在贝鲁特被数名阿拉伯人绑架 ,一年后他被撕票。1988 年 12 月 21 日 ,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客机 ,在英国小镇洛克比上空坠落 ,虽然经过数年调查 ,美国人还是未能弄清真相。再往前 ,还有阿拉伯人驾车爆炸美军驻黎巴嫩兵营的事 ,数百名美军士兵成为异国的孤魂野鬼。事实是 ,美国从来不是世外桃源 ,对恐怖主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免疫力。至于说由美国人自己制造的、在美国本土上的恐怖行动 ,那就更多了。

1963 年 11 月 22 日 ,正当年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满怀豪情 ,准备带领美国人民奔向新生活时 ,就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 ,李·奥斯瓦尔德向他开枪了 ,肯尼迪总统当场身亡 ,鲜血溅了总统夫人一身。凶手虽然当场抓获 ,但奇怪的是 ,就在当天晚上 ,另一名杀手 ,杰克·卢比在众目之下 ,射杀了奥斯瓦尔德。事后虽经多方调查 ,但肯尼迪遇刺之谜至今难解。有人说 ,因为肯尼迪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搞对抗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恼羞成怒 ,因而命令克格勃派出杀手将肯尼迪除去。也有人说 ,肯尼迪得罪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 ,因而胡佛下令将他除去。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但一个事实是 ,肯尼迪的死因至今未明。他是美国历史上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 ,在他之后 ,罗纳德·里根也差点命赴黄泉。

1968 年 3 月 ,同样是在“天堂”美国 ,一名杀手向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开枪 ,这位享誉全美的黑人领袖就这样饮弹身亡了。

1970 年 3 月 6 日 ,非法组织“地下气象员”的三名成员在纽约格林威治村试制炸弹时失手 ,结果当场毙命。同年 ,一名极端分子因为反对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 ,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陆军数学教学中心放置了一枚炸弹 ,结果造成一名研究人员死亡。

1975 年 12 月 29 日 ,一枚藏匿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环球航空公司办事处锁柜中的炸弹爆炸 ,造成 11 人死亡 ,75 人受伤。

1981 年 5 月 16 日 ,纽约肯尼迪机场泛美航空公司办事处的男浴室发生爆炸事件 ,当场炸死一人。

.....

联邦调查局发出“红色密码”

谁是这个爆炸案的元凶？难以想象。纽约市警察局在爆炸发生后的 24 小时内竟连接到 19 个电话 ,均声称对此事负责。接电话的警察不敢怠慢 ,每一个电话都进行了录音 ,并逐字逐句进行处理 ,指望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或者从中找出真凶。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的。联邦调查局紧急行动起来 ,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的调查活动 ,其规模足以令联邦调查局此前的任何一次行动黯然失色。塞欣斯局长亲自坐镇 ,在华盛顿成立了指挥中心 ,并向全国发出了标志着最高行动状态的“红色密码” ,要求各地协同提供线索。联邦调查局当天即向纽约增加警力。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怖中心也行动起来 ,热线立即开通 ,并向世界各国发出求援急电 ,要求各国提供各恐怖组织的最新动态。此外 ,电脑专家、心理学家、爆破专家也紧急行动起来 ,协助破案。

当然 ,警方深知 ,恐怖分子以世界贸易中心为爆炸目标 ,一定是与美国及纽约有着“深仇大恨” ,否则 ,是不会下此毒手的。那么 ,当今世界 ,谁与美国有着如此“深仇大恨”的呢？破案人员首先想到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由于美国在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拉偏架 ,袒护克罗地亚和波黑穆斯林 ,对塞尔维亚族大打出手 ,早就在塞族引起公愤。南斯拉夫激进党领导人塞塞约就曾对美国发出过多次威胁 ,而布什政府也把塞塞约列为“战争罪犯” ,塞塞约多次表示要复仇。塞族军事指挥官姆拉迪奇就说过 ,他要把战争引到美国去。当然 ,姆拉迪奇此言只能是说说的 ,当真要与美国打仗 ,只怕也不容易 ;不过 ,如果他派出一些恐怖分子 ,到美国兴风作浪 ,制造混乱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波黑驻联合国大使就说 ,塞族完全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迫使美国人少管闲事。再说 ,第一个打进电话声称对爆炸负责的

就是一个自称为“塞尔维亚解放阵线”的人。不过,这一说法立即遭到塞裔美国人组织的反驳。该组织的发言人称:“随便哪个傻瓜都可以拎着电话声称对此事负责。”美国人拉偏架,塞族人恼火,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此事真系塞族人所为,塞族人还会这么傻,故意引火烧身吗?

警方重点怀疑的第二个对象是伊拉克人。其时正是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两周年之际。早在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就扬言要对美国采取恐怖行动,但事后证明是一场虚惊。这一次,萨达姆会不会来真格的呢?说来也巧,科威特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层正好租了一间房间,萨达姆会不会拿科威特人出气呢?不得而知。此外,纽约州州长的市内办公室也在世界贸易中心,他的停车点离爆炸现场不远,萨达姆会不会拿他开刀,搞一场蓄意谋杀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警方只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了。3月2日,《纽约时报》收到了一封署名为“解放军第五连”的信件,这封信使破案者觉得恐怖分子可能来自中东,因为信中扬言除非美国答应他们的要求,包括终止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不干涉中东国家的内部事务,否则,他们就要对美国的军用和民用设施继续进行攻击,连核设施也不能幸免。

证据很快就拿出来了。现场清理的结果表明,爆炸发生在地下第二层停车场,面积达1800平方米。如此之大的爆炸面积,专家认为,可能不是普通炸弹所为。专家分析,此次爆炸,恐怖分子极可能使用了一种名为塞姆泰克斯的高能炸药。这种炸药体积虽小,杀伤力极大,且便于携带。1988年洛克比空难中,恐怖分子使用的炸药仅一个盒式录音机那么大,但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客机因此而粉身碎骨。它原先主要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虽然现在已经停产,但据捷克总统哈维尔说,库存量足够恐怖分子用上150年!

爆炸专家又想到,要在世界贸易中心炸出这么一个大坑,恐怖分子使用的炸弹量必不在少,恐怕有500磅——1000磅。如此数量的炸弹,要带入美国,只怕也非易事。那么,恐怖分子能否就地取材呢?五角大楼的武器库中就有这么一种产品,它的性能极似塞姆泰克斯,深受北约及美国各矿业公司的欢迎。恐怖分子极可能从美军的武器

库中偷一点出来。

清理现场最有价值的发现是警察在现场找到了几盘录像带,其中一盘录像带显示,有一辆福特牌汽车从车库中急驶而出。这引起侦探们的兴趣。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汽车的车速是不可能有这么快的。调查人员由此推断,这辆小车可能就是装了巨量炸药进入世界贸易中心的那辆小车。作案者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此外,两位调查人员还在现场清理出一块扭曲的黄色铜牌和十几片碎片。经鉴定,那块铜牌是一辆福特货车的残片,号码为XA70668。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调查人员开始按图索骥,进行全面的调查。他们找到了这辆小汽车的主人——与纽约州一河相隔的新泽西市肯尼迪大道1558号赖特卡车出租公司。该公司证明,这辆汽车确实是它的,但已在一周前租给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萨拉马的男子,而且,萨拉马还三番五次来公司纠缠,说他的汽车被盗,要求退还他的400美元押金。萨拉马丢车之说,无法得到警方的证明,因此,赖特公司也无法退还他的押金。调查小组在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设下圈套,等待萨拉马再次前来索款。3月4日,萨拉马果然打来电话,这次,公司职员没有拒绝他的要求。原来,伪装成公司职员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在电话中告诉他,虽然没有警方的证明,但他仍然可以取回一半押金,让他随时来取。萨拉马不知其中有诈,兴冲冲地赶到赖特公司,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有意与他周旋,询问了一些有关丢车的情况,萨拉马不疑有诈,只想取回自己的押金。他取钱后准备乘出租车离开,正在这时,一群联邦调查局特工截住了他。

打开联邦调查局的电脑资料库,电脑显示,穆罕默德·萨拉马原是位约旦籍男子,今年26岁。1967年出生于约旦河西岸,1987年合法移民美国,一直居住在新泽西州泽西城。萨拉马文化程度不高,因此来美后一直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他对现状不满。他的母亲曾对人说过:“他到美国是想找份好工作。他要去学习,去创造自己的未来。”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萨拉马是一位狂热的伊斯兰教徒,尽管他常去泽西一所由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教奥马尔·阿卜杜拉·拉赫曼传教的清真寺做礼拜。随后,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结果,尽管警犬在他的房间中嗅到了强烈的炸药气味,但特工费尽九牛二虎

之力,还是没有找到炸药,只是找到了一些与制造炸弹有关材料,如天线、电路图、接线说明书。这些材料不能证明萨拉马与炸弹直接有关,但已经足以将他列为重大嫌疑犯了。警方认为,如果爆炸真与萨拉马有关,那么,萨拉马绝对不会单枪匹马,因为爆炸世界贸易中心是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而萨拉马却为他那区区几百美元押金斤斤计较。因此,萨拉马背后必定有一条大鱼。因此,警方随即围绕萨拉马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凡是与萨拉马有接触的人都脱不了干系。

在爆炸案发生的前一天,有人发现萨拉马与其他几个人一起出入泽西市的一间仓库,并向一个名叫尼达尔·阿亚德的人打过电话。于是,警方对那个仓库进行了突击搜查。这次搜查发现了不少物证,仓库里有几包尿素、数瓶硝酸,还有一些烧瓶、试管和引信。这些东西已经足以制成炸弹了。至于那个阿亚德,警方也根据萨拉马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他。原来他是一名有巴勒斯坦血统的科威特人,不过,他目前已经向星条旗效忠,归化为美国公民了。他与萨拉马不一样,来美后取得了化学工程学位,现供职于某信号公司。警方认为他的专业知识已经足以制造一枚炸弹了。他和萨拉马关系极佳,两人认识已有一年,且共同拥有一个账号。在萨拉马租车后,他也开着一辆红色的汽车与其同行。这样,3月10日,联邦调查局直奔阿亚德的寓所,从被窝中请出了阿亚德,并对他的寓所进行了搜查,结果在他的个人电脑里发现了一封信,信中他对第二次行动表示不满,并准备再次行动,炸毁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他在信中说:“很不幸,这次我们的计算不精确,不过我们可以保证,下一次行动将非常精确。除非我们的行动成功,否则世界贸易中心将始终是我们在美国的目标。”信末还附有“解放军第五连”的签名。联邦调查局将此信与《纽约时报》接到的信件相比,发现两者有相似之处。再对《纽约时报》那封信的信封和信纸进行化验检查,结果发现,这封信就是阿亚德所写。真凶终于露面了。

联邦调查局还发现,阿亚德和萨拉马制造炸弹所需要的钱,都是由一个外国组织资助的。几个月来,至少有8000美元从欧洲汇到阿亚德和萨拉马的账户里,使用这笔经费的,除了萨拉马和阿亚德外,还有四个人,结果就引出了穆罕默德·阿布哈里马。阿布哈里马原籍

埃及，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萨达特总统遇刺后，埃及政府开始镇压穆斯林兄弟会，阿布哈里马眼看就要落入法网，因此，他悄悄地飞到德国慕尼黑，那里有一个伊斯兰中心，他就在那里住了下来。他向德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但申请被驳回。德国政府的理由是，如果阿布哈里马真如他所声称的那样，没有从事过任何非法活动，那他就没有必要害怕埃及政府。因此，德国政府勒令他两个星期内离开德国。就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又结识了一位34岁的老姑娘索卡。索卡是一位护士，有过酗酒史，感情上受过挫折。阿布哈里马就向她发动了进攻，结果两人很快结婚了。这样，阿布哈里马也不用回埃及了。索卡对阿布哈里马还是满意的。她的评价是：“他非常有礼貌，待人和善，从来没有凶神恶煞、咄咄逼人的样子。”阿布哈里马每天要作一次被告，这一点也让她很感兴趣。不过，两人之间谈不上有感情。按照《古兰经》的圣训，一个男子得有四个妻子，于是他又娶了一个女子玛丽娜，并建议索卡和他们两人一起居住，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两人吵翻后离婚。但是，阿布哈里马终究还是遇到了知音。他与后来的妻子玛丽娜一起来到美国，在纽约定居下来。与萨拉马和阿亚德等人相比，阿布哈里马的记录可是不太好。在纽约他以开出租汽车为生。闯红灯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在计程器上做手脚也是常有的事。为此，他的驾驶执照被没收过十多次。他丝毫不隐瞒自己极端的宗教热情，并积极投入了当地穆斯林组织“兄弟的阿富汗穆斯林”进行的募捐活动，并亲自到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基地接受军事训练，成绩绝对优秀。在那里他结识了拉赫曼教长，教长的两个儿子也在那里受训。后来，他还跑到阿富汗去，与阿富汗的伊斯兰同胞一起从事反苏斗争。他的一位同事至今记得阿布哈里马“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曾在阿富汗各地打过仗”。回到纽约后，阿布哈里马经常身穿旧军装，脚登军靴，到处走来走去，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不久，他又成了拉赫曼的私人保镖兼司机。因此，联邦调查局一发现阿布哈里马与爆炸案有牵连，立即就认定，阿布哈里马可能就是那个在幕后出谋划策的人。爆炸案发生后的3月6日，他携妻带子回埃及探亲，而后又到麦加朝圣。但是，这一点难不了联邦调查局。求助信立即发到埃及，请求埃及警方

协助逮捕这个重大嫌疑犯。由于阿布哈里马本来就是一个令埃及警方头疼的人物,因此埃及警方通力合作。3月24日,埃及警方在阿布哈里马的老家将其拿获,然后交由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带回美国审讯。阿布哈里马表面上强悍,实际上是个软蛋。警方没有费很大的劲,就撬开了他的嘴巴。他交代说,还是在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时候,他和他的一些同党就酝酿了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参加圣战的阿拉伯退伍军人的赞同,事先也征求了泽西市的拉赫曼教长的意见。当时约定,从事爆炸活动的人可得到“伊斯兰团体”的资助。这个组织以真主的名义从伊朗商人、流亡欧洲的反政府人士那里募捐,也可以从支持伊斯兰复兴事业的沙特阿拉伯政府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那里得到援助。审讯表明,来自国外的伊斯兰复兴势力策划了这次爆炸。联邦调查局认为,起码还有两个人应该列入侦查范围。一名是27岁的比莱·阿凯西,他怂恿和支持爆炸;另一名是兰吉·优素福,有人看到过他与萨拉马一起出现在仓库里,而且阿亚德身边有一张他的信用卡。但这两人被拘捕后,只有阿凯西承认与爆炸有关,优素福拒不认罪。

他是真正的凶犯吗?

现在,除了那位伊斯兰教长拉赫曼以外,所有与爆炸案有关的人物均已亮相,并落入法网。接下来就是对凶犯进行审判。

为了保证主控官和陪审员的人身安全,警方这次采取了特别严密的保安措施。从9月起,两名主控官就和他的家人一起移居一处秘密地点,据说有人对他们进行了威胁。负责审理此案的曼哈顿下城法院制定了严密的安全保卫措施。法院内有双层金属探测仪和调光仪器设备,外有层层警卫。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都隐去了姓名,仅以号码识别。

10月4日,法庭开庭审理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助理联邦检察官季尔莫·柴尔德斯进行了冗长的发言。3月4日,陪审团裁定,萨拉马等4人策划、实施爆炸罪名成立。5月24日,4名凶犯被带进法庭作最后陈述。他们都辞退了自己的律师,自己进行申辩。结果,法庭认为,他们的申辩是一派胡言。法庭出示了1000件物证,传唤了

200 名证人,认定是萨拉马把爆炸物运进了现场,其他人则与策划爆炸阴谋、制造炸弹有关。纽约市地方法院判处这 4 名凶犯每人 240 年徒刑,并且不得假释。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这 240 年徒刑只是司法机构发泄自己心中的怒气,说不上是什么惩罚,因为显而易见,没有一个人能完成这么长的刑期。

至此,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并不能说已经划上圆满的句号,因为本案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没有出场。他就是移居泽西市的伊斯兰教长拉赫曼。各种迹象都表明,他才是这起爆炸案的真正策划者。但是,美国当局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证据证明拉赫曼就是那个在幕后指使爆炸世界贸易中心的人。再说,拉赫曼是一位伊斯兰教长,在当今伊斯兰复兴的年代,美国对这样的人还真是十分头疼。

拉赫曼原籍埃及,他是一个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从表面上看,拉赫曼并无惊人之处。他是盲人,这一点就很容易引起人们同情。此外,他最大的特征就是永远戴一顶红白相间的帽子。这种打扮几乎几十年一成不变。但是,拉赫曼绝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据说,1981 年萨达特总统被刺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埃及政府对他无可奈何,干脆把他一脚踢出埃及。拉赫曼本人是以旅游签证进入美国的,一直在泽西城的艾尔沙勒姆清真寺活动。美国警方对拉赫曼早有怀疑,认为他进入美国不怀好意。1990 年,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卡哈尼被杀,涉嫌凶手纳沙尔被警方扣留。纳沙尔是一位阿拉伯人,警方认为这起凶杀案可能与阿以冲突有关系,当时就怀疑拉赫曼与此事有牵连,但因证据不足无法对他采取行动。不要说拉赫曼,就是纳沙尔,不久也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对这样的人,如果美国警方找不到真凭实据,还真不敢对他下手。他们对巴勒斯坦哈马斯运动的创始人谢辛的情况都很了解。谢辛每进一次监狱,他的声望就增加一分,最后,以色列当局根本不敢对他下手。美国担心对拉赫曼采取行动也会产生类似的后果,因此,警方一直很慎重,不敢对他采取行动。

但是,到了 6 月底,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联邦调查局经过周密调查,一举抓获 8 名伊斯兰恐怖分子,他们被控准备于 7 月初炸毁位于哈德逊河底深处的霍兰隧道和林肯隧道。经审讯,这 8 名嫌疑犯

与拉赫曼都有联系,且听命于拉赫曼。联邦调查局这下觉得有理由对拉赫曼采取行动了。联系世界贸易中心的被炸,司法部门认定,这几起恐怖主义事件,表面上不相关联,实际上都与拉赫曼有关,拉赫曼才是这些恐怖分子的真正主使。8月底,纽约市大陪审团正式起诉拉赫曼、纳沙尔和其他13名伊斯兰恐怖分子,主控官为他们定的罪名是:“发动针对美国城市的恐怖主义战争”。这个罪名是够吓人的。但是,美国司法部长依然认为,起诉拉赫曼,证据仍嫌不足。不过,由于市民都认为拉赫曼是这一系列恐怖活动的策划人,对政府迟迟不对拉赫曼采取行动表示不满,因此,纷纷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部门只能以违反移民法将拉赫曼拘捕。司法当局声称,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述几起案件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但是,经过逻辑分析,已经可以勾勒出一幅阴谋图画。恐怖分子打算绑架或杀掉伊斯兰的假想敌人,被害的卡哈尼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卡哈尼的朋友、审判纳沙尔的法官、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都名列其中。下一步,他们的目标就是轰炸一些军事目标,如纽约市的华盛顿大桥、曼哈顿的犹太人定居区。这样,拉赫曼就在劫难逃了。联邦司法机构用飞机把他从拘捕处送到法庭,与其他恐怖分子一起受审。由于在此之前,警方已经接到警告:如果拉赫曼受到伤害,他们将要报复。因此,法庭内外军警密布。法庭上,控方出示证据,证明拉赫曼与上述几起恐怖主义案件有联系,其主要的证据就是拉赫曼与其保镖沙勒姆近10个小时的谈话录音。沙勒姆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派在拉赫曼身边卧底的眼线,他把拉赫曼与其谈话的内容都偷偷地录了下来,这成为联邦调查局指证拉赫曼的证据。拉赫曼肯定在与其谈话时暴露出自己的思想,联邦调查局指望用这些证据来给拉赫曼定罪。但辩方律师也不是吃素的。他指责政府凭借“谣言和怀疑”编织了一个阴谋神话,其目的就是在美国煽动起一股歇斯底里的、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列为美国的敌人的风潮。这样,对拉赫曼的起诉实际上也是对整个原教旨主义运动的起诉,这样打击面就太大了。律师提起“歇斯底里”,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忆起50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的一幕。当时,美国参议员麦卡锡诬指共产党钻进了美国政府,杜鲁门政府也跟着瞎起劲,在政府内搞忠

诚调查 ,结果使一大批正直的政府官员遭到打击。对那恐怖的一幕 ,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心有余悸。因此 ,辩方律师的反驳颇为有力。此外 ,他还指出 ,联邦调查局所谓有力证据 ,全部来自拉赫曼的私人保镖 ,此人又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间谍 ,用这种手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信 ,很难证实。

对拉赫曼的处理让司法当局十分犯难。没有明确的证据 ,司法部门无法对拉赫曼定罪 ;但对他不作一点处理 ,就让他逍遥法外 ,似乎也说不过去 ,联邦调查局也心有不甘。于是 ,有人想出一个放逐的方法。拉赫曼原先不是埃及人吗 ,干脆让他还回埃及算了 ,让穆巴拉克去头疼吧 !殊不料 ,穆巴拉克知道这块骨头不好啃 ,因此 ,也不愿意接纳拉赫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美国政府才说得埃及政府回心转意 ,但司法专家却发现 ,根据美国的法律 ,拉赫曼还不能被驱逐出境 ,这一下 ,轮到联邦调查局为难了。不管拉赫曼与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是否有牵连 ,不管他的最后处理到底如何 ,世界贸易中心的一声巨响 ,把美国人从梦中震醒了 ,美国不是世外桃源 ,恐怖主义一样会光顾美国。

死在和平日的“鹰爪”——拉宾

国王广场上的枪声

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

这一天是星期六,根据犹太教律,也是安息日。犹太教的先知摩西曾告诫他的子民:“一星期要工作六天,第七天安息日,应当有圣会。”因此,一般情况下,从星期五傍晚落日 to 星期六晚上天空中出现第一颗星星为止,犹太人必须在家或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而不得在外边闲逛。因此,在安息日里,人们会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大街上空空荡荡的,没有人,更没有汽车。如果有人不守礼法,驾驶汽车上街,那么,等候他的也许是石头。

但是,这一个安息日与以往迥然不同。夜幕降临后,特拉维夫还是灯火通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的国王广场,到那里参加一个集会。据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一批政要将出席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重要演说。

7点钟,随着市政厅电动平台在国王广场缓缓升起,拉宾总理一行出现在国王广场。陪同他出席这次集会的有他的内阁同僚,包括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另外,埃及、约旦等国驻以色列的使节也应邀出席。当他们出现在广场上时,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顿时欢声雷动,向贵宾们致意。

在人们的掌声中,拉宾总理开始向来宾发表演说。他首先向今天晚上来到广场集会的人们表示感谢。他说:“请允许我这样说,我

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要感谢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 ,因为你们都是为了反对暴力、拥护和平而光临的。我和我的朋友西蒙·佩雷斯领导的政府决定给和平一个机会——这个和平将解决以色列大部分的问题。”

他继续说道：“我当了 27 年的军人 ,只要和平的机会没有到来 ,我就会矢志不渝地斗争下去。我相信现在有一个机会 ,一个争取和平的伟大机会 ,为了站在这里的人 ,为了更多的不在这里的人 ,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个机会。”

是的 ,暴力必须受到谴责 ,但是 ,拉宾总理不知道 ,今天来到广场参加集会的人们 ,并不全是和平进程的拥护者。夹杂在热望和平之神降临的人群中 ,就有这么一位誓死从肉体上消灭拉宾的人。此刻 ,他怀中揣着手枪 ,正在等待着机会的降临。

他叫伊加尔·阿米尔 ,巴尔·伊兰大学法律系一年级的学生。他的父亲是犹太法律学家 ,母亲是幼儿园的老师。阿米尔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 ,从小就养成了知礼、守法的好习惯。在人们的心目中 ,阿米尔是个文静、温顺、有礼貌的年轻人 ,从小就因乐于助人得到人们的赞扬。从预备役退役后 ,他进入大学深造 ,读的也是法律。杀人是一桩违法的勾当 ,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他知道得很清楚。

可是 ,今天他就要去干一件违法的事情 ,这件事情的程度足以惊天动地 ,使许多人扼腕顿足 ,又令一些人欣喜若狂 ,令他阿米尔青史留史 ,不管它是英名 ,还是骂名。

他要去刺杀伊扎克·拉宾 ,用自己的手枪将伊扎克·拉宾总理送入地狱。

他与拉宾并无私仇。可是 ,他觉得他与拉宾仇深似海。

仇恨的根源在于阿米尔对拉宾的和平政策不满。阿米尔是个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他上的学校也是一所犹太教会大学。因此 ,他不希望听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在这块土地上可以和平共处的说法 ,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不时挑起的恐怖行动 ,他也深恶痛绝。他认为 ,万恶的根源就在于拉宾总理与巴勒斯坦人议和 ,因此 ,“我们要把这一切记在拉宾和他的政府账上”。在他的心目中 ,拉宾是一个犹太人的“叛徒”、“刽子手” ,是出卖犹太人利益的“纳粹分子”。仇恨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 ,他发誓 ,一定要为犹太人除掉这个败类。

今天是他第三次策划谋杀拉宾。前两次 ,因为机会不佳 ,暗杀无法进行 ,阿米尔深感遗憾。这一次 ,他听说拉宾将出席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 ,认为天赐的良机总算降临了。他摸着自己的手枪 ,不断地对自己说 :“刺杀拉宾 ! 刺杀拉宾 ! 我要让拉宾变成一具僵尸 !”

他为手枪压上了经过自己精心改装过的子弹 ,使它更具杀伤力 ,然后 ,大步走出家门 ,赶往国王广场。

台上 ,拉宾还在发表演说。

阿米尔慢慢地靠近了拉宾总理的汽车。他已经知道 ,这一次拉宾将从市政府的后门离开 ,他仔细地察看着周围的一切 ,包括拉宾总理周围的保镖。

拉宾以一个老军人、一个国防部长的身份向人们保证 ,他的政府将尽一切可能去推动中东的和平进程。他说 :“这次集会一定会给以色列人民、全世界的犹太人、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 ,确切地说是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 ,以色列人民需要和平 ,支持和平 ! 为此 ,我向你们深表感谢。”

广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拉宾总理意犹未尽 ,又与全场群众一起高唱《和平之歌》 ,广场上群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歌毕 ,拉宾转过身来 ,同站在自己身旁的佩雷斯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个举动让大家深感意外。虽然佩雷斯是拉宾的重要阁僚 ,但大家都知道 ,两人的关系素来不睦 ,两人曾为争夺工党领袖这个职位明争暗斗几十年。就在去年 ,拉宾和亚西尔·阿拉法特因为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获得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而西蒙·佩雷斯的支持者不断鼓噪 ,要把外交部长佩雷斯也列入候选人。应该说 ,拉宾和佩雷斯是一对冤家对头 ,人们从未看到两人拥抱过。因此 ,马上有记者挤过去问拉宾 ,这是不是两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拥抱 ? 拉宾说 :“事情在变 ,不仅仅是世界和中东在变 ,我们也在变。”

拉宾一行在人们的簇拥下走下广场 ,准备乘车离去。拉宾一边走一边与热情的群众握手。就在此时 ,拉宾突发奇想。他对佩雷斯说 :“你跟我说过 ,在这个大会上有人要行刺 ,不知道这人群中会有谁会开枪。”佩雷斯把它当作笑话 ,一笑了之。大会已经结束 ,下边是层层护卫着的警卫 ,就是有杀手 ,这个时候行刺也不可能得逞。

佩雷斯走下台阶，碰到了总理的司机达姆提。达姆提问：“总理什么时候走？”佩雷斯说还要再等几分钟，拉宾总理正在与外国使节握手。

拉宾和夫人丽荷向停在广场旁边的轿车走去。在此之前，他的警卫曾要求他穿上防弹背心，尽快离开广场。拉宾拒绝了。他说：“此刻我觉得像在家一样安全。”有记者问丽荷：“你不怕一个疯子会突然冲出来，向总理开枪吗？”对这个不吉利的问题，丽荷没有反感，也没有担心，更没有引起警觉。她反问道：“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你疯了吗？我们在哪里？在非洲吗？我真不明白，你们记者怎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丽荷是有理由说这番话的。虽然丽荷所处的巴勒斯坦地区是世界闻名的火药桶，战后绝大多数重大的局部战争发生在这里，世界上恐怖主义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也在这里，但是，以色列这块土地，却像一个孤岛，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绝少出现恐怖主义案件。在以色列，个人拥有枪支虽然很普遍，但犯罪率很低，这令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至于说战争，只要以色列不首先动手，一般不会打起来。更何况，今天的晚会如此成功，拉宾得到这么多支持者的拥戴，记者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岂非突兀！

拉宾终于同人们告别，向自己的汽车走来。黑暗中，有一个人突然从旁边窜到离拉宾两米远的地方，从怀中掏出手枪，对准迎面而来的拉宾“叭叭”就是两枪。他一边开枪，还一边喊着：“没事，没事，这不是真的。”

不消说，对准拉宾开枪的就是阿米尔。他无心听拉宾的演说，对全场高唱《和平之歌》的情景也无动于衷，他只想除掉犹太人的“败类”，顺便使自己名垂青史。因此，他迎面对准拉宾的胸口就是两枪，拉宾的胸口如同中了两下重锤。他不由得弯下腰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拉宾的保镖发了呆，一刹那，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愣在那里，既没有去追捕凶手，也没能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自己的总理，反而把拉宾的后背暴露给了凶手，结果，阿米尔向着拉宾的背部又开数枪。一枪击中了拉宾，另一枪击中了一个保镖。拉宾终于倒下了。拉宾被立即送上汽车，随车的一名保镖问拉宾：“总理先生，你伤着了

吗？”

“唔，唔。”拉宾呻吟着，他已经无力回答保镖的提问了。

“伤在哪里？”

“背上，背上，”然后，他又说：“我没事，没事。”然后，头一歪，再也没有醒过来。

拉宾被送到伊希洛夫医院，这时，他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脉搏。检查发现两颗子弹，一颗打中他的脾脏，一颗击中他的脊椎。凶手使用的不是普通的子弹，这两颗子弹都经过改装，是国际上禁止使用的炸子弹。阿米尔在弹头上加了一个铁丸，还在子弹上钻了一个洞，使它的命中率更高，威力更大。结果，拉宾流血不止。

当以色列电台向全国人民宣布，拉宾总理在国王广场遇刺，伤势非常严重时，以色列人民点燃了蜡烛，祈祷拉宾总理平安度过险境，更多的人则涌向医院，探问拉宾总理的病情。11点10分，医生终于放弃了一切努力，走出手术室，宣布拉宾总理伤重身死，11点14分，拉宾总理的助手哈伯正式宣布，拉宾总理遇刺身亡。消息传出，举世同悲。很多人禁不住痛哭失声，更多的人点起了白烛，为拉宾总理祈求冥福。国际社会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动。联合国加利秘书长发表讲话，称拉宾遇刺对以色列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重大损失。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发表声明，对这一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表示愤怒。拉宾几十年的对手、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和平伙伴亚西尔·阿拉法特更是对此表示震惊和悲痛。他说：“这种对一位以色列勇敢的领导人与和平缔造者犯下的可怕的罪行使我感到非常悲痛和震惊。”

11月5日，护送拉宾遗体的军队离开特拉维夫，前往耶路撒冷，这是拉宾总理最后的一段人生旅程。拉宾总理的灵柩安放在一辆军车上，遗体上覆盖着以色列国旗。车上，6名以色列将军为先总理守灵；车外，则是如流的车队和随同灵车一起前行的人们。从5日下午2点至6日上午11点，大约有100万人守候在耶路撒冷，等着见拉宾最后一面。

拉宾死了，人们称赞他为和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掩卷深思，我们发现，拉宾并不是第一个为和平而献身的英雄。在他之前，

有埃及总统萨达特，正是他，以非凡的勇气表示愿意到耶路撒冷与以色列领导人会谈，以解决中东问题，他获得了成功，也付出了代价。几年后，他死于自己的士兵手中。在萨达特之后，还有阿布·杰哈德，巴解武装力量副总司令。1988年4月18日，他被几个以色列杀手杀死。

从表面上看，阿布·杰哈德与拉宾之死、与中东的和平事业并无关系。拉宾是为和平而死的，称之为和平英雄理所当然，阿布·杰哈德却是为了反抗以色列而死，这两者怎么可能相提并论呢？但是，细细追溯中东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件事中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正是阿布·杰哈德的死使拉宾成了一个和平英雄，也正是他的死，使拉宾的死成为必然。

巴勒斯坦人一次又一次地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制造了一次又一次流血事件，被以色列人包括拉宾称为“恐怖分子”，遭到血腥镇压。但是，是谁把他们变成恐怖分子的？他们难道不愿意放弃那种自杀性的行动，安居乐业吗？还不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眼中，巴勒斯坦人只有服从以色列的统治，听任犹太人的盘剥，才有生路，否则就是死路一条，由于以色列政府将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视为草芥，以色列国内的极端分子当然也不把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放在心上，因此，他们也时不时地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大开杀戒。

1988年5月20日清晨，一名以色列男子身穿黑色上衣，怀揣一支以色列制造的M—16自动步枪，悄悄来到特拉维夫以南8公里的小镇里雄莱锡安镇，潜入一处灌木丛中。如果你看到他这副模样，准以为他是狩猎的。不错，他确实是狩猎的，不过，他的猎物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巴勒斯坦人。6时许，天已放亮，灌木丛已经无法掩盖他满身的杀气，于是，他走出灌木丛，朝热闹的街口走去，那里坐着20余名巴勒斯坦人，他们正等着去打工。随后，又一辆满载工人的汽车开来了。那个以色列人命令停车。司机以为他是一名军人，以色列虽然是一个法治国家，但军人对于这些没有国家保护的巴勒斯坦人还是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遵命停车，车上的巴勒斯坦人纷纷下车，与原先坐在那里的同胞坐在一起。他命令他们掏出身份证来。没有违拗，一个个顺从地掏出了身份证。他又问：

“知道我为什么截停你们吗？”答案当然是“不知道”。“很好，那就让你们弄个明白吧！”他的眼中突然冒出野兽般的凶光。他端起自动步枪就向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狂扫。结果，8名巴勒斯坦人当场死亡，劫后余生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受难而无能为力。凶手作案后又截住一辆汽车，打死了开车的阿拉伯人，然后扬长而去。以色列人的暴行传出后，当即在全国、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激怒的巴勒斯坦人涌上街头，抗议以色列人的暴行，但又招来军警的镇压。冲突中至少有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非命，数千人受伤。它成为1987年被占领土起义以来最严重的流血事件。事情闹大了。警方收审了这个名叫阿米·朴帕的凶手。他才21岁，曾在以色列军队中服役18个月，因违反军纪被判入狱4个月，后被军方认定不宜继续在军中服役而提前退伍。在审判过程中，他对自己的暴行面无愧色。追究其原因，他一会儿说是因为最近与女友感情破裂感到十分痛苦，需要发泄一下；一会儿又说自己8年前曾遭到一个阿拉伯人的性虐待，因此他想报复。真真假假，连法官也无法分辨。法官以色列军方电台说：“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是否是事实。”

对这一起暴行，以色列政府是什么态度呢？当局一方面谴责这是一起恐怖主义暴行，另一方面却说，这次暴力事件是一次神经错乱的举动。阿米·朴帕有精神病，其行为无法控制，因此算不得什么，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考虑到当时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起义，考虑到拉宾先生对以色列军方下达的开枪政策，我们不难发现，这起暴力事件实际上与以色列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是分不开的。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的领导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利库德集团一贯制造仇视阿拉伯人的气氛，长期纵容以色列士兵袭击和屠杀阿拉伯人，因此，这不是一起孤立的暴力事件，也不是一个精神错乱者所为。它的真正制造者是以色列政府。审判阿米·朴帕的法官克莱恩也说：“问题在于，如果纯粹是因个人理由，那么他为何只袭击阿拉伯人而不去袭击犹太人？”约旦首相巴德兰道出了事实真相。他对约旦国家电视台讲：“以色列政府是恐怖的当权者。”

1994年2月25日发生的希伯伦惨案是另一个典型例子，有意思的是，根据以色列政府也就是拉宾先生的说法，造成这桩惨案的凶

手巴鲁赫·戈尔茨坦也是一名神经错乱者。

2月25日凌晨,戈尔茨坦身着旧军服,手持步枪混入希伯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当时正值伊斯兰律法的斋月,清真寺里有大批的穆斯林正在礼拜真主,对戈尔茨坦的闯入谁也没有留心。谁都没想到,戈尔茨坦手持步枪,对准虔诚的穆斯林扣动了扳机。措手不及的穆斯林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夺路而逃,岂料连出口也被封住了。封住出口的正是以色列士兵,因此,戈尔茨坦得以对准这些手无寸铁的穆斯林继续射击,结果当场造成66人死亡,而受伤者竟达400余人。事后检查,死亡的66人中,只有3人不是穆斯林,可见这次巴勒斯坦人又成为犹太人发泄仇恨的对象。

事件发生后,巴勒斯坦人被激怒了。他们走上街头,为受难者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且在被占领土上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总罢工。阿拉伯国家对此反应强烈,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暴行;并认为以色列政府应对此负完全责任,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发表声明,暂时退出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中东和会。连以色列总统魏茨曼也说,希伯伦惨案是“我们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可是以拉宾为首的以色列政府是怎样解释这一惨案的呢?拉宾说,戈尔茨坦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且在事发后也已经自杀身亡,因此,在他看来,这件事纯属戈尔茨坦个人的恐怖主义行为,与以色列政府无关。而公正的舆论则认为,对于这件事,以色列政府脱不了干系。一名以色列警官作证,他曾接到命令,如果发生犹太移民向穆斯林开枪或以色列士兵开枪的事情,以色列警察不可开枪阻止。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戈尔茨坦行凶是有预谋的。而目击者证实,当时在场的不止戈尔茨坦一个人,他还有几个帮手,他们堵在大门口,不让穆斯林从清真寺中逃出,另外还有一个一直在帮助戈尔茨坦往枪里压子弹。把这件事说成是孤立的恐怖主义行为很明显缺乏说服力。希伯伦惨案甚至震惊了善良的犹太人。惨案发生后的民意调查表明,66%的人主张政府采取行动,宣布一些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非法,25%的人认为,应该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果,拉宾政府也被迫采取一些措施,取缔了几个非法组织,并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应该说,拉宾的举动适应了时代的潮流,但得罪了以色列国内的极端分

子,使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建立“大以色列”的美梦破灭。他们认为,过去的战神拉宾已经背叛了犹太人的事业,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诅咒拉宾,并喊出了“打倒拉宾”的口号。反对派为拉宾举行了模拟葬礼,棺木上印着“拉宾:锡安主义的谋杀犯”,而利库德集团的领袖则昂首阔步,走过了拉宾的“棺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已经不满足于除掉争取和平的巴勒斯坦人,连拉宾也不放过了。凶手阿米尔事后说:“这是最神圣的领土。2000年前,以色列人大多住在这里,拉宾政府的骨头很软,他们愿意放弃所有的东西来换取和平。”他说,他是按上帝的旨意行事的,根据犹太教经典,他可以杀死任何放弃土地的人。因此,对于他自己的行为,他毫不后悔,十分满意。

读者一定还记得,在拉宾遇刺前,拉宾的警卫曾要求拉宾穿上防弹背心,并尽快离开广场,但拉宾拒绝了。当记者问拉宾的夫人是否担心有人会向拉宾行刺,她认为他是发疯了。以色列不是非洲,暴力与以色列无缘。以色列是一个法治国家,容不得歹徒乱来。实际上,当他们在讲这些话时,都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以色列虽然是一个法治国家,但它的法律是犹太人的法律,而不是巴勒斯坦人的法律,对巴勒斯坦人,他们从来没有讲过法律,对他们,以色列政府历来是用刺刀和子弹发言。而且,以色列也不单纯是恐怖行为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恐怖行动的制造者。在从事恐怖活动方面,犹太人绝不比巴勒斯坦人逊色。此外,恐怖活动在以色列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建国之前,以色列就有三个准军事组织,他们是哈加纳、伊尔贡和施特恩邦。这些组织最初就是靠杀人放火,在巴勒斯坦制造恐怖气氛起家的。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恐怖组织。他们的口号是“花一个美元,杀掉一个阿拉伯人”。杀死一个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是完全合法的。曾任以色列总理的贝京当时就是伊尔贡的首脑。建国后,以色列更是强化了这种恐怖机制。哈加纳等三个准军事组织被改组以色列国防军,此外,以色列还建立了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摩萨德既从事反恐怖的活动,也执行政府的旨意,针对阿拉伯人进行恐怖活动。因此,以色列既有单独的个人恐怖主义行为,也有由国家组织的集体恐怖主义行为,这是以色列的恐怖主义不同于当今世界上其他

恐怖主义的地方。当然,以色列政府的恐怖主义行为针对性是极强的,即完全针对那些威胁到它的国家安全利益的人或组织。在以色列政府眼中,这种人或组织主要是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首的巴勒斯坦人。像拉宾自己,他就曾说阿拉法特是恐怖主义的总后台,并说他是和平进程的障碍。对此,阿拉法特曾不客气地回敬说:“我没有在被占领土上搞恐怖主义,我们将继续开展占领点的斗争。这是一个合法的方式。对于遭到侵略和占领的人民来说,他们根据联合国宪章有权这样做。”阿拉法特认为,如果他是一个和平障碍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身为以色列总理的拉宾也是一个和平障碍。阿拉法特还说,拉宾是个聪明人,但他通常都是用体力而不是用脑子来考虑问题。

1988年的阿布·杰哈德事件毫无疑问是以色列政府进行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证明,而这件事,拉宾先生当年也是积极参与的。

阿布·杰哈德,原名哈利勒·瓦齐尔,1935年10月10日生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勒。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占领,瓦齐尔一家成为难民,流浪到加沙地带。20岁时,瓦齐尔到开罗一个军事基地学习,为光复国土、反对以色列的统治作准备。1960年,他结识了阿拉法特,从此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成立了巴勒斯坦的游击队组织“法塔赫”,任阿尔及利亚分部的负责人。“法塔赫”成立后,积极从事反以斗争。瓦齐尔也在战斗中成长,立下了赫赫战功,并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技能和组织才能,被人称为“杰哈德”,意为“圣战之鹰”。他是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巴解武装力量副总司令、“法塔赫”风暴突击队负责人,在人们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他,以色列政府是恨之入骨。1972年,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制造了慕尼黑事件,以色列当局认为,杰哈德是幕后指挥者,因此将他列入暗杀名单。此后,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多次对杰哈德进行追杀,但杰哈德每次都幸免于难。1987年,由于以色列政府的高压政策,被占领土上爆发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起义,以色列当局又认为,是杰哈德在幕后策划,准备将他除掉,但慑于杰哈德的崇高威望和国际影响,以色列政府不敢立即下手。1988年3月,3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制造了一起绑架事

件,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有6名人员死亡,包括那3名绑架分子。以色列当局认为,这次事件的主使是杰哈德,因此,它再也忍不住了,决心下手除掉杰哈德。4月13日,以色列内阁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从肉体上“消灭”巴解领导人一事,杰哈德首当其冲。表决结果:4票赞成,2票反对。这4票赞成票中,就有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宾和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总理沙米尔投赞成票自不待言。结果,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紧急出动,执行内阁决议。对这种任务,摩萨德当然是驾轻路熟,因为他早就在搜集杰哈德等人的情报,杰哈德的一举一动都没有瞒过他的眼睛。接到任务后,摩萨德马上就了解到杰哈德在突尼斯住宅的所在地,并将周围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随后,内线发来密报:4月16日晨,杰哈德将从突尼斯飞往某地,3时离开别墅。据说杰哈德此行是与一位外国首脑会面,讨论尽快恢复巴解组织的战斗力,开展对以武装斗争。自1982年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后,巴解武装力量大为受损,在以军的包围下,巴解战士不得不放下武器,撤往突尼斯。摩萨德总部认为,这是刺杀杰哈德的绝好机会,因为飞机在凌晨起飞,杰哈德这段时间不可能外出,一定会呆在寓所内,因此成功的可能性极大。这样,总部就下定了最后决心。报告再次送到内阁讨论。最后,沙米尔和拉宾等人认为,此次行动关系重大。杰哈德此行如果成功,对以色列的安全将是一个严重威胁。除掉杰哈德,对巴解武装力量又是一次重大打击,搞得好,巴解将无法恢复元气。因此,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但是,由于杰哈德在突尼斯,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以色列在别国主权范围内杀人,搞不好是一件丑闻,因此,此事必须做得十分机密,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不能让人抓住把柄。这就需要高超的技巧和组织才能。内阁决定,此次行动由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沙姆龙将军亲自挂帅,副总参谋长巴拉克亲自指挥,军事情报部部长沙哈克,沙米尔的特别行动顾问普雷斯勒从旁协助,由摩萨德和陆海军的特别行动部队具体执行。上述部门接到行动命令后,立即挑选精兵强将,组成了一支30人的突击队,分工负责,进行模拟演练。

4月14日,一部分突击队员化装成黎巴嫩人,分批进入突尼斯。第二天上午,3名阿拉伯男女手持黎巴嫩护照,到突尼斯三家旅游公

出租车,其中有两辆是大众牌小型面包车,还有一辆是法国标致小轿车。一名妇女曾到杰哈德寓所附近拍摄了大量照片。

16日凌晨1点多,一架看不清国籍的波音飞机在距突尼斯55公里处的国际走廊上空施放电子干扰,该地的通讯设施全部失灵。几乎与此同时,杰哈德寓所附近的电话线也被切断。

1点半,3辆汽车停留在杰哈德寓所周围,车上跳下了几十个蒙面人。他们有秩序地分成三组,一组切断路口交通,一组包围寓所,另外一组则闯进了杰哈德寓所,杰哈德的两名警卫觉得情况有异,但没等他们作出反应,以色列突击队员的无声冲锋枪就让他们失去了抵抗,正在楼上的杰哈德,听到楼下有变,立即作出反应,他掏出手枪,来到门边,正好碰上了迎面而来的蒙面人。他当即就是一枪,但杀手的反应也不慢,几乎就在同时,4支冲锋枪一起吐出烈焰,杰哈德当即倒地。刺客们还不满足,他们继续对准倒在地上的杰哈德射击,直到打光了冲锋枪里的子弹。

也就在这个时候,杰哈德的妻子、有“奋斗之母”之称的乌姆·杰哈德也听到了声音,当即和女儿赶下楼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杰哈德已经不能回答她的问题了。4个杀手用枪把她逼到墙角,把屋里的文件洗劫一空,然后,闯进杰哈德两岁儿子的卧室,用冲锋枪对准天花板又是一阵狂扫,最后与楼下的接应者会合,扬长而去。杰哈德倒在血泊之中,他至少身中75弹,右手臂被打断,连手枪也被打毁了,全身被打得像蜂窝一样,惨不忍睹。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竟有一名女杀手还手提摄像机进行摄像。凌晨4点,所有杀手都回到地中海的船上,没有一个人落网。

以色列再次创造了集体恐怖主义的“奇迹”,杀手们还在途中,沙米尔就急不可耐地发来了祝捷电报,并对沙姆龙说:“这表明以色列的打击还能走得更远。”但是,以色列想掩盖自己恐怖主义罪行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事发后,人们很快就想到,这肯定是以色列所为。随后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猜测。突尼斯警方在海滩上找到了以色列突击队员遗弃的三辆汽车。事后人们想起,这三辆车是手持黎巴嫩护照的人租的。因此,突尼斯警方下令通缉这三个人,但是,谁能拿以色列有什么办法?巴勒斯坦人只有以更猛烈的行动来回警以色列占

领军。4月16日成为被占领土上最暴乱的一天,抗议者与以色列警方发生冲突,有15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

1995年11月4日,伊扎克·拉宾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中东的和平进程遭到重大挫折。拉宾在世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成为了和平伙伴,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取得了共识,尽管双方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是,只要双方都有诚意,中东的真正和平是有望实现的。但是,现在拉宾已经倒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枪口之下,利库德集团取代工党上台执政又一次声称要以“和平换和平”,并在定居点问题上挑起事端,中东和平进程出现逆转。这下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图谋是实现了,但是,巴勒斯坦人会答应吗?拉宾的血没有唤醒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良知,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也许又要上演悲剧了。

“猛虎”啸狮岛——斯总统壮志难酬

美国国务院 1988 年 8 月公布了一份有关亚洲恐怖主义活动的报告。报告称，在过去的一年里，亚洲的恐怖主义事件增加了 121%，大大高于全世界 7% 的增长水平。亚洲之所以能摘取这顶“桂冠”，斯里兰卡以及与其隔海相望的印度“功莫大焉”！如果把这两个国家的统计数字除掉，那么，亚洲总体的恐怖主义水平必将下一个台阶。

据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称，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活动泛滥成灾，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是民族矛盾上升，宗教、种族冲突加剧的必然后果。就斯里兰卡而论，这块昔日的金子般的国土之所以沦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同样是斯里兰卡国内政治、经济、宗教和种族冲突的必然结果。

1983 年的袭击事件是斯里兰卡种族冲突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过去，斯里兰卡的种族仇杀一般几年才发作一次，此后，种族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发作周期越来越短。此前，猛虎组织虽然也进行一些恐怖主义活动，但多系零星出击，没有多大影响，猛虎组织也没有形成气候。经过这一场惨变，大多数泰米尔人都同意武装建国的设想，猛虎组织家喻户晓。对普通的斯里兰卡公民来说，布拉巴兰卡的大名也如雷贯耳，成为一个永远揩不掉的印记。不管你承认与否，布拉巴兰卡策划的这起事件，收到了它应有的效果。

布拉巴兰卡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恐怖分子。他有思想，有纲领。他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泰米尔国，实行类似于南斯拉夫的民主制

度。他声称：“我的政治哲学是革命，我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矛盾的平等社会。”据说，他从古巴革命那里受到很大的影响，古巴革命者格瓦拉是他的导师，因此，他对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烂熟于心，在战术上很有一套。他亲自为猛虎组织规定了严明的纪律，猛虎组织的成员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准贪污，不近女色。他曾经说过：“我可以允许我的成员结婚，但绝对不允许道德败坏。”违犯纪律者将格杀勿论。猛虎组织推崇自杀性的攻击行为，认为只有不怕牺牲自己，才能确保攻击的效果。每个成员脖子上都挂着一瓶氰化物，连布拉巴兰卡本人也不例外。

布拉巴兰卡在猛虎组织内部建立了绝对的权威。虽然猛虎组织也有一个中央委员会，但他主要依靠少数亲信，他对待异己是毫不手软的。猛虎组织的副首领马哈蒂亚是布拉巴兰卡的同乡，由布拉巴兰卡本人引荐加入“猛虎”。15年来，两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并进。但是，1993年8月2日，猛虎组织却突然宣布，马哈蒂亚已经被捕，罪名是企图暗杀布拉巴兰卡等猛虎组织高级成员，与印度情报机构合作，充当第五纵队。观察家认为猛虎组织是靠恐怖行动起家的，至今，恐怖行为还是它对斯里兰卡政府施加影响的看家本领。加入猛虎组织的成员，个个心狠手辣，忠于自己的信仰，必要时，他们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人肉炸弹就是他们常用的手段之一，1996年7月4日，一只“黑虎”就腰缠炸药，冲进政府军的车队，结果，包括一名准将在内的21人当场被炸死。猛虎组织靠这种手法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斯里兰卡，可以说是谈“虎”色变。当然，猛虎组织的支持者除外。

猛虎组织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僧伽罗人和斯里兰卡政府，在国际上破坏它们的形象，逼迫它们同意建立一个泰米尔人的独立国家。它总是通过最有效的途径向世人展示斯里兰卡可怕的一面，让斯里兰卡在世人面前黯然失色。斯里兰卡是一个旅游大国，每年到这个岛国的游客很多，为了破坏政府的形象，打击政府的旅游收入，“猛虎”就以宾馆、铁路、航空业为目标。1986年5月3日，它炸毁了一架民航班机。很多外国政府忠告本国公民，不要到斯里兰卡旅游，否则生命得不到保证。结果，斯里兰卡的旅游业一落千丈，许多宾馆门

可罗雀,五星级饭店的房间使用率不到 20%。茶叶是斯里兰卡的传统出口项目,猛虎组织扬言,它已经用氰化物污染了茶叶。结果,斯里兰卡的茶叶出口量锐减,价格也一跌再跌。为了打击政府的经济,破坏斯里兰卡的投资环境,“猛虎”对一些合资项目发动了进攻。1986 年,它炸毁了一座日本投资的水泥厂,结果外资纷纷撤退。“猛虎”的这些恐怖行为确实取得了轰动效应。但是,斯里兰卡政府并没有让步,民族矛盾也没有缓和,“猛虎”建立泰米尔独立国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相反,“猛虎”在人们心目中却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组织。面对“猛虎”咄咄逼人的攻势,斯里兰卡政府也进行围剿。无奈,斯里兰卡的国内矛盾积重难返,猛虎组织又有外援,因此,政府军剿“虎”不成,反被“虎”伤。猛虎组织越打越大,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以前的“猛虎”只能打一些游击战,后来,“猛虎”已经强大到可以与政府军相持、对抗的程度,这是斯里兰卡政府剿“虎”之前始料未及的。

更为头疼的是,猛虎组织经常派出敢死队员,贴身携带炸弹,接近政府军或者政界要人等目标,一有机会,即同归于尽。就是这类猛虎常用手段,使得其名扬世界恐怖组织之林。

国际劳动节到了。斯里兰卡准备热烈庆祝一番。执政的统一国民党也准备趁机炫耀一下。尽管斯里兰卡已经是满目疮痍,但是,经过艰难的剿“虎”行动,斯里兰卡国内已经大致安定下来,与两年前印度军队和猛虎组织肆虐北方、僧伽罗人民解放阵线作祟南方的局面相比,已经大有好转,而这一切与普雷马达萨总统的铁腕统治是分不开的。对此,普雷马达萨也颇为自得。5 月 1 日那天早上,68 岁的总统 4 点钟就起床了。他先是做瑜伽功,然后开始读报。7 点半,他吩咐自己的秘书去搜集能反映他政绩的资料,以便在庆祝大会上演说时使用。他对秘书说:“我要告诉斯里兰卡人民我是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的。”他在竞选时就提出,要让印度军队撤出斯里兰卡,以维护斯里兰卡的主权和独立,但是拉·甘地置若罔闻。而这时,人阵在南方闹得轰轰烈烈,普雷马达萨只得把矛头首先指向人阵,以解燃眉之急。他先是用软的一手,释放了监狱里关着的 1800 名嫌疑犯,取消了政府的紧急状态法,指望人阵能投桃报李。不料,人阵利用这个机会,

反而闹得更凶了。3000 名政府的支持者和普通平民死于非命。软的一手无效,普雷马达萨只得拿出强硬的一手,再次宣布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并于第二年 2 月下令对人阵进行清剿,结果取得了胜利。人阵有几千人被杀,从此元气大伤。

平定了南方僧伽罗人的叛乱,普雷马达萨开始考虑对付北方的“猛虎”和印度军队。猛虎组织为害斯里兰卡,是斯里兰卡陷入内战的主要因素,剿灭它理所当然。但是,这是斯里兰卡的内政,不劳印度援手。印度 5 万军队在斯里兰卡领土上耀武扬威,动辄烧杀抢掠,而斯里兰卡政府却敢怒不敢言。斯里兰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脸面何在!心高气傲的普雷马达萨总统哪里受得了这种气!他请拉·甘地撤军,而对方却拿出印斯两国协议,说“猛虎”未除,斯里兰卡国内和平没有实现,印度军队怎能撤出?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普雷马达萨总统也无可奈何。但是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反正“猛虎”和印军都是为害斯里兰卡的罪魁,何不让他们自相残杀,然后自己出来收拾残局?“猛虎”不管怎么胡闹,这终究是斯里兰卡的内政,印度军队在里面插一手算怎么回事?因此,他决定暗中支持“猛虎”,让它用爪子在拉·甘地的脸上抓两下,让他知道厉害,自己退出。1989 年 4 月,普雷马达萨呼吁猛虎组织与政府直接谈判,解决斯里兰卡的种族冲突。而“猛虎”也作出了温和的反应,这还是内战爆发以来第一回。在致总统的信中,布拉巴兰卡说:“您已认为,外国军队可能利用我们国内的冲突而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您会认识到,我们一贯反对把外国军队引入国内的政策。”在对待外国军队介入斯里兰卡内政方面,政府与猛虎组织第一次取得了共识。猛虎组织在复信中异乎寻常地使用了“我们国内”这样的字眼,让人以为它已经放弃了民族分立的要求。于是,斯里兰卡北方就出现一种奇怪的局面:一方面,科伦坡信誓旦旦,要与印军一起行动,剿灭“猛虎”;而另一方面,普雷马达萨却秘密地与猛虎组织签署停火协议,命令政府军把重武器秘密地交给猛虎组织,让它与印度军队对抗。布拉巴兰卡的妻子也被总统下令从丛林中运到了安全的地方。

1990 年 2 月,印度新政府终于从斯里兰卡撤兵,而猛虎组织与政府的矛盾又开始恶化。猛虎组织指责总统背弃前盟,言行不一,双

方重开战火。总统也受到指责。一位军官说：“每当我手下人在战斗中被炸掉腿时，我就想起了我们的总统。”

5月1日11点半，普雷马达萨总统已经视察了支持者的队伍，他准备亲自带着他们从体育场出发进行“五一”游行。沿线已经布置完毕，到处是总统的画像，普雷马达萨十分自得，这是他希望看到的场面。他从一个低级种姓的下等人，成长为一个国家的总统，还不值得骄傲吗？事实上，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纪念馆，它就在他自己的家中。他专门辟出一间房子，里面陈列着铭刻着他功绩的玻璃盒子，另外还有一辆黄包车，这是他父亲的产业，是他发家的象征。他的父母的蜡像站在车旁，而他，普雷马达萨，则在车上正襟危坐。没有人说这不合适，因为这毕竟是普雷马达萨自己的私事，没有人能干涉他，包括他的父母。

游行队伍来到阿姆奥街，总统戴着标有执政党字样的绿色棒球帽，沿途向人们致意。一个青年推着自行车从对面走来，没有人意识到他的行动，只是到了跟前，总统的私人秘书莫希才认出，这个名叫巴布的人是一个泰米尔人，曾在自己开的百货店里干过。最近已经有风声传出，猛虎组织要暗杀总统，因此，莫希上前干涉这个青年的行动。他推了巴布一下，想把他赶得离总统远一点。就在这时，巴布引爆了捆在身上的炸弹。只有录音机大小的炸药威力很大，炸弹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包括普雷马达萨在内的16个人被炸死，另外有38人受伤，其中有7名是重伤。到处是残腿断臂和横飞的血肉，68岁的普雷马达萨总统刚才还威风凛凛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此刻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四肢不全，凶手也是身首异处。

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接连发生两起凶杀案，两名政界要人死于非命，这就不能不让人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不得而知。舆论认为，普雷马达萨总统在镇压人阵的同时，也组织起一支代号为“黑猫”的秘密敢死队，专门绑架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他首先杀了拉利特，而拉利特的追随者也采取了极端措施，报复普雷马达萨。有一位学校的教师说：“我们对前任领导人经常对反对派采取的独裁做法已经司空见惯。”言下之意是，普雷马达萨遭此报应也属必然。一位反对党领导人也说：“我们是佛教徒，我们相信因果报应之

说,不是在今生就是在来世。”普雷马达萨本人对自己这种易得罪人的性格也深有体会,表示决不会因此改变。在临死前几天,他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谋杀我,但是不能除掉我的性格。我不是一个凶手,他们指责我,但是他们没有证据。”

当然,最有可能的还是猛虎组织或人阵策划了此次暗杀事件,斯里兰卡警方也坚持这种观点。事发之前,警方已经得到情报,猛虎组织的爆炸小组已经潜入科伦坡,目标是陆军司令部和政界要人。普雷马达萨作为总统当然是首当其冲。再说,这次巴布杀害普雷马达萨使用的又是自杀性攻击,这不能不让人们把猛虎组织当作嫌疑犯看待。另外,普雷马达萨对待人阵也十分心狠手辣,人阵要进行报复,杀害普雷马达萨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斯里兰卡司法部长哈米德说,由于总统结怨甚多,到底是谁杀害了总统,现在还不得而知。

普雷马达萨总统遇难后,接任的维杰通加总统对猛虎组织发动规模更大的围剿。政府军发动了代号为“贾夫纳之女”的军事行动,把猛虎组织压迫到贾夫纳半岛的最北端。双方交战十分激烈,死伤惨重,猛虎组织元气大伤。但就在政府军一步步向前推进、逼近猛虎组织总部贾夫纳城之际,猛虎组织突出奇兵,攻陷政府军的普内林军事基地。这是一个包括陆、海军军事基地在内的大型基地,主要负责阻止猛虎组织向内陆渗透,切断其海上补给。这个基地的陷落,对政府军的剿“虎”行动极为不利。国防部承认,这是政府军10年中最惨重的失败,最后,政府军出动精锐部队,使用了空降作战,终于夺回基地,但已经伤亡惨重。猛虎组织在撤退前把基地内的军事装备洗劫一空,监视海上情况的雷达站也被摧毁。普内林基地的陷落表明,猛虎组织虽遭重创,但仍有相当实力。

1994年,斯里兰卡新一届政府组成,主张早日解决民族冲突,通过政治途径结束内战的人民联盟在选举中获胜。新政府宣布解除北部地区的紧急状态,并不再把猛虎组织放下武器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猛虎组织也作出了积极反应。经过两轮和谈,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同意在五个冲突地区设立由双方代表及国际代表组成的仲裁委员会,并在双方之间设立一个隔离带。在此期间,

猛虎组织不得从事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但是,这种和平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1995年4月18日,猛虎组织退出和谈,重开战端。19日,猛虎组织成员以自杀性进攻方式,炸沉政府军的两艘炮艇。政府军也发动了代号为“跃进”的军事行动。政府希望以战迫和,让猛虎组织回到谈判桌上来。1995年8月3日,库马拉通加总统提出了政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1. 斯里兰卡实行地区联邦制,将全国划为九个地区;2. 下放权力,给予地方政府较大的权力,泰米尔人所居住的东北地区将设立“东北地区”。这个方案被猛虎组织拒绝,所有的泰米尔组织都对这个方案表示失望,认为它无法保证泰米尔人获得足够的权力。看来,泰米尔人的要求是“不独立,毋宁死”,但是,恐怕任何一个斯里兰卡政府都无法满足泰米尔人的这个要求,因此,政府军再次发动代号为“阳光”的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行动。经过8天的苦战,政府军在猛虎组织的大本营升起了斯里兰卡国旗。猛虎组织则退回丛林地区,重作森林之王。“猛虎”在丛林中舔血养伤,一俟时机成熟,它又出来为害。布拉巴兰卡声称:“要为独立建国流尽最后一滴血。”1996年1月31日,它炸毁了科伦坡的中央银行大楼,造成70余人死亡。1996年7月18日,猛虎组织再次发动进攻,奔袭了政府军的穆莱蒂军事基地,打死了150名士兵,劫掠了大批军火。消息传到科伦坡,科伦坡交易所的股票指数剧跌,达到三年来的最低点。

对斯里兰卡政府来说,要消灭“猛虎”并非易事,14年来的内战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猛虎组织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了大部分泰米尔人的支持。14年的血战,使“猛虎”已经出落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它长于化整为零的游击战,除了正面交锋外,它还不时进行恐怖活动以造成恐怖气氛。这对政府军的围剿颇为不利。

但是另一方面,猛虎组织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政府军近年的围剿还是有效果的。“猛虎”死伤惨重,14年的内战,已经使5万余人丧生,其中猛虎组织成员也有3000人,有生力量受到沉重打击。现在,猛虎组织已经被迫退出它盘踞多年的贾夫纳,进入丛林地区。这一地带长期与世隔绝,生活用品缺乏,猛虎组织衣食无着,药品更是奇缺,不利于长期坚守。

其次,猛虎组织过去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尚可得到一定程度的

国际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猛虎组织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但是,由于猛虎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尤其是暗杀政界要人,滥杀无辜,致使人心丧尽。现在,印度政府已经明确宣布“猛虎”是恐怖主义组织,组织力量大肆追捕,并且切断了泰米尔纳德邦与猛虎组织的联系,“猛虎”的补给困难,难以长期坚持下去。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也采取行动,拔掉了猛虎组织的几个内线,敲掉了“猛虎”的几颗“牙齿”。美国政府也公开宣布“猛虎”是恐怖主义组织,不时向斯里兰卡提供有关猛虎组织的情报。大赦国际谴责猛虎组织侵犯人权。欧洲议会则呼吁其成员国关闭猛虎组织的办事处。如果国际社会对其组织坚持其否定态度,那么,“猛虎”重出丛林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

国际空难大调查

飞机爆炸之谜

1988年12月21日,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客机在苏格兰南部的洛克比镇坠毁,机上的258名乘客和15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据目击者称,飞机是在空中爆炸后撞上了一座小山失控的,坠地时撞毁了一座加油站和7幢民房,形成了一个高达百米的大火球,火光冲天,震动强烈,镇上至少死了22人。

这架泛美103班机是从伦敦的希思罗机场飞往纽约的。机上的部分乘客是从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飞来的,他们大多数是转机回家过圣诞节美国军人,此外还有一些大学生和8位官员。

21日傍晚6点25分,班机从希思罗机场起飞,按惯例穿越苏格兰上空直飞纽约。可是约1小时后,飞机上升到3.1万英尺高空时,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专家们注意到两个明显的事实,即机组人员根本来不及发出紧急求救信号,而且飞机坠毁前先发生了爆炸。

在英国,由于这次空难事故是多年来发生在英国境内的最严重的飞机失事惨祸,所以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对此表示震惊,撒切尔夫人在22日早上召上召开了内阁会议之后急忙赶赴现场视察。

里根总统12月29日在加利福尼亚的休假地听取了泛美103航班的失事汇报后,表示要全力搞清这一悲剧的制造者及其动机,并扬言要对破坏者施加报复。

由于这架班机是从联邦德国起飞的,所以事实上这次事故的调

查牵涉到了三个西方国家。

灾难的洛克比

出事现场在英国的洛克比镇 ,所以那里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惨案发生后 ,600 多名英国警察迅速赶赴现场。在飞机着地的中心点 ,地面已形成了一个 7 米深、30 米宽的“火山口”。残骸的猛烈撞落使附近的房屋、汽车、加油站和柏油公路陷入一片火海。

机尾掉在离洛克比镇 25 公里以外的地方。泛美 103 班机早已成了上万块碎片 ,而最远的一块离坠毁中心足有 65 公里远。

洛克比镇是苏格兰一个仅有 2500 名居民的小镇。据当时在加油站停车的玛丽安·皮尔向警察介绍情况说 ,“我听到一阵雷鸣般的轰鸣声 ,接着是一声爆炸。刹那间飞机碎片满天飞舞 ,好像下起了一场火雨。我赶忙从汽车里钻出来 ,像着了魔似的朝前飞奔逃命。”

警察后来认为 ,玛丽安的叙述基本符合实情。爆炸是从货舱开始的 ,飞机驾驶舱和前舱的一部分当即折断脱离机体 ,机外气温在零下 50 摄氏度 ,所以所有的人立刻失去知觉。180 吨重的着火的飞机残骸和乘客及机组人员的身体与行李 ,就像雨点般飘落下来。

灾难的洛克比 ,从此举世闻名。

恐怖分子的“杰作”

失事飞机的两个黑匣子不久就找到了。由 8 名空难事故调查专家组成的小组开始对它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 ,计划两周内提出初步报告。

飞机残骸和大部分遇难者的尸体在一周内也基本找到 ,所有的残骸不论大小 ,全部被送往英国皇家武器开发研究所作科学鉴定 ,以确定失事原因。

这家机构是英国国防部属下专门研制枪炮、弹药和常规弹头的机构 ,对常规爆炸物的研究很有建树 ,曾多次协助警方在刑事案件中从事科学调查。

当时虽已时值圣诞佳节 ,可是英国方面仍然集中了 2500 多人 ,其中 1000 多名是科技人员 ,突击对飞机残骸进行分析化验。据说爆

炸物专家们仅仅花了 24 小时,就作出了 103 航班是被炸弹炸毁的结论。在离失事中心约几英里的地方,警方找到了一个损坏的箱子。皇家武器开发研究所的专家们从这个有金属框架的箱子里,发现了“强力炸药爆炸”的确凿证据。

1988 年 12 月 29 日,英国运输部正式公布,泛美航班 103 飞机失事的原因是一枚炸弹爆炸引起的。

在此前后,两个匿名电话引起了英国警方的高度重视。12 月 22 日,伦敦通讯社收到一个男子打来的电话。此人自称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声称炸毁泛美 103 班机是他们干的,目的是对 1988 年 7 月美国“文森斯”号军舰在海湾上空误击落一架伊朗客机进行报复。

不过伊朗总理侯赛因·穆萨维同一天却断然否认这次空难与伊朗有关。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儿子阿梅德·霍梅尼也在德黑兰正式辟谣。

可是到 12 月 30 日,伦敦通讯社再次接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匿名电话,重申对这起空难事故负责。

1989 年 1 月 29 日,一个自称这个组织的人再次匿名恐吓说,美国必须将伊朗前国王巴列维的儿子驱逐出境或限制其政治活动,否则他们将采取更厉害的行动。他们还把这次事故说成是致乔治·布什出任美国总统的礼物。

虽然这些匿名电话真伪莫辨,可是基本可以肯定,泛美 103 班机失事是国际恐怖分子故意搞的惨祸。

世界最先进的炸药

从爆炸物的来源追查肇事者,是警方采取的途径之一。英国皇家武器开发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正是这么做的。

他们从飞机残骸前部行李舱的金属板上,被认为是装置炸弹的旅客行李箱中,分析出致使飞机爆炸的是一种高烈度的塑料炸药。

塑料炸药棕色,无味,油灰状,具有延展性,能塑成任何形状,还可以放置在通常情况下不能放置炸药的地方,令人防不胜防。此外,它可以按要求塑成某一形状,使爆炸具有方向性,从而增加冲击破坏

力。塑料炸药最大的特点是普通的探测器及调光探视仪都查不出来,因此恐怖分子可以避开检查将它带上飞机。而它的使用方法却与其它炸药一样,遇到撞击或掷甩出去,即会爆炸。

这种塑料炸药最先是使用气压式起爆器引爆的,即当气压发生变化时,引爆器即引爆炸药。后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机场的候机室里增加了“压力室”,专门对付这种带气压式起爆器的塑料炸药。于是又有一种双重起爆装置问世。这种装置在气压发生变化时,先不会引爆,而是由它起动第二个引爆器——电子定时引爆器,当飞机升空后到达预定的时间,塑料炸药才会爆炸。这样,机场即使有“压力室”也将对它不起作用。

英国专家们相信,装上泛美 103 班机的塑料炸药就是使用的双重起爆装置。

谁制造的炸药

当今世界上生产塑料炸药的国家并不多,英国警方对它也并不陌生。比如爱尔兰共和军就曾经从利比亚进口了大量的这种炸药。1987 年 8 月,爱尔兰共和军曾用塑料炸药炸毁了一辆大客车。同年,英国保安当局甚至截获过 2 吨塑料炸药,并得到过有 3 船塑料炸药已运抵英国的情报。

皇家武器开发研究所的专家从 103 班机残骸上残存的炸药剩余物分析,它可能是一种由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塑料炸药,名叫 Semtex。这一消息被英国与西方一些国家的报刊大量报道之后,1989 年 1 月 6 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也从未向任何恐怖组织提供过武器、炸药和其它物资。”后来,捷克斯洛伐克还派出一批爆炸专家前往英国,帮助鉴定致使飞机失事的炸药是否是本国生产的塑料炸药。

1989 年 1 月中旬,西方有些报纸报道说,泛美 103 航班的失事,很可能是以色列的特务组织“摩萨德”制造的一起惨案。因为他们在西德的夜总会里曾与一些美国军人接触过,愿意出高价雇佣美国军人在回国度假时携带钻石走私偷运回纽约。这些报纸援引消息来源说,然而实际上以色列特工人员交出的根本不是钻石,而是他们生产

的塑料炸药。

叙利亚国防部长塔拉斯将军在 1 月 21 日接受科威特《火炬报》记者访问时支持这一说法称：“以色列摩萨德的一名特工将一个藏有炸药的袋子交给一位美军，让他带上飞机，并给他 30 万美元作为报酬。这位特工说，袋子里是价值 50 万美元的钻石，需要偷运入美国。”

据一些人士分析，以色列炸毁泛美 103 班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嫁祸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破坏美国和巴解的对话，离间美国和巴解的关系。

然而以色列却断然否认此事，并指责叙利亚国防部长的指控是荒谬的。不仅如此，以色列的“摩萨德”反而通过一些渠道散布消息说，在以伊拉克为活动基地的一个巴勒斯坦游击组织中，有一位出身工程师的领导人。多年来此人一直在研制精巧的起爆器和塑料炸药。言下之意是说泛美 103 班机的爆炸失事与这个组织有关。

有关塑料爆炸物的来源问题，线索纷繁复杂，互相矛盾，所以根本搞不清楚。

“美人鱼”消失了

泛美 103 班机机号 N739PA，以“美人鱼”命名。这架巨型远程民航飞机已经投入运行了 18 年，安全升降 3.3 万次，在珍宝机种中它属于“元老级”。

1988 年 12 月 21 日，它从美国的洛杉矶飞到伦敦，停靠在第三通道口。此时是 12 点 07 分。清扫、加油、检查、装食品饮料等一切工作都正常进行。

18 点，旅客开始登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回国度假的驻西德美军。在从法兰克福飞至伦敦的波音 727 飞机上，共有 124 名乘客。其中 49 名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转机去纽约的乘客，都登上了泛美 103 班机。由于他们的行李在法兰克福登机前已接受过检查，所以转机时就直接被搬上了飞机，没有再检查。

“美人鱼”的机长名叫詹姆斯·麦克夸瑞。泛美 103 班机离开伦敦希思罗机场时晚点 25 分钟，从伦敦到纽约穿越大西洋的飞行大约

需要 7 个半小时 ,所以机长并不着急。

顶着强烈的西风 ,飞机很快上升到 9500 米高空 ,但航向略向北偏离了些。35 分钟后 ,“美人鱼”的导航权由伦敦移交给了苏格兰普瑞斯威克监控中心。

飞机平安地越过苏尔维弗斯海湾和夏普尔克若斯核电站。机舱内旅客们有的看书读报 ,有的喝着饮料聊天 ,也有人在听着音乐 ,他们在等待空中小姐开晚餐。

大约在 19 点钟 ,普瑞斯威克地面监控中心接到“美人鱼”号副驾驶员雷蒙·瓦格纳的请求 :“珍宝 103 请求飞越大西洋 ,北纬 59° ,西经 10°。”

19 点 02 分 ,地面导航站作出回答 :“珍宝 103 ,同意在北纬 59°、西经 10°直飞肯尼迪机场。”可是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美人鱼”号班机上的讯号突然消失 ,对导航站的回答也没有任何反应。导航员连续呼叫 :“珍宝 103 ,听到了没有 ?”可是泛美 103 班机上毫无回音。

19 点 17 分 ,地面导航站的雷达荧光屏上闪烁发光的绿点突然分裂成 5 个小绿点 ,8 分钟后它们全都消失了。

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 N739PA“美人鱼”飞机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

炸药放在哪里

通过对洛克比镇周围 516 平方公里范围内收集到的散落物的分析 ,英国专家确认炸毁“美人鱼”的炸药是一颗 17 公斤左右的塑料炸药炸弹。接下来调查人员就要调查炸药是被安放在飞机的什么地方的 ,从而可以从上行李的情况来找出可疑的乘客。

珍宝飞机上有两个行李舱 ,一个在机翼前 ,一个在机翼后 ,旅客行李一般都是放置在行李舱里的大柜子里的。比如飞机的前行李舱就有 16 个大柜子 ,每个都有一定载荷。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有效载荷能比较平均地分布 ,以使飞机平稳。当然所有行李的存放都有清单。

飞机失事后 ,根据各种原始资料 ,调查人员了解到“美人鱼”是以每小时 800 公里的速度、在时速 115 英里的西风朝西北方向飞行的。雷达资料显示 ,飞机是在飞近洛克比东南约 6 英里的位置时爆

炸的。

这样调查人员就可以利用风速、飞行速度、罗盘指向以及飞机残骸碎片的形状、大小、重量,计算出飞机爆炸后的抛射轨迹。此外,这次被炸毁的泛美 103 航班上的黑匣子等纪录也储存下了至少 25 项飞行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使调查人员分析出飞机爆炸前后的运动过程,从而判断出是飞机的哪一部分先断裂,以及爆炸最先发生在什么部位。

经过周密的调查以及使用调光对所有遗物进行照射,最后确定炸药是被放在一只蓝色箱子里的。在存放这只箱子的 1 号行李舱内,总共堆放了 40 件行李,其中的 30 件属于从法兰克福到伦敦来转机去纽约的旅客。

据此,警方相信恐怖分子是在法兰克福或伦敦将炸弹带上飞机的,而在西德就已携弹上机的可能更大。英国警方向海外,特别是法兰克福派出了不少警探,对全部乘客名单展开调查。

来自以色列的情报

在英国警方加紧调查飞机失事惨案的同时,联邦德国的警探也忙得不亦乐乎。原来国际恐怖分子要炸毁美国民航飞机的阴谋由来已久。

大约在 1988 年的初秋,以色列的秘密警察发觉有不少国际上关注的恐怖分子先后飞往西德的杜塞多尔夫。他们立即把这一情报秘密通报给了联邦德国保安部。

于是联邦刑警局对进入西德境内的所有这些国际恐怖分子嫌疑展开跟踪侦查,并窃听了他们的电话。西德警方发现这些嫌疑犯的人数越聚越多,而且还在挪易斯的商店里大量购买电子元器件,似乎会有一场大的恐怖行动发生。

针对这一情况,联邦刑警局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决定先发制人,立即出击。1988 年 10 月 26 日,杜塞多尔夫检察院下令在 6 个联邦州对 16 座建筑物进行搜查,并逮捕了 16 名嫌疑犯。可是第二天警方不得不因证据不足,先是释放了其中的 12 名,后来又释放了 2 名嫌疑犯。

然而被拘留的两名头目却是证据确凿。41 岁的哈弗斯·卡森·达卡莫尼在诺伊斯市伊撒街 16 号开了一家“东方鱼肉店”。搜查中西德警察从该店的地下工厂里找到了一台正在安装的收录机炸弹；从他的汽车里搜到了一台已安装成功的收录机炸弹。这种炸弹装置利用东芝收录机，在机内藏有 300 克高效塑料炸药，并安上了气压式引爆开关。

住在法兰克福沙街 28 号的阿布德·法塔·卡德法已 47 岁。警方在他的住处发现了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一枚反坦克力火箭榴弹，23 枚手雷，83 个雷管，6 支冲锋枪，1 支意大利手枪，一批子弹及 10 公斤炸药。用一位警察的话说，“这个武器库足可以打上一小仗了。”

虽然哈弗斯和阿布德在狱中拒不招供，可是联邦德国的警方确认这是一些阿拉伯极端分子用来搞恐怖活动的器材，武器弹药是计划用来袭击到西德来旅游的以色列人的，而录音机炸弹则可能是准备从马德里机场送上一架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航飞机的。

被疏忽的警告

这起案件侦破之后，1988 年 11 月 8 日，西德联邦刑警局向设在巴黎的国际刑警组织报告了录音机塑料炸弹的情况，以及可能发生的炸毁民航飞机的动向。国际刑警组织随后发出了第一份警告。

波恩内务部在接到这份警报后的第二天，就通知各联邦州、航空公司及各大机场。数日后，威斯巴登市联邦刑警局还专门召开了有 18 名西德专家和 25 名外国专家出席的特别会议，展示了收录机塑料炸弹的实物结构和使用方法。这次会议后约一个星期，有关这种炸弹的彩色照片和说明被作为第二份警告，分寄往有关各国的保安部门。

11 月 18 日，美国联邦航空局发出了一份警告，要求美国各航空公司及驻各国使馆注意防范高技术炸弹。4 天后，英国运输部也向英国各航空公司和机场发出了内容相似的警告。

12 月 5 日，美国驻芬兰大使馆还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是泛美航空公司从法兰克福到纽约的航线上将有飞机在两周内被炸毁。随之美国国务院将这一情况通知了有关方面。所以 12 月 13 日在美国

驻莫斯科使馆的黑板通知上还警告所有打算回美国度圣诞节的外交人员 ,千万别坐泛美航班。

所有这些警告看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因为有情报称 ,一些国际恐怖分子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曾经秘密集会过。针对美国军舰“文森斯”号误击落伊朗一架民航客机一事 ,他们准备采取一项报复行动。当时拟定的目标有二 :一是袭击美国驻波恩大使馆 ,一是炸毁一架美国民航班机。最后经过分析比较 ,认为袭击使馆风险过大 ,于是才把攻击目标集中到法兰克福—伦敦—纽约航线上。

然而谁也想不到 ,对于如此严重的警告 ,竟会有人无动于衷。比如泛美航空公司驻法兰克福办事处主任汉斯·劳伊宁厄 ,居然在出事的 1988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2 点 30 分 ,在机场大楼的柏林厅里举行圣诞聚会 ,致使 150 名泛美公司雇员相互祝贺节日直至夜晚 ,旅客发送的行李根本未经检查就被送上了飞机。

事故发生后有人回忆起 ,在 1988 年 12 月 21 日之前 ,有人多次到法兰克福机场打听美国航空公司的保安情况 ,及运输武器、弹药的规定等。然而这些情况居然均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至于美国驻芬兰使馆收到匿名电话 ,有人声称要炸泛美航班一事 ,西德的法兰克福机场和英国的希思罗机场都说根本没有接到有关通知。

于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机毁人亡的惨案 ,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迟误的措施

事故发生以后 ,西德警方对法兰克福机场的工作人员和出境旅客展开了广泛的调查 ,甚至长期扣押了个别嫌疑极大的人 ,但这一切都已为时过晚了。

鉴于专家们大体上认定是由法兰克福登机到伦敦转机飞纽约的旅客将炸药带上飞机的 ,所以美国 and 英国都要求联邦德国采取果断行动 ,审讯在 1988 年 10 月拘留的哈弗斯和阿布德。

尽管当初逮捕他们和搜查他们的住宅 ,与后来发生的泛美 103 航班惨案并无直接的联系 ,但是在国际压力下 ,西德警方还是对哈弗斯·达卡莫尼的住宅再次进行搜查。

1989年4月13日和1月17日,警方在他的家又搜出了两台立体声收录机和一台三洋产电视监视器。检查表明,这三台电器设备都安装了塑料炸药。其中的一台警方在拆解时不慎,致使炸药爆炸,当场炸死一名技术人员,另一人受了重伤。

一个身份不明的阿拉伯人

警方对在泛美103航班上遇难的乘客进行排队,发现有一个南斯拉夫姑娘和一个美国女大学生都曾在维也纳与一个阿拉伯人相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卡里德·亚法的嫌疑最大。

卡里德·亚法出生在黎巴嫩。1983年他在费拉多费亚获取了美国护照,成了拥有双重身份的阿拉伯人。

小伙子相貌端正,人也正派,思想毫不激进,也不倾向于任何政治派别。

1988年中学毕业后,卡里德·亚法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在底特律一家汽车厂附属的工业大学里接受培训,学期一年,学习汽车设计和制图。

这年8月份,卡里德回到贝鲁特度假,探望他仍住在那里的祖父、妹妹和女朋友。10月底,他从贝鲁特经法兰克福飞到多特蒙德,在他的堂兄哈桑处住了两个月。有关这一段的活动警方认为是关键,可是飞机失事后他的堂兄哈桑一直守口如瓶。

12月初,卡里德·亚法要返回美国,他委托法兰克福一家旅行社代他预购了一张19日泛美103航班的机票。可是几天之后他又要求改订12月21日的机票。警方曾向卡里德的父亲了解他为何要改签机票,据说卡里德曾用电话向父亲解释,是由于班机满座才要求推迟两天起飞的。但是他显然在撒谎,因为19日的班机并没满座。警方现在无法弄清楚他改期旅行的真正原因和目的。

1988年12月21日,卡里德·亚法从多特蒙德坐汽车来到法兰克福机场,他的行李顺利地装上了飞机。16点05分,从法兰克福到伦敦的波音727班机起飞了,一切顺利。可是当他和他的行李在伦敦转上泛美103航班波音747“美人鱼”号班机后,他永远消失了。

警方相信,小伙子是无辜的。他也许根本不知道在他的行李中

有一架装上了塑料炸药的东芝牌收录机。他可能想走私点什么，捞点外快，但他绝不会走私炸弹。

美国联邦调查局多次向卡里德·亚法的父亲调查，希望原原本本地弄清楚小伙子生前的生活情况和社会关系。可是他的父亲却抱怨说：“所有的死难者的家属都能平静地哀悼死者，惟独我们家被牵连到这桩案子中去，连悼念死者的权利也没有了。而之所以把罪责归结到我儿子身上，就因为他出生于黎巴嫩。”

悬赏 50 万美元

1989 年 12 月 29 日，美国悬赏 50 万美元，捉拿造成洛克比镇空难的凶手。随之，美国开始了自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以来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

美国国务院反恐怖活动办公室主任保罗·布雷默宣布，侦查范围缩小到 4 个组织：

(一)亲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组织承认对该事故负责。

(二)艾哈迈德·杰布里派，这是以叙利亚大马士革为基地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杰布里是该组织的指挥部领导人。杰布里与阿拉法特有分歧，在与以色列的关系上持激进态度。尽管他在 1988 年 12 月 29 日公开否认与泛美 103 航班失事有关，可是美国认为该组织有爆炸过民航飞机的前科，所以仍然将它列为嫌疑。

(三)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其领导人是阿布·尼达尔。这个组织没有爆炸民用飞机的前科，可是美国认为几年前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发生的屠杀无辜旅客的事是他们干的。

(四)最后一个遭怀疑的组织是日本的恐怖组织赤军。

据说美、英、联邦德国的情报机关和保安机关使用了包括卫星在内的多项高技术，对恐怖分子及他们的组织经济活动的场所用微波进行了千万次窃听，再加上计算机的分析处理。所有的侦查目标最后都集中到了杰布里派身上。

钱农泄密

1989 年 8 月 15 日，英国运输大臣保罗·钱农和 5 位记者一起在

加里克俱乐部共进午餐。酒足饭饱后的钱农,也许被酒精冲昏了头脑,居然对他的同桌透露,泛美 103 航班“美人鱼”惨案的侦破,是保安工作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次。他滔滔不绝地披露说,炸弹来自中东,被人在法兰克福带上了飞机,警方不但已经掌握了罪犯的姓名,而且还了解他们现在藏身于何处。

这条消息被公开捅出去之后,随即引起了一场风波。

英国和西德的警方立即否认此事。美国的情报官员则气愤地指责说:“在恐怖分子没有捉拿归案之前,透露他们的身份无一好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抓住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吓跑或躲起来。”

由于钱农的泄密,美国的反对党甚至气得要他辞职。钱农虽然后来一再否认他透露了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还是被舆论攻击得狼狽不堪。

在英国运输大臣已经露出口风的情况下,1989 年 3 月底美国情报机关介绍了泛美 103 航班空难事件真相。美国人证实这起惨案是杰布里组织的恐怖分子干的,报酬是获得 100 万美元,由伊朗的极端分子组织提供资金。这项秘密交易是在利比亚成交的,目的是报复美国巡洋舰击落了一架伊朗民航客机。

美国强调,他们已通知了所有西方的情报机关只要与此案有关的杰布里分子一露面,立即逮捕,并不惜一切代价引渡到美国受审。

几乎与此同时,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高级官员也承认,在他们经过几个月的独立调查之后,基本证实了上述消息。

1991 年 11 月 14 日经过近三年时间的调查取证,美英两国终于宣布了洛克比空难的调查结果:空难是由两名利比亚情报人员制造的。他们是:前利比亚航空公司驻马耳他办事处主任阿里·穆罕默德·迈格拉希,他的同事拉明·哈里发·弗希迈。他们将藏有炸弹的行李从马耳他送上 103 航班,准备于爱尔兰海上空爆炸。这样,爆炸产生的碎片将沉入汹涌的爱尔兰海。另外,美英两国还指控利比亚现任交通运输部长埃泽丁·欣沙里与爆炸案有关,因为恐怖分子所使用的炸弹是他从瑞士麦伯公司采购的。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制造飞机坠毁这样的大屠杀恐怖活动如果没有政府最高层人士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因此矛头直指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

菲上校。他还说，布什总统将与英国首相梅杰磋商后采取一致行动。当问到美国是否会对利比亚采取报复行动时，菲茨沃特说：“没有排除任何选择。”随后，美英两国通过意大利驻利比亚大使馆向利比亚递交了起诉书和通缉令。

利比亚大祸临头

祸不单行。次日，法国总统密特朗也公布了1989年法国航空公司772航班爆炸事件的调查报告。当时，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尼日尔上空爆炸，机上170余名人员葬身沙漠。密特朗宣布，有4名利比亚人涉嫌此案，并向利比亚提出了引渡要求。11月27日，美英法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利比亚在三国调查飞机事件时与三国司法部门合作，并“最终具体同意放弃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动，放弃对一切恐怖组织的支持”。此后，法国司法部门还发出通缉令，缉拿炸机事件的嫌疑犯，其中就有卡扎菲的妹夫、利比亚情报机构事实上的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三大强国一起向利比亚发难，小小的卡扎菲上校如何作出反应？

不料，卡扎菲对西方三大国的指控并不在乎。他的理由很简单：利比亚与洛克比空难没有关系，因此，所谓交出凶手之说，自然不能应承。但是，利比亚也希望弄清真相，因此，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出面裁决此事。不过，由于西方对利比亚的指控言之凿凿，因此，利比亚也把三个据说是炸机案犯的人拘留了起来。12月3日，利比亚情报部门宣布，西方指控的6名情报人员已经被抓起来，并正在进行审讯。不过，它又说，西方的指控是对利比亚的栽赃，“真正的罪犯现正逍遥法外……正在嘲笑我们。我看到，他嫁祸于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或许正在计划采取其他行动。”这与三大国要求利比亚把人交出来、由三大国进行审讯的要求相距甚远。同日，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格甚至向利比亚发出威胁：如果利比亚不把与洛克比空难有关的两个人交出来，不排除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利比亚则反击说，如果他们真的与洛克比空难有关，那么，他们将被判处极刑。但前提必须是，103航班确实是他们炸毁的。而且，利比亚是一个主权国家，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把本国的公民交给别的国家去处理。利

比亚的立场是明确的：它反对恐怖主义。卡扎菲已经表示过，过去利比亚支持一些国际恐怖组织是一个错误，但是，利比亚正在与他们断绝联系。如果西方不信，可以派人来利比亚调查。利比亚愿意配合这种调查，这样可以澄清事实真相，洗清泼在利比亚身上的脏水。而且，西方要求引渡嫌疑犯的要求也缺乏法律根据。根据 1971 年在蒙特利尔通过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嫌疑犯所在国有权调查、起诉罪犯。根据这一规定，利比亚根本不用把嫌疑犯交给三大国去处理。面对利比亚的伶牙俐齿，三大国也着实无奈。毕竟，他们在公约上也签过字的，怎能强迫利比亚交人呢？但是，三大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尤其是美国，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平时已经习惯于颐指气使，怎能容忍利比亚的抗辩？因此，三大国态度强硬，利比亚必须交人。利比亚是小国，但是，现任国家元首卡扎菲上校却是一个天生不信邪的人物。他上台后根本没把美国放在眼中，三大国的压力又算得了什么！何况，真理看来在利比亚一方，因此，利比亚虽然与恐怖事件有关，却也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尤其是阿拉伯联盟，更不能看着大家庭中的成员平白无故地受气。因此，阿盟建议，在联合国国际卫队的护送下，将两名涉嫌洛克比空难的利比亚人送到一个中立国家，由一个国际司法机构进行审讯，但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一建议充分照顾到了三大国的面子，但是，三大国强权在手，对这个建议置之不理。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站在利比亚一边。双方各执一词，于是，三大国就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安理会不能不理睬三大国要求弄清真相、惩罚恐怖分子的要求。因此，1992 年 2 月 21 日，安理会通过了第 731 号决议，要求利比亚在调查空难原因问题上与三大国合作，同时明确要求利比亚引渡嫌疑人员。但利比亚只愿意把人犯交到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却不愿交给三大国，并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诉，要求由它自己审判嫌疑人员。国际法院也受理了它的申诉，开始调查。但美国与英国坚决不答应。它们早就认定利比亚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恨不得把卡扎菲也摊上被告席，怎能同意由利比亚自己审判所谓嫌疑犯。安理会 731 号决议已赋予它们引渡罪犯的权力，因此，它们声明，在利比亚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是遵守安理会决议，引渡人犯

要么是不执行安理会决议 ,等着制裁。利比亚选择了后者。1992 年 3 月 3 日 ,安理会通过了第 748 号决议 ,要求利比亚在 4 月 15 日前交出嫌疑犯 ,否则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从 15 日起中断与利比亚的空中联系 ,实行武器禁运 ,直到利比亚交出嫌疑犯。但是 ,卡扎菲并不把制裁放在心上。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我将对任何实施安理会制裁措施的国家采取报复行动。”卡扎菲的立场为何变得如此强硬 ? 这两个因素 : 一是美国和英国口口声声说利比亚涉嫌洛克比空难 ,但到现在还没有拿出使人信服的证据 ,证明他们的指控。二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对安理会的决议也持异议 ,对美国 and 英国以势压人的蛮横态度更是不能赞同。在它看来 ,利比亚的立场是有道理的 ,也是符合国际法的。为什么不能由利比亚自己审判罪犯 ? 为什么在事实真相没有弄清之前就要对利比亚进行制裁 ? 这不是强加于人吗 ? 因此 ,阿盟秘书长马吉德说 ,他估计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会对利比亚进行制裁。

4 月 1 日 ,安理会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天 ,国际法院也驳回了利比亚的申诉 ,理由是 :安理会作出的两个决议 ,优先于其他国际条约 ,因此 ,利比亚的申诉不予受理。当利比亚再次要求国际法院阻止美国与英国采取制裁行动时 ,国际法院也拒绝了这个要求。

4 月 15 日制裁正式生效。这一天 ,所有从利比亚出发的航班都遭到拦截 ,被迫返航 ,法国、瑞典、日本、德国等国驱逐了利比亚的外交官 ,利比亚与西方各国本来就没有什么来往 ,这下子 ,驻在利比亚的外交机构更少了。利比亚也不示弱 ,卡扎菲迅速通知那些驱逐利比亚外交官的国家 ,利比亚将采取报复措施。阿拉伯国家也纷纷作出反应 ,支持利比亚的立场 ,谴责西方对一个阿拉伯国家主权的赤裸裸的干涉。苏丹等国首先宣布不执行制裁决议 ,埃及也开放了陆上边界。这样 ,利比亚与外界空中联系暂时中断 ,但与外界的联系并没有真正切断 ,制裁没有达到目的。但是 ,制裁一个月后 ,利比亚在制止恐怖主义行动上还是迈出了一大步 :5 月 14 日 ,利比亚外交部宣布 ,接受联合国安理会 731 号决议 ,放弃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6 月 23 日 ,利比亚总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解决洛克比危机的新建议 ,同意通过阿盟或联合国 ,把两名人犯交给一个“公正廉洁”的法庭进

行审判,并呼吁与西方国家进行直接谈判。但是,美国等三大国不依不饶,坚持要对利比亚进行制裁。1993年8月,三大国又表示,要对利比亚进行更严格的制裁。克林顿总统说:“美国与利比亚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只有在的黎波里交出炸机嫌疑犯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关于利比亚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说,如果利比亚不交出与洛克比空难有关的两名人犯,利比亚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

三大国为什么一口咬定是利比亚制造了洛克比空难?他们手里有什么证据吗?利比亚遭受的是“无妄之灾”吗?美英等国对利比亚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与其说是它们找到了过硬的证据,不如说是它们逻辑推理的结果。

最初,美国与英国在确定炸机嫌疑犯时,根本没有想到利比亚。它们想到了伊朗政府,因为伊朗与美国的关系素来不睦。美国认为,伊朗支持恐怖分子与美国为难,而且,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军舰“斯塔克”号曾击落过一架伊朗民航班机,伊朗也一直声称要进行报复。而且,洛克比空难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宣布对此事负责,并说这是对美国军舰击落伊朗民航班机的报复。后来,美国又想到了阿布·尼达尔的“恐怖公司”,这家公司专门与美国和以色列为难,而且尼达尔称,近期会有空难事件发生。如果不是他策划的,那么,他就是一个高明的预言家。此外,美国人还想到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人阵也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1970年曾炸毁过一架瑞士的民航班机。

在调查空难原因时,调查人员发现了两个重要线索:一是一片从烧毁的皮箱里的一件衬衣口袋里取得的金属片,另一个是在另一只皮箱内的东芝牌收录机的残体,最终鉴定是集成电路的碎片,而且不是收录机本身具有的。专家鉴定,这是一只定时器的残体。炸弹藏匿在两只皮箱内的衣物内。经过详细的调查,调查人员发现,衬衣是马耳他生产的,而且,他们在马耳他找到了出售这种衬衣的商店,而定时器则是瑞士麦伯公司生产的,它曾把这种定时器卖给了利比亚。1985年,利比亚交通运输部长埃泽丁·欣沙里从麦伯公司买走了22台定时器,此后,这种定时器多次被发现与塞姆泰克斯一起使用,而

且 ,使用者都是利比亚人。这就可以说明 ,欣沙里买这种定时器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用途 ,而是专门给恐怖分子提供的 ! 美国人这才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竟然把最有可能实施这项恐怖行动的利比亚忘掉了 !

利比亚与美国的结怨由来已久。自 1969 年 9 月 1 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统一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亚斯王朝以来 ,利比亚与美国的关系就一直走下坡路。1970 年 6 月 11 日 ,利比亚收回了美国在利比亚的惠勒斯空军基地 ,这是当时美国在海外最大的空军基地 ,美国人的恼怒可想而知。1971 年 12 月 ,利比亚实施国有化措施 ,美国又是首当其冲。此后 ,卡扎菲逐渐左倾 ,与苏联关系密切 ,这更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1979 年 ,美国和利比亚相互撤回大使馆人员 ,但未彻底断绝外交关系。1981 年 8 月 ,美国曾在利比亚的锡尔特湾向利比亚的空中势力挑战 ,结果利比亚失败了。1986 年 ,美国借口利比亚在柏林向美国军人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于 1986 年 4 月 15 日对利比亚动了“外科手术” ,结果卡扎菲幸免于难 ,但其养女却被炸死。双方积怨甚深。可这次 ,美国竟然先把它忘记了。于是 ,其他的线索都暂时收了起来 ,美国和英国开始一心一意对付利比亚。

利比亚在三大国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 ,在联合国也没有捞到好处 ,安理会同意对利比亚进行制裁。利比亚为何如此被动 ? 原来 ,利比亚的屁股确实不是干净的。利比亚确实有支持恐怖活动的坏名声。利比亚与美国有不共戴天之仇 ,但与美国相比 ,利比亚只是一个弱者。真刀真枪、明枪实弹 ,利比亚决不是美国的手 ,但如果搞背后袭击 ,进行一些非正规的战争 ,那美国佬是防不胜防的。因此 ,利比亚确实利用各种场合 ,对美国发动过“非正规战争” ,也就是恐怖主义行动。而且 ,卡扎菲还庇护了一大批恐怖分子。这些恐怖分子的袭击对象主要是美国、英国和以色列以及其他西方国家 ,卡扎菲为他们提供了大本营 ,让他们在利比亚训练 ,借用利比亚的护照向“帝国主义”出击 ,出事了为他们提供政治保护 ,受伤了让他们在这里休养生息。因此 ,利比亚与阿布·尼达尔的“恐怖公司”、北爱尔兰的共和军都有密切的交往。阿布·尼达尔之所以来无踪去无影 ,与利比亚的帮助有很大关系。因此 ,西方干脆把利比亚看作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美国中校被绞杀黑幕

30 秒钟的录像带

1989 年 8 月初 ,美国四大电视网获得了一份电视录像带 ,是记录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被军官希金斯被绞死的情况。

由于这段录像带的画面完全是写实的 ,充满了阴森恐怖气氛 ,所以电视台在决定播放这段仅 30 秒钟长的录像带时 ,还特别警告电视观众 :心脏有毛病 ,平时不能受惊吓的人 ,以及不赞成暴力行动的人 ,最好不要观看这段录像。

可是 ,由于希金斯中校被绞杀的消息早已见诸报端 ,所以在美国仍有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观看了这段录像。

希金斯被绞杀的画面共分两部分。画面是一名中年男子双手被反绑在背后 ,身体被吊在半空中。他显然已经气绝身亡 ,所以被固定在天花板上的绞绳上的尸体已经僵直挺硬。由于他的双脚被绑在一起 ,因此整个尸身像钟摆一样微微晃动 ,而脑袋向左侧垂下。

电视画面的光线很暗 ,显然这不是专职摄影师的作品。但因此也使这段录像更显恐怖 ,更显真实。拍摄录像片的人为了使观众能认清被绞死的人是谁 ,所以在片子的前 15 秒钟内 ,那名男子是被蒙住双眼的 ,而后 15 秒钟内 ,死人脸上的白布条已被取下 ,清楚地露出了他整个脸部的侧面。美国联邦调查局初步证实。被害者极有可能确实是美国人质希金斯中校。

希金斯的内部档案

被绞死的希金斯中校现年 44 岁。他早年曾经参加过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也曾当过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的助手。后来他受雇于联合国,被任命为联合国驻黎巴嫩监督停火部队的副司令。1988 年 8 月 17 日,当他在黎巴嫩南部的蒂尔执行公务时被绑架,以后一直没有消息。

在希金斯遭绑架后的第二天,黎巴嫩“世界被压迫者组织”公开承认,这名美国人已成了他们手中的人质。该组织声称,他们绑架希金斯是因为这位美国中校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他在黎巴嫩一直“充当美国和以色列的间谍”。

1989 年 7 月 31 日,希金斯的家属们在观看了那段录像之后表示,他们并不能确定绞死者肯定是希金斯。他的姐姐说,她怀疑这个录像,因为以前有关她兄弟已被处死的报道早就有过。然而尽管如此,希金斯中校的家乡——肯塔基州卡非尔瓦他的家门口,肃穆的黑纱仍然代替了黄绢带。

布什总统在获悉这一消息后随即与希金斯的妻子通了电话,表示“无法恰当地表示自己的愤慨”。对她“目前正蒙受极大的苦难”深表同情和慰问。

希金斯中校被绞杀的录像在美国电视台播放以后,美国观众为之震惊。消息报道说,许多美国人已保证要筹款 1 万美元,以使希金斯 19 岁的女儿能完成她的大学学业。

20 分钟的国际绑架

据黎巴嫩“世界被压迫者组织”宣称,他们绞死希金斯,是为了报复以色列绑架了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奥贝德。

1989 年 7 月 4 日拂晓前,25 名以色列突击队员分乘 3 架直升机,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潜入黎巴嫩,在距以色列东北边境 16 公里处的吉布希特,包围了真主党领袖奥贝德的家。

奥贝德的家四周警卫森严,但所有的警卫人员都被以色列突击队员一一解决了,只除了一名机警的保镖。他发觉情况不对,与以色

列突击队员展开了枪战 ,但迅即被击毙。

突击队员翻墙入院 ,冲入奥贝德的卧室 ,很快制服了刚被惊醒的奥贝德。奥贝德的亲人 ,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 ,全被以色列突击队员捆绑住手脚 ,反锁在室内。而他本人及两名助手则被蒙上双眼 ,遭绑架。

奥贝德的一名邻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来探望 ,结果被一名以色列突击队员击毙。

全部绑架行动干净利落 ,以军无一伤亡 ,仅仅 20 分钟之后 ,以色列突击队员就带着奥贝德等三名人质坐直升机返回以色列了。这以后 14 个小时 ,以色列军方宣布是他们绑架了奥贝德。

据消息透露 ,以色列早就想对奥贝德下手了。因为奥贝德是黎巴嫩伊斯兰教什叶派真主党的主要领导人。而这个组织明显倾向伊朗。于是以色列便认定在伊朗长大的奥贝德应对真主党的一切行动负责。

真主党是近几年在黎巴嫩崛起的新组织 ,党内派系林立 ,组织松散 ,往往由于狂热分子的鼓噪 ,而有颇多过激行动。西方一般认为 ,这个组织搞过不少的恐怖活动。以色列方面也认定 ,是这个组织经常策划游击队袭击以色列的首脑人物。

所以长期以来 ,以色列一直想除掉或绑架奥贝德。两年前 ,以色列军方曾经开展过一次针对他的突击行动 ,不过在关键时刻奥贝德逃掉了。据内幕消息透露 ,这次绑架奥贝德行动 ,是以色列内阁的核心人物于行动之前的 3 个月定下来的。行动目的有三 :一是活捉奥贝德 ,了解黎巴嫩真主党的内情 ,然后实施对策 ,二是能搞清楚被绑架的西方人质的情况 ,以及他们被囚禁的地点 ;三是以奥贝德来交换被黎巴嫩穆斯林民兵绑架的三名以色列士兵。

然而据阿拉伯方面的舆论认为 ,以色列冒险绑架奥贝德的真正目的是要搅混中东局势 ,激化西方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阻挠中东和平进程。

两个被绑架者的神秘关系

那么希金斯与奥贝德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

奥贝德现年 36 岁 ,他的家乡吉布希特是个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 ,大约有 1.2 万穆斯林。在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地区时 ,奥贝德和他的乡亲们对以色列十分仇恨。

原来奥贝德是个温和的穆斯林 ,一心想成为一名工程师 ,为祖国建水坝、筑公路。1980 年他随父母到麦加朝拜后 ,决定放弃工程学 ,改学伊斯兰教教义 ,他十分崇拜霍梅尼 ,便离开故乡专门到伊朗去考察学习 ,回国后他逐渐成了黎巴嫩真主党的主要领导人。

这次奥贝德被绑架之后 ,他的母亲艾敏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一直劝阻儿子不要到德黑兰去 ,可他怎么也不听。他成了极端分子。”奥贝德的妻子穆娜则表示 ,她现在一个人领着 4 个孩子 ,心如刀割 ,却又毫无办法 ,只能日夜为他祈祷 ,愿真主保佑他 ,能早日平安地回家。穆娜恳求世界舆论阻止以色列的强盗行径。

据报道 ,奥贝德在 1989 年 2 月份曾经公开承认 ,是他批准“逮捕”美国中校希金斯的。那次绑架的经过大致如下 :

1988 年 2 月某日下午 ,在黎巴嫩南部的海滨高速公路上 ,一辆挂着联合国旗子的小车 ,正由港口城市蒂尔向联合国驻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驻地纳吉拉驶去。

车内坐的是美国军官希金斯。此时 ,他身着联合国制服 ,军服左臂上缝有美国国旗标志 ,随身没有携带武器。当时 ,他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的负责人 ,刚在蒂尔和当地穆斯林什叶派阿迈勒运动民兵组织领导人会晤过。双方在交换了意见后 ,希金斯准备返回驻地。

当载有希金斯的汽车驶到距离贝鲁特以南约 75 公里处的一个村镇时 ,突然一辆轿车挡住他的去路。车上冲出 4 名持枪的人 ,围住了希金斯的座车。其中一人拉开希金斯汽车的门 ,将他强拉出车 ,然后再塞入他们的汽车 ,很快便驶得不知去向了。

希金斯被绑架后 ,被带到吉布希村 ,囚禁在当地一个显要家中。几天后他又被转送到奥贝德住宅附近的一支武装部队驻地。一个星期后他才被转押到黎巴嫩南部什叶派控制的一个据点里 ,开始他的囚禁生活。按照美国官方的估计 ,由于进入 1989 年以来 ,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略有进展 ,恐怖活动逐渐转淡 ,因此很可能再过一段时

间,希金斯有望重见天日。谁知由于以色列采取了绑架奥贝德的行动,加速了希金斯的死亡。

人质大行动

中东的人质危机由来已久。追本溯源,它是由40年来中东阿以纷争造成的。所以从根本上说,如果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不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那么人质问题也很难彻底和平解决,无辜死亡的人还会继续增加。

当希金斯在1988年2月17日被绑架时,他是第20个在黎巴嫩被绑架的美国人。不过他们中有的获释了,有的逃离虎口,所以现在仍被扣的美国人质有:美联社中东办事处主任特里·安德森,贝鲁特美国大学农学院院长托马斯·萨瑟兰,审计师约翰夫·西西皮奥,电子计算机教授杰西·特纳,新闻系主任艾伦·斯蒂恩,贝鲁特西区黎巴嫩中学校长弗兰克·里德,作家爱德华·奥斯汀·特雷西,会计学校校长罗伯特·皮尔希尔。

希金斯的被绞杀,是第8个在黎巴嫩被杀害的西方人质。

被囚禁的西方人质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台湾《联合报》曾根据西方报刊的片断介绍,作过如此描述:

特里·安德森作为美联社驻中东的首席记者,他是在1985年8月6日在西贝鲁特被绑架的,也是至今仍被扣留的时间最长的一个美国人质。

最初,安德森被送到贝鲁特什叶派穆斯林贫民区一栋肮脏的公寓里,用手铐铐在一张小床上,这里离贝鲁特国际机场很近,因此他经常可以听到喷气式飞机的怒吼声。

这是一间大约15平方米的房间,简陋、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每天,他有15分钟的时间自由活动。他必须抓紧这段时间刷牙、淋浴和洗内衣裤,其他的时间他都要被铁链锁住。

他的床是地板上的一张草席。对一位美国新闻记者来说,这样的生活的确度日如年。

1985年6月8日,美国人质、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站长布克莱病死之后,人质的待遇略有好转,他们被获准听收音机,有时偶尔也

能阅读报纸。

安德森有时与其他美国人质关在一起,有时一个人单独监禁。比如1987年,大部分时间他独处一室。他曾经绝食抗议过7天,但毫无用处。他也曾要求寄一段有关他生活的录像带给他的家人,仍遭拒绝。为此他还用头部撞墙抗议,但没有结果。

1988年,安德森被转送到一栋有暖气的公寓里监禁,并且开始吃上了热食。当时他认为这有可能是个好兆头,也许绑架他的人打算将他养胖后释放他。但他始终没有遇到他想象中的好运气。

对安德森来说,他梦寐以求的第一愿望肯定是获释回国。但不知为什么,绑架者始终对他特别严厉。负责看守他们的一位警卫负责人甚至说,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获释的人,如果他们有可能获释的话。

绑架者对人质的看守是很严格和机警的。有一次,夜间不知发出了什么声响。绑架者以为是美国突击队员来营救人质了,立即将安德森推到墙边,用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显然,他们只要一见到营救者的身影,立刻就会先送安德森去见阎王。

在黎巴嫩遭绑架的人质,除了等待释放而外,似乎别无选择。但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武器换人质”事件被新闻媒体揭露出来之后,西方人质获释的机会就小多了。

美国人质的危急

在希金斯中校被绞杀后几个小时,黎巴嫩真主党的另一个分支机构“革命正义组织”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以色列不在7月31日下午6点以前释放奥贝德的话,他们将杀死手中的一名美国人质——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审计师西西皮奥。这样,所有在贝鲁特的8名美国人质都受到了生命威胁,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奥贝德是以色列绑架的,然而真主党属下的“世界被压迫者组织”和“革命正义组织”却以美国人质开刀,这显然是要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释放奥贝德。

希金斯被害的消息公布之时,美国总统布什正在芝加哥出席全国州长会议。他立即中断了计划中的中西部之行,返回华盛顿,连续

召开各种会议 ,研究对策。7月31日晚上 ,布什总统在一份措词谨慎的声明中发出呼吁 ,要求中东各方冷静 ,并释放他们手中扣押的人质。同时 ,他也含蓄地批评了以色列绑架奥贝德一事导致了希金斯的死亡。与此同时 ,布什政府严厉警告在黎巴嫩的一些极端分子 ,不要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胆敢再杀害人质的话 ,必将遭到美国方面的强烈报复。在军事上 ,美国立即作出姿态。

美国国防部官员8月2日宣布 ,在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原来就有25艘军舰及一个两栖海军陆战队。它们加紧了在地中海的活动。特别是其中的“珊瑚海”号航空母舰 ,缩短了对埃及港口的访问 ,转到地中海东部游弋。这艘航空母舰上有80架飞机 ,不过美国官方没有承认它肩负监视黎巴嫩的任务。

在布什的命令下 ,美国在全球各地总共有14艘军舰缩短了对外国港口的访问 ,或是改变了行动计划。比如主力舰“依阿华”号中断了对法国的访问 ,离开了马赛港。“贝尔纳普”号巡洋舰取消了对苏联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尔的访问 ,奉命进入地中海待命。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美利坚”号及其8艘护卫舰匆匆结束了它对新加坡的访问 ,驶向波斯湾。“游骑兵”号航空母舰也奉命离开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基地 ,向中东方向集结……

与此同时 ,塞浦路斯《黎明报》8月10日报道 ,美国不断在向英国设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军事基地增派海军陆战队员。塞浦路斯在地中海东部 ,是地中海的第三大岛 ,距黎巴嫩的直线距离不过300公里左右。所以美国的这一军事行动极有可能与黎巴嫩人质危机有关。

此外 ,据国际军事专家分析 ,美国驻关岛的空军第四十三轰炸机联队 ,也可以在数小时之内轰炸中东地区的任何目标。虽然美国国防部官员承认这些军事大调动是对布什总统决定采取的行动的有力支持 ,但同时他们又说这些并不意味着军事行动。美国政府发言人菲茨沃特也要求新闻记者们不要对美国军舰的调动大做文章。但是实际上美国摆出了一副军事干涉的架势 ,以“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来配合他们的外交努力则是显而易见的。

布什到处请人当说客

然而美国方面也十分明白,武力解决不了人质危机。这里面最大的困难是迄今为止西方人质究竟被拘禁在何处都搞不清楚。

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他们只知道被绑架的西方人质被囚在贝鲁特南郊的贫民区内。但这里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违章建筑和难民营处处皆是,连当地人都搞不清楚地理位置。

此外,绑架西方人质的恐怖组织采取了分散囚禁的办法。即他们三四个人一组,在一地看管一二名西方人质。因此,即使美国或以色列搞清楚了个别人质被拘禁的地点,敢于派突击队去解救他们,那么其余人质就难免会惨遭杀害。所以谁也不敢下这样的命令。

此外,如果美国敢于派军队入侵或轰炸黎巴嫩的话,不仅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而且必然激起极端分子更加疯狂的报复。

因此,美国尽管摆开了一个大的军事架势,但却是“狗咬刺猬”——无从下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重点仍然放在外交努力上。首先,布什政府通过第三国,与伊朗政府多次就人质问题交换意见,因为据传黎巴嫩真主党是得到伊朗政府支持的。接着,美国还通过苏联,要求当时正在伊朗访问的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代为施加影响和压力。另据《德黑兰时报》报道,布什总统本人还提出建议,如果西方在黎巴嫩的人质问题得到释放的话,美国政府将解冻1980年因伊朗伊斯兰革命而被美国冻结的在美伊朗资财。(不过白宫发言人后来否认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考虑,而且说布什不会为解救人质而和伊朗作什么交易)。

与此同时,美国还请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居间做工作,一方面陈说利害,一方面表示希望不再有人质被杀害。

此外,由于希金斯中校的被害,是以色列绑架黎巴嫩真主党领袖奥贝德的直接恶果,所以美国人对以色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甚至于一些在美国国会内一贯倾向以色列的议员也对此大发雷霆,责怪以色列把事搞糟了。在这种压力下,以色列不得不放弃最初的强硬态度。1989年8月1日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宣称,以政府正在为人质获释而进行接触。后来,以色列方面又表示,愿意用奥贝德来换取西

方人质的获释。

布什总统本人还在 3 月 2 日打电话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希望他能居中做些工作。如果希金斯中校确已被处死的话,希望他能代为说情,收回希金斯的尸体。据说这个电话打了足足有 12 分钟。

联合国也在行动

由于威廉·希金斯中校受雇于联合国,作为联合国维持黎巴嫩和平部队的成员在黎巴嫩被绑架而遭杀害,所以联合国有责任对此采取行动。

1989 年 7 月 31 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一项声明中说,他对希金斯的被处死表示“最严重的关切”。

第二天,联合国的一位发言人宣布德奎利亚尔已派遣一名高级助手前往黎巴嫩,调查希金斯被杀一事,并尽可能设法弄回他的尸体。据这位女发言人说,负责政治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马拉克·戈尔丁 8 月 2 日将去黎巴嫩南部,查实希金斯遇害的真实性。马拉克·戈尔丁在途经以色列时,和以色列当局就人质危机作了磋商。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本人也在 8 月 1 日下午会见了以色列驻联合国使团的代办。

8 月 5 日,马拉克·戈尔丁在大马士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解决西方人质问题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认为人质问题不会很快解决,也不会简单地解决。

在贝鲁特期间,戈尔丁会见了黎巴嫩穆斯林内阁代总理胡斯、军政府领导人奥恩将军等人。在叙利亚期间,戈尔丁会见了叙利亚政府外交部长法鲁克·沙雷和由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领导人纳比·贝里。

8 月 8 日,戈尔丁在与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会晤之后,在特拉维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被绑架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奥贝德。

经过繁忙的一周访问,马拉克·戈尔丁在先后访问了黎巴嫩、叙利亚和以色列之后,于 8 月 9 日飞回纽约,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汇报他中东之行的结果,据秘书长宣布,根据戈尔丁的调查,希金

斯中校“几乎肯定”已经死去，但是他未能就弄回尸体一事有所建树。

伊朗的作用

自从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去世之后，由拉夫桑贾尼担任伊朗总统。据认为拉夫桑贾尼是一位关键的人物。他希望实现伊朗的经济复苏，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得到先进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摆脱伊朗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黎巴嫩真主党得到伊朗的支持。现在他的属下的一个小组不断制造极端的恐怖活动，又杀害了联合国维持黎巴嫩和平部队的希金斯中校，遭到了世界舆论的谴责，特别是美国的强烈反应。这些显然都是不利于伊朗的，也违背刚刚登上伊朗总统宝座的拉夫桑贾尼的治国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1989年8月4日，拉夫桑贾尼在德黑兰一次大规模的穆斯林祈祷仪式上告诫美国，用武力是不能解救他在黎巴嫩的人质的。与此同时，他又表示，伊朗愿意为释放关押在黎巴嫩的人质提供帮助。

拉夫桑贾尼的这番话就像是一个和解的信号，得到了美国的欢迎。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立即在华盛顿说，美国认为拉夫桑贾尼的讲话“鼓舞人心”。

在伊朗的作用下，杀害希金斯的“世界被压迫组织”从此不再出现了。扬言要杀死另一名人质西西皮奥的“革命正义组织”先是宣布“延迟”处死他的最后期限，后来又决定“冻结”处死西西皮奥的行动。

看来黎巴嫩极端组织已不太可能再贸然杀害西方人质。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以色列方面出于各方的压力，很有可能释放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奥贝德。这一场中东人质危机也许就这样过去。

一条震惊世界的公告

1988年8月17日下午3时47分,巴基斯坦东南部旁遮普省巴哈瓦尔普尔机场。一架C—130军用飞机掠过跑道,徐徐冲向云天。几分钟后,飞机突然在空中爆炸。人们只见一团火球翻滚而下,直栽到地面上,方圆10公里都散落有飞机的碎片。当天晚上8时整,巴基斯坦电台和电视台中断了正常节目,开始播放《古兰经》文,紧接着宣布了一条惊人的公告:巴基斯坦总统兼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因飞机失事遇难身亡。随行的10多名高级军官,包括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赫塔尔·阿卜杜尔·拉赫曼上将、陆军司令部参谋局长阿夫扎尔中将、穆罕默德·沙里夫少将、阿卜杜勒·萨米少将、穆罕默德·侯赛因·阿瓦少将和总统新闻秘书沙利克等无一幸免。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阿诺德·拉菲尔和美国驻巴基斯坦国防代表处主任赫伯特·沃森准将以及13名机组人员也同机遇难。噩耗传出,整个伊斯兰堡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巴基斯坦各界以及世界各国无不为之震惊。

空难骤然降临

8月17日,天空晴朗,阳光明媚,苍穹像水一般洁净。上午,哈克总统从伊斯兰堡机场乘坐“巴基一号”总统座机——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前往巴哈瓦尔普尔市。巴哈瓦尔普尔地处沙漠边缘,距首都伊斯兰堡以南720公里,离巴印边界仅100公里。哈克总统此行的目的是视察驻守在那里的第31军并观看美国最近提供的新

型坦克在沙漠中的作战演习。

这是齐亚·哈克总统两个半月来第一次乘坐“巴基一号”总统座机。那天早晨，齐亚·哈克总统以前的军事秘书、现任装甲兵司令穆罕默德·杜拉尼少将异乎寻常地几次打电话给他，一再希望哈克总统前往巴哈瓦尔普尔观看在沙漠地区进行的坦克射击表演。杜拉尼少将说，届时整个陆军司令部的头面人物全在那儿，言外之意是如果总统不出席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一种“轻慢”。最后，齐亚·哈克总统勉强同意了杜拉尼少将的请求。

在烈日当空的沙漠地区，齐亚·哈克总统自始至终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军事演习，并对参加演习的将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军事演习结束后，齐亚·哈克总统前往军官食堂，同高级军官们共进午餐，他们边吃边开着玩笑，齐亚·哈克总统显得格外轻松愉快。

下午3时多，齐亚·哈克总统回到巴哈瓦尔普尔机场。在跑道旁，他面朝圣城麦加方向，虔诚地做了礼拜。登机前，他又走到列队欢送他的当地军官们面前，与他们一一热烈拥抱，握手告别。

下午3时30分，齐亚·哈克总统一行登上“巴基一号”总统座机。准备前往木尔坦参加一个悼念仪式，悼念一位几天前被杀害的木尔坦女修道院的美国人院长。然后再飞回伊斯兰堡。按照日程安排，齐亚·哈克总统当天晚上还要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巴基斯坦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与齐亚·哈克同机返回伊斯兰堡并坐在他旁边的是巴基斯坦第二号最强有力的人物、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赫塔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将军。拉赫曼是哈克总统的亲密朋友之一。他和哈克一样，原先也不想来观看坦克射击表演，但他以前副手告诉他，哈克即将对陆军司令部和情报部进行重大改组，想征求他的意见。于是，拉赫曼决定去巴哈瓦尔普尔。

哈克和两位将军坐在C—130飞机上一个座舱前面的座位上，另外两个要人座位上坐着哈克的两位美国朋友：一个是与哈克相识已有12年的巴基斯坦问题专家、45岁的美国大使阿诺德·拉斐尔，另一个是49岁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国防代表处主任赫伯特·沃森准将。在要人座位后面，8名巴基斯坦将军分坐在小座舱尾部的两

排长凳上。

一架保安飞机结束了对巴哈瓦尔普尔军事基地周围的最后一次检查,这是自1982年曾有一枚导弹射向正飞行在拉瓦尔品第上空的“巴基一号”总统座机,但未击中之后采取的一项例行预防措施。3时47分,机场控制塔向齐亚·哈克的座机发出了起飞信号,“巴基一号”腾空而起,相继起飞的还有两架护航战斗机。

这时,巴基斯坦陆军副参谋长米尔扎·阿斯拉姆·贝格准将站在跑道上挥手向哈克总统一行告别。那天他是惟一没有登上“巴基一号”座机的陆军高级将领。在起飞前最后一分钟,齐亚·哈克还邀请他登机,但贝格说,在他回家的路上还有一个会要参加。在“巴基一号”座机升空后,他立即登上另一架等候起飞的小型涡轮喷气机。

“巴基一号”座机的驾驶舱与小座舱中间只隔一扇门和三级台阶。驾驶舱内有4名机组人员。其中机长兼正驾驶员是空军联队指挥员马什胡德·哈桑,他是齐亚·哈克亲自挑选的。机上副驾驶员、导航员和工程师也都经过空军安全部门审查核准。

“巴基一号”座机升空后,巴哈瓦尔普尔控制塔的工作人员向马什胡德询问飞机的准确位置。马什胡德通过无线电回答:“‘巴基一号’准备发送信号。”但接下来便是一片静默,地面人员与马什胡德很快失去联系,他们开始惊恐万状:总统座机起飞仅4分钟就失踪了!与此同时,护航机上的驾驶员突然报告地面说,总统座机冒出烟雾和火花。报告话音刚落,护航机驾驶员惊慌失措地呼叫起来:“总统座机起火爆炸!”

悲剧发生时,在离机场7公里的一条河上,目击者说他看见一架飞机在空中东倒西歪地向前飞行。突然,机身喷出一团黑烟,几秒钟后,一个大火球吞噬了整架飞机。附近村庄里的村民看到飞机令人恐怖地向下坠落,剧烈地翻滚,在做了第三个环形运动之后,它一头栽到地面,机上的4个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反弹起两次,在反弹后第三次落下来时,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旁遮普省巴哈瓦尔普尔地区的数千群众闻声赶到飞机残骸主要散落地——苏特里杰河岸边的拉杰·卡迈尔村一带。当他们得知出事的是总统座机后,有的人极度悲伤,不少人

痛哭流涕。

一位名叫古拉姆·纳比的磨粉厂主人说:“飞机从河边飞来,突然又掉头飞走。它再次腾空而起,然而不多会儿,就又落下来坠毁了。”

另一位目击者说:“一开始,飞机在苏特里杰河上空往下降,然后,飞机又往回升。这时部分机体散落。接着飞机爆炸,落地起火。”还有一些目击者说,他们看见总统座机在该地区上空盘旋了两圈,接着听见两次爆炸声。爆炸声相隔约5秒钟。

“巴基一号”座机的大部分残骸散落在一个直径不到40米的小地带里,而且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可以辨认出的最大部件是一个机翼。另一个机翼跌落在离飞机坠毁中心约1公里远的地方。

惨案发生后,巴基斯坦官员分别乘两架直升飞机赶到现场,消防车和吊车前往灭火,军队和警察立即封锁了出事现场,以防止记者和其他人员入内。

此时,贝格将军乘坐的涡轮喷气机在燃烧着火焰的“巴基一号”残骸的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后,便朝伊斯兰堡方向飞去。贝格用无线电通知在首都的陆军高级将领,要他们在他的飞机降落后立即来见他。贝格估计齐亚·哈克总统和拉赫曼上将都已罹难,他作为陆军副参谋长,如今顺理成章地成为陆军最高指挥官了。

大火扑灭后,有关人员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开始搜寻哈克总统及其他遇难者的尸体。附近村民赶制的25具棺木被急速送往现场。直到18日,才发现了23具尸首,其中能辨认出来的只有5具,包括哈克总统和拉斐尔大使的尸首。人们辨认死者的主要依据是他们生前所佩戴的军衔、勋章和奖章等其他饰物。在破碎的机翼、机轮和油箱之间,人们竟发现了哈克生前一直随身携带的,被烧坏的《古兰经》。

哈克罹难之后

哈克总统罹难后,按照巴基斯坦宪法规定,73岁的参院主席吴拉姆·伊沙克·汗继任总统。伊沙克·汗1915年1月生于班努市。先后毕业于白沙瓦伊斯兰学院和旁遮普大学,获化学和植物学学士学位。1940年在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开始从政,他是1985年2月巴

基斯坦举行第一次大选时 ,被选为参议院主席的。

为了稳定局势 ,缓和各派矛盾 ,新总统伊沙克·汗于 17 日傍晚召集了由看守内阁成员和陆、海、空三军首脑参加的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 (1) 成立由国防、内政、外交等 6 名联邦内阁部长 ,陆海空三军参谋长 ,3 个省政府首席部长和 1 名信德省议员组成的 13 人紧急委员会 ; (2) 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 (3) 任命陆军副参谋长米尔扎·阿斯拉姆·贝格中将为陆军参谋长 ; (4) 宣布现行宪法仍然有效 ,将严格按照宪法办事 ,并允诺按原计划于 1988 年 11 月 16 日如期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 (5) 宣布巴基斯坦现行的内外政策不变 ,将继续履行一切国际义务。

会议结束后 ,伊沙克·汗连夜通过电视、广播发表讲话 ,向全国人民宣布政府的上述决定 ,并高度赞扬了哈克的政绩。当天 ,巴基斯坦政府宣布 ,全国将为哈克总统的逝世哀悼 10 天 ,政府机关和学校关闭 3 天。

伊沙克·汗讲话后 ,部队和警察奉命在主要城市巡逻 ,各战略要地和公共建筑物外都派有重兵把守 ,以防发生不测事件。

自 5 月 29 日解散国民议会以来 ,哈克既当总统又当总理 ,每晚 7 时的电视新闻必有他的镜头。8 月 17 日下午 ,哈克总统因飞机失事遇难的消息传出后 ,一时人们简直难以相信这会是真的。

直到晚上 8 时 ,哈克总统死难的消息正式公布后 ,巴基斯坦人民才不得不接受这一令人悲痛的事实。卡拉奇等地的股票交易所马上停止营业。伊斯兰堡街头可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在神情紧张地议论这一重要消息 ,但饭馆、商店照样开门。

齐亚·哈克总统突然遇难后 ,人们震惊和悲痛之余 ,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座机怎么会爆炸呢 ?

8 月 17 日 ,悲剧发生后 ,当地军警奉命把现场严密保护起来。18 日由空军司令员阿巴斯·米扎尔率领的空军和巴航高级技术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前往巴哈瓦尔普尔进行调查。美国政府也应邀派出两队人马 ,一队由五角大楼费斯特准将率领 ,由 8 名空难调查专家组成 ,其中有 C-130 型飞机制造厂洛克希德公司的专家。另一队来自联邦德国基地 ,主要是帮助巴方辨认死难者的尸体。

调查小组调查了巴哈瓦尔普尔和木尔坦两个城市,伊斯兰堡附近的普克拉拉空军基地和中部城市拉合尔等地的 500 多人,并于 21 日隔离性拘留了与齐亚·哈克座机爆炸事件有关的 80 多人,其中包括空军保安人员、地勤人员、行李理货员,在座机起飞前曾向齐亚·哈克总统赠送芒果等物品的地方知名人士以及将芒果运往巴哈瓦尔普尔的人。此外调查人员还在座机坠毁现场周围 6 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收集 C-130 座机的各种残存部件,以便确定是否有定时炸弹爆炸的证据,并将其中一些关键部件运往美国,请美国专家作出鉴定。而美国派来的专家则在死者遗体中寻找可能存在的爆炸物碎片,如果确实有的话,就要进一步确定是什么爆炸物。

专家们认为,发生空难事故的原因不外有五种:气候因素、机械故障、技术错误、两机相撞和人为破坏。

出事当天下午,巴哈瓦尔普尔地区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微风轻拂,能见度很好。这有当地居民、军警和气象台的记录为证。气候因素首先被排除。

接着,调查小组又排除了机械故障和与另一架飞机相撞的可能性。C-130 中远程军事运输机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以其优良的质量、稳定的性能和安全系数高而闻名于世,是该公司的“拳头”产品。这种飞机装有 4 个引擎,是目前最稳定的运输机,即使只有一个引擎在运转,它也能继续飞行。只要有陆地,它就能降落。哈克总统乘坐的这架 C-130 飞机的机械状态非常之好,从拉瓦尔品第起飞前已经经过高级技师的检查。在看完军事演出后飞离巴哈瓦尔普尔机场之前,又经过 14 名技师全面检查,主管飞行员在检查报告上签了“OK”。

事后的调查分析证实,飞机引擎没有出毛病。因为如果引擎有故障,螺旋桨在飞机坠毁时就不会全速旋转,这会影响到叶片受撞击时断裂和卷曲的形状。但是,通过检查每一片断裂的螺旋桨叶片的卷曲程度,调查人员确定,当螺旋桨撞击地面时,发动机正在全速转动。他们还从坠机后扣押的加油车中取样化验,发现燃料未受任何污染。

调查人员推断,飞机上的电力系统一直在工作,因为飞机上的两

个电钟都停在飞机撞地一刹那的时间上。这同目击者提供的坠机时间和电子计算机复制的这次短暂飞行的时间完全吻合。

C-130 座机的控制系统不是一个,而是 3 个。在两个液压控制系统漏液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控制系的机械系统做后盾。调查人员将控制系统的位置同液压阀的结构和机尾稳定器进行比较后,确定飞机在坠毁时控制系统是正常的。因此,机械故障的原因完全可以排除。

专家们认为,即使发生机械故障,飞行员也完全来得及报告地面控制中心或设法就近着陆,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机毁人亡的灾难。

另外,据《阿拉伯新闻》报道,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哈基穆拉·汗中将 8 月 18 日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齐亚·哈克总统座机是“一种很安全的飞机。我们向来都对重要人物乘坐飞机的飞行采取可靠的措施”。他还说:“当齐亚·哈克前往巴哈瓦尔普尔观看坦克部队射击表演时,所有空军基地都采取了常规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飞行控制和地面指挥。”巴基斯坦驻联合国大使在谈到会不会有可能与另一架飞机相撞时说:“不会的,因为齐亚·哈克总统座机飞行时,附近不会有其他飞机飞行。”

技术错误的假设也不能成立,哈克总统乘坐的这架飞机的机长,主管飞行员马什胡德中校,是巴基斯坦数一数二的老牌飞行员,他驾机技艺高超,已荣获多枚功勋奖章。他的履历表上从未有过事故记录。C-130 机组人员一般只需 4—6 人,而这架总统座机是双倍建制,共有 13 人。他们都是经过挑选的技术尖子,身体很好,况且飞机失事不是处于飞行的关键时刻,如起飞或降落。因此,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机组肯定不会在起飞数分钟后就出现技术错误的。

排除上述几种原因,剩下的惟一可能就是人为破坏。

巴基斯坦官员们普遍怀疑,这次总统座机事件是有人故意破坏造成的。8 月 17 日,伊沙克·汗根据宪法接任总统后,在谈到这次爆炸事件时说:“这是一个预谋行动,而不是一般飞行事故。”18 日,巴基斯坦一位高级官员说,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几天前曾报告说,一个谋杀齐亚·哈克总统和政界要员的阴谋正在计划之中。20 日,伊沙克·

汗总统在参加完哈克的葬礼后,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各种情况表明,巴基斯坦的敌人正对我们的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他们已经渗入到我们国家的防卫内层中。”从目前的技术手段看,破坏飞机的方式有导弹袭击、安放定时炸弹和遥控引爆装置等几种。

调查人员同样采用排除法进行分析。

首先,他们排除了飞机在空中爆炸的可能性。如果出现空中爆炸,残骸碎片将会散落在一个广阔的地区内。可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把“巴基一号”座机重新拼装起来,用电子显微析像器检查每一碎片的边缘,证实飞机在落地时是完整的。其次,飞机不是被导弹击中的,空难调查者在飞机残骸上找不到遭受导弹袭击的痕迹。因为如果飞机被导弹击中,会转而熔化铝制的机翼,当飞机突然下降时,风会在熔化的金属上留下明显的条纹。但在总统座机上没有发现这种条纹。而像 C—130 这样的飞机,即使受到威力很大的导弹袭击,飞行员既可能报告地面,又可以安全滑翔着陆。

至于定时炸弹,一般对定时起落的民航班机起作用。总统座机起落时间严格保密,而且随意性很大,破坏者一般很难采用定时炸弹得手。另外,专家们排除了机舱在空中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因为出现火情的话,坐在机舱内的乘客死去之前会吸入大量的烟尘。可是,对美国将军的尸体——惟一的一具尸体——进行解剖表明,在他的气管内没有发现烟尘。这说明他死于坠机引起的大火之前,而不是之后。

经过两个月紧张、细致的调查,10月16日,由巴基斯坦空军调查委员会和美国专家联合起草的调查报告,正式送交巴基斯坦政府公诸于众。这份长达350页的调查报告的结论是:运用高技术而又精心策划的破坏行为导致了这场空难事件。

关于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这份报告分析说,由于在货舱后门处发现了超常量的磷、锑和硫以及破坏分子常用的爆炸物季戊四醇硝酸脂,经美国的实验室测定,还有一种新型的中高度爆炸品的痕迹,所以,在机舱内发生过低强度爆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专家们认为:由于飞机残骸中发现了异乎寻常的磷和钾,在残留的一个芒果核中含有过量的钾,一个芒果皮上含有不容有的锑和氯,破坏者有可能使

用了毒气爆炸装置,这些装置很可能混迹于装上飞机的芒果筐中或包装饮料中。然后通过自动或遥控手段引爆这些毒气装置,使机组人员在几分钟内不知不觉中毒。最后造成飞机失控而出事。

巴基斯坦军械专家们使用这些同样的化学物质,复制了一个低烈度的炸药起爆管,它能用来炸开一只饮料罐头大小的瓶子。调查人员认为,这个瓶子可以容纳足够使驾驶员失去驾驶能力的无味毒气。那么,这枚遥控炸弹可能藏在哪儿呢?巴基斯坦国防部的官员说,这架C—130军用运输机改装为“巴基一号”总统座机时,内部曾做了一些特殊的改造,包括安装座椅和桌子,炸弹可能就安放在这些地方。据法新社19日报道,齐亚·哈克总统座机在每次出发前都要在机场的飞机库里装上集装箱,箱内装有椅子、桌子和其他设备。因此,有的专家认为,爆炸物可能安装在某个集装箱中。但也有专家认为,在齐亚·哈克总统座机起飞前最后一分钟搬进飞机的,由地方知名人士向总统赠送的20箱芒果里可能藏进炸弹。

有关人员在巴哈瓦尔普尔的调查表明,在飞机上安放毒气炸弹的机会是有的。

按惯例,巴基斯坦空军为总统配备了两架C—130飞机。为了防止意外,保安官员通常在总统登机前一分钟才宣布总统乘哪架飞机。8月17日上午,两架C—130飞机停在拉瓦尔品第的查克拉拉空军基地,当官员们陪同齐亚·哈克总统登上飞机时,自动显示器才显示“巴基一号”字样。“巴基一号”座机在巴哈瓦尔普尔机场降落后,便一直停在跑道上,而没有遵照预定的程序飞往附近的木尔坦机场,在那儿能得到最好的安全保护。巴哈瓦尔普尔机场很小,不能同时容纳两架大型运输机,另一架只得返回查克拉拉基地。这样,总统要返乘的飞机就再清楚不过了。

按常规,总统和他的随从官员在检阅时,要有三股不同的武装力量保护机场,空军基地警察和军事警察密切注意进出口处,随从警卫分散在专机四周形成警戒线,地方安全警察守卫机场。但是,这种奇特的保安措施反而分散了保安人员的注意力。据一个检查人员说,那天上午一个包括平民在内的修理小组,为调节货舱的门,在那儿工作达两小时之久,工人们没有经过任何搜查就进出飞机,其中任何人

都有可能将一枚毒气弹扔在通气孔或别的什么地方。一位地方警察看到后,当时也对修理小组产生过怀疑,但是,他却沒有去过问。

1989年6月17日,英国《泰晤士报》曾刊出了该报记者采访有关齐亚·哈克事件的特别报道,其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

“当时,该地区还有3架飞机的无线电调到同一个通讯频率上,他们是贝格将军乘坐的涡轮喷气机,为‘巴基一号’座机做替补的‘巴基379’飞机以及在‘巴基一号’起飞前搜索恐怖分子的保安飞机。我们设法找到了这些飞机的机组人员,他们不仅都与‘巴基一号’座机机组人员很熟,而且很熟悉它的程序——他们听到了‘巴基一号’和巴哈瓦尔普尔控制塔之间的对话。”

“他们各自对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的描述是一致的。首先‘巴基一号’座机报告了抵达首都的大致时间。然后,在控制塔询问它的位置时,它未能做出回答。与此同时,‘巴基379’飞机试图与‘巴基一号’座机上的联队指挥号马什胡德联系,但没成功。他们听到‘准备发送信号’的话,但接下来没有任何信息。在继续保持静默的情况下,控制塔越发像发狂似的试图与它取得联系。三四分钟过去了,突然,从‘巴基一号’座机传出了呼叫‘马什胡德’‘马什胡德……’的微弱声音。”

“偷听对话的驾驶员中有一人辨别出,这声音出自齐亚·哈克的军事秘书纳吉布·艾哈迈德准将之口。从声音的微弱程度来推断,他显然是在仪器舱的后部(有一扇门将它同‘小座舱’连在一起)。这意味着,当时无线电报话器是开着的,正收听到后面的声音。”

“如果马什胡德和机组的其他3人遇到了麻烦,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其他飞机的驾驶员解释说,如果‘巴基一号’座机上的机组人员神态清醒但遇到麻烦时,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无论如何不会保持沉默。如果控制有困难,马什胡德会立即发出紧急呼救信号。即使他因某种原因不想同控制塔联系,人们也会听到他向机组人员发号施令或提醒乘客做好紧急降落准备的声音。此外,如果座舱里有人试图劫机或驾驶员之间发生扭打,这也会有声音播送出来被收听到。”

“无线电一定开着,因为它传出了准将的声音。回顾各自以往的经历,驾驶员们对长时间的沉默只能做出一种解释:马什胡德和机组

人员要么死了,要么失去了知觉,而麦克风因其中一人的手紧按在操纵无线电的按钮上,一直没关掉。”

“坠机地点目击者的叙述与无线电的沉默是相吻合的。他们看见飞机像是滑行在铁道上那样上下摆动。按照 C—130 飞机专家的说法,在没有驾驶员操纵情况下,这种飞机即进入如下飞行方式:首先,机头朝上,然后机尾的机械装置自动地矫正过正,造成机头暂时朝下。过一会儿,由于无人操纵,它又改为朝上。每次摆动都将比前一次更为明显、剧烈,直至飞机坠毁为止。”

神密的凶手

如果说,恐怖分子用什么手段制造这次爆炸事件的问题已有一个初步解答的话,那么又是谁蓄意谋害齐亚·哈克总统的呢?

齐亚·哈克刚逝世时,巴基斯坦最著名的反对党——人民党领袖贝娜齐尔·布托小姐提出了也许是最简单的解释:神的仲裁。

1976 年 3 月,贝娜齐尔·布托的父亲布托亲自提拔齐亚·哈克为陆军参谋长,可是第二年 7 月,齐亚·哈克发动政变一举推翻了布托政府,并在 21 个月之后以“谋杀政敌罪”将她父亲处以绞刑。同时,齐亚·哈克宣布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为非法政党,监禁贝娜齐尔和她的母亲,并缺席审判了她的两个兄弟沙阿·纳瓦兹和米尔·穆尔塔扎,宣布他们犯有严重罪行。当 1985 年 7 月 18 日沙阿·纳瓦兹在法国神秘地死去时,她怀疑,她弟弟是齐亚·哈克派人干的,齐亚·哈克毁了她的家庭。

但是,也有不是来自“神的报应”。在过去的 9 年里,贝·布托的兄弟米尔·穆尔塔扎在国外领导过一个叫“佐勒菲卡尔”的团体,旨在推翻齐亚·哈克的政权。他们使用了包括破坏、劫持和暗杀等手段。1981 年,该团体劫持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载有 100 名乘客的波音 727 飞机,一名乘客在喀布尔被处死,然后这架飞机飞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在那里,“佐勒菲卡尔”迫使齐亚·哈克用 54 名政治犯交换人质。

米尔·穆尔塔扎承认,他曾在 5 个场合暗杀齐亚·哈克。以报杀父之仇。其中一次就是 1982 年运用一枚地对空导弹,射向正飞行在

拉瓦尔品第上空的齐亚·哈克总统座机,但未击中。8月17日齐亚·哈克遇难后,“佐勒菲卡尔”一开始声称是他炸毁“巴基一号”座机,后来得知美国大使也死于坠机时,他又予以否认。“佐勒菲卡尔”的一名成员8月26日在伦敦宣称:“佐勒菲卡尔”组织现在已不复存在,他也不再活动了。

关于谁是凶手的问题,一位西方分析家说:“齐亚·哈克总统树立了许多敌人,现在有几十个反对他的组织,其中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可能这么干。”事实上,在齐亚·哈克执政的11年中,有的暗杀者已经动真格的,尽管都没有得逞,但许多杀手还在等待时机。

8月20日,伊沙克·汗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调查小组已排除可能牵涉这次爆炸事件的6种势力。据有关报道,巴基斯坦问题专家还开了一长串可能的嫌疑犯名单,从国外的宿敌到国内的反对派,无所不包,他们认为,哈克总统最危险的敌人也许是阿布·尼达尔领导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组织。因为巴基斯坦曾指控它的5名枪手参与了1986年在卡拉奇劫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客机事件,并缺席宣判他们5人死刑。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发誓要杀死齐亚·哈克。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最有可能的凶手是阿富汗情报机关“卡哈德”。8月22日发表的美国国务院一份题为“1987年全球恐怖主义类型”的报告说,1987年全球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总共832件,其中国家发起为189件,而阿富汗情报机关在巴基斯坦就策划了127件,且都是针对民用目标的,造成100多人死亡,其目的在于搞乱巴基斯坦,阻止齐亚·哈克总统支持阿富汗游击队。美国官员也在私下说,情况表明齐亚·哈克总统座机爆炸是一次高明的行动,只有受过克格勃训练、资助和有效控制的阿富汗情报机关这样的组织才能有动机和能力实施这样的行动。

此外,在巴基斯坦内部也有一些势力想置齐亚·哈克总统于死地。其中最危险的是穆斯林的什叶派,他们占巴基斯坦1亿穆斯林人口的20%。他们因齐亚·哈克总统同美国亲热和把逊尼派树为巴基斯坦正统穆斯林而不满。他们甚至认为属于逊尼派的齐亚·哈克总统是8月5日什叶派著名的宗教和政党领袖胡中尼在自沙瓦遇刺的幕后策划者,发誓要对齐亚·哈克总统实行报复。自那天起,什叶

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在齐亚·哈克蒙难后,巴基斯坦好几个地方发生了两大教派之间的冲突。在南部信德省,有 50 名反对齐亚·哈克的人,手拿猎枪、斧头、短剑和铁棍,攻打在清真寺为死去的哈克总统祈祷的人,造成了 6 人受伤。西北部的帕拉奇镇,由于有人在逊尼派做祈祷过程中扔了一枚手榴弹,而实行部分宵禁。

调查人员也没有排除巴基斯坦军队中心怀不满的军人进行破坏的可能性。齐亚·哈克自 1977 年 7 月上台后,一直紧紧抓住军权不放。1984 年前,哈克对全国实行军法管制,依靠军队实行专权统治,对反对党采取高压政策。1985 年后,哈克通过全民投票方式当选为总统,恢复了议会和民选政府。这时,哈克作为陆军参谋长在当选总统后理应脱掉军装。然而,尽管国民议会、反对党以及军队内部有人多次呼吁哈克辞去军队中最有实权的陆军参谋长之职,而哈克却一直以各种借口拒绝,并称死也要穿着军装死,这无疑使一些有继续升迁机会的军官们感到失望。哈克还不断在军队内的各种重要位置上安插亲信,经常调换不可靠的军官,部分中、下级军官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他们对哈克的强权统治及其推行伊斯兰化政策极为反感。另外,军队里还有人认为巴基斯坦援助阿富汗游击队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怨声载道。西方舆论认为外部的任何暗杀者遇到的最大障碍是齐亚·哈克总统周围严密的保卫工作,而在这次座机爆炸事件中,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需要在军队中找到一只“鼯鼠”。8 月 21 日拘留了所有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员大概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另两个嫌疑涉及苏联和印度当局。自 1988 年 4 月巴、阿签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以来,巴基斯坦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军事、政治及各方面的援助,特别是哈克总统一再表示支持阿富汗游击队,有时还进行关于苏联停止撤军,又向阿富汗增兵等宣传。对此,苏联当局十分恼火。1988 年 6 月,在巴基斯坦一次秘密内阁会议上,一位德高望重的内阁部长提醒齐亚·哈克总统:“你现在处境危险,请随时注意防范。”几个小时前,来自阿富汗的情报说,在那里有一个受命于苏联克格勃的特种暗杀组织,哈克已被列入他们暗杀的黑名单。8 月初,苏联暂停从阿富汗撤军,以抗议齐亚·哈克违反日内瓦协议。同时,苏联人还走出了异乎寻常的一步:召见美

国驻莫斯科大使杰克·马特洛克,通知他苏联想教训一下齐亚·哈克。印度则一直认为向国内锡克教恐怖分子秘密提供武器者是巴基斯坦。8月15日,拉·甘地总理曾警告说,巴基斯坦是将会对这种行为“感到懊悔”的。

8月23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沃龙佐夫约见了巴基斯坦驻苏大使穆罕默德·阿明,指出关于苏联参与谋杀哈克的臆想是荒谬的。8月19日,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印度外交部发言人也正式否认印幕后策划哈克空难事件的说法。那位发言人称,将印度列入涉嫌谋杀齐亚·哈克总统的名单之中“完全是荒谬的,毫无根据的和居心不良”。

疑团种种

10月16日齐亚·哈克总统事故调查委员会负责人,巴基斯坦空军司令阿巴斯·米扎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调查结果后说,作为飞机失事的技术调查已经完成,为继续追查破坏者,找出幕后主犯,他已向政府建议立案进行刑事侦查。

调查部门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对机组人员的遗体没有进行尸体解剖,因此不能确定他们是否中过毒。调查报告承认,调查部门缺少调查犯罪活动的专门知识。耐人寻味的是,在飞机坠毁后,美国似乎对这次破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美国国务院就表现得不怎么热情,它似乎不愿去尽力寻找凶手、或者不想让世界人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人在国外被恐怖分子杀害,联邦调查局就有责任进行调查。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参加齐亚·哈克葬礼回到华盛顿,就劝告联邦调查局不要插手巴基斯坦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尽管联邦调查局有权调查涉及美国公民死亡的这次坠机事件,但它还是默默地同意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就不得而知。当时在伊斯兰堡的一名美国外交人员则说,使馆工作人员都接到不要多说话的命令,情况就好像是存在着重大而又见不得人的秘密。

结果是,美国派往巴基斯坦官方调查部门的人员只有6名空军事故调查人员,没有一个是刑事、反恐怖或对付破坏的专家。“巴基一号”飞机失事以后,据联邦调查局官员说,在现场调查的美国人暗

示,飞机坠毁不是出了机械故障造成的。然而,新闻综述却转载美国国务院一位人士的话说:“‘美国专家’相信飞机失事是因为飞机出了故障。”这些报道给人的感觉是,这仅仅是一起飞行事故。事实上,据一位巴基斯坦高级官员透露,事故发生后,美国驻巴大使馆曾传话巴基斯坦当局,巴基斯坦政府不该因这件事而让苏联人难堪、不要“揪熊的尾巴”。

杀死或麻醉驾驶员的化学剂只有通过尸体解剖才能确定下来。然而据报道,巴基斯坦有关方面从未对机组人员的遗体进行解剖。据说对此的解释是:据伊斯兰教的习俗,死者尸体必须在24小时内埋葬。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遗体是在坠机的两天后才运回去埋葬的。从巴基斯坦空军的一位医生那里了解到,尽管有伊斯兰法律,但在坠机的情况下,通常要对驾机人进行尸体解剖。

8月17日晚,受害者的遗体被装在塑料收尸袋中运到巴哈瓦尔普尔军事医院,并被贮存起来,以便一个由美国和巴基斯坦病理学家组成的小组能对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可是第二天,在病理学家到达之前,医院接到上级命令,把这些尸体装入棺材,运了出去。驾驶员出了什么事情的主要证据就这样被埋葬了。

事后,警方对机场接近“巴基一号”座机的人以及与其安全有关的人进行的调查,似乎也有所放松。据一位安全官员透露,地勤人员没有受到有计划的审讯。齐亚·哈克总统和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赫塔尔·阿卜杜尔·拉赫曼上将的家属说,坠机前不久打给他俩的电话录音已被销毁,联合情报部关于米尔·穆尔塔扎的档案据说也失踪了,坠机时在巴哈瓦尔普尔的军事人员也被调换了。这些细节合起来就意味着有一种巧妙安排的掩盖手法。如果确是如此的话,那就是说,“巴基一号”座机的爆炸必定是内部人干的。因为即使外部敌对势力能炸掉这架飞机,但它们没有能力阻止巴基斯坦一家军事医院已计划好的尸体解剖,更不能淡化审讯和不让美国联邦调查局插手。

尽管这件事涉及美国在南亚的主要盟友被杀,以及美国大使和军事代表丧生,但美国从没有提出任何报复凶手的强烈要求,更没有做出要找到凶手,查个水落石出的真正努力。在巴基斯坦,事件淹没

无闻的速度令人惊讶。齐亚·哈克和拉赫曼的名字几天后就从电视和报纸上消失了。齐亚·哈克的画像，除了在阿富汗难民营中仍挂有一些外，在其他地方已很少见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齐亚·哈克总统的空难“见证”——“巴基一号”座机上的黑匣子或座舱声音录音机至今未找到。

齐亚·哈克的长子伊贾兹·哈克今后决定从政，但在当时，他的首要任务是查出谁是陷害他父亲的凶手。“巴基一号”被炸后，齐亚·哈克的尸体没有进行解剖化验，原因是他的尸体被大火烧得不完整了。但1989年6月，伊贾兹向记者出示了一些他父亲的遗物，包括一个黑皮包、念珠、胃药、替换军服以及齐亚·哈克心爱的一本《古兰经》。据说这些东西都是在坠机现场齐亚·哈克的尸体附近找到的，基本上完好无损。伊贾兹认为，如果坠机发生的大火可把尸体烧焦，那么，这些随身物品又怎能保存下来？伊贾兹、安瓦尔兄弟两人和另一位遇难将军的儿子决心进行私人调查，彻底弄清事实真相。

“巴基一号”座机爆炸究竟是一起飞行事故还是一桩罪恶谋杀？凶手是内部人还是外部敌对势力？如今，它在人们心中仍是一个疑团。人们期待着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最后的线索

但是许多人对1988年5月间，齐亚·哈克总统突然解散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和居内久内阁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并认为此事所反映的巴基斯坦总统总理之争，可能与哈克遇难有直接的联系。

据了解真相的内幕人士透露，哈克和居内久两人翻脸的导火线，是1988年4月10日拉瓦尔品第奥杰里军火库的爆炸事件。

奥杰里军火库是巴基斯坦军火库爆炸局直接掌握的军火库，它有三个武器库房和其它物资库组成。有关这个军火库的小道消息实际上早就在巴基斯坦流传开了。消息说它是向阿富汗圣战者转运军火的场所。它库存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据说只要它的“转运工作”不停止，阿富汗游击队就不愁没有武器使用。

这个武器库中有火箭、火箭发射器、导弹、燃烧弹等。此外，木材仓库里还散乱地堆置着木头等易燃物品。虽然这是一个极重要又极

危险的仓库 ,可是这里的管理工作却相当混乱 ,保卫工作也不太严密。

1988年4月10日 ,这种粗心大意的管理果然带来了严重的恶果。这天上午10点15分 ,伴随着可怕的接连不断的爆炸声 ,滚滚浓烟和尘埃直冲云霄。

在奥杰里军火库里 ,大火从一个库房里首先烧起 ,然后迅速蔓延开去 ,甚至连地下库房都未能幸免。由于军火库里的武器弹药有硫磺等物质 ,根本不能用水喷灭火焰 ,所以军火库管理部门从一开始就慌了手脚 ,致使整个仓库成了一片火海。

当时 ,连美国专家对此都表示束手无策 ,他们甚至认为 ,在一周之内能否控制住这样的大火都把握不大。

两份调查

奥杰里军火库爆炸事件发生后 ,居内久总理下令对事故原因展开全面调查。巴基斯坦联邦交通和铁道部长阿斯拉姆·哈塔克先搞了一个偏袒军方的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采用“丧事喜办”的手法 ,说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为了支持阿富汗圣战者 ,过去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考虑到阿富汗解放战争的需要 ,巴基斯坦设立奥杰里军火库 ,向阿富汗游击队转运军火是必须的。因此 ,这次军火库失火和爆炸 ,应该被看作是巴基斯坦军方为支援阿富汗圣战者而作出的一次奉献。

显然 ,哈塔克的这份调查报告回避了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谁的过错与责任、教训是什么、今后如何防止类似事故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它只在最后轻描淡写地提到有三四十名下级军官玩忽职守 ,酿成了这次事故 ,并说将对他们依法惩处。

现在尚无法证实 ,哈塔克的这个调查报告是否和哈克总统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的这些观点和总统是基本一致的 ,因为哈克总统希望军方的这次事故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然而居内久总理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在哈塔克的报告呈交政府后不久 ,以联邦国际事务部长拉纳·纳伊姆·马哈茂德为首的另一份调查报告被送到了居内久面前。

这份报告指出,奥杰里军火库是由当时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拉赫曼将军亲自批准建立的。后来拉赫曼将军提升为三军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主席之后,这个军火库就由新的三军情报局局长领导。所以这次军火库爆炸事故的一切责任都应该由三军情报局承担。为此,这份调查报告建议政府惩处负有主要责任的前三军情报局局长拉赫曼上将和现在三军情报局局长古尔·哈米德将军。

哈克的难言之隐

在巴基斯坦,总统分管军事、外交。总理分管内政、经济,遇有重大问题,则由总统拍板。所以,要处罚拉赫曼和哈米德将军,居内久没有这个权力。于是,他就将这截然不同的两份报告都递交给了总统哈克将军。

居内久总理的这一招,含有很深的用意,它使齐亚·哈克总统处于十分窘迫的困境。因为哈克与巴基斯坦军方有极深的关系,他是在1977年7月5日实行军管,于第二年9月16日就任总统的。在他的统治中,最可靠的支持就来自于军方,特别是三军情报局。这个情报局虽然没有巴基斯坦国家情报局那么庞大,但其人员的素质比后者要高得多,情报工作也比后者搞得好。在巴基斯坦的各个历史时期,三军情报局都向齐亚·哈克总统及时提供了最好的情报。所以从主观上讲哈克不希望作出什么损坏他声誉的决定。

另外,拉赫曼上将是哈克最要好的伙伴,也是哈克在阿富汗问题上强硬态度的忠实支持者和执行者,当然他不愿意看到拉赫曼上将受到惩处。

但是齐亚·哈克也明白,无论如何,有关奥杰里军火库的事故调查报告,居内久肯定会提交给议会,并且予以公布的。这样,军方和三军情报局及有关军官的前途肯定会受到影响。而更为严重的是,哈克总统正在考虑任期满后争取连任的问题。如果巴基斯坦军方因此而受到打击的话,哈克失去的将不仅是他本人在军队中的威望和势力,而很可能是总统宝座。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齐亚·哈克总统决定采取断然的措施。所幸的是,居内久总理的一着失误,使哈克有了可乘之机。

居内久其人

居内久总理原来是巴基斯坦信德省的一个地主,曾留学英国,获农学文凭。1954年这位农科专家开始从政,从县议员开始一直当到铁道部长。

当哈克总统提名他出任巴基斯坦总理之初,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认为居内久是一个缺乏经验的政治家,似乎他必定是一个听命于哈克的驯服总理。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居内久其实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1985年3月他出任巴基斯坦总理后不久,就致力于恢复“穆斯林联盟”的活动,扩充自己的实力。

穆盟最早成立于1906年,在巴基斯坦独立后曾是第一大党,执政多年,后来分裂为三派。在军管期间所有反对党都被取缔。1985年巴基斯坦取消军管后,居内久在穆盟帕加罗派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穆斯林联盟,自任主席。目前,这个执政党已有近800万成员,而且地方政府市长或主席的80%—90%都是穆盟成员,从而使居内久的声望和势力大大加强,直接威胁到了哈克的地位。

与此同时,居内久不断利用机会打击军方势力,打击哈克总统本人,甚至要求齐亚·哈克辞去陆军参谋长职务,减少参政军人……

记者招待会

1986年5月29日下午5点半,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出访东南亚三国后坐专机回到伊斯兰堡。在机场的贵宾室里,他举行了简短的记者招待会。这个记者招待会开得毫无生气,居内久本人的精神状态好像很紧张,他只简单地回答了个别记者提出的问题之后就打道回府了。

有人事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觉得居内久飞回伊斯兰堡时机场的气氛已经不正常了。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破天荒地迟到,没能按时站到欢迎居内久的行列里,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外交上的失礼。一些站在机场迎接居内久总理的巴基斯坦将军们,似乎也缺乏应有的热情,连敬礼都有点有气无力。

另外，在居内久召开记者招待会之前，首都机场上秩序很混乱，而且记者们都被告知，哈克总统过一会儿在“军人之家”也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欢迎大家在这儿完事后前往参加。不过事实上当时在场的新闻记者们完全没有估计到哈克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有多么的重要，他们只以为总统是在第二天访问中国之前向记者们吹吹风而已。

“军人之家”客厅里的记者招待会，几乎是在机场居内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直接召开的。这里早已布置成一个小礼堂般，记者们都安坐着。老资格的新闻记者们从会场的气氛中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可能会有重大新闻发布。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哈克的文件夹是由副官拿的，而这次哈克从后门进入“军人之家”的客厅时，文件夹是由他本人拿着的。这是否意味着他手中的文件特别重要呢？

猜测很快被证实了。哈克总统在简短寒暄之后说：“我要告诉你们一条特大新闻。”接着，他用英文宣读了一份命令，然后向每一位在场的新闻记者分发了这份命令的复印件，最后还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哈克总统命令的大意是，根据巴基斯坦宪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他决定解散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和以居内久为首的内阁政府，命令立即生效。当天晚上，他还突然取消了招待来访的美国克里斯特上将的宴会，同时也推迟了原定于第二天对中国的友好访问。

这些消息公布后，使巴基斯坦国内久深感震惊。

艾兹哈尔·苏凯里是巴基斯坦著名的新闻记者，和哈克及居内久都有广泛的接触。据他后来透露，在总统遇难前，他曾经亲口问过哈克总统，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采取这一断然措施的？哈克告诉他，大约是在正式宣布命令之前的三个星期，总统已基本决定要这么做了。这说明，哈克面对有关奥杰里军火库爆炸事故的调查报告，以及居内久的进攻，似乎已到了无可退缩的地步，于是乘居内久出国访问之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还错一步

哈克在国际上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精明强干，老谋深算，清廉自守，以及治理和处理纷繁复杂的巴基斯坦国内事务所取得的成

功,使他声望颇高。在国际上由于他奉行独立自主又灵活的和平外交,所以巴基斯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可是,他在巴基斯坦实行了长达8年的军法管制和独裁统治,也使他遭到了国内外一些人的反对。1985年当他宣布结束军管,请出居内久组成文官政府后,人们对巴基斯坦的民主化进程有了希望,哈克本人的形象也有所改变。可是现在他又突然宣布解散议会和居内久政府,从而使他又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境地。

6月3日,被解职的前总理居内久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指责哈克总统解散国民议会是独断专行的行为。破坏了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损害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6月17日,巴基斯坦有14个反对党在拉合尔举行了两天的会议,一致要求齐亚·哈克总统下台。无论是穆斯林联盟,还是人民党,或是其他反对党,一致反对军事独裁。

有消息说,哈克总统6月29日的行动是万般无奈而出的下策。面对国内一片反对声,他明白自己错了。在国际上,要求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统治已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汹涌大潮。然而在这种气候下,他宣布解散议会和政府,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给人一种他要恢复独裁的印象。他的这一行动太失人心了,也错得太可怕了。但是,已经错迈了这一步的哈克总统,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只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设法寻求最好的结果。但是在他内心深处,那些日子的压力是相当沉重的。据他身边的人透露,自从5月29日之后,他的脾气明显变坏,生硬、急躁,记性不好,甚至在开会讲话时会突然忘记了刚才讲过的是什么。这和以前一贯思路敏捷、说话幽默、办事果敢的哈克判若两人。

为了恢复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确保对巴基斯坦的统治,并体现自己将一如既往地推进民主化进程,完全无意恢复独裁统治,哈克不得不使出最后一件法宝,在巴基斯坦举行全国大选。

哈克的设想是这样的:当他在政党的基础上进行大选的设想得到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认可之后,就实行4个月的军管,然后再修改宪法,设立总统制,继而再恢复宪法法令让新议会予以认可,从而确保自己对巴基斯坦的统治。

哈克是这么筹划的 ,也是这么行动的 ,他开始启用一些“沙场老将” ,并在一些政党之间频繁活动.....可是他没有等到 11 月 18 日大选的那一天。1988 年 8 月 17 日的空难使他失去了最终实现他的心愿和梦想的机会。

三总统被暗杀之谜

黎巴嫩 ,位于地中海沿岸 ,面积 1 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 300 万。在过去的 10 来年中 ,先后有三位总统、总理死于非命 ,他们是 :

1982 年 9 月 14 日 ,即将宣誓就职的黎巴嫩当选总统巴希尔·杰马耶勒在开会时被炸身亡。

1987 年 6 月 1 日 ,黎巴嫩总理拉希德·卡拉米乘军用直升机由家乡特里波利返回首都贝鲁特时 ,被座椅下的炸弹炸死。

1989 年 11 月 22 日 ,上任仅 17 天的总统勒内·穆阿瓦德在独立纪念日招待会结束后 ,乘车回家途中被炸身亡。

在阿拉伯世界中 ,黎巴嫩的国情独特 ,是惟一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组成的国家。在两大宗教内部又分为若干个小教派。基督教分为 :天主教马龙派、希腊东正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亚美尼亚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派等。伊斯兰教则分为 :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各教派一般都有其传统的居住地区 ,设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和武装组织 ,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可称之为“国中之国”。天主教马龙派主要集中在黎巴嫩的北部地区。伊斯兰教什叶派主要居住在南部地区 ,逊尼派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 ,德鲁兹派主要在中、南部山区。首都贝鲁特 ,东区是基督教的势力范围 ,西区则是伊斯兰教居民区。

1975 年 ,黎巴嫩爆发了全面内战。1978 年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了野蛮入侵 ,从此黎巴嫩战火不绝。贝鲁特到处是连片的废墟 ,弹痕累累的断壁、坑坑洼洼的道路以及横七竖八的沙垒。不是东区基督

教徒在为死去的亲人哭泣,就是西区穆斯林在含泪掩埋兄弟的尸体。更令人恐怖和不安的是,首都贝鲁特的爆炸、暗杀和绑架事件层出不穷。直至1991年海湾战争后,在联合国的不懈努力下,中东和谈给黎巴嫩人民带来了和平的曙光。但黎巴嫩人民不会忘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为了和平,先后奉献出自己生命和热血的两位总统和一位总理。

一、贝希尔·杰马耶勒总统之死

贝希尔·杰马耶勒是黎巴嫩天主教派政党长枪党创建人和主席皮埃尔·杰马耶勒的次子,他1947年11月10日生于贝鲁特,贝希尔曾就读于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1972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后去美国卫理公会南部大学留学,当过律师。他从13岁起就开始同长枪党人一起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1976年,长枪党前武装部队司令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贝希尔便接替了司令的职务,时年仅29岁。贝希尔酷爱古典音乐,读起小说来更是废寝忘食。他能说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

35分钟的选举

1982年9月23日,是黎巴嫩第六位总统萨尔基斯6年任期届满的日子。按照黎巴嫩宪法规定,总统竞选应提前两个月,即在7月23日就开始。当时由于以色列的入侵,加上部分议员不在国内,总统选举面临困难。面对着这战火纷飞、满目创伤的国家,萨尔基斯心灰意冷,一再表示拒绝延长总统任期。为了避免国家政治生活中总统职位的空缺状态,议会议长阿萨德与议会各个集团的代表进行磋商,于8月19日宣布将原定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推迟到8月23日。黎巴嫩议会办事机构在一项声明中说,推迟选举的原因是议会大厦周围的安全措施未能完成,以色列军队还没有完全撤出他们在议会大厦周围的阵地。声明说,举行选举的地点改为贝鲁特东郊的法雅迪那军事学院。同一天,基督教的黎巴嫩阵线正式推荐34岁的贝希尔·杰马耶勒为总统候选人。

8月23日,黎巴嫩总统选举在法雅迪那军事学院举行。这次选举是在以色列侵占黎巴嫩半壁河山,贝鲁特仍处于以军严密包围之中和巴勒斯坦游击队正从贝鲁特转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下举行的。为了保证前来参加投票的议员们安全,当局采取了必要的保卫措施。在贝鲁特东、西区交界处,集结了重兵。通往法雅迪那军事学院的所有道路被封锁,沿途设有黎巴嫩政府军和宪兵的重重岗哨。大道旁边还停放着重型坦克,总统选举所在地附近的建筑物上,都有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守。采访选举的当地和外国记者,发给了特别采访证。为了防止意外,有的外国记者在衣服上印着醒目的大字:“新闻记者,不要开枪。”

首批议员于上午10时30分到达会场,但在预定开会的时间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仅到了53位议员,比三分之二的多数66人还少13人。这时,贝希尔·杰马耶勒的哥哥阿明·杰马耶勒只好离开会场去拉议员。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一批议员才姗姗来迟。因为根据宪法规定,出席会议的议员人数少于66人,选举就得推迟。黎巴嫩议会议长阿萨德还邀请了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议会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了这次选举。

下午1时30分,议长阿萨德敲响了木槌,宣布会议开始。议会秘书长宣读了宪法有关总统选举的条文。按照规定,在第一轮投票中需得到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选票才能当选。如未达到,要举行第二轮选举,这时只要得到简单多数选票,就可当选。接着,便开始了第一轮投票。议员们按照次序,一个个走向主席台前投票,然后当众开票。贝希尔·杰马耶勒获得47票。由于不足法定票数,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轮投票,结果贝希尔得到57票。议长立即宣布,贝希尔当选总统,并向他表示祝贺。这时,会场外庆祝的枪声此起彼伏,使议长无法继续讲话,只好猛敲木槌,要求宪兵立即阻止放枪。未等宪兵跑出开会大厅,议长已宣布散会,整个选举过程仅用了35分钟。

杀一个没上任的总统

饱尝长期战乱之苦的300万黎巴嫩人民渴望和平的生活,期待着新当选的总统实现全国和解。许多黎巴嫩人认为,尽管有30名议

员抵制了这次选举，但年轻而又精明能干的贝希尔·杰马耶勒不仅是最强有力的铁腕人物，而且得到广大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拥护，他们相信贝希尔能为黎巴嫩带来和平、稳定和繁荣。

按照计划，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将于9月23日宣誓就职。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他比平时更为忙碌。为了应付和处理各种棘手的内政和外交问题，他需要加紧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频繁出席和主持各种会议。1982年9月14日下午，贝希尔来到贝鲁特东区长枪党总部开会，下午4时10分左右，一枚放置在总部大楼底层200公斤重的炸弹突然爆炸，随着一声轰然巨响，弥漫的硝烟直冲云天，整座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被埋在废墟瓦砾之中。

贝希尔的哥哥阿明·杰马耶勒在他的回忆录中形容那是“令人心碎的一幕”。

他写道：“那天下午4时15分整，我收到一个紧急通知后，立即中断政治会议，跳上汽车，但我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广播员声音颤抖，最后我终于听到了我害怕听到的消息：贝希尔的政治总部被炸了。我急忙赶到弟弟家里，接走弟媳，一起前往出事地点。楼房已经倒塌，人们正乱哄哄地忙着抢救，气氛悲惨、惶恐，在这一片混乱中，无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传出的消息又全都相互矛盾。但所有在场的人在一点上都是一致的：看见一个浑身尘土的男人从倒塌的楼房中跑出来，歇斯底里地呼喊着‘贝希尔！贝希尔！’随后立即不见了。当时的时间是4时20分。每个人都以为这个人是我弟弟。他受伤了，呼叫自己的名字，为了让人认出他，救护他。稍后，我们找到了这个人。他长得的确与我弟弟相似。他告诉我们，他呼喊贝希尔的名字，是为了表达对当选总统的性命担忧。这时，我们心里不停地为贝希尔祈祷，希望能见到活着的贝希尔。我们不仅与所有的医院和红十字会中心联系，甚至连贝希尔偶尔去的地方都询问了，但仍毫无结果。夜幕降临，我们仍然没有得到贝希尔下落的确切消息。夜里10时，我前往总统府，那里黎巴嫩情报机关对当选总统的命运一无所知，坐在对面的萨尔基斯总统明显地露出 不安，可能他是预料到贝希尔已死的第一个人。无奈中我又惊慌失措地回到出事地点，其惨状目不忍睹。在茫茫黑夜中，吊车在灯光照

耀下 ,吊起堵塞住门窗的砖头和水泥块 ,里面的幸存者的呻吟声此起彼伏。直到午夜 ,才极为艰难地将这幢楼的一层清理出来 ,我们找到了一些被压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连辨认身体的痕迹都不复存在。但有两个标记使我们确认贝希尔就在遇难者之中 ,一是他所处的位置与众不同 ,二是在他的衬衫口袋里发现了他在会议开始之前收到的一张便条。于是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贝希尔确已被害。”

爆炸事件发生后 ,通过现场清理 ,发现炸死 20 人 ,炸伤 44 余人。当天深夜 ,黎巴嫩总理瓦赞在他的住处宣布了贝希尔遇难的消息。瓦赞说 :“惊悉这一噩耗 ,我感到深切的悲痛。”他以最悲痛的心情谴责夺去了贝希尔生命的这次暗杀事件。他说 ,这一罪恶行径发生在黎巴嫩开始恢复正常和开始走上和平道路的时刻 ,是不能让人容忍的。

第二天凌晨 ,总统萨尔基斯发表声明 ,呼吁全国人民对破坏黎巴嫩统一、主权和独立的阴谋保持警惕。他下令为贝希尔举行一周的全国哀悼活动 ,并邀请全国各派领导人参加在贝希尔家乡比克费亚举行的葬礼。

在整个葬礼过程中 ,有两架以色列喷气式飞机在上空盘旋。在葬礼开始前 ,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在一群防范森严的保镖陪同下 ,出人意外地来到贝希尔家乡 ,向贝希尔遗体致以最后的敬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哀悼。有人说这是哀痛气氛中惟一使人感到不是味道的“插曲”。

大惨剧的发生

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事件在以色列引起的直接反应 ,是贝京当局以此为借口进兵贝鲁特。这正是以色列侵略者梦寐以求的 ,因为他们正在寻找机会屠杀居住在贝鲁特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

早在 3 个月以前 ,以色列内阁就决定 ,要假手黎巴嫩右翼民兵中的极端分子来屠杀巴勒斯坦平民 ,其托词是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8 月撤出贝鲁特后 ,还留下大约 2000 人的游击队战士。为了帮助黎巴嫩“肃清恐怖主义分子” ,“恢复和维持贝鲁特的秩序” 。以色列军队要“搜捕残存的巴勒斯坦游击队”。

年轻的黎巴嫩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死后，贝京当局认为正是实现他们这一血腥计划的良机。

9月15日凌晨2时，以色列军队在“避免局势的严重发展”、“维持治安和秩序”名义下，兵分3路悍然开进西贝鲁特，将位于西贝鲁特的夏蒂拉、萨布拉和比尔哈桑3个居住着15万巴勒斯坦难民的难民营团团包围，封锁了所有可以逃跑的通道。此时，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平民正在酣睡。这些善良的人们万万没有料到，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已揭开了序幕，正在悄悄地向他们扑来。

9月15日下午，黎巴嫩右翼极端分子开始了军事运输，一辆辆卡车由东贝鲁特向贝鲁特西端的国际机场驶去。在同一时间里，由基督教长枪党分裂出来的另一个派系，同以色列结盟的萨阿德·哈达德少校的民兵沿着以色列控制的道路也向机场进发。机场内设立了指挥部，一位以色列联络官担任了指挥部的副职。16日清晨，以色列炮火开始向难民营中那些简陋的棚舍轰击。以色列大部分军队部署在夏蒂拉难民营的西边。他们沿夏蒙大街配备了12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

下午6时左右，以色列军队按照国防部长沙龙预先下达的指令，将早已集结待命的长枪党右翼民兵队伍放入夏蒂拉和萨市拉难民营。这样，四十年代纳粹法西斯分子演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惨案”又在贝鲁特发生了。

当夜幕降临后，那些面带黑罩，身着伪装，在以色列军队的指引和配合下闯进难民营的歹徒，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了屠杀。他们沿着大街小巷，逐户搜索，见到男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反绑起来，押送到附近的体育场，然后用乱枪打死。

经过整整40个小时的血腥屠杀，在两个难民营的废墟上，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为了掩人耳目，以色列军队18日上午又出动20台大型推土机，推倒残垣断壁，盖住尸体。当一些新闻记者赶到现场时，除了一堆堆盖不住的尸体外，碎石瓦砾之中还露出许多被害者的胳膊和腿。这场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确切统计，有的说1000多人，还有的说达几千人。

贝鲁特大屠杀的消息一传出，许多国家首脑相继发表声明，痛斥

贝京、沙龙的法西斯暴行,有的还要求把他们送交国际特别法庭审判。在以色列国内,正直的人们纷纷涌上街头,要求贝京、沙龙下台。但是,贝京政府的头目们却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百般抵赖狡辩。然而,一些有良知的新闻记者和大屠杀的幸存者,以其亲闻目睹的事实揭露了真相。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贝京被迫同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在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面前,10月25日,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不得不承认,是他在9月15日视察贝鲁特附近的以色列前线指挥部后,亲自批准黎巴嫩右翼民兵进入难民营,从而造成大屠杀惨案的。

贝希尔·杰马耶勒遭暗杀后,黎巴嫩重新选举总统。9月16日,长枪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名贝希尔的哥哥,阿明·杰马耶勒为总统候选人。9月21日,阿明·杰马耶勒在议会投票的第一轮选举中获得77票,成为黎巴嫩第八位总统。

二、拉希德·卡拉米总理被害记实

1987年6月1日,对于全世界儿童来说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可是对黎巴嫩的儿童以及他们的父母而言,则是一个灾难的日子。上午9时30分,黎巴嫩总理拉希德·卡拉米结束了他在比卡萨夫林的寓所的为期十天的休假,乘坐一架法国制造的“美洲狮”军用直升机,从他的家乡——黎巴嫩北部城市特里波利飞返贝鲁特西区的总理府。直升飞机起飞后仅10分钟,放置在卡拉米座位下的一枚炸弹突然爆炸,顿时将卡拉米抛出座位。他的背部、颈部、肋部和臀部多处受伤。直升机当即起火,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在此紧急关头,驾驶员在被炸伤一只眼眼的情况下,忍着巨痛,全力握紧操纵杆,成功地将燃烧着的直升机紧急降落在离贝鲁特以北32公里处的哈拉特军用机场。卡拉米等人立即被送往比布鲁斯医院抢救。但卡拉米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在手术台上,终年66岁。

十任总理

卡拉米是穆斯林逊尼派的老资格政治家。1921年12月3日出生于特里波利郊村落。特里波利是黎巴嫩第二天港口城市,位于北部地中海阿里河口,距首都贝鲁特82公里。卡拉米的父亲亚达·卡拉米是当地逊尼派的领袖,黎巴嫩独立的创造者之一,1945年曾出任黎巴嫩总理。

卡拉米曾就读于当地的一所罗马天主教小学和法国在黎巴嫩开办的一所学院。1947年,卡拉米在开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从事律师业务,颇具声望。1951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数月后被任命为司法部长。1955年,风华正茂的卡拉米首次登上总理座位,年仅34岁,成为黎巴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由于他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立场,同当时亲西方的总统夏蒙政见不合,半年后就挂冠不干了。

卡拉米经历了黎巴嫩政局32年的风风雨雨。他时而上台,时而下野,先后10次出任总理。1984年4月,阿明·杰马耶勒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任命卡拉米组阁,这是他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出任黎巴嫩民族联合政府总理。

按照黎巴嫩宪法规定,总统必须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担任,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卡拉米头脑冷静,而拙于言辞。他作为逊尼派的总理能先后同数名马龙派总统共事,足见为人精明能干。

1987年2月22日,应卡拉米的邀请,叙利亚部队7000人陆续开进贝鲁特西区,以“制止穆斯林内部爆发的激烈武装冲突”。对此,基督教方面表示强烈反对。此后,贝鲁特爆炸和枪战逐日升级。

持续不停的内乱,给黎巴嫩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1986年下半年,黎巴嫩镑一跌再跌,到1986年底已贬值了两倍半。各种生活必需品,诸如鸡、鸡蛋、沙丁鱼和纸张等价格飞涨。由于物价失控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出现了抢购风潮。汽油、面包、大米、食糖、饮料和牛奶等商品经常紧缺。首都贝鲁特曾被誉为“东方的小巴黎”,金融和旅游业相当发达,曾是黎巴嫩的两大经济支柱。但到了1987年,这两个行业已濒于破产,许多外国银行关门他迁,外国游客视贝鲁特为畏途。各种因素的恶性循环,已使黎巴嫩经济陷于崩溃的境

地。

经济形势的恶化,又反过来加剧黎巴嫩两大教派的矛盾和冲突。基督教派不断向卡拉米总理发难,认为经济危机是卡拉米联合穆斯林部长抵制总统领导,停开内阁会议和不履行政府职责的结果。国内基督教派一再要求卡拉米辞职,并打算筹建新内阁以解决经济问题。卡拉米总理和其他穆斯林部长们则坚持,只有先就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一致意见,实现全国和解,才能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穆斯林派别还指控基督教派非法控制港口,擅自征税和侵吞国家财产,致使国家经济每况愈下。两大教派的争斗,已使国家机器无法运转。

由于卡拉米和杰马耶勒之间长期存在着政见分歧,最后发展到视若陌路、互不搭理的程度。1987年5月4日,卡拉米以其半穆斯林半基督教的内阁不能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为由,愤然向全国口头宣布辞职,但杰马耶勒对此一直未予明确表态。

卡拉米总理宣布辞职受到基督教派的欢迎,叙利亚和黎巴嫩穆斯林一些人士则竭力劝说卡拉米收回声明。但卡拉米仍重申他辞职是“最后决定”,“决不收回”。然而,就在他即将离开政治舞台时,竟会出现如此悲惨的结局。

卡拉米成为黎巴嫩独立后第六位被暗杀的政治领袖。终身未婚的卡拉米,在黎巴嫩政治漩涡中搏击了30多年,最终成为黎巴嫩10多年动乱的又一个牺牲品。

“谁是真正凶手”

是谁杀害了卡拉米?在这个被残酷血腥的内战折磨了12年之久,又受以色列野蛮入侵的国家,要找到这个答案可谓如登天之难。

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黎巴嫩空军司令法希姆·哈吉准将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宣布这架直升机曾在特里波利东南10公里的扎塔尔镇停留过,让内政部长阿卜杜拉·拉西上机,然后在特利波利市郊降落,接走卡拉米。在两次停留期间,运送行李工人曾在直升机上放置行李。哈吉说,但未对这些行李进行检查,因为在过去和类似的情况下,都未进行过检查。

哈吉准将说,这架运送卡拉米的直升机在起飞前15分钟才被选

中 ,又过 5 分钟才指定正副驾驶员。而且 ,机上作过彻底检查。

6 月 1 日下午 ,一位自称“‘秘密黎巴嫩军’队长哈茂德”的人打电话给贝鲁特一家国际通讯社说 :“今天上午 ,爆炸卡拉米总理乘坐的直升机一事是我们干的 ,而且我们宣布 ,从今天起 ,我们决不饶恕背叛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任何领导人。”6 月 2 日在法国巴黎 ,一个自称“伊斯兰复仇组织”的代表声称 ,炸毁卡拉米乘坐的直升机是该组织干的。

同一天 ,黎巴嫩陆军司令否认了当地报纸的报道。因为有报道说 ,军事专家的初步调查已确认 ,一枚近 3 公斤重的炸弹就安放在卡拉米的座位后面。但该司令部的一位发言人说 :那是一枚 300 克的炸弹。如果一枚 3 公斤重的炸弹 ,就会炸毁整架直升机 ,炸死机上所有的人。

他说 ,炸弹放在一只公文包里 ,卡拉米把公文包放在他的膝上。炸弹爆炸时炸穿了他的腹部和胸部 ,他“当场死亡”。但是他说 ,军事专家仍在调查炸弹是如何安放在直升机上的。

一位接近调查工作的军官说 ,1 日上午 ,直升机从特里波利的库比赫军事基地靠近比卡萨夫林起飞 10 分钟后 ,炸弹爆炸了。

陆军司令部的另一位军官说 ,这是一次“使用定时炸弹 ,也可能是压发炸弹进行的有预谋的暗杀”。

爆炸之后检查卡拉米伤势的验尸官约瑟夫·索托则说 ,受伤部位大多在卡拉米背部 ,“这说明炸弹是放在总理座椅的后面”。炸弹爆炸时坐在卡拉米附近的内政部长阿卜杜拉·拉西对军方所说的炸弹放在卡拉米公文包内的说法也表示怀疑。拉西只受了点轻伤。

拉西在北部城市兹加尔答的家中对记者说 :“在直升机飞抵黎巴嫩北部接我们上机之前就已有炸弹放在直升机里了。不是在北部才放进去的。”

拉西是信仰东正教的基督教徒 ,是叙利亚的亲密盟友。

拉西说 :“炸弹是随这架直升机而来的 ,而这架直升机是从黎巴嫩军队管辖的一个空军基地飞来的。”这架直升机是从贝鲁特以北的基督教中心地带的阿德马军事基地派到特里波利的。

当记者问到谁可能是这次暗杀的幕后操纵者时 ,拉西说 :“以色

列是惟一的受益者,这罪行旨在破坏黎巴嫩的团结和为统一祖国做出的努力。”

另一方面,黎巴嫩左翼报纸和德鲁兹派军事领导人瓦利德·琼卜拉特指责黎巴嫩军队基督教民兵策划了这次暗杀。

接近什叶派主流派阿迈勒民兵的《真相报》谴责黎巴嫩军队司令萨米尔·盖亚盖亚是“战争罪犯,应该送上法庭,对他的罪行进行审判”。该报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高级内阁部长”的话说,黎巴嫩军队利用一些基督教军官的忠诚控制着黎巴嫩空军。该报还称,一星期前迫降在以色列北部的一架黎巴嫩空军侦察机的两位驾驶员同以色列情报机关协调了暗杀卡拉米的安排。

6月2日,正当黎巴嫩全国沉浸于悲痛之中时,侦破卡拉米遇难的行动就开始了。由于凶手作案老练,在卡拉米座机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侦破人员对发现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予以高度重视,并追究根源。6月18日杰马耶勒还签署了一项公告,宣布对有关暗杀总理卡拉米事件提供情况和线索的人员奖赏1500黎镑(约合14.3万美元)。7月底,首都贝鲁将终于传出了“佳音”,说凶手是黎巴嫩空军基地的一位25岁的现役飞行师,名叫埃利亚·萨利比。

消息传出后,贝鲁特燃起一片愤怒之火。特别是卡拉米故乡的人民更是群情激愤。要求政府立即逮捕凶手萨利比,将其处以极刑。可是萨利比已于卡拉米遇害的第五天离开了黎巴嫩,到了瑞典,并向驻在国政府提出了政治避难的要求。当时,他正住在距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西南200公里处的穆塔拉市郊外的一个难民营中。

黎巴嫩政府迅速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瑞典政府发出了通缉令。于是,8月1日凌晨2时,萨利比在异地他乡锒铛入狱。在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初审中,萨利比只承认自己背叛祖国是由于厌恶旷日持久的内战,而拒不承认自己是谋杀卡拉米的凶手。萨利比在法庭上多次含泪叫冤,而且几度发誓,如果警方查出确凿证据,自己愿受极刑惩治。萨利比的律师阿思·利尔杰罗斯也极力为其辩护。

8月20日上午,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准备再次开庭审问萨利比,以便确定是否继续关押这位异国“罪犯”时,忽然收到瑞典外交部打来的电话,法院在稍为推迟后重新开庭审理。面对威严的法官,萨

利比鸣冤不止，供词与首次审问时只字不差。利尔杰罗斯律师亦向法官提出了许多疑问，为萨利比进行辩护。50 分钟后，就在审问无法进行下去时，首席检察官斯蒂格·贾思森读了黎巴嫩当局刚刚发来的电文：“黎巴嫩司法部不再怀疑埃利亚·萨利比参与暗杀卡拉米一案。”

电文一念完，在绝望中的萨利比惊呆了，接着破涕为笑，从被告席上一下子扑入利尔杰罗斯的怀中，兴奋地高呼：“我是无罪的！我是无罪的！”

萨利比被释放了，可是黎巴嫩人民心中的疑团尚未解开。究竟是谁杀害了卡拉米？相信这一历史疑团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大白于天下。

三、勒内·穆阿瓦德总统殉难日

1989 年 11 月 22 日，是黎巴嫩独立 46 周年的纪念日。对于饱经内战创伤的黎巴嫩人民来说，节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愉快。下午 1 时 45 分，在西贝鲁特的临时总统府附近，随着一颗重磅炸弹的轰然巨响，新上任仅仅 17 天的总统、64 岁的勒内·穆阿瓦德不幸身亡。演出了自 1982 年贝希尔·杰马耶勒总统被炸以来的又一起总统被炸身亡的悲剧。消息传出，整个黎巴嫩和国际社会无不为之震惊。

发生在独立日的悲剧

1989 年 11 月 22 日上午，穆阿瓦德在临时总统府举行了纪念黎巴嫩独立 46 周年的招待会。他在那里接见了一批外国使团的代表和大使。下午 1 时许，纪念招待会结束，穆阿瓦德在叙利亚军队及黎巴嫩保安人员的武装护卫下离开临时总统府返回官邸。1 时 45 分，当由 6 辆武装吉普车护卫的总统车队沿着布斯特罗大街驶至离总统府 500 米处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大爆炸发生了！总统车队前面的几辆吉普连人带车被炸得七零八落，血肉横飞。强大的冲击波将附近一所中学的楼房冲塌，方圆 500 米的玻璃窗被震碎。

警车、军车和救护车在人们一片惊恐惨叫声中呼啸而至飞速赶到现场。控制西贝鲁特的叙利亚士兵和穆斯林民兵不停地向空中鸣枪示警，不知所措的居民冲出楼房，西贝鲁特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

坐在总统车队后面几辆车上的总理萨利姆·胡斯和议长侯赛因·侯赛尼幸免于难，也未受伤。但救护人员在现场既没有看到总统，也未见到他的蓝色防弹车。经过仔细搜索，才在离爆炸地点大约 30 米远的一个停车场上找到了穆阿瓦德总统的蓝色防弹奔驰轿车的残骸，车内的穆阿瓦德已被炸得模糊不清了，保安人员最后不得不请来总统夫人一起辨认，终于从衣服口袋里的一块糖证实了穆阿瓦德的尸体。这块糖是总统夫人在穆阿瓦德当天离家参加独立纪念日活动前送给他的。据现场目击者说，穆阿瓦德的尸体已经没有头和胳膊了。一幅多么惨不忍睹的情景啊！

事情发生后，虽然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公开声明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但据警方调查，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暗杀事件。炸弹安放在路旁一家久未开门营业的小蔬菜店内，共有 250 公斤梯恩梯烈性炸药，是由遥控装置引爆的。除了穆阿瓦德总统遇难之外，另有 23 人被炸死，其中包括 10 名警卫，有 36 人受伤。这是黎巴嫩自 1975 年内战以来第四次重大谋杀事件。1977 年，德鲁兹民兵首领琼卜拉特被枪杀，1982 年，当选总统杰马耶勒被炸和 1987 年卡拉米总理被炸身亡。

在遇害的当天，穆阿瓦德总统在贝鲁特西区举行的独立庆典上，感慨万千地追抚国家多年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悲惨命运。面对内忧外患、教派对立的现状，他向国民发表了上任后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演讲：“尽管有人反对，但和平已经到来。我将致力拯救黎巴嫩，不管任何后果和牺牲。”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这位斗志昂扬的黎巴嫩新总统便连同他的巨大信心和希望被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吞没了。

穆阿瓦德不幸遇难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把黎巴嫩群众又一次推入了痛惜与悲伤之中。喧闹的大街上顿时车少人稀。电台中断了正常的节目一首又一首地播放古典音乐，一遍又一遍地重播新总统

临终前的演讲.....

下午早些时候 ,黎巴嫩总理胡斯在电台用颤抖的声音向全国人民发表吊唁穆阿瓦德总统的文告。胡斯总理说 :“这是一次国难。勒内·穆阿瓦德总统被叛国者杀害了。罪犯可以杀死一个伟大的生命 ,但摧毁不了一个民族的信念。黎巴嫩和解的意志永存。”

刺穿瑞典深夜的枪声

瑞典十二年的悬案

据新华社安卡拉 1998 年 4 月 29 日电 ,据土耳其媒体 29 日报道 ,被土耳其安全部门俘获的库尔德工人党主要领导成员萨基克日前交代说 ,12 年前轰动世界的瑞典前首相帕尔梅遇刺事件系库尔德工人党所为。

报道说 ,土耳其外交部已于 28 日晚些时候将萨基克的口供提交给了瑞典驻土使馆。

据萨基克交待 ,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厄贾兰 80 年代中期曾在瑞典滞留。当时瑞典政府虽然给厄贾兰以政治庇护 ,但仍将库尔德工人党视为“恐怖组织”。后来 ,厄贾兰一名下属在奉命杀死该组织另一名领导人后被瑞典法院判刑。厄贾兰遂下令刺杀帕尔梅 ,作为对瑞典和其他持相同观点的欧洲国家的一种警告。

帕尔梅在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间曾两度出任瑞典首相 ,是当时欧洲政坛威望较高的政治家 ,1986 年 4 月在斯德哥尔摩遇刺身亡。瑞典警方多年来一直在调查这起案件 ,但未能发现重大线索。

“谁也不知道窗外会有什么危险”

1986年2月28日,星期五,北欧的瑞典春天姗姗来迟,斯德哥尔摩郊外依然是冰冻雪封,国外的旅游者纷纷来到这个冰雪之国滑雪溜冰。瑞典面积不大,人口稀少,街道整洁。

瑞典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星期五是周末。帕尔梅每日的生活极有规律。早晨,他前往皇家网球馆,同他的20多年的老网球友——瑞黄投资银行行长哈里·沙因打网球。

8时55分,他像往常一样准时进入办公室。他坐下来,看了看办公桌上的日程记事簿,发现下个星期一之前,没有大的外事活动,于是便让警卫人员和助手们回家度周末去了,接着开始批阅国内的各种公文。

帕尔梅批阅了一个又一个文件,其中有一份是即将与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希腊和坦桑尼亚联合发表的六国声明。这项声明呼吁美国 and 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举行下次首脑会谈之前,暂时停止进行地下核实验。

尔后,他在办公室里接见了当地一家工会报纸的记者英格瓦和约格贝尔格,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帕尔梅显得非常轻松,兴致很高,在谈到世界形势时,他满怀信心地对约格贝尔格说:“今年是实现和平大有可能的一年。”

这位记者为坐在窗前的帕尔梅拍照时,半开玩笑地说:“坐在窗前不危险吗?”帕尔梅望了望窗外,满不在乎地答道:“谁也不知道窗外会有什么危险。”

帕尔梅一家早在20多年前就在波罗的海的费罗群岛租了一幢别墅,他经常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前往那里休假和度周末。但是这一天,帕尔梅决定同妻子一起去看电影。

晚上8时40分,帕尔梅夫妇乘地铁前往格兰德电影院。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为帕尔梅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项活动。

深夜的枪声

1986年2月28日夜,这是和往常一样和平、宁静的夜晚,大街

上行人稀少、灯火如昼,小巷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点与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没有什么区别。格兰德电影院中正放映新影片《莫扎特兄弟》,影片中优美的音乐、动人的情节,将人们带入了电影故事的世界,使人忘掉了一周工作的劳累,忘掉了心中的烦恼,更无暇去想将会发生什么事。11时许,电影院散场,年轻的情侣们亲昵地搂抱、搀扶着走向自己的汽车,距家近者则一边走一边窃窃私语。

帕尔梅首相和夫人随其他观众一起走出电影院。他们边走边与瑞典白领工会的领导人罗森格林夫妇交谈,不一会儿,罗森格林夫妇与帕尔梅夫妇握手道别乘车走了。跟随帕尔梅夫妇的次子马尔腾和他的女友同父母互道晚安后也走了。帕尔梅夫妇按习惯的做法,没有带保镖,没有乘车,漫步沿着大街朝家走去。他们经过几个街区,偶有行人迎面而来。擦肩而过。在他们刚刚踏上斯德哥尔摩中心区斯韦亚瓦根大街时,突然从暗处闪出一个人影,在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连开了两枪。帕尔梅和夫人莉斯贝特当即倒地,凶手消失在夜幕中。此时已近午夜,时针指向11时30分。

驾车从这里经过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听到枪声立即停车,司机代尔斯博恩发现帕尔梅倒在积雪覆盖的大道上,鲜血染红了大片的雪。他立即通过车上的报话器向警方报了案,并向医院要了救护车。另外一辆过路车上两名17岁的女孩听到枪声,也跳下车来,她们看到遇害者呼吸微弱,就施行心脏按摩。三四分钟后,警车和救护车相继赶到。帕尔梅夫妇被送进附近的茨巴茨贝里医院。帕尔梅的胸部和下腹部中弹,莉斯贝特的背部被子弹擦伤。

半个小时后,帕尔梅因一颗直径9毫米的子弹打断了心脏边上的一根主动脉,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而停止了呼吸,终年59岁。第二天一大早,瑞典的新闻媒体报道了帕尔梅遇难的消息,人们惊呆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在瑞典这样平静、安宁的社会里,国家的首相会遭此厄运。帕尔梅首相的遇难,顿时使瑞典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首相府门前,人们自发地排成长队,来表达深切的哀思。在帕尔梅遇害现场,川流不息的群众献上一束束鲜花,有的献上一盏长命灯,有的则全家围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

艰难的调查

斯德哥尔摩警察局接到帕尔梅被暗杀的报警电话后,迅速派人赶到现场。警察们发现首相被枪击中,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他们在把帕尔梅夫妇送往医院的同时,立即封锁了出事现场,向瑞典警察总部作了报告。

斯德哥尔摩的警察立即分头行动起来,他们封锁了出事现场周围的一些街区,控制了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严格检查过往的旅客。正在外地度假的斯德哥尔摩警察局长汉斯·霍尔默在四小时之内赶回首都,连夜分析案情。

经过严密的侦察分析,警察们认为刺客很可能是一名“老练的职业杀手”。整个作案过程只用了几秒钟,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惟一的实物罪证是两颗直径9毫米的穿甲子弹。警方在瑞典的武器库中还没发现这一型号的子弹,只得把子弹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联邦德国的侦察机构进行鉴定。

据首相夫人回忆,当她听到第一声枪响时,还以为是小孩放爆竹,当她回过头来看时,第二声枪声响了。她在惊慌中来不及看清刺客的面孔。

第一个目击者是出租车司机代尔斯博恩,他提供的情况是,枪响后他曾看到开枪者跑向停在几百米外的一辆大众牌“帕萨特”型蓝色小轿车,车上似乎还坐着一个人。凶手上车后,车子立即开走了。他看到了车牌号,但没有记全。

较早到达现场的两名17岁的女孩说,她们看到的凶手身高1.80米左右,大约30多岁,身穿一件深色的长大衣,头戴一顶带帽檐的帽子。但她们只是看到侧面,没有看到面容。

一位22岁的女画家作证说,出事时她正沿着内加尔但胡同朝斯韦亚瓦根大街方向走去,同一个迎面跑来的男子相遇。女画家还根据回忆画了一张模拟像。

瑞典警方和联邦德国的两名专家对这幅画像进行修改和鉴定后,于3月6日公布于众。从画面上看,嫌疑犯的面部特征是:脸为长型,黑头发、高鼻子、黑眼珠、深眼窝,年龄约在32~33岁之间,其

长相像是中东人或拉丁美洲人。

瑞典警方从全国调集了 300 名警察,根据已有的线索展开搜捕。他们检查了一切形迹可疑的人,对各种恐怖组织严加注意,侦察机构也进行了改组,充实了有办案经验的人员。

瑞典警方广泛散发所绘制的案犯肖像,在全国悬赏捉拿案犯,悬赏金额由开始的 50 万瑞典克朗增加到 500 万克朗(合 85 万美元)。在警察总部的大楼里,办案人员日夜值班,接受人们提供的他们认为同案情有关的线索。

瑞典警方为了尽快破案,使用计算机数据系统搜索凶犯。这种系统根据为在瑞典出生的所有瑞典人和在这个国家定居的所有外国人确定的十位数身份证号码,可以很快查到他们的一切资料,其中包括以往犯罪情况、健康情况、文化程度、纳税申报单等。对外来和侨居的人员,警方通过移民局和海关当局可以查到他们进入这个国家的情况。

斯德哥尔摩市的出租车司机也是警方的助手,司机们随身都带有与计算机相连接的电传打字机,警方还把对凶手的初步描绘输入了出租汽车司机的电传打字机中。

从帕尔梅被害到 1987 年 3 月的一年中,瑞典警方一直在运用各种手段紧张地搜寻罪犯。一年中,他们已经审查了 1.7 万名有嫌疑的人,侦察记录多达 2.9 万份,曾向 1.05 万名证人作过调查。

凶手之谜

帕尔梅被谋杀的当晚,有人给瑞典《快报》打匿名电话说,谋杀案是一个叫“PNK”的组织策划实施的,瑞典驻联邦德国的使馆接到电话,来电者称:“我们是赤军派,我们已经杀死了帕尔梅。”

3 月 1 日,又有一位匿名者打电话给驻伦敦的一家国际通讯社,声称是一个叫做霍尔格·迈因斯突击队的组织打死了帕尔梅。这个组织同联邦德国左翼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后来改称红军派)有联系。这个打电话的男子讲英语时带有北欧口音。他说:“你们可以从历史书上查到进行这次袭击的理由,我不准备通过电话告诉你们。”瑞典警方对两个匿名电话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这起

谋杀事件不像赤军派的惯常做法。赤军派通常在行动之后,总要发表一个详细的书面公报,说明他们的行动动机,而且在他们的地下刊物中也可以看到有关报道,而这次却不是这样。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凶手,瑞典和联邦德国警方都没有予以证实。

土耳其的一家报纸曾推测说,总部设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库尔德工人党可能与此事有关,因为帕尔梅曾拒绝接纳它的一位领导人到瑞典避难,该组织可能以杀害帕尔梅作为报复。但是该组织出面否认了这一消息,瑞典警方本身也认为这一说法没有根据。

瑞典警方还曾怀疑过克罗地亚分裂分子,但后来因为无证据,又推翻了这种猜测。

帕尔梅遇刺后,瑞典警方受到了公众的关注,也受到了来自大众的压力,尽管他们绞尽了脑汁,使尽了解数,广大瑞典群众还是不能理解,不时有群众打电话责问。他们假设、猜想、细心求证,然后再推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忙碌着。

在帕尔梅首相被刺后不久,瑞通社收到一封匿名信,声称“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联盟已于2月28日成功地处死了帕尔梅,下一个该轮到维利·勃兰特了”,还说这一决定是上一年9月在希特勒当年的活动据点——联邦德国的贝希特斯加登举行的一次年会上作出的,信的落款是“希尔·希特勒,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联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领导人”。后据联邦德国警方提供的材料,这是一个新纳粹组织,该组织早在1972年就扬言要杀死帕尔梅的好友,当时的德国总理勃兰特。

1986年4月,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恐吓事件。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局长汉斯·霍尔默的夫人,晚上正在街上行走,一个高个子年轻男子走上前,用瑞典语对她说:“小心你和你丈夫的脑袋。”说完便匆匆消失在夜色之中了。据霍尔默夫人回忆,此人同模拟像上的凶手十分相似。一周之后,霍尔默夫人晚饭后在住处附近散步,突然从黑暗中跳出两个蒙面人来,手持匕首,几下就撕烂了她的衣服,并把她推到路边的沟里,厉声说:“这是对你丈夫的最后警告!”随后两人跳上停在不远处的一辆小轿车逃跑了。事后据警方分析,两次恐吓为同一人所为,而且此人很可能就是暗杀帕尔梅的凶手。警方根据已掌

握的情况 ,倾向于认为凶手是外国人。

有人声称是凶手 ,有人被怀疑是凶手 ,那么真正的凶手是谁呢 ? 至今仍是一个谜。

种种猜测

时针指向 1988 年 ,警方的调查仍无头绪 ,瑞典国内怨声四起 ,政府和民众对警方失去了信任。由于舆论压力大 ,调查工作茫然无绪 ,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局长汉斯·霍尔默只得引咎辞职。新任司法大臣安娜·格蕾塔决定另辟蹊径 ,进行一场特别的秘密调查。她上任伊始 ,决心在帕尔梅被刺案中找出一点线索。

安娜·格蕾塔瞒过情报机构、警方和其他内阁部长 ,委派帕尔梅首相密友卡尔松携带司法大臣的介绍信于 1988 年 5 月前往伦敦 ,会见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的官员 ,并查阅有关的秘密情报资料 ,特别要求查阅有关 1985 年 8 月库尔德工人党(PPK)在大马士革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记录。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曾成功地窃听了这次会议。

伊朗决定要采取行动的原因 ,是帕尔梅首相多次重申要阻止瑞典向伊朗出口武器。在瑞典的库尔德人的极端组织的自相残杀 ,影响了瑞典的安定 ,帕尔梅首相下令将其驱逐出境 ,他们怀恨在心 ,因而伺机报复。

在查询中 ,卡尔松获悉军情六处早在 1985 年秋季就已警告瑞典的情报机构 ,瑞典将发生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事件 ,帕尔梅首相是袭击的首要目标 ,其处境十分危险。但是瑞典情报机构对此置若罔闻 ,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是令卡尔松感到遗憾的是 ,他想要查阅有关资料 ,未能如愿。据说瑞典情报机构的头目已抢先一步 ,于 4 月 10 日访问了军情六处 ,内情不得而知。

尽管卡尔松行踪诡秘 ,但是瑞典《快报》在 6 月初仍首先披露 :他正在一名警察的保护下 ,在欧洲执行神秘的使命。报上说他在巴黎还会见了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 ,巴尼萨德尔还告诉记者 ,卡尔松持有一封瑞典司法大臣的介绍信。这篇报道在瑞典政坛引起强烈反响。执政的社民党、情报机构、国家警察局和司法部都围绕着帕尔梅

之死的责任问题及调查问题,开始相互指责和攻击。瑞典国家机关的大多数部门都认为情报部门在帕尔梅被害的问题上渎职。据说,关于情报部门的渎职问题,一度曾在瑞典驻法国大使的负责下着手进行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还发现了帕尔梅最后日子的秘密活动情况。

在帕尔梅遇刺前的日子里,瑞典和伊朗的关系已经恶化。就在帕尔梅遇害的当日,帕尔梅接见了伊拉克大使,大使告诉他,巴格达对瑞典向伊朗出售武器深感不安。帕尔梅回答说,他准备阻止这样的交易,停止对伊朗出售武器。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采取措施,阻止瑞典的博福斯公司经新加坡出售武器给伊朗。帕尔梅与伊拉克大使的会面,在帕尔梅遇刺后的新闻报道中一点也未提及,这说明伊拉克大使的来访是极端秘密的。据事后透露的消息,帕尔梅在遇刺的那一周内还接见了伊朗大使,由于没有新闻报道,此事同样鲜为人知。

帕尔梅是在黑夜被人刺杀的,由于事实不足,种种猜测都有,但谁也不敢肯定是什么人出于什么政治动机干了这件见不得人的事。时间是无情的法官,随着岁月的流逝,终究会冲刷掉裹在事实上的泥沙,使事实大白于天下。人们,尤其是瑞典人民盼望着这一天。

来自非洲大陆的情报

时针指向1996年。帕尔梅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被人忘记,但对其死因及凶手,人们似乎不再给予关注,只有秘密警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仍在认真搜寻世界上任何一个与该案有关的线索,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线索。

谁知就在这年9月,与瑞典相隔千山万水的非洲大陆最南端却传来了与帕尔梅遇刺案有关的内幕新闻,而且这个新闻并不像以往那些疑点那样空穴来风。

原来自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以纳尔逊·曼德拉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了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特·图图大主教为主任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清算种族隔离时代白种人种族主义当局犯下的罪行,其主要方式是请前政府时期有关证人出庭作证。

1996年9月28日,在审讯南非前秘密警察头目库切时,库切语出惊人。在法庭审理中,库切承认前南非秘密警察曾经残酷迫害黑人自由志士,同时披露了令人震惊的内幕: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参与了暗杀帕尔梅的案件。而在此之前,库切的继任者科克上校已于几天前作过同样的证词。

据当天法庭的证词,库切称杀害帕尔梅的凶手名叫安东尼·怀特,此人至今仍生活在希腊或塞浦路斯。库切证实,科克上校关于南非前政府参与暗杀帕尔梅的证词是确实的。库切说,由于帕尔梅强烈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给予南非非国大以有力的支持,因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

库切的这一指控公布之后,正在莫桑比克经营一家锯木厂的安东尼·怀特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声称他没有参与刺杀帕尔梅事件,是无辜的。与此同时,瑞典负责对帕尔梅遇刺案进行调查的官员们说,早在1987年他们就获悉南非可能与帕尔梅被刺有关。但是瑞典国家检察官尼尔森和帕尔梅的儿子对于库切和科克上校的证词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帕尔梅不可能是由南非前政权派人杀害的,库切等人提供证词是想借此减轻罪行,逃避惩罚。在这之后,库切和科克上校在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证时,又指控南非前政权超级间谍威廉逊为刺杀帕尔梅的凶手。对此,正在狱中服刑的威廉逊又于1996年10月21日断然否认,同时他承认当时南非秘密警察确实有刺杀帕尔梅的计划,但不是由他领导,而且该计划直到帕尔梅死时都未执行。

南非关于帕尔梅被刺案的线索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经过媒介渲染,一时炒得沸沸扬扬。由于该风无源,不久又归于平静,案件何时能大白于天下,实难预料。

萨达特开罗遇刺前前后后

为了纪念埃及士兵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每年10月6日,埃及都要在纳斯尔城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庆祝那天的胜利。该城位于开罗近郊,是萨达特总统为了纪念十月战争而专门命令建造的新城镇。1981年10月6日,是十月战争8周年的纪念日。

自古以来,埃及的秋天一直以天气晴朗而闻名于世,绝少有阴霾的记录。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天刚亮,一轮红日从尼罗河冉冉升起,把金色的光芒洒向纳斯尔城,洒向专门用来阅兵的胜利广场,洒向广场对面那座模仿金字塔式样建造的无名战士墓。几十面埃及国旗在晨风中飘动。

10点半钟,阅兵大典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梯形的检阅台上人头济济。今天,全埃及的头面人物几乎全都聚集于此。除了埃及的军政要员外,还有各国驻埃及的使节、专家和记者,以及他们的眷属。人们情绪很好,热烈地交谈着。

身穿精心制作的元帅服的萨达特总统出现了。笔挺的军服,加上绿色的总统绶带,使他显得十分精神。对此,萨达特总统很是满意,他的夫人贾汉以往看着他这副样子,总要嘲讽他一番,但是,今天她没有这样做。作为共和国总统,他理应以最饱满的形象出现在国民面前。

萨达特在副总统穆巴拉克、国防部长阿布·加扎勒等人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阅兵台。他的周围围坐着副总统、国防部长、总

统私人顾问赛义德·马雷 ,另外还有阿曼亲王。他的身后是手持手枪的卫士及秘书哈菲德。他看到了爱资哈尔大学的校长和萨维姆主教 ,他们俩都坐得离他较远 ,于是示意他们坐得离他近一点 ,这样可以显示出他亲近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 ,以缓和最近因大逮捕而造成的紧张气氛。就在 9 月 3 日 ,他下令国家安全部门紧急行动 ,对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进行大搜捕 ,搜捕的主要对象是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 ,结果共拘捕了 3000 人。萨达特以为 ,如果人们见到爱资哈尔大学的校长和萨维姆主教与他一起坐在观礼台上 ,对改善他的形象将有好处。他还在如潮的人群中看到了自己的妻子贾汉和子女 ,原来贾汉说不出席这次阅兵庆典 ,但她还是来了。自己的妻子毕竟懂得自己的心意 ,知道自己希望她能在这个时刻来捧场。想到这里 ,他对妻子感激地笑了笑。

11 点 ,阅兵式开始。一位穆斯林长老朗诵了几段《古兰经》的经文 ,接着 ,国防部长加扎勒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最后 ,萨达特怀捧一个红色的花圈 ,到离阅兵台 200 米处的无名烈士墓致哀。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 ,就没有埃及的光荣。

11 点 25 分 ,阅兵式正式开始。受阅队伍开始向主席台行进 ,播音员介绍着每支部队的情况。首先是骑兵方队 ,然后是军事院校的方队 ,接着是骑在驼峰上的“骆驼部队”。12 点 ,天上响起了轰鸣声。人们知道 ,这是埃及空军的特技飞行部队过来了。仰头望处 ,四架一组的“鬼怪”式飞机首先从头顶掠过 ,接着是 10 多架的“幻影”式战斗机 ,它们拖着五颜六色的烟柱 ,穿过长空。观礼台上响起了阵阵欢呼声 ,许多人站了起来 ,连萨达特也不例外。精彩的飞行表演使得人们几乎忘记地面上的炮兵方队正在向前开进。

12 点 55 分 ,炮兵方队终于通过观礼台。不料 ,一直表演顺利的阅兵行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差错。一个在炮兵方队前开道的摩托车手突然一个趔趄 ,在检阅台前摔倒了。许多观众哈哈大笑 ,但这位摩托车手倒也不慌 ,他爬起来后向主席台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军礼。这个小小的插曲让人们感到了一些乐趣。在军事训练日趋严格的今天 ,这种差错已经很难见到了。不过 ,在十月战争以前 ,类似的错误几乎是家常便饭 ,如果军事演习中不闹点笑话 ,那是不可想象的。今

天这位摩托车手的错误正好为这次检阅增添了一些笑料。检阅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坐在观礼台上的贵宾也累了，再加上气温升高，人们早就想开小差了。这个小插曲倒让人们觉得看下去还是有意思的，谁知道下面还要闹出什么笑话呢？

13点零4分，一辆炮车突然偏离行驶路线，停了下来。人们以为又出差错了，因此，对这个现象谁也没加重视。突然，炮车上跳下4个人，其中一个一下车就趴在地上；另一人像离弦之箭，奔向检阅台，人们以为他会像刚才那个摩托车手那样，向检阅台行礼，因此，大家也没在意他的举动。萨达特还特意站起身来，准备接受他的敬礼，并向他还礼。没料到，这个名叫伊斯兰·布里的家伙一面高呼“光荣属于埃及”的口号，一面拧开了手榴弹的盖子，用力向检阅台扔了过去。几乎在同一时刻，留在车上的阿拔斯·穆罕默德站起身来，举枪向总统射击，第一颗子弹便击中了总统的颈动脉，后来证明，这是致命的一颗子弹。另外还有两人也向主席台作压制性的扫射。伊斯兰布里投出了3颗手榴弹，但除了第一枚爆炸以外，其余两颗都没有爆炸。一颗扔在国防部长加扎勒的脚下，另一颗砸在武装部队参谋长阿卜杜拉·哈菲茨的脸上。随后，伊斯兰布里便举枪向萨达特总统射击，34发子弹，弹无虚发，全部射进了萨达特的身体，而总统的私人秘书哈菲德还想扑向总统，准备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他用手抓起总统的座椅想挡住子弹，但一颗手榴弹正好在他身边爆炸，他的右手被炸断。同时正在进行现场实况转播的播音员作出的反应仅次于哈菲德。在枪响十余下后，人们从电台里听到了他的哽咽声：“叛徒，叛徒，同胞们，埃及……”此后，他就泣不成声了，人们只听到广播里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再也听不到播音员的声音了。

当伊斯兰布里扔出第一颗手榴弹时，总统的卫队完全没有反应。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受阅部队会暗杀自己的总统，此前他们一直盯着来宾的小包，看着总统的后方，担心有人打黑枪。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问题，因此，几秒钟内都没有反应。等他们终于反应过来，整个袭击事件也结束了，暗杀者扔出了所有的手榴弹，打光了枪膛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他们准备逃跑了。伊斯兰布里首先奔向炮车，并招呼他的同伴。就在这时，卫兵的枪响了，一个凶手当场被击

倒在地 ,另外几名也受了伤。整个过程不足 30 秒。

萨达特倒下了 ,他根本没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第一颗手榴弹在检阅台前爆炸时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心爱的共和国军队内部竟然有人向他扔手榴弹 ,这太不可思议了 ! 其他人听到爆炸声都吓得躲在椅子下面 ,而萨达特却毫无畏惧地站着 ,总理毛希丁等人想把他拉下来也办不到。他对站在旁边的副总统穆巴拉克说道 :“ 不可思议…… ”这是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 ,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军用直升机把萨达特送往医院抢救。总统夫人贾汉·萨达特已经看到了刚才血淋淋的一幕 ,她见到萨达特浑身是血 ,就知道没有指望了。因此 ,直升机没有立即前往医院 ,而是在中途停留。贾汉向她远在美国求学的儿子和美国朋友打电话 ,报告了这一不幸的消息。 1 点 20 分 ,直升机飞抵开罗医疗条件最好的迈阿迪医院 ,医生立即对总统进行了检查。医生发现 ,萨达特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正式的医疗报告是这样表述的 :“ 阁下他处于完全昏迷的状况 ,脉搏、血压均不可测 ,听不到心音 ,两眼瞳孔扩散 ,对光反射消失 ,检查表明 ,眼底未出血 ,膝反射消失…… ”但尽管如此 ,医生还是作了最大可能的抢救。 2 点 40 分 ,医生正式宣布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已经死亡。

萨达特遇刺后 ,对于凶手的动机 ,外电众说纷纭。合众国际社分析说 ,暗杀者“可能属于利比亚等敌对方面或被它们所利用 ,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曾公开宣布要以任何可能的方式除掉萨达特。”美国国务卿黑格也有同感 ,因为利比亚电台在暗杀事件发生后的几分钟内就报道了此事 ,动作之快 ,异乎寻常。如果利比亚不是知情者 ,这种情况难以设想。法国的《费加罗报》则认为暗杀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为中心的一帮人干的。而事发之后 ,贝鲁特竟同时有三个组织承认 ,是他们杀了萨达特 ,很明显不可能都是真的。还是埃及军方提供了准确答案 :暗杀主谋是哈力德·伊斯兰布里 ,现役军人 ,中尉 ,另外两人也是宗教狂热分子。 10 月 24 日 ,已经上任的穆巴拉克总统向《金字塔报》记者发表谈话 ,说筹划暗杀阴谋的是埃及一个名叫“赎罪与迁徙”的秘密组织 ,其目标是要建立霍梅尼式的宗教共和

国。

一股暗流在悄悄地涌动着 ,他们在策划如何推翻萨达特政权 ,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鉴于政府控制得极端严厉 ,因此 ,这些非法组织行动十分诡秘 ,外人根本无法得知。其中就有一个“赎罪与迁徙”组织 ,它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已经活动了 60 余年 ,一直处于非法状态。萨达特早年就曾奉命打入这个组织 ,要把这个组织改造成政府的驯服工具。这个目标无疑没有达到。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萨达特成了这个组织追杀的对象。“赎罪与迁徙”组织的联络方法十分神秘。它采用了崭新的串形组织。整个组织像一棵大树的根 ,它由很多须组成 ,这些须就是“串” ,而各个“串”又由很多信徒组成 ,这些信徒是组成这个集团的基本细胞。所有的“串”都通向一个根 ,“串”与“串”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切断一个“串”对于“根”来说无足轻重。这样就保证了整个集团的安全。

“根”与“串”之间的联系一般在清真寺里进行。埃及的清真寺一般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德拉尔清真寺 ,这种清真寺是为世俗目的而修建的 ,在真正的穆斯林眼中 ,它们不是真正的清真寺 ,尽管富丽堂皇 ,但他们宁愿不到里面去做礼拜。第二种清真寺是无名清真寺 ,不知道是何人建造 ,真正的宗教信徒对这种清真寺并不热心 ,但也不摒弃它。真正得到信徒尊崇的清真寺是第三种 ,一种小而新的清真寺 ,它们大都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如光明、穆罕默德之光、伊斯兰的荣耀 ,等等。它们是由一些极端宗教教派修建 ,一般坐落在城市或农村的小巷 ,被信徒称为自强清真寺。真正的穆斯林一般光顾这种清真寺 ,而极端宗教组织也在这些清真寺里完成联络。联络时 ,你只见到他们的口中在喃喃自语 ,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不知情的人以为 ,他们在念祷告词。就在这些喃喃自语中 ,“赎罪与迁徙”组织定下了暗杀萨达特的计划。他们曾经考虑过几种方案 ,一是在萨达特的家乡动手 ,但很多人认为 ,萨达特虽然经常光顾那个地方 ,但是那里戒备森严 ,很难下手 ,下手后也不能确保成功 ,更不能阻止萨达特乘直升飞机逃走 ,因此该方案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用导弹袭击萨达特的直升飞机 ,这个方案因可靠性不高也被否决。第三个方案是在 10 月 6 日阅兵时动手 ,由组织的一个飞行员用导弹袭击阅兵台 ,消灭萨达

特和政界要人 ,但这个主意也被否决。最后 ,他们决定只好等待时机 ,先放萨达特一马。

所有的密谋者都以为自己的密谋天衣无缝 ,殊不料隔墙有耳。哈力德·伊斯兰布里就在祷告时听到了他们的耳语。好在他也是这些清真寺的常客 ,虽然不是组织的核心人物 ,但无疑是组织的一个成员 ,因此 ,他们也没放在心上。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伊斯兰布里把他们的话记在心上 ,知道他们暂时遇到了困难 ,无法下手。但是 ,当时他也没想到由自己去完成这个艰险的任务。

1981年9月2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对伊斯兰布里、对埃及 ,这都是一个命中注定无法逃避的日子。10点15分 ,伊斯兰布里奉命来到333炮兵团 ,团长阿卜杜·阿勒对他说 ,他将带领2辆炮车组成炮兵方队 ,参加10月6日的阅兵式。伊斯兰布里对这种形式不感兴趣 ,借口说要与亲人一起过古尔邦节 ,要求豁免。但团长拒绝了他的要求。无奈 ,伊斯兰布里只得说 :“那就按真主的意志办吧 !”一句话决定了他自己和萨达特的命运。“按真主的意志办”是穆斯林的一句口头禅。一个真正的穆斯林 ,他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被当作是真主意志的体现 ,是按真主的意志行事的。伊斯兰布里这句话 ,是说他参加阅兵式是真主的意志 ,还是说不参加阅兵式是真主的意志 ?没有人明白 ,反正事后他明白过来 ,他必须参加这个阅兵式。他本来不想参加这个仪式 ,但团长不肯准假 ,这是真主意志的体现。是真主要让他在阅兵式上杀掉总统 ,他不能违背真主的旨意。因此 ,说完这句话后 ,他的主意打定了 ,而团长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其他人 ,包括他所在的“串”组织的领导 ,也不知道他已经下决心替天行道 ,暗杀萨达特。后来在受审时 ,他说 :“我曾对参加军事检阅犹豫不决 ,但在团长阿卜杜·阿勒的坚持下 ,我才同意了。我突然想起 ,这是真主的意愿 ,是真主给我执行这个神圣任务的机会。”

9月24日 ,他所在的部队进行了阅兵操练 ,他带着大炮和牵引车经过检阅的主席台。主席台上空空荡荡 ,但是 ,伊斯兰布里知道 ,阅兵式当天 ,这里不会是空空荡荡的 ,萨达特要出席这个阅兵式 ,他的左膀右臂要出席这个阅兵式 ,一批外国政要也要前来观礼。他仔细研究了检阅场地的地形、检阅路线、方队同主席台之间的距离 ,确

定攻击是可行的。但是,他需要两个助手,光靠他一个人难度极大。检阅完毕后,他前往姐姐家吃饭,大家都发现,今天的伊斯兰布里陷入了沉思。

25日晚上7点,他会见了自己所在“串”组织的领导人阿卜杜·萨拉姆·法尔吉,两人密谈了一天。他对法尔吉说了自己的详细计划,法尔吉兴奋不已。当年他与伊斯兰布里结交,就看上了他是个现役军人,可能会有机会接近总统。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其他人都束手无策,而他却想到了主意,实在不简单。伊斯兰布里介绍完自己的计划后,问了法尔吉两个问题: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基本看法?能否帮助找两三个可靠的助手?法尔吉让他第二天听回音。第二天,两人在约定的时间,在法尔吉的一个朋友阿勒家中又见面了。法尔吉果然带来了两个人,他们是阿塔·埃依勒·哈米戴·拉海勒,27岁,是毕业于工业学院的预备役军官,后来不干了,转而搞自己的本行。第二个叫阿拔斯,是在民防学校负责火器训练的军士,连续7年获得军队投掷冠军。伊斯兰布里见到他们两人,立即开门见山地说:“有一个需要牺牲的任务,你们准备去吗?”没有任何人犹豫,虽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需要自己付出生命代价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于是,伊斯兰布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方案。计划极为简单。他将率12门大炮组成一个方队参加阅兵式,他的大炮将由炮兵班的牵引车牵引,而其他两个人将坐上他的牵引车,当牵引车行驶到离主席台最近处的时候,他们应该向萨达特开火。他说,检阅方阵与主席台之间的距离是30米,他们可以在牵引车上开火,其他人则在火力掩护下向主席台冲去,在最近的距离内完成任务。讲完他的行动计划后,四个人一起发誓要保守机密,然后又用了一个小时诵读《古兰经》,以便从真主身上吸取力量和智慧。伊斯兰布里要求法尔吉提供一些武器,包括四枚手榴弹、一支手枪以及足够的弹药。以往的经验表明,检阅者尽管会带武器,但都是空枪,不允许带子弹。27日,法尔吉从组织那里搞到了伊斯兰布里所需要的子弹。

到目前为止,暗杀密谋的知情者还仅限于法尔吉。法尔吉所在的“串”组织的军事负责人泽姆尔中校还不知情。26日,法尔吉通过信使向泽姆尔通报了伊斯兰布里的计划,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这

个计划却遭到泽姆尔的坚决反对。他认为目前组织的力量还不足以夺取整个国家政权,实施伊斯兰化,即使刺死萨达特也无济于事,因此,他认为最好再等一段时间,等组织做好接收整个国家的各项准备工作后再开始行动。但法尔吉表示反对。他相信伊斯兰布里能实施自己的计划,杀死萨达特。此外,他还认为,只要杀死萨达特,埃及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组织有可能夺取政权。再说,伊斯兰布里行动时可不是针对萨达特一人的,120发子弹可以消灭主席台上的大部分人,萨达特的整个班子将会消失,广大群众将从国家政权的恐惧中摆脱出来,而这就是不久前伊朗发生的事。他指责泽姆尔犹豫不决,胆小怕事。他通过使者转告泽姆尔,说:“我注意到你的作用导致阻止其他人发挥作用。无论如何,我将执行我的计划。”反对无效,泽姆尔无可奈何,只得收回反对意见,这样,伊斯兰布里的计划得到批准,他可以勇往直前去执行他既定的计划了。

接下来是摆脱一切有可能阻碍计划实施的人。首先是开牵引车的司机,他不是组织的成员,伊斯兰布里认为,应该让他不能发挥作用。首先想到的主意是给他吃一些安眠药,让他看上去生病了,这样,伊斯兰布里本人就可以开车。但是,买回来的安眠药显示,这一招不一定能起作用,阿拔斯吃了一些安眠药,试服后效果不佳,此举只得放弃。最后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伊斯兰布里决定铤而走险。他说他将坐在司机的旁边,用暴力迫使他停车。后来证明这个冒险是成功的。当牵引车靠近主席台时,伊斯兰布里突然亮出手枪,喝令司机停车。司机从命,用力制动,结果汽车偏出跑道。在受审时,审讯人员问道:“司机是不是组织里的人?”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为什么会服从命令停车?”伊斯兰布里回答说:“因为他害怕了。”审讯人员又问:“他为什么害怕?”伊斯兰布里回答说:“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胆小鬼。”

到目前为止,阿勒还没有被要求参加此次行动,但伊斯兰布里等人的密谋没有瞒着他,因此,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参加这次行动。事实也正是如此,阿勒已经用上了心,知道了自己到时应该怎么办。这样,暗杀就由他们4人去完成。

按规定,一辆炮车上除掉司机和伊斯兰布里外,还有3名士兵。

伊斯兰布里设法让两个士兵生了病 ,第三个人也被他派往其他地方执行公务 ,这样 ,就为阿勒、拉海勒和阿拔斯腾出了位置。他告诉炮连的其他人 ,外连将有 3 个士兵参加他们这台车 ,而且这 3 个人可能来自军事情报部 ,是来负责检阅安全的。

10 月 4 日 ,伊斯兰布里最后一次去了开罗姐姐家 ,在姐姐家扔了一封信 ,信中说 :“我请求你们宽恕我 ,我没有犯罪。我一点没有想到自己 ,也不要求提升和奖励。如果因为我 ,你们中有人受到伤害 ,我希望你们能宽恕我。”一股神圣的宗教热情驱使他走向死亡。后来他被关在狱中 ,他母亲前去探望。她问他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家人带来灾难。他回答说 ,他只想到了真主 ;其他的事情 ,他就顾不得了。

10 月 4 日 ,阿拔斯等 3 人在家中念了一天的《古兰经》。天黑时分 ,伊斯兰布里来了 ,他们一起换上旧军装 ,乘汽车进入检阅集合区。奇怪的是 ,卫兵没有要求他们交进门许可证。第二天一早 ,伊斯兰布里的勤务兵发现自己的长官没有吃早饭 ,而是把自己的饭让给了那 3 位刚来的士兵 ,想到长官曾经说过 ,这 3 个人来自军事情报部 ,是负责检阅安全的。勤务兵没有怀疑 ,只是觉得长官过于讨好他们了。吃完饭后 ,一位高级军官前来传达命令 :一切小型武器均收入专门的帐篷中 ,随后 ,另外一名共和国卫队的高级军官前来传达命令 :拆除所有武器的击发装置 ,统统集中到连队指挥官那里。伊斯兰布里忠实地执行了命令 ,让两名“新兵”去完成这个任务。这种做法并不奇怪 ,因为秘密警察对国家安全负有更大的责任 ,让他们两人去完成这个任务 ,可以证明上面对他们绝对放心。

6 日 ,检阅的日子到了。伊斯兰布里清晨 3 点就起来了 ,向战士们发布命令 ,上午 6 点开始行动。在此之前 ,他去了存放武器的帐篷 ,取了 4 挺机枪 ,放在装枪的口袋里。长官进入武器库这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6 点前 ,整个连队已经做好准备 ,伊斯兰布里下一步要把手榴弹放在汽车的座位下。他命令司机到餐厅去给他买三明治 ,趁此机会 ,他把手榴弹放在座位底下。这样 ,一切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在 9 月 3 日的大逮捕后 ,埃及安全机关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一切

已经万事大吉了。9月23日,内政部长还发表声明,说安全当局已经掌握了兄弟会的所有机密。他引证穆斯林兄弟会一名发言人的话说,如果认为安全当局只了解兄弟会的旧成员,而对新成员一无所知的话,那他们就是犯了最大的错误。他说:“我们确实了解他们所有的人,老的和新的,我们很好地监视着他们,包括他们在1970年之后的组织发展。”他太自信了,而埃及将为此付出代价。

当暗杀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敢肯定这到底是一场有限的暗杀行动,还是一场推翻现政府的政变阴谋的一部分。因此暗杀一发生,埃及政府就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切断电力供应,进行戒严。事实上,泽姆尔等人虽然反对伊斯兰布里轻举妄动,但暗杀成功后,他们还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他们认为“暴君之死”的消息会引起群众的反抗,埃及将会爆发一场革命,因此,他们准备用武力打开一条通往省政府的血路,结果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有100人被警察打死。法尔吉还在广播电台发表声明,要求武装部队以宗教的名义举行革命,如果他们不支持伊斯兰革命,至少也要保持中立。但他失望了。这场叛乱没有得到人们的响应,两天内就被平息了,泽姆尔也落入法网。

在主要的阴谋策划者落入法网后,情报局75分队搜查了他们的住处,结果在他们的家中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家家都有一个指南针,据说是为了在礼拜时能面向克尔白神庙。家家都保存着一些谢赫的录音磁带,家家都有军装。除此之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东西:被撕碎的贝京画像。所有的被捕者都对萨达特恨之入骨,认为他的残酷统治已经无法忍耐。审讯者问法尔吉:为什么不再等一段时间,给萨达特总统一点时间?他回答说:“圣战是不容拖延的事业,萨达特带给人们的暴虐超过了人们所能忍受的程度,他侵犯了真主的权利。”“伊斯兰运动从1952年革命以来在埃及一直受压迫,信徒们等了很久,任何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在军队中发展成员有困难,毕竟军队是政府控制最严的组织之一,再说,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伊朗革命的经验证明,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军队和警察都是不堪一击的。

埃及警方对罪犯进行了大审判,直接参与暗杀的伊斯兰布里等人被判处死刑;另外,穆斯林兄弟会也有300人被判处死刑,武装部

队也进行了清洗,大约有 100 人被开除出武装部队。但是,埃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伊斯兰运动还在悄悄复兴,穆斯林兄弟会还在活动,不过,它的攻击目标已经不限于那些与以色列议和的人们,而是以整个埃及政权为敌了。他们利用广大中下层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先后成立了各种非法组织,埃及境内的极端势力急剧膨胀。他们在偏僻的乡村和小镇,挑动教派冲突,暗杀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仅 1992 年他们就挑起冲突 17 起,制造暗杀事件几十例,埃及著名作家福达也死于他们之手。1992 年 10 月,他们又改变策略,认为小敲小打影响不大,难以对政府产生大的威胁,因此,他们把目标盯住了埃及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旅游业。从 10 月开始,埃及接连发生了几起袭击外国游客的暴力事件。只要是到埃及旅游的人员,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恐怖分子都一样对待。结果,一些国家纷纷告诫本国公民,不要到埃及旅行,否则,后果自负。恐怖分子的行动导致埃及的旅游业急剧衰退,几百艘游轮因缺少游客而不得不在岸上停泊,直接经济损失达 7 亿美元。1993 年 2 月 26 日,恐怖分子在开罗一家咖啡馆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7 名外国游客当场被炸死,同时有十几名本国人遭难。恐怖分子还扬言,要对外国投资项目开战,一时间人心惶惶。

针对恐怖分子的暴力行径,埃及政府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92 年 7 月,埃及国会通过了《反恐怖法》,宣布对恐怖分子动用死刑。在内务部门的统一指挥下,国家安全力量从南至北,开展了有计划的搜捕行动,共抓获了千余名嫌疑犯,收缴大量枪支弹药。穆巴拉克总统还宣布,以后恐怖活动将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原先由私人管理的清真寺也收归国有。1993 年 3 月 9 日,军事法庭首次对 49 名穆斯林极端分子进行了审判,随后几天,保安部队又在开罗、吉萨、格勒尤比亚等城市向恐怖分子的老巢发起了猛烈的进攻,200 余名恐怖分子被捕,另有 10 余名被击毙。政府的严厉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埃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上国际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埃及政府打击穆斯林兄弟会的行动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在反恐怖斗争的道路上,埃及政府依然是征程漫漫,任重而道远。

在“红色旅”总部 ,总理被“撕票”

1978年3月16日 ,中午12时。

当罗马电视台新闻广播员呜咽着宣读特别公告——莫罗总理被人绑架。意大利举国震动 ,世界也被震动了。

罗马戒严。全国戒严。警察倾巢出动 ,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大搜捕行动。

是谁绑架了莫罗 ?在最初 48 小时里 ,这是一个谜。众说纷纭。世界也在猜测。

3月19日中午 ,罗马信使报记者巴沙拉接到一个匿名电话 ,要他到亚兰诺路天桥下去拿“红色旅”的“第一号公告”。

“难道你们绑架了莫罗 ?”

沉默。沉默就等于承认。

巴沙拉愤怒地大叫 :“你们要干什么 ?!”

对方平静地回答 :“我们向整个世界宣战。”

巴沙拉发疯般地跑到指定地点 ,果然找到了“红色旅”的公告。“红色旅”提出用莫罗交换库乔的要求 ,并附了一张莫罗的照片 ,莫罗神情沮丧地坐着 ,背后的墙上贴着“红色旅”的徽号——环绕着圆圈的五角星。

罗马信使报在显著的位置发表了“公告”和莫罗的照片 ,世界各大报刊纷纷转载。人们不禁要问 ,库乔是什么人 ?“红色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为什么要绑架莫罗 ?

库乔与“红色旅”

库乔是“红色旅”的缔造者之一。他曾是都灵特伦多大学社会系的学生。他读大学时，正是意大利所谓“经济发展黄金时期”。政府采取大学开放政策。广收学生，但对学生毕业后的安排不闻不问。大学生们离开拥挤的校园，住房、卫生照顾、公共交通的不足，使他们感到痛苦和沮丧，尤其是就业问题，意大利的失业率本来就相当高，面对潮水一般的学生涌入社会，哪能应付自如！毕业几乎变成失业的同义语。那段时间，学生几乎天天游行示威，政府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但丝毫没有转机的迹象，莫罗，素有“铁腕杀手”之称的天主教民主党主席 1974 年再度出任总理，上任伊始，他就下令，任何人都不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鼓动罢工、游行，他呼吁“意大利人在国家危急的时刻，要坚决站在政府一边，同不法分子作斗争……”

世上的事情有时很难讲得清楚，莫罗这个长期涉猎政治舞场的老手，曾多次驾驶意大利这艘摇晃的小舟绕过了险礁、暗滩，但在这种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高压只能表明你的专断、残暴，表面上的缄默并不一定是好事，学生满怀着强烈的渴望，希望莫罗调整教育政策，采取切实的措施，解决日益膨胀的失业率。但结果他们绝望了！

接下来的便是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库乔是特伦多大学的学生领袖，每次示威游行他都积极地参加。

一天，示威学生同来镇压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向学生投掷催泪弹，库乔和他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勇敢地站在前列，将催泪弹捡起来掷回去。

一颗催泪弹投到库乔身上落下来，嗤嗤地冒着白烟。他的两个朋友同时俯身去拾，催泪弹恰在此时爆炸。

惨叫声揪人心魄。库乔凝目望去，看见他的两个朋友全身是血倒在烟雾中。就在这一天，他萌发了组建城市游击队的念头，并决心立即付诸实施。

最初的“战斗”被唤作“使权力机构残废”的运动。在罗马的国会大厦前，一个高级官员刚从汽车里出来，突然从斜刺里冲过来一个青

年,举着 P38 手枪对准他的膝盖连发数枪,然后逃走。

在威尼斯机场,外交部一位官员上厕所时,被埋伏在厕所里的一伙青年抓住,捆在抽水马桶上。两支无声手枪对准他。他闭上眼睛,心想一定完了。几声沉闷的枪响后,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膝盖上发出难忍受的剧痛。

在都灵、米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城市也相继发生恐怖分子射击政府官员膝盖的事件。库乔得意地说:“政府官员是为权力机构效劳的人,打碎他们的膝骨,他们便终身不能走动。他们的残废,象征着政府残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库乔把他的组织命名为“红色旅”,最初那些日子里,“红色旅”几乎每次行动都得手,实力不断得到扩充。他们有纲领和目标,鼓吹通过暴力达到它们,这一切强烈吸引着各阶层对现实不满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甚至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红色旅”。到 1973 年,“红色旅”发展到 400 多人,拥有编外会员 1000 多人的庞大组织。

城市游击战开始升级。“红色旅”除了绑架政府官员外,还进行炸弹攻势。1973 年菲亚特汽车公司的陈列室被炸。警察赶到现场,肇事者早已遁去,惟见一片瓦砾,满目凄凉。断壁上贴着一张传单,上面印着“红色旅”的徽号。

警方始知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但认为它和大多数恐怖组织一样,是一群乌合之众和亡命之徒,不足为患,没有认真对待。

他们错了!

打那以后,“红色旅”在各地不断制造暗杀、爆炸和绑架事件,无往而不胜。每次都干得十分漂亮,突然行动,突然离去,警方莫知其踪。

“红色旅”的组织极为严密,它的最基层单位是小组,每个小组有三名成员,每六个小组构成一个“核心”,再由各地的“核心”构成旅部,像埃及金字塔一样层层向上。平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一位意大利官员形容道:

“它的组织机构活像一条被切成数段的蚯蚓,每一段都能蠕动。”

一个小组的成员落网,无论警方怎样盘问,都不可能从他的嘴里得到线索,因为他只知道与自己有关的事,即使一个小组的成员悉数

被捕 ,也绝不会涉及到其他小组。

警方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红色旅”的特别行动小组 ,双方明争暗斗数年 ,互有胜负 ,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时机 ,库乔被捕了。

意大利警方欣喜若狂 ,认为只要库乔招供 ,“红色旅”这个社会的毒瘤便会从意大利的肌体上摘除。但很快他们发现看错了人 ,不论是金钱、地位还是以终生监禁相威胁 ,库乔总是保持沉默。为了打击“红色旅”的气焰 ,司法部门立即着手准备审判事宜 ,库乔怒视着大法官巴巴诺 ,轻蔑地说 :“该审判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 ,意大利人民法庭总有一天会审判你们的……如果你们不立即释放我的话 ,莫罗定有灭顶之灾 !”巴巴诺漫不经心地笑了 :“这小子又开始说梦话了 !”

3月16日凌晨4点半 ,前总理莫罗就起床了。他蹑手蹑脚地从妻子依列娜卧室前穿过 ,到阳台上去做柔软体操。

他是个勤勉的人 ,习惯早睡早起 ,可是今天起得比平时要早许多。他心里激动 ,睡不着。浓重的黑暗笼罩着天际。几颗寒星在树梢上眨眼 ,窥视着这位61岁的老人。

他轻松地做完体操 ,回屋 ,对着镜子使劲把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去 ,然后开始洗漱 ,他今天心情极佳。

对于他来说 ,今天是他30年政治生涯中最重要 ,也可以说是最辉煌的日子。不久前 ,他解决了意大利战后最大的政治危机——数月来的无政府状态行将结束 ,各党派在他的斡旋下达成协议 ,组成联合政府。今天 ,国会将讨论这个协议。事先他已得到许多头面人物的保证 ,协议一定会获准通过。

在当今意大利政坛上 ,莫罗是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天主教民主党的主席 ,曾数度出任总理 ,解决过不少政治危机 ,但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引人注目。人们都说 :没有莫罗 ,意大利早就四分五裂了。现在他们尤其体会到这一点。年底的总统竞选 ,他是最炙手可热的人选。如果这个协议得到批准 ,总统的位置一定非他莫属。

7点半 ,他同妻子共进早餐。

看他高兴有点乐不可支的样子 ,依列娜责备地说 :“你高兴得有些早吧。”

“我坚信国会一定会通过的。”

自信是好事 ,但他常常会造成一个人的政治视角的偏颇。依列娜自从嫁给莫罗后 ,无时不为他的安全而担心 ,几次劝他退下政坛 ,安居乐业 ,但她转念一想 ,又深深为她的自私而愧疚 ,想到莫罗每次集会上发表演讲时 ,台下数万名观众如痴如醉动人画面时 ,她就激动不已 ,莫罗不仅属于我的 ,也属于意大利人的 !

人的感情总摆脱不了自私的弧圈 ,依列娜看着莫罗 ,长长叹了一口气 ,“国会能否通过 ,我不管 ,我只知道 ,政治是那样自私自利 ,而且没有人性。”

莫罗没理解妻子这话的含义 ,正想说什么 ,门铃响了。

来人是莫罗的保镖头目里奇 ,他是反恐怖小组的特别警官 ,受过严格的特殊训练 ,反应敏捷 ,临事冷静而且有决断能力。据罗马高级反恐怖小组考核 ,从拔枪、装子弹、到射中目标 ,里奇只需 0.7 秒的时间。近年来 ,恐怖活动在意大利层出不穷 ,警方对政府要员实行严格保护 ,也给莫罗派了 5 名保镖。莫罗对此不以为然 ,他极力反对警方决定。他说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 ,就要时时刻刻同人民在一起 ,如果他们被隔绝起来 ,那是最可悲的事了。”

警方寸步不让 ,他们有他们的理由 :“您的安全关系到整个意大利的政局 ,这绝不是个人的事。”

他无奈 ,只得服从 ,但终于拒绝了警方的这个要求 :将他的菲亚特牌小轿车换成防弹汽车。

8 点半 ,莫罗准备离家。在门口 ,他同妻子深情地吻别 ,每次出去他都要这样做。

“早点回来 ,亲爱的 !”依列娜叮嘱道。

“我知道。”莫罗笑着。“你怎样打发这一天 ,依列娜 ?”“看 ,摆弄它们” ,依列娜指指楼前的庭院 ,那里没有草坪 ,而种满了番茄、大豆和辣椒。初升的太阳为它们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金光。

莫罗走向菲亚特。里奇早已在司机旁坐好。另外 4 个保镖坐在随车里。

汽车启动。莫罗从反光镜里看到依列娜瘦削的身影在尘埃中一点一点地缩小。

这对情笃的伉俪万万没有料想到 ,这一别竟成永诀 !

自从“红色旅”领导人库乔被捕后，“红色旅”成员一直在设法营救，他们准备绑架莫罗作为人质来交换库乔，至少可以刹一下政府的威风，促使政府同“红色旅”谈判……

莫罗的轿车一开动，负责监视的“红色旅”成员立即用无线电通知了埋伏在玛利奥夫尼街和斯特里街交叉处的“红色旅”特别行动小组。莫罗去国会大厦，这里是必经之路。

他们化装成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雇员，身穿制服，提着旅行包，像是在等候机场的班车。

他们当中有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她名叫安娜，别看她长得娇小细嫩，楚楚动人，却是“红色旅”的创始人之一。她也曾就读于特伦多大学，是库乔的同窗和挚友，她是今天行动的总指挥。

这个行动后来被人称为“最凶猛和最大胆的行动”，它的代号是：“宝石行动”。

9点整。

莫罗的轿车沿着斯特里大街驰来，保镖的随车紧跟在后面。

安娜轻轻咳了一声，安东尼奥将帽子取下，这是暗号。

布置在四周的“红色旅”的成员们看见这个暗号，马上明白：“宝石行动”正式开始！

一辆白色的菲亚特128型旅行车从一条小巷里开出来，在斯特里大街中央缓缓而行。

莫罗的车恰在此时来到，被迫减速。里奇有些警觉，但当他看到那辆旅行车挂的是外交牌照，陡然放下一颗心。他哪里晓得这辆车是“红色旅”从委内瑞拉大使馆偷的。莫罗的车跟在旅行车后面缓缓行驶了100多米，来到了两条大街的交叉处，里奇瞥见了站在路旁的4个穿民航制服的人。

司机正要加速，意外发生了。前面的旅行车骤然刹住。莫罗的司机猛踩刹车，汽车发出刺耳的怪叫，但终于没有撞上去，里奇猝不及防，脑袋在挡风玻璃上狠狠碰了一下，眼冒金花。

随车司机没来得及刹车，哐的一声撞到莫罗的车上。车内一片混乱。保镖们都不同程度地负了伤。

安娜一挥手，4个人同时打开旅行包。转眼间，乌亮的冲锋枪出

现在他们手中 ,他们闪电般地向莫罗的汽车冲来。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 ,以至于最有经验的受过特殊训练的警官里奇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直到安娜冲到汽车跟前 ,他才伸手掏枪。迟了 !

安娜用枪托猛击挡风玻璃 ,其动作之猛烈 ,简直不像一个娇弱女子所为。莫罗的固执得到了应有的报复 :因为不是防弹汽车 ,玻璃哗啦啦地碎了。安娜端着冲锋枪对准前排座位乱扫 ,里奇和莫罗的司机全身被打得像马蜂窝一样 ,连叫都没叫一声就死去。

紧跟在莫罗车后的那辆随车里面的 4 个保镖看见有人端枪冲过来 ,情知中伏 ,刚要拉开车门冲出去 ,一阵弹雨铺天盖地而来 ,4 个保镖身中数十弹 ,倒地而亡……

从撞车到所有保镖被击毙 ,只有几十秒。“红色旅”数月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安娜拉开“菲亚特”的后门 ,用冲锋枪指着里面 ,喝道 :“出来。”莫罗出来了 ,双手紧紧抓住公文包。面对着恐怖分子黑黝黝的枪口 ,他故意把头昂得很高。“跟我们走 !”安娜指指路旁的一辆警车。莫罗回首望了望司机和里奇的尸体 ,眼中含着一缕痛苦和悲凉 ,然后走向警车。他挺胸、阔步 ,像走向中世纪刑场的布鲁诺。

附近一座楼的阳台上有一位妇女自始至终目睹这一切 ,事后她激动地对别人说 :“他是意大利最勇敢的男子汉。”

有人打电话报警 ,无论如何也拨不出去——电话线被割断了。几十分钟后 ,警察赶到现场 ,斯特里大街上到处是人 ,却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 ,大多数人面呈冷漠之色。这样的事情他们见得太多了。所不同的是 ,今天被恐怖分子绑架的是这个国家的“国父”、20 世纪世界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意大利实际上的领袖莫罗。

依列娜在子女的陪伴下来到现场。目击惨景 ,这位一贯以稳重和冷静著称的前总理夫人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

莫罗之死

意大利总理莫罗被绑架 ,这消息如同龙卷风一样迅速扫荡亚平宁半岛 ,其传播后的效应丝毫不亚于一枚原子弹所产生的冲击波力

量……

罗马戒严，全国警察紧急出动，但搜遍了罗马城的每一个角落也不见绑架者和莫罗的影子。终于，警方做出这样的决定：“红色旅”一定把莫罗转移到其它城市，全国性的大搜捕开始了。

其实，莫罗并没有离开罗马，他所在的地点甚至距他被绑架的斯里特街不太远。安娜和伙伴们早在一年前就选好了这个地点：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修理库。他们用了大半年时间在那里盖了一座隔音的密室，就在莫罗被绑架的当天，警察便对修理库进行过搜查，却没有发现密室，真是件天大的憾事！

“红色旅”不断发表公告，不断提出要求，然而，所有这些均遭到意大利政府的拒绝。

接着，“红色旅”又发表了莫罗的亲笔信。莫罗以个人名义向政府呼吁：同“红色旅”谈判，释放库乔等人。依列娜也多方奔走，希望政府能同“红色旅”对话，拯救莫罗的生命。政府置之不理。

她又来到天主教民主党总部，声泪俱下地对党的领袖们说：“为了这个党，莫罗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呀！”

那些领袖大都是莫罗一手提拔的，与他私人感情极深，但这件事委实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他们沉痛地说：“党的立场不能改变，我们绝不同恐怖分子对话。这样，即使莫罗遇害，亦等于意大利精神上的胜利。”

4月27日罗马电视台在特别新闻节目中发出声明，如果“红色旅”胆敢对莫罗予以迫害，那他们必将遭到人民及政府的彻底唾弃和毁灭性的打击。

至此，“红色旅”明白不可能以莫罗为人质要挟政府了，决定利用莫罗给政府以严重打击。

莫罗住在这座与世隔绝的隔音密室里已经有55天了，密室虽小，设备却不差，澡堂、厕所、电视机、电冰箱一应俱全。还有很多书籍，不过那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被“红色旅”称为“革命文学”的书籍。

有人说，人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自由，现在他恰恰失去了这种最宝贵的东西。

“红色旅”在密室里设立“人民法庭”，几乎每天都要对莫罗进行审判，刚来到这里，莫罗认为自己的生命安全不会出大问题，要知道，政府的头头不是他的密友，就是他的部下。当他知道政府拒绝同“红色旅”对话后，他变得惴然起来，“红色旅”要求他给政府写信，重复他们的要求，他想拒绝，但求生的欲望很强烈。他写了。

写毕，一个念头从心头掠过：政府会不会为了国家制度的尊严而抛弃我呢？

他知道自己想法有些自私。如果他们为了制度的尊严而抛弃他，也无可非议。那种制度正是他用了毕生的心血来建立的啊。他不禁怅然。

莫罗连续给他的政府写了 88 封信，每一次信件都石牛入海。他彻底绝望。他明白自己一切都完结了——生命和政治生命。

他开始等待死亡的来临。

下午 1 点，安娜领着几个人来了。他们向莫罗宣读了“人民法庭”的判决：对前总理、资产阶级代表莫罗的一切指控都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8 年 5 月 7 日晚 10 时，意大利的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光终于到来！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皓月当空，繁星点点。微风轻拂着面孔，使人感到痒丝丝的。莫罗贪婪地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时光！

莫罗尽量使自己显得镇静、从容，但内心紊乱极了，当他回头看到安娜那副美丽的面孔时，他想到了自己温柔可爱的妻子，他特别强烈地感到生命的可贵，人生的美好，特别强烈地想活下去。他用恳切、哀求般的口吻对安娜说：

“求求你们，放走我吧！……”

他的脸像纸一样的白。有这样一句话：生死在一念之间，果然不差。人，复杂的动物呵。

安娜厉声地命令道：钻进车内，躺下！车内厢很小，莫罗不得不把身子蜷曲起来。安娜举起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对着莫罗的胸膛，连发 11 枪。大约 10 分钟后，莫罗死去。

全世界都被莫罗的死震动！意大利在哭泣！

莫罗的尸体是在罗马市中心距基督教民主党总部只有几码远的地方被发现的。数以万计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

一个家庭主妇哭着说：“他们是暗杀者，应当把他们统统枪毙。”

一个少女说：“莫罗，我们心中的太阳，永远不会陨落！……”

一个老者愤慨地说：“我们应当恢复列刑。”

内政部长、莫罗的好友科西嘉泪流满面地说：“‘红色旅’想制造内战。但是，我们将取胜，民主将取胜。他们无论如何是要失败的。”

他的话得到了验证。

“红色旅”杀害了一个莫罗，却失去了一切，使千千万万意大利人看清了他们。在莫罗尸体安葬那天，数万人自发地游行，声讨“红色旅”的罪行，当时目睹这一场面的法国历史学家雷尔斯深有感慨他说：莫罗死去的仅是一个身体，他的人格魅力连同他身上所体现的意大利精神将同我们永存！

意大利举国同悲

悲痛难抑的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着“立即处死库乔”、“为莫罗报仇”的口号，来到政府门口请愿。战后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次不同年龄、不同党派的人肩并肩地走到了一起，为了莫罗的死，他们放弃了分歧。共产党的红旗与天民党的白底红十字旗一起在示威队伍的上空飘扬。

“红色旅”的政治形象急剧下降。如果说，在莫罗事件之前，意大利人民对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有一丝同情的话，那么，在莫罗被枪杀后，他们的真实面目一下子暴露出来。在意大利人民的心中，他们变得比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还要可恶。阿卢尼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种印象甚至影响到公众对意大利左派力量的总体评价。虽然意大利共产党与“红色旅”没有任何联系，共产党也反对“红色旅”的恐怖行为，在莫罗死后，意大利共产党也参加了示威游行，但是，公众对他们仍持怀疑态度。在当月进行的选举中，意大利共产党的得票率下降了30%。

“红色旅”内部也因莫罗事件出现了分歧。库乔在都灵的法庭上

得意洋洋地宣布：“杀死莫罗是一个革命的正义的行动，暗杀是在这个有阶级的社会中能采取的最人道不过的手段。‘红色旅’对国家的宣战将继续下去。”但是，与他同时被捕的另一位“红色旅”领导人马拉斯基却从狱中带出信件，宣布与“红色旅”断绝关系，说“对莫罗的袭击不可能推进事业。我必须为真正的斗争而执言，不要再把我看作是‘红色旅’分子”。马拉斯基背叛“红色旅”阵营，剩下的“红色旅”分子也分成了两派。“军事派”主张用极端手段消灭一切敌人，制造恐怖气氛，而“运动派”则主张只有在真正打击国家机器的前提下才动用恐怖手段。两派相互争吵，相互拆台，“红色旅”元气大伤。

莫罗事件同样震惊了意大利政府。在此之前，意大利已经成了恐怖主义肆虐的乐园，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一直缺乏得力的反恐怖主义措施。

议会没有这方面的立法。意大利议会曾想制定《反恐怖活动法》，但由于议员的相互扯皮而没有结果，最终不了了之。莫罗的死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因此，莫罗死后一个星期，议会便以绝对多数赞成通过了这个法案。法案加重了对绑架、暗杀等恐怖行为的处罚，而且授予了警方必要的权力。内政部长科西加还任命安东尼奥·法列洛为“中央安全行动核心”的头目，让他从国防军和全国警察部队中挑选了170名精干人员组成反恐怖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对付绑架、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对付“红色旅”是其工作重心。“核心”直属内政部“侦察和特别行动中央办公室”指挥。但是，为了保密，意大利政府不承认有这么一支部队存在。意大利的宪兵部队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干预小组”，由100多人组成，主要是一些射击能手和跳伞尖子。如有意外行动，它直接听命于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两支部队在以后的岁月里，给“红色旅”多次沉重的打击。

莫罗事件是“红色旅”恐怖事业的顶点，在这一事件中，“红色旅”风头出尽，一时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其声势威震海内外。但是，莫罗事件也是“红色旅”衰落的起点。人们暂时遗忘了意大利的老牌恐怖组织黑手党，“红色旅”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名声一落千丈。莫罗事件成了“红色旅”走向衰落的导火线，点燃这根导火线的，正是“红色旅”自己。可悲的是“红色旅”的决策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阿卢

尼还杀气腾腾地说：“我们的口号不再是咬了就跑，而是开枪杀人。”意大利议会通过《反恐怖活动法》，阿卢尼认为这是对“红色旅”的公开挑战。于是，他杀气腾腾地下达了密杀令，意大利总理、莫罗的接班人安德烈奥蒂，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和参议院议长范范尼赫均在此列。但是，由于莫罗事件提醒了意大利政府，警方加强了对政界要人的保卫，“红色旅”的杀人阴谋没有得逞。相反，阿卢尼等一批恐怖分子却落入了法网。

1978年9月14日黄昏，警方接到内线举报，包围了米兰市的格罗利大街3012号。“红色旅”头号人物阿卢尼束手就擒。警方从他窝藏的地方搜到了机枪2挺、手枪14支、各种口径的子弹1200发，此外还有防毒面具、匕首等物，简直是一个小型的军械所。警察看了目瞪口呆。

“宝石”行动没有换得库乔的自由，却又赔进了阿卢尼自己。“红色旅”两代领导人相继落网，元气大伤。在此后的几年时间内，“红色旅”的残余分子忙着舔伤抚痛而无暇复仇。

最后的疯狂

意大利南部有一个名叫维罗纳的小城，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莎士比亚的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和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建筑，吸引着一群群观光客，他们来此抚今追昔，寻觅这一对情圣的踪迹。因此，维罗纳又是一座旅游城市。尽管如此，维罗纳在世人心目中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如果不看莎翁的名作，谁会知道意大利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呢？可是，1981年12月17日发生在维罗纳的一件事，却使它成了一时举世瞩目的焦点。

当天下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欧盟军地面部队副参谋长、美国陆军准将詹姆斯·多齐尔将军结束了一天的公务，回到家中。6点钟左右，四名自称是煤气公司工人的人来到他的家门口，按响了门铃。多齐尔夫人朱迪斯赶紧打开门。来人说：“我们是公寓的水暖工，现在前来检修煤气管道。”朱迪斯心中感到诧异：我家的煤气管道没有出问题呀？再说，我也没有报修。她心里嘀咕着，可还是把他们让进

了大门。她还没有来得及把他们引到厨房里去,这四个人就迫不及待地动起了手。他们捆住了她的手脚,嘴里塞上了破布。接着,他们就掏出手枪,向里间的多齐尔将军扑去。门口的响声惊动了多齐尔,他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对,可能有问题。于是掏出手枪,准备抢占有利位置。不愧是军人,多齐尔的行动十分敏捷,但是,那四个工人的手脚也很麻利。他们扑了上去,与多齐尔扭打起来。50岁的多齐尔哪里是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多齐尔被打倒在地。四个人把他塞进了一只大木箱,然后大摇大摆地把他抬了出去。

一切都准备得天衣无缝。木箱是事先准备好的,楼下的汽车也是等着的。木箱被扔上了车厢,汽车疾驶而去。

第二天早上,多齐尔的警卫来接将军去上班,可是,不管他怎么敲门,里面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知道大事不妙,立即撬开窗户,进入将军的住宅,结果发现将军的夫人被捆在地上,嘴里塞着布团,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而将军则下落不明。

多齐尔60年代曾在越南战场拼杀过,后来调到南欧盟军地面部队司令部任职,他是这个司令部职务最高的人,因此,他掌握着大量的军事机密。多齐尔将军的意外失踪,急坏了美国总统里根,也急坏了意大利政府。

这起恐怖勾当是谁干的?人们立即想起了往事:三年前,意大利总理莫罗被“红色旅”绑架,最后被枪杀。这一次,多齐尔的命运如何呢?是不是又是“红色旅”干的?

绑架者马上就亮出了他们的身份。第二天,意大利安莎社维罗纳分社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我们,来自威尼斯、米兰和那不勒斯、罗马的‘红色旅’战士,绑架了这个北约刽子手多齐尔。现在,他已经被关在人民的监狱里,人民监狱将对北约组织的刽子手进行人民的审判。”口气与当年绑架莫罗一模一样。

“红色旅”卷土重来!消息震惊了整个世界。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立即打电话给里根,对这起绑架事件表示“非常遗憾和震惊”。里根总统恨恨地说:“红色旅,是一帮怯懦的游民,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没有胆量公开站出来面对任何人。”不过,他不得不承认,美国目前面临的局面“十分令人失望”。

是的,目前的形势确实令人感到失望。“红色旅”在经过两年时间的养伤后,又卷土重来了。此前,他们已经干了多起恐怖勾当,其中主要是绑架人质,这是它的拿手好戏。1981年4月27日,“红色旅”在那不勒斯绑架了天民党负责住宅事务的部长齐罗·齐里罗,它向政府开出的价码是把市内空闲的私人住宅分给在1980年地震中失去住宅的人。“红色旅”此举明显是在收买人心,因为自从莫罗事件后,它在意大利人心目中的威望尽失,那顶美丽的“革命”的光环也消失了,有人甚至这样说:“像他们这样的革命,一万年也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红色旅”也干一些事情,证明自己确实在为人民着想,以收买人心,挽回损失。这一招倒有些威力,政府不能拒绝它的要求,因此,“红色旅”的愿望得到了满足,空闲的住房分出去了。但是,“红色旅”的本性这时又暴露出来了,它并没有立即放人,而是向齐里罗的家人勒索了一大笔赎金,这才放人。1981年6月3日,“红色旅”又以工人阶级的救世主自居,绑架了阿尔法汽车制造厂的经理桑德鲁奇,迫使其放弃了解雇5000名工人的计划。在要求得到满足后,“红色旅”发布公告:“已经决定释放桑德鲁奇。”

接连几次绑架得手,“红色旅”又得意忘形了。它以为自己的形象已经有所改善,因此,准备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1981年,下半年,它宣布准备组建恐怖国际,以“红色旅”和“红军派”为核心,联合西班牙的“埃塔”和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向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的帝国主义”开战。为了扩大影响,“红色旅”决定搞一起轰动事件,拿一个美国人来“祭旗”,多齐尔不幸中选。

多齐尔被绑架后,意大利立即成立了一个“紧急行动中心”,全权负责多齐尔的营救工作。吸取莫罗事件的教训,“紧急行动中心”认为,“红色旅”还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把多齐尔转移出维罗纳地区。多齐尔一定被关在维罗纳某个地区,因此,警方立即封锁了维罗纳至帕多瓦地区,并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搜捕行动。

这一次,意大利警方得到了美国和德国专家的帮助,他们对该地区进行了地毯式搜查,每个角落都查到了。这次行动抓到了不少“红色旅”成员,但多齐尔仍然下落不明。

12月27日,“红色旅”的第二号公告出笼了;公告没有提及释放

多齐尔的条件 ,只是说 :“多齐尔这个猪猡 ,这个暗杀者 ,是美国在越南进行大屠杀的‘英雄’ ,由于他的‘功绩’他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勋章。同志们 ,审判已经开始了。”看来 ,这一次“红色旅”要杀掉多齐尔 ,多齐尔看来是死路一条。

意大利政府的要求是 ,多齐尔活着要见人 ,死了要见尸。“红色旅”不断发表虚假信息 ,一会儿说多齐尔关押在阿尔卑斯山的某个无名山谷里 ,一会儿又说尸体已经运到某军营附近的汽车里面 ,但是 ,所有这些线索经过核对都是假的。这说明 ,“红色旅”还没有处死多齐尔。警方悬赏 170 万美元 ,奖励提供线索者。据说 ,意大利警方还与另一个老牌恐怖组织黑手党联系过 ,要求他们协助搜查多齐尔 ,结果 ,线索源源不断。

1 月 20 日 ,警察已经搜到了帕多瓦地区 ,此地离维罗纳不过 50 公里。网一点点在收缩。

25 日 ,帕多瓦警署的报警器响了 ,值班警察一把抓过报警器 :“帕多瓦警署 ,请先报姓名和住址。”

“我不愿意透露姓名。”对方拒绝了警察的要求。警察立即压下录音机的开关。

“现在我把‘红色旅’关押多齐尔的确切地址告诉你们。他被关押在宾德蒙大街 2 号马利罗·法拉斯勒医生的公寓。”

警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是谁提供了这个机密情报 ? 是黑手党 ,还是“红色旅”的叛逆 ,抑或是偶然发现线索的老百姓 ? 不得而知。不过 ,这已经不重要了。知道了多齐尔的下落 ,又不用付出 170 万美元的巨额酬金 ,这笔买卖不亏本。

意大利警察特种部队“金豹”中队的负责人布尔吉塞负责对这个情报进行核实。布实吉塞立即带领他的部下来到宾德蒙大街 2 号。这是一幢 8 层高楼 ,一楼是附近几个街区最繁华的“迪阿依”超级市场 ,楼上则住着居民。由于附近只有这么一家超级市场 ,因此 ,平日这里热闹非凡 ,购物的、观光的 ,络绎不绝。布尔吉塞走进了超级市场 ,与营业员聊了起来。一位营业员告诉他 ,她曾看到几个人抬着一个很重的大木箱上楼去 ,当时大家都没在意。布尔吉塞又向其他几

个营业员核实,结果大家都记起来了,而且时间就在多齐尔失踪那天。布尔吉塞什么都明白了。好家伙!“红色旅”也真会选地方。如果不是那个神秘电话,很难想象这里会有一座“人民监狱”,而这大概正是“红色旅”的高明之处。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最平常处,最不显眼的地方,往往最安全。熙熙攘攘的人群足以掩盖“红色旅”的活动,热闹非凡的超级市场上出现几个陌生面孔大概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莫罗被关在修理所的隔音室里50多天,警察几次搜捕而一无所获,如果这次没有人举报,人们发现的恐怕只能是多齐尔的尸体。

“红色旅”的一切安排都显得天衣无缝,但是,百忙之中,他们忽视了此地一个最大的弱点:没有出路。一旦被发现,警察包围了通道,那么,他们只有束手就擒。

也许是艺高人胆大,也许是他们根本就不认为有人会发现他们藏匿在这个地方,反正“红色旅”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因此,他们守在楼上的“人民监狱”里,外边连个岗哨都没有。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风水轮流转,这次,该意大利警察出头了。每战皆败,不是警察的作为,这一次,意大利警察要改写记录。紧急行动中心立即研究营救方案。有人建议在深夜动手,有人主张在拂晓时分出击。大家都能提出一堆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布尔吉塞却提出,应该在中午出击。理由是,夜晚固然有利于隐蔽,但是,敌人在这个时候警惕性最高,不利于造成突然袭击,而且,夜袭很可能会造成误伤,如果一不小心,打死了多齐尔,那么此次行动有什么价值?这一点最有说服力,因此,利用夜幕进行掩护的方案立即被否决。布尔吉塞认为,中午人多,恐怖分子思想麻痹,这是实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时机。于是,紧急行动中心决定,1月28日中午11点半开始行动,由布尔吉塞负责。

28日天还未亮,通往帕多瓦郊区的各个出口都被封锁了。超级市场周围布满了便衣警察。布尔吉塞和他的10名战友,也提前进入出击点。他指着二楼,告诉他的同事,那个窗户上写着大A字的房间,就是多齐尔关押的地点。

11 点半 时间到。一声令下 ,超级市场旁边的一辆铲泥车开始启动 ,巨大的轰鸣声掩盖了其他一切声响。紧接着 ,布尔吉塞和他的战友们跳下车 ,向二楼奔去。早就隐蔽在人群中的便衣警察立即露出真面目 ,他们命令街上的行人立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防止发生误伤 ,命令一切车辆停驶 ,封锁所有的路口 ,防止恐怖分子逃跑……

布尔吉塞和他的战友们冲进超级市场时 ,曾引起一阵小小的骚乱。由于“金豹”中队一身黑衣 ,每人头上都带着有色塑料兜 ,蒙住了脸部 ,只露出两个眼睛 ,模样十分怕人 ,因此 ,当他们冲进超级市场时 ,人们还以为碰到了打家劫舍的强盗 ,尖叫声不绝于耳。一个妇女当场昏了过去 ,营业员也战战兢兢 ,躲到了柜台下。

毁灭性的失败使一些“红色旅”分子产生了信仰危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 ,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他们不明白 ,他们口口声声代表了无产者的利益 ,但为什么这么多无产者都不与他们合作 ,反而向警方通风报信呢? 安东尼奥想起了自己被带出超级市场时 ,围观的群众射向他的愤怒的眼神。恐怖行动不会带来社会的进步 ,“红色旅”代表的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部分“红色旅”分子幡然悔悟。1983 年 5 月 ,从意大利传出消息。

关押在监狱里的部分“红色旅”领导人 ,包括其创始人库乔 ,已经公开发表声明 ,认为当年产生意大利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已经不复存在 ,自己的政治纲领破产 ,因此 ,他们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这个消息令意大利人欢欣鼓舞。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红色旅”分子都认清了大势。还有一些人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 ,企图卷土重来。鉴于“红色旅”的创始人库乔都已悔过 ,再打“红色旅”的旗号明显不合时宜了 ,因此 ,部分“红色旅”残余放弃了“红色旅”的招牌 ,亮出了新的旗号 ,继续进行恐怖活动 ,其手段之残忍 ,令以前的“红色旅”自叹弗如。因此 ,意大利反对极左恐怖主义的斗争 ,还远远没有结束。

肇源电视机——费萨尔死因揭秘

意外死亡

1975年3月25日,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

夕阳带着血红的光彩消失于天际,终年生活于酷热之下的沙漠居民又迎来了一个凉爽的傍晚。

王宫里灯火辉煌,人影憧憧。数量众多的王室成员正在这里举行聚会。身着阿拉伯传统服装的国王费萨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一边微笑着与周围的人谈笑,一边慢慢地呷着果子酒。气氛十分的轻松、和谐。

突然,一位年纪约30来岁的王室成员冲到费萨尔身边,狠狠地盯着费萨尔,胸口急剧起伏。

费萨尔站起来,困惑不解地望着自己的这个远房侄子,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正当费萨尔和众人惊愕的片刻间,枪响了。只见费萨尔痛苦地捂着胸口,不解地盯着拿着手枪的侄子。然后,慢慢地倒在血泊之中。

待众人反应过来,缴下刺客手中的枪,扶起满身血迹的费萨尔时,才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当晚,沙特阿拉伯和全世界都得知了费萨尔遇刺的消息。

凶手受谁指使?刺杀的背景是什么?……一串串疑问揉进中东纷纭变幻、动荡不安的政局中,给事件本身罩上了厚厚的一层迷雾,

当时的一家颇有影响的周刊就直言不讳的指出：“费萨尔遇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表明中东局势仍处于动荡不稳之中。”

此话似乎言之有理。沙特阿拉伯地处欧亚交汇的中心，地理位置重要，石油资源丰富，长期以来一直是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都想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这块广袤的沙漠之国中来。几次阿以战争，美苏的明争暗夺，沙特国内的政局，使得许多人都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这次谋杀。特别是 50 年代以来反政府、反王室运动的历史，不断提醒公众将费萨尔遇刺理解为政治谋杀。

50 年代初，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沙特阿拉伯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53 年，一些受过教育的青年军人、低级官吏和阿美石油公司的职员建立了“民族改革阵线”，其奋斗目标是：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统治以及阿美石油公司和其它石油公司的经济控制，制定宪法，保证建立选举产生的议会，保障出版、结社、组织政党与工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的自由，发展民族工业，供应农民廉价种子、肥料和农业技术，消灭奴隶制度，解放奴隶。为此，“民族改革阵线”先后举行过一系列的罢工和游行示威。1956 年 7 月 9 日，国王抵达达兰时，数千工人游行示威。19 日，工人又宣布总罢工，要求制订宪法，准许政党和民众团体活动，给工人以组织工会的权利。

沙特政府对罢工和游行严加取缔，国王在 1956 年 7 月 11 日颁布法令，规定禁止一切罢工和示威游行，违者判处一至三年监禁。同时残酷镇压了罢工，约有数十人被打死，500 人被关进监狱，这一年政府还宣布取缔“民族改革阵线”，并逮捕了 56 人。但是还并未压制住国内的反政府活动。自 60 年代以来，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些秘密政党和团体，他们大都以推翻现存的君主专制政权为首要目标，并组织了多次政变。例如，1962 年 12 月，40 名青年军官就试图发动政变，但未遂。1963 年 2 月，当局破获一个地下团体，有一些伞兵军官以阴谋颠覆现存制度罪被捕入狱。1965 年 12 月，内政大臣又宣布，有 65 人因有颠覆罪嫌疑被捕。后来的王室法令说这涉及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有 34 人，都有扰乱国家治安为目的的“秘密极端分子组织的成员”的罪行，其中大部分是埃及人和巴勒斯坦人，另一个集团据

说“有共产党嫌疑”。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高级官员也参与反政府活动。据报道，1969年6月沙特阿拉伯政府破获一案件，被捕者近300人。牵连进去的有空军学校校长、国民警察学校副校长、两名退休将军、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石油和矿业总公司某些高级职员及其他高级官员。9月发现了另一起案件。据说，这两起案件属于政变性质。到了70年代，继续出现了许多反政府案件，仅仅在费萨尔被刺前半年，政府还逮捕了一批密谋政变的国民警卫队军官。

因此，在头脑中留下许多反政府案件的印象的公众，自然而然地同意了前述周刊的观点。

但随后的侦察和审讯证明这次谋杀纯属个人仇杀，并不带多少政治色彩。

刺客是费萨尔的一个侄子。他的兄长曾是沙特国内的一个土王。费萨尔执政后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允许放映电视。刺客的兄长认为这个方头方脑的怪物扰乱了真主安拉的清净，会给伊斯兰教徒带来灾难，于是便带领手下袭击利雅得的电台，但是没有成功。这个土王回到王宫时，发现自己已陷入保安部队的包围。混战中，土王被击中头颅，顿时气绝。他的弟弟决心为他报仇。10年后，他实践了诺言。

费萨尔的死证明了千古不变的仇恨所带给人们的恐惧。费萨尔也是第一个因为电视而献身的领导人。但电视并不构成他伟大的理由。正如尼克松所说的那样，费萨尔是一个谨慎地处理好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平衡的领导人，在这一点上，他的穆斯林兄弟萨达特、伊朗国王巴列维都不如他，前者被人刺杀，而后者则被留恋传统的人赶出自己的家园。

费萨尔的一生表明，现代世界的种种长处与对伊斯兰真主的笃信有可能在同一个社会里和谐地共存。

达拉斯世纪谜案 肯尼迪死得蹊跷

达拉斯的枪声

1963年11月22日下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发生了一起震撼世界的大悲剧。美国在位总统肯尼迪遇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惨遭暗杀的总统。

这天,将近中午的时候,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夫人应达拉斯商界领袖的邀请乘坐林肯牌高级轿车前往贸易中心赴午宴。总统夫妇并排坐在敞篷汽车舒适的后座上,微笑着向街道两边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坐在汽车折叠式坐椅上的是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和夫人,汽车司机是安全勤务局的保安人员威廉·格利尔,旁边是另一个保安人员罗伊·凯勒曼。总统座车后边几码处跟着一辆凯迪拉克牌“随从”车,车上有8名保安人员,两个坐在前排,两个坐在后排,汽车两边特制的护板上站两人。“随从”车后边是副总统约翰逊夫妇的座车,后边是跟着去赴宴的车队。

一路上,肯尼迪总统两次命令把车停下来,去和群众握手。每次停车,“随从”车上的保安人员都立即跑过来,围在总统和夫人的周围,保护总统的安全。

大约12时30分,总统一行的车队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转道休斯顿街进入埃尔姆街。“随从”车上的一个保安人员用报话机通知贸易中心说,总统一行再过5分钟就将到达。

话音刚落,突然听到拍拍两声枪响。肯尼迪总统两手捂着脖子,

身子直挺挺地向前倾了一下 ,然后倒在了夫人的膝上。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和颈部。

当时坐在“随从”车上的保安人员克林特·希尔听到了好像放爆竹一样的响声 ,接着看见一直挥手向群众致意的总统倒了下去 ,就立即跳下“随从”车 ,从便道向总统座车冲去。看见肯尼迪夫人想从后座上站起来 ,希尔跳起来把她推了回去 ,使她不至于摔在马路上。事后希尔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看见肯尼迪夫人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好像要去抓住车后正在掉下的什么东西 ,她看见我正要爬上车 ,就朝我转了过来 ,我抓住了她 ,把她推回汽车的后座上 ,然后爬到后座的上边 ,呆在那里。”一个旁观者说 ,如果不是希尔把她推回去的话 ,肯尼迪夫人会跌在马路上摔死。后来肯尼迪夫人说 ,她自己不记得有这件事。

就在枪响之后的几秒钟内 ,紧随在总统座车后边的约翰逊副总统的座车里 ,保安人员伊昂·布拉德听到枪声 ,看见总统座车附近的忙乱情景 ,立即意识到副总统也可能成为刺杀的目标 ,于是转过身去按下约翰逊副总统的肩膀喊道 :“躺下 !”然后又向四周望了一望 ,就趴在副总统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

在总统的座车里 ,康纳利州长也身受重伤。坐在前排的保安人员罗伊·凯勒曼立即抓起话筒对车队前面的警车说 :“我们遭到了袭击 !快 !带我们去医院 !”

于是 ,警笛呼啸 ,汽车以 120 至 140 公里的时速向医院开去 ,只用了 4 分钟就到了帕克兰德医院。

医生们竭尽全力想挽救肯尼迪总统的生命 ,但是没有成功。下午 1 时 20 分 ,医生通知在医院等候的约翰逊副总统说 ,抢救无效 ,肯尼迪总统去世了。

击中肯尼迪总统的子弹是从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六层上一个窗口射出的。从这里可以俯瞰埃尔姆大街。搜查这座大楼后 ,在六层的 1 个窗子旁边找到了一支 M·C·6.5 毫米步枪 ,据说在枪上验出了这个仓库大楼里的一个工作人员的指纹 ,他就是李·奥斯瓦尔德。

奥斯瓦尔德开枪之后逃跑了。一个小时左右 ,他在市里的另一

个地方又开枪打死了一名叫齐皮特的警察,当他准备向另一名警察开枪时被抓获。

美国安全勤务局,联邦调查局都认为奥斯瓦尔德毫无疑问是刺杀肯尼迪的凶手,但是奥斯瓦尔德却矢口否认。11月24日(星期天)的早晨,达拉斯警察局准备把奥斯瓦尔德从警察总部转移到县监狱去,当奥斯瓦尔德被押解出来时,许多报社记者和警察在四周围观。突然,一个名叫杰克·鲁比的家伙,从人群中冲了出来,掏出枪来对准奥斯瓦尔德就是一枪。奥斯瓦尔德当场毙命。鲁比被逮捕,据说后来死于癌症。

约翰逊总统亲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彻底调查这一谋杀案件。美国首席法官厄尔·沃伦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们的调查结果全部收入了《总统特别委员会关于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调查报告》中,这个具有51本之多的报告也叫做《沃伦报告》。

这份报告后被封存了起来,要在75年后,即公元2038年,待所有与本案有关联的人全部死后,才能公诸于世,这使得肯尼迪遇刺一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可是人们不禁要问,究竟谁是杀害肯尼迪的真正凶手?奥斯瓦尔德为何要杀死肯尼迪?奥斯瓦尔德又怎样能在一小时内,在另一个地方杀死警察齐皮特?鲁比为何要杀死奥斯瓦尔德?鲁比的死因到底是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一直盘绕在人们的脑际,长达30年之久。

奇特的结论

1963年11月25日,肯尼迪总统的葬礼结束后。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决定建立一个犯罪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得克萨斯人组成。厄尔·沃伦任调查委员会主席。

1965年9月25日,经过10个多月的调查,沃伦委员会准备向新闻媒介公布一份调查报告。向美国全国人民提供总统暗杀事件的真相,并做出结论。

下面是全文:

“1963年11月22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被暗杀,这是一

个反对个人、家庭、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反对全人类的残酷的和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在肯尼迪面前尚有多年的社会和个人生活前景，谁知这样一个年轻和精力充沛的总统成为暗杀的牺牲品，成为我国第四个被暗杀的总统。本委员会于1963年11月29日成立，它是在人人具有获得关于这一事件的全部和真实情况权利的基础上建立的。本报告试图在理智和正义的指导下，完成这个任务，对这一悲剧做出结论。报告是委员会本着高度负责精神完成的，它特向全国人民提供与总统暗杀事件有关的客观真相。

结论

本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查明与上述事件有关的事实，并讨论上面提出的需要说明的重要问题。委员会承担了这个任务，并根据已掌握的资料，得出一定的结论。委员会进行的调查研究，未受到任何限制，委员会是独立进行调查的，所有政府机关都尽了自己的职责——支持委员会的调查。本结论反映的是委员会全体成员经过论证后取得一致的看法，这是经过调查之后提出的，上述调查使委员会确信它提供的是经过长时间详细侦察后得出的，反映了暗杀总统的真实情况……

委员会没有发现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和杰克·鲁比参加了任何旨在谋杀总统的国内和国际的阴谋集团。本结论根据如下：

1. 委员会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帮助奥斯瓦尔德制订谋杀计划或组织其实现。

2. 尽管委员会围绕事件的所有其他方面详细地调查了与奥斯瓦尔德有关的全部细节，他的财务状况和个人爱好，特别是他1962年6月从苏联返回美国后的情况，没有发现有任何证据证明奥斯瓦尔德与其他人或集团，参加了旨在谋杀总统的阴谋。

3. 委员会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奥斯瓦尔德为哪个外国政府服务，或是令人信服地证明外国政府资助他谋杀肯尼迪总统，或者他已成为任何一个外国政府的间谍。

4. 委员会研究了奥斯瓦尔德与各政治组织的交往，其中包括美国共产党，“古巴正义政策实施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党，没

有报道后者与奥斯瓦尔德签订有关谋杀总统协议的任何证据。

5. 根据委员会所掌握的全部资料判断,委员中没有人认为奥斯瓦尔德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机关密探、职员或情报员。委员会详细调查了在暗杀之前奥斯瓦尔德和美国各政府机关的关系,这些机关与奥斯瓦尔德之间通常是通过签订的协议协调他们完成各自义务的。

6. 委员会没有发现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和杰克·鲁比之间有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虽然对各种传说和有关类似关系的推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没有找到任何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相互认识。

7. 委员会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杰克·鲁比打死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与任何其他人合谋。

8. 经过详细的调查后,委员会未找到任何足够的证据证明,鲁比和打死齐皮特的奥斯瓦尔德相互认识或者奥斯瓦尔德与达斯相互认识。

既然很难证明否定态度的可靠性,就不能断然确定其他人参加了奥斯瓦尔德活动或是鲁比活动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具有这方面的证明材料,那么,他们也是美国政府和侦察机关无能为力的,同时本委员会对此也一无所知。

在调查过程中没有找到任何阴谋颠覆活动或违反美国政府、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机关法律的行为。

根据委员会现在掌握的资料,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奥斯瓦尔德纯属个人行为。”

这个结论一公布,就引起人们的猜疑。美国舆论机器都写了很多评论文章。

人们仔细研究了 this 报告,发现委员会结论叙述的方法很特别。在开始的几行中,委员会简单地允诺已阐述了全部真理,并声明进行调查的可靠性,用词确切和可信。而在结论中,当一触及实际问题,例如,奥斯瓦尔德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时,委员会突然丧失了信心。“委员会没有人认为奥斯瓦尔德是……秘密机关密探。”没有人认为不等于不是密探。“这些机关与奥斯瓦尔德之间是通过签订协议协调他们完成各自的义务的”。此话更令人费解,难道

说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与奥斯瓦尔德有联系吗？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委员会是独立的权威机构，调阅一下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就可以证明奥斯瓦尔德和鲁比到底是否他们的密探，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这个结论的结尾在谈到关于其他人参加奥斯瓦尔德和鲁比的活动：“如果有这方面的证明材料，那么，它们是美国侦察机关无能为力的，同时本委员会一无所知。”无能为力是指什么？

……总之，这个报告给人留下了一系列费解的疑团。

是谁向罗伯特·肯尼迪开了致命的一枪？

这个人名叫坦思·塞扎，是肯尼迪的警卫人员，与黑手党有密切的联系。罗伯特·肯尼迪在失去知觉前，可能已意识到塞扎在向他开他，在倒地之前，他扯下了塞扎的领带。

在调查时，和第一次悲剧一样，第一现场拍的照片和能弄清凶杀真相的物证永远消失了。1975年，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局长说：“在这个世界上，罗伯特·肯尼迪是我最仇恨的头号敌人。”

罗伯特·肯尼迪也和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一样，热衷于政治。他说：“我喜欢政治。政治是一种高尚的冒险。”可惜的是，他也未能幸免于难，他又多挣扎了25个小时，才痛苦地死去，年仅42岁。

印度三“甘地”被暗杀之谜

在印度，“甘地”二字，是万众景仰的名字，是一国顶礼膜拜的名字。然而，对以“甘地”为名的人来说，在承受尊崇目光的同时，还意味着更多的牺牲……

一、“圣雄”甘地之死

他一生主张非暴力，却死于暴力

在新德里亚穆纳河之滨的火化场上，印度为纪念圣雄建造了一座石碑。纪念碑是用黑色石头修建的普通平台式建筑物，上面用英文和印度文镌刻着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教诲：

“我希望印度自由强盛，敢于牺牲自己，勇于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每个人应当为自己的家庭牺牲，每个家庭应当为自己的县牺牲，每个县应当为自己的省牺牲，每个省应该为自己的国家牺牲，每个国家应当为全人类牺牲。我期望天国降临尘世。”

每天，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来到这座普通的纪念碑前献花、祈祷，表达对印度精神之父甘地的怀念之情。

一个普遍的背影

1869年10月2日。波尔班达的帝万（即印度土邦王公的首相）很高兴地从佣人口中得知他的第四个妻子普特丽白又生了一个儿

子。他兴冲冲的回家 ,给这个孩子取名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这就是后来被印度人民称为玛哈德玛(意为伟大的灵魂 ,或译为圣雄)的甘地。

在甘地的记忆里 ,其父是一个忠勇侠义、刚正不阿、热爱宗教的人。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似乎有点纵情肉欲。因为他第四次结婚的时候 ,已经过 40 岁了。然而他却是一个廉洁的人。他对于本邦忠心耿耿 ,这为人所周知。他对钱财看得很淡 ,从来没有发财致富的打算。从他的身上 ,甘地学会了公正、忠心而紧张、宽容的品格。他给少年甘地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甘地 15 岁的时候 ,从兄长的手镯上偷了一小块黄金 ,而且没人知道这一偷窃行为 ,但甘地的内心倍受自责 ,于是决心向父亲坦白 ,以求彻底改过 ,因为没有坦白的承认 ,就不能彻底的悔改。他写了一张悔过书 ,小心翼翼地递给他的父亲。当时卡巴·甘地正患着痲病 ,躺在床板上 ,当读完悔过书后 ,晶莹的泪水流满了他的双颊 ,连那张纸都弄湿了 ,他合上双眼沉思了一会儿 ,就把纸条撕了。

多年以后 ,甘地在描绘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时写道 :

“那些出于慈爱的珍珠般的眼泪 ,涤净了我的心怀 ,并洗掉了我的罪恶。只有经历过这种爱的人 ,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爱。”

这位日后以其精神力量使身躯六尺高的英国人及其庞大帝国蒙受耻辱的顽童。经受不住歌谣的诱惑 ,让人煮熟一块山羊肉 ,然后偷偷的啃食起来。这次破戒行动的结果很糟糕。吃下山羊肉不久 ,少年甘地立刻开始呕吐。晚上做了一个恶梦 ,总觉得好像一只活山羊在肚子里苦苦的哀叫。从此以后 ,他再也不食肉 ,保留了素食的终生习惯。

当时的印度盛行童婚习俗 ,婚后头 5 年 ,童妇大部分时间在娘家度过 ,然后回到婆家和丈夫一起生活。当甘地长到 13 岁时 ,他的父母就安排他与一位目不识丁、名叫嘉斯杜白的女孩结婚。这位后来成为世界上禁欲主义象征的人 ,很快发现了夫妻生活带来的快乐。婚后 4 年的一天晚上 ,甘地给重病的父亲按摩完 ,就匆匆跑回寝室 ,将已经熟睡的妻子弄醒 ,与她温存起来。突然一阵叩门声打断了他们的欢娱 ,佣人告诉年轻人说 ,他的父亲刚刚去世。甘地听后如雷轰

顶,懊悔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他知道如果他当时不为肉欲所驱使,他就能在父亲的最后一刻亲视含殓。还能够为他按摩,那父亲会在他怀里死去。而他却没能这样做。自这时起,青年甘地常为这件事感到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开始逐渐摆脱情欲的羁束,到他 37 岁时,就彻底摆脱了性欲的骚扰。

1887 年甘地念完了中学,依照家人的期望和许多同龄青年的选择,他进入了设立在八万纳加的萨玛尔达斯学院学习。但很快,他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应那里的生活,他到了那儿,如坠五里云中,事事有困难,教授的讲授听不懂,更不要说有什么兴趣了。于是过了不到半年,甘地就辍学回家了。

这时,甘地家的一位老朋友,一个名叫马福济·达维的机智而有学问的婆罗门前来探望甘地一家,为甘地指引了另外一条发展之路。他对甘地的家人说:“时代变了。如果你们不受适当的教育,不要指望继承令尊的衣钵。”

甘地的道路就这样定下来了。1888 年秋,他便启程到英国攻读法律。以期能够来日继承家父的帝万家业。对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家庭来说,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学习,意味着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此之前,他家庭的任何成员从未到过国外。甘地为此被正式开除其商人种姓,因为在长辈人的眼里,飘洋过海到异国旅行,只能永远玷污他的声誉(毗湿奴教禁止其教徒航海远行。)

禁欲主义的先知

1893 年 4 月,当甘地在南非德班港口登陆时,他思想上尚未流露出任何关于禁欲主义的志趣和反对种族歧视的理想。这位穷苦人未来的先知,身穿伦敦律师界常见的礼服。他踏上南非土地,是应聘为一位印度商人的案件辩护,但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的一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许多甘地研究者认为,正是这件事后,他才决定终生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的事业。甘地也认为,这件事是“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经历。”事情发生在甘地从德班到比勒陀利亚铁路线上的一次旅行过程中。一位白人乘客冲进甘地乘坐的头等卧铺车厢,毫不客气地命令他搬到行李车厢去,甘地拒绝了,因为他手持一

等车厢的车票，火车抵达下一站时，那位白人把警察叫来，强行把甘地从火车上赶下去。甘地孤身一人呆在茫茫黑夜中，冻得浑身发抖，度过痛苦难熬的一夜，因为他不敢到车站行李处提取行李。他祈求悉达神为他带来勇气和光明，犹如中世纪一位尚未取得盔甲兵器的年轻骑士在夜间警戒一样。当早晨的阳光在马里茨堡小车站上撒下一片金黄色的光芒时，这位神态羞怯、举止笨拙的年轻人，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从今以后，莫汉达斯·甘地将坚决抵制种族歧视。

一周后，甘地第一次向旅居比勒陀利亚的印度人发表演说，昔日，这位伦敦律师事务所出来的律师，在孟买法庭上胆小如鼠，张口结舌，今天，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他号召印度兄弟们团结起来，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共同奋斗。不久，他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迫使铁路当局同意：凡是衣着整齐的印度人，有权乘坐南非铁路的头等或者二等车厢旅行。

甘地在南非为印度兄弟的利益斗争时，提出了“非暴力主义”和“非暴力抵抗”两项学说。甘地告诫他的信徒，“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原则，只能导致人类丧失理智，人们不能砍掉别人的脑袋强迫他改变信仰，同样，人们不能用枪弹穿透别人的心脏，强行灌输仁爱之心，暴力只能孕育暴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促使甘地提出非暴力主义的是《新约全书》。耶稣劝告人们，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时，你要把右脸扭过来让他打。耶稣的训诫使甘地深受感动，促使他下决心以仁慈的典范改造人类，以上帝的意志使他们和睦共处。

1906年秋，甘地获得了一次实施上述理论的机会。这年秋，南非政府制定了一项法律草案，规定：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制身份证。这条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法律激起了旅居南非的印度人的抗议。在同年9月11日，一群愤怒的印度人在约翰内斯堡帝国影院集会，甘地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大声呼吁说：“如果接受法律，意味着我们同意毁灭印度侨民团体。”“我认为只有一条出路，即反抗到底，直至牺牲，而决不能屈服于这种歧视。”

“玛哈德玛——群丐之王圣雄”

1915年1月9日,一位身体纤弱的人在孟买穿过印度门户——帝国拱形凯旋门,受到密集人群的凯旋式的隆重欢迎。他随身携带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他的惟一财产——厚厚一叠手抄原稿。这部题为《印度自治》的著作告诉人们,对于甘地来说,南非仅仅是他一生中真正战役的演习场地。

甘地在工业城市艾哈迈达巴德附近安下家,按照以往的作法,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讲经所。他一如往常,济贫救弱。在比哈尔省,他组织靛青小土地种植者,反对英国大地主的敲诈勒索;在孟买地区,他发动因遭旱灾而破产的农民,拒绝交纳田赋;在艾哈迈达巴德,他号召纺织工人起来和老板斗争,他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关心贫苦大众的领袖。不久,印度伟大诗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宾特罗纳斯·泰戈尔授与他“玛哈德玛——群丐之王圣雄”的称号。在他有生之年,这一美称永远伴随着甘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和大多数印度人一样,对大英帝国忠心耿耿,因为他相信,英国会满怀同情地满足印度民族主义的要求。但是他上当了。英国于1919年通过了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定,英国可以残酷镇压一切旨在要求印度解放的骚乱事件。甘地十分震惊,决心反抗印度民族的统治者,他苦思冥想了几星期,终于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既简单又奇特,与过去他发起的政治倡议具有同工异曲之妙,印度全国将以死一样的沉默表示抗议。1919年4月6日,甘地领导全国举行哀悼日。那天,印度人关闭商店,停止营业,走出学校,进行罢工,或者到寺庙里去祈祷,或者干脆闭户不出,以示声援甘地的反抗心声。

不幸的是,印度群众没有在全国各地保持沉默。一些地区爆发了骚乱事件,4月13日,阿姆利则城数千名居民在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举行和平游行,抗议英国人对该城采取的报复措施。该城军区司令R·E·戴尔将军大怒,亲自指挥士兵向集会群众开枪,以示惩戒。结果,1000多人被打死或打伤。

阿姆利则惨案进一步唤醒了印度的民族觉醒,而对甘地来说,这

次悲惨事件最终使他失去了对大不列颠的幻想。在以往的岁月中,他曾两次为效劳英国而牺牲了自己的和平原则。这次事件后,甘地决定掌握一个代表印度民族主义愿望的组织。他的声望使他的这一决定很快得以实现。1920年,甘地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一项行动纲领,获得代表们的一致通过。从那时起,无论他是否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甘地始终是国大党的灵魂和引路人,印度独立斗争中无可争议的公认领袖。

英国人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们逮捕甘地的追随者,查封国大党的办事机构。但这只能激起甘地进一步的反抗。1922年2月1日,甘地致副王(由英国委派的统治印度的人,均由英国人担任)一封信,以平和的语气指出,他将从不合作运动转入非暴力运动。他号召农民抵制捐税,城市居民不服从英国法律,印度士兵停止为大英帝国效劳。

英国人以空前的大逮捕进行报复,数千名印度人被捕入狱,甘地也未能幸免,在那拉维达监狱,甘地在给其支持者的信中写道:“一位主张非暴力的人,手握食盐,象征印度的荣誉,紧握盐的手可被砍断,但他决不交出食盐。”

席卷全国的反英运动迫使英国人释放了甘地,并与他于1931年10日在伦敦进行了一次谈判。但不幸的是,在白金汉宫一起呷茶交谈的英王兼印度皇帝与甘地并未达成任何协议。甘地不得不返回印度,断续他的反英斗争。

1942年,当日本法西斯的军队抵达印度国门时,丘吉尔为了获取印度对英国进行战争的支持,保证英国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时迫于华盛顿等同盟国的压力,当时的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同意对印度作出重大让步。虽然他拒绝承认印度立即独立,但英国为了自己的生存,付出了巨大牺牲。英国庄严保证,日本被战败后,印度将取得自治领地的地位,换言之,印度可在英联邦范围内享受自治权力。

甘地拒绝这件礼物,因为它的惟一目的在于争取印度立即给予合作,以暴力保卫他们的领土。他认为,如果必须抵抗日本,惟一有效的反战武器乃是非暴力。在他的想象中,一排排印度人,纪律严明,手无寸铁,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冲去。他们前仆后继,勇

往直前 ,直到尸体堆积如山 ,血流成河 ,从而使敌人心慈手软 ,从而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甘地还认为 ,如果英国人撤离印度 ,日本人就没有任何理由进攻该国。因此 ,他以“退出印度”当作新的反英口号提出来 ,他说 :“我要求立即获得自由。如有可能 ,我要求在今晚结束黎明之前就取得自由。”

但是英国人不会立刻响应甘地的话 ,大英帝国需要印度提供的人力、物力和土地去与轴心国作战。在一次周密布署的行动中 ,英国人逮捕了甘地及国大党的领导人 ,使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直至二战接近尾声。

由于国大党的突然退出政治舞台 ,从而大大帮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忙 ,这位孤傲的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决定支持英国关于参战的努力 ,以换取英国在战后对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主张的支持。这个将来分治印度的计划 ,加剧了英国人撤退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血腥仇杀。

“愿神保佑他们 ,恩赐他们以智慧 !”

在印度 种族和教派之间的血腥屠杀 ,加上连年不断的饥谨 ,构成印度社会的巨大灾难。

1933 年 1 月 28 日 ,一名留学英国的印度穆斯林大学生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了分治印度 ,建立穆斯林自治国的方案 ,随后 ,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将这一目标当作了行动纲领。当 1947 年印度人民欢呼独立的到来时 ,他们十分心痛地发现 ,他们不得不吞下历史留下来的苦果 ,将印度一分为二。

多年来 ,甘地的足迹遍及印度的每一个角落 ,十分熟悉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杂居的状况。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和一个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国家并不能改变这种杂居状况 ,相反 ,却会带来更深的宗教仇杀 !

甘地的担心很快成了现实。

1947 年 8 月 14 日午夜 ,在巴基斯坦的首都达卡和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两国的领导人都在和人民一起欢呼各自国家的诞生。然而 ,

这种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印度，居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挥起大刀，砍向住在邻近的穆斯林；在巴基斯坦，穆斯林们也对附近的印度教徒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掠夺他们的土地，抢劫他们的财产；一场全面性的血斗在印度大陆出现。不久，印巴两国又为争夺克什米尔邦而残醒厮杀。无论真纳，还是尼赫鲁，面对这种混乱的状况都束手无策。他们所信奉的神灵都没有出来帮他们一把。

甘地决定绝食。这位已是 78 岁的老人，一生中不断绝食以换取胜利。在他手中绝食成了一个没有武器、经济上不发达的人民从未使用的最有力的武器，由于这种武器“把一种使其不能逃避的紧迫感强加于对手”，甘地“每当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就使用这件武器。他断言，只有绝食才能“打开谅解之心，感化对手们的每一根道德神经”。现在，甘地决定再次使用这一武器，以迫使印巴两国领导人在克什米尔的争斗，并保证制止住本国教派间的残杀。

1948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1 时 55 分，莫汉达斯·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斗争。这年冬天寒冷，像往日一样，甘地这天清晨 3 时 30 分起床，然后进行晨祷，他喃喃的朗读到：“通往神灵之路为勇士们开辟，而绝不是为懦夫们铺设。”

10 时 30 分，甘地最后一次进餐，他吃了两张烤饼、一个苹果、一杯山羊奶和大半个柚子。用餐之后，在新德里比尔拉寓所的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随后，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正式开始绝食。当时，他的几名亲近门徒待在身旁，出席了绝食仪式。他们是：甘地的侄孙女摩奴·阿已，秘书普雅雷拉尔·纳亚尔和妹妹苏悉拉·纳那尔医生，以及甘地的精神继承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甘地突然绝食和停止绝食的条件，使广大同胞们感到震惊和沮丧，因为此时，在遥远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巴两国军队在进行一场带有明显宗教情绪的残酷战斗，而印度全国的印度教徒则大喊着“杀尽穆斯林，为死去的同胞报仇”的口号。现在，甘地居然要他们忘掉儿子被杀、妻子被强奸的事实！而且，甘地还要求偿还分治方案规定的五亿五千万卢比给巴基斯坦！无论是大多数的公众，还是印度政府的官员，都难以忍受这一条件。

年迈的斗士毫不屈服，他说，如果我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我就绝

食而死！甘地解释说，这次绝食的目的，旨在“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之间的纷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必须下定决心，要兄弟般地在这个国家和睦相处。”

1月14日星期三，甘地像平日一样，于3时30分起床，然后吟诵《薄伽梵歌》。数分钟后，甘地用树枝刷完牙，吃下了摩奴送来的这一天的第一顿“饭”：一杯掺有苏打水的温水。然后，甘地开始了他从前天以来不断思考的工作。

甘地谢世的危险使周围亲近的人焦虑不安。当时，他已是78岁高龄的人，数月来，他的体力已明显下降，肾功能减弱，血压急剧上升。年轻的女医生苏悉拉·纳那尔痛苦地发现，绝食才过去一天，甘地的体重就下降了一公斤。她明白，要不了多久，甘地即将消耗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到那时，老人的生命也就彻底完了。

傍晚时分，比尔拉寓所外出现了黑压压的游行队伍。他们不是出自佩服来请求甘地停止绝食的，相反，大多数却带着强烈的不满。不少印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一件带有偏见色彩的阴谋诡计，旨在为穆斯林的事业效劳。因而喊道：“让甘地去死吧！”

1月15日星期四清晨，医生在化验甘地的小便时发现了 he 进入危险时刻的信号。她感到十分不安，不厌其烦地向甘地解释说，他的健康从此会每况愈下。但是，圣雄对此置若罔闻。

这天，新德里城的街头出现小规模游行队伍，呼吁各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的生命。与此同时，一封来自巴基斯坦的电报告诉甘地说：“这里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如何才能拯救圣雄的生命。”在各清真寺，大群大群的善男信女为甘地的生命祈求真主；在闺房深处，穆斯林妇女们吟诵古兰经，默默祝愿为印度的穆斯林伸出友爱之手的年迈印度教徒继续活在尘世间。

这天下午，甘地取得了绝食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印度政府决定立即向巴基斯坦偿还五亿五千万卢比。

傍晚，数百名信徒们聚集在比尔拉寓所的草坪上，期待“印度灵魂”奇迹般地出现，为他们举行晚祷会，然而他们大失所望。甘地已虚弱得不能行走，只能躺在床上，通过麦克风向他们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要关心国家，要想到它需要亲善。”老人恳求道：“你们不要

为我担心。凡是来到尘世的人,某一天终究会死去的。死亡是我们所有人的朋友,我们应当终生感激它,因为它可以使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1月16日清晨,一股强大的浪潮终于越过了比尔拉寓所的围墙,过去它始终把印度广大人民群众和伟大灵魂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同甘地过去绝食时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现在印度的气氛骤然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拥有3亿人口的国家,如今突然以整个身心在倾听一位身体衰竭的老人自觉地进行战斗的音讯。从老人居住的寓所的围墙内,印度电台每隔一小时播发一次关于他的生命垂危的消息。在印度半岛各城市,人们纷纷涌向广场,手里高举标语牌,不断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各教派和各政党的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这一天,全国邮电部门的职员寄来了数百万封信件,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必须拯救甘地的生命,我们要像兄弟一样和睦相处。”数十万人举行了集会,祈求神灵把甘地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一时间,教派之间的敌对情绪消失了。

1月18日星期日。上午11时,和平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来到比尔拉,站在临近昏迷的圣雄床边。

国大党主席俯身告诉甘地,他的七点宣言已经取得迅速的一致签字。

圣雄的脸上浮出安详的神色。他示意讲几句话。摩奴把耳朵靠近他的嘴边,然后,在笔记本上记下来,由普雅雷拉尔高声宣读:

“现存于人们心中的最大错误观念,莫过于认为印度只是属于印度教徒的,或者认为巴基斯坦只是属于穆斯林的。看来,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巨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合力,任何事情总是可以办成的。”

“听完我的讲话后,如果你们仍然希望我停止绝食,那么我一定会这么做。但是,如果印度不朝好的方向发展变化,那么你们的诺言只不过是一场恶作剧,我也只好一死为快。”

顿时,一片令人慰藉的气氛掠过整个房间。

这时,在场的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俯下身体向甘地发誓说,他

们要切实履行甘地的教诲。“国民公仆团”的负责人也表示了同样的诺言。当最后一人立下誓言后，甘地轻轻地说：“我同意停止绝食，现在神的意愿业已实现。”

让他去死

正当圣雄以他的生命作赌注迫使印度民众实行他的宗教和睦政策之时，一场以他为目的的暗杀正在悄悄进行。印度独立的那一天，一位狂热的印度民族主义分子、印度国民团的骨干分子纳图拉姆·戈德森在一场小型集会上叫嚣：“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将手无寸铁的印度教徒置于敌人的魔爪之中。今天，印度难民正忍饥挨饿，奄奄一息，然而甘地却维护穆斯林压迫者。印度妇女宁愿焚身自殉也不愿遭人奸污，然而甘地却声称‘受害者乃胜利者也’，受害者中可能有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已被肢解，成群的秃鹫正在撒吞她的躯体。光天化日之下，印度妇女惨遭蹂躏。但是，面对上述暴行，国大党的懦夫们居然无动于衷，这种局面持续到何时才能结束？我们究竟能忍受到何年何月？”

以上的这段话，很好地表述了戈德森及其所属的国民公仆团仇恨甘地的原因。国民公仆团是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印度教大会的准军事团体，该组织的核心机构是秘密社团“印度民族集团”，于1942年5月由享有“狄克推多”（即独裁者）称号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沙瓦迦尔建立。除了盲目服从沙瓦迦尔外，种姓这一强大特殊锁链、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纽带，将该组织的首领和成员紧密连系在一起。“印度民族集团”的成员均是出身于印度民族主义发源地浦那城的婆罗门世家。他们顽固地反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政治主张，反对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主张建立一个印度教徒统治的国家，宣扬印度种族优于其它种族，妄图在从印度河之滨到希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到科摩林角之间的大片土地上，重新建立大印帝国。在他们憧憬的印度社会内，穆斯林将会不占一地。

1948年1月，当戈德森获悉甘地开始绝食以制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仇杀时，这位极端主义分子的狂热情绪突然迸发出来了。他希望自己成为印度教的复仇大使，便对同为国民公仆团成员的维

拉扬·阿卜提说：“我们必须铲除甘地。”

阿卜提点点头，表示赞同戈德森的看法。

于是，这两位《印度民族报》的合伙人便放下手中的笔，转而操起了枪枝和炸药。

1948年1月20日下午5时，戈德森和阿卜提来到比尔拉寓所，和他们同来的还有四个人：戈德森的弟弟、浦那城客栈老板维斯努·卡卡雷、难民马丹拉尔·帕瓦和军火走私商迪甘巴尔·巴德热。他们都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决心为印度教的事业奉献一切。

在来之前，戈德森等人已周密的制定了行动计划，时间选定在这天下午5时甘地出来与信徒们举行晚祷会的时候。因为只有在此时，才可以接近甘地，并在刺杀成功后迅速地逃脱，每个人的分工是：晚祷会开始后，马丹拉尔将炸弹放在围墙的墙下，卡卡雷混入参加晚祷会的人群中，戈德森的弟弟戈巴拉·戈德森和巴德热潜入寓所的房间内，戈德森和阿卜提负责指挥。炸弹一爆炸，必然会在人群中引起一片惊慌。这时，巴德热用手枪向甘地的颈部射击，与此同时，戈巴拉和卡卡雷也将向甘地坐的小平台扔手榴弹。

5时整，甘地准时出现在比尔拉寓所的门口。由于身体依然虚弱，他不得不坐在轿上前来出席晚祷会。当他穿过人群时，信徒们双手合十，虔诚地俯身向他鞠躬致意。甘地到平台上坐定后，就开始举行晚祷会。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草坪上，信徒们唱完圣歌，静静地听甘地的讲话。他的声音极为细弱，虽然安装了麦克风，但人们仍然很难听清，苏悉拉·纳那尔只好逐句向大家再口复一遍。

纳图拉姆·戈德林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观察着手下进入刺杀位置。待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便果断地用手势告诉手下：开始。

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马丹拉尔·帕瓦看到信号，狠狠地抽了一口香烟，随即点燃了炸弹的引爆线。此时，甘地正在谴责美国野蛮虐待黑人。

“如果我们忠于自己的良好保证，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攀登新的道德高峰……”苏悉拉·纳那尔重复道。

突然，炸弹的爆炸声盖住了她的讲话声。

顿时，草坪上一片混乱。人群中惊慌四起，刺客们本可乘机对甘

地下手并安然逃跑。但卡卡雷和巴德热被强大的人流卷到了离甘地很远的地方，负责掷手榴弹的戈巴拉也因为窗口太高看不到目标而无法下手。甘地幸运地摆脱了死神的纠缠。

警察迅速赶来，抓住了引爆炸弹的马丹拉尔。但是其他五名罪犯却乘机逃跑了。

“一位来自旁遮普的难民因失去理智，以粗暴的方式反对甘地。”粗心大意的警察当局向关心甘地安危的公众解释了比尔拉挨炸的原因。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派了一名警官时刻守护在甘地的身旁，以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没有迅速查清其他谋刺者的情况并予以逮捕，甘地将不得不为这次粗心付出性命。

1月25日傍晚，已逃到孟买郊区的纳图拉姆·戈德森召见他的两名同谋，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我们1月20日未能得手，究其原因，在于参加行动的人太多。”他正色向阿卜提和卡卡雷说道：“现在惟有一条途径可以干掉甘地，即由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单独行动。这将由我一人来承担。”停了停，他接着说：“肢解的印度，遭人践踏的印度，现在需要一名勇士为它复仇，需要一支洗涤罪行的宝剑，以便使他摆脱阻挠印度人进行暴力叛乱的人的控制。这个角色，将由我担任。”

于是，再次谋杀甘地的行动开始了。

1948年1月30日下午，对印度和全世界来说，这将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

纳图拉姆早早地来到了比尔拉寓所前的草坪上。他神态安详，情绪很好。信徒们稀稀拉拉地分散在草坪各处，等待着圣雄的出现。快5点时，人群逐渐聚集起来，谁也没想到，一个凶手就藏在他们中间。

5时10分，甘地来到了院子。像平日晚祷会一样，摩奴手里拿着圣雄的痰盂、眼镜和反省录。她和阿巴分别站在甘地的两边。甘地亲切地把手臂支撑在“拐杖”上，向晚祷会场走来。令后人深表惋惜的是：负责保卫甘地的警官因病不在甘地的身边。

这天下午，天气晴朗宜人，当圣雄出现在信徒们面前时，晚霞在他的面部撒下一层金色光芒。甘地从侄孙女的肩上把双手收回来，

然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地频频向信徒们致意，信徒们一面充满敬意地向圣雄执礼，一面给他让开通道。圣雄甘地走在行列的前面。在这一刹那间，纳图拉姆用右手打开了衣服口袋里的手枪的保险，然后径直朝圣雄走去。当他走到甘地面前时，一面弯腰向甘地问好，一面迅速地掏出手枪，用枪口抵住圣雄赤裸的胸膛连放三枪。

当摩奴俯身去给被纳图拉姆撞落在地上的眼镜和反省录时，她听到了第一声枪响，于是急忙站起来，这时她看到，敬爱的巴布（指甘地）仍然双手合十，好似他想迈出最后一步，向前来参加晚祷会的信徒们致意。殷红的鲜血渐渐染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主啊！”甘地喃喃而道，随后徐徐地倒在草地上，双手始终保持着生命最后一息的合十姿势，好像以此向刺客敬献礼物和表示致意。拖地一角的凹陷处淤积了一大片鲜血，摩奴看到那只破英格索尔怀表躺在甘地身旁，时针正好指向5点17分。

18时正，即甘地遇刺身亡43分钟后，印度人民从一项公报中获悉，为他们带来自由的人已经与世长辞。

一颗耀眼的巨星陨落了，但它的光芒将永存人间。

二、“蓝星行动”的主持人

1984年10月31日上午，柔和的阳光铺洒在总理官邸的房顶、水泥路上，印度首都新德里沉浸在秋天的爽意里。在这果香四溢的收获季节，人们正为一年辛勤劳动后的丰收而陶醉在幸福之中。这时，英迪拉·甘地夫人，这位67岁高龄的却像年轻人一样充满蓬勃朝气的印度总理，缓步走出住室，向邻近的办公室走去，仿佛一个饱经风霜摔打的船长，正威严地走在乘风破浪的巨轮的甲板上，她的目光，睿智而敏锐。

然而，她的心情并不轻松，自从6月她批准军队的“蓝星行动”计划，军队攻占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城的金庙后，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她食寝难安。金庙，是锡克教朝拜的圣地，按照传统，军警不得进入，但是，随着锡克人独立倾向日益严重，金庙也就成为武装分子的总指挥部，从这里发出的指令，飞向全国各地，变成冲突，变成暴力事件，变

成死神的使者。因此 ,深思熟虑之后 ,她批准了军方的“蓝星行动”。但是 ,进攻金庙 ,严重伤害了锡克教徒的宗教感情 ,不仅激怒了锡克教的激进分子 ,而且也遭到锡克教温和派长老的反对 ,他们先是多次向她提出军队撤出金庙的要求 ,遭到她的断然拒绝 ,于是温和派转向激进派 ,支持他们的暴力行动 ,9月2日 ,世界锡克教大会在阿姆利则举行 ,由于事先周密布置 ,没有发生骚乱 ,但大会通过的决议宣称 ,如果军队不在9月30日之前撤出金庙 ,长老们将于10月1日组织一次“解放这座金庙的大进军” ,配合他们的要挟 ,锡克教激进派不断在全国各地制造暴力事件。凶杀、抢劫等暴力事件席卷全国各大中小城市 ,并一再扬言要暗杀政府要人。这时 ,处心积虑要推翻她的反对党也趁火打劫 ,先是谴责政府派军队进攻金庙是挑起民族争端的无耻行动 ,她是造成教派冲突的罪魁祸首 ,后来又声称坚决支持锡克人民收回金庙的正义行动 ,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而且 ,党和政府内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使她不得不考虑锡克长老的要求。于是。她派出代表和锡克教温和派谈判。9月25日 ,她宣布军队近日内将全部撤出金庙 ,为了给锡克人一个面子。9月27日 ,她又委托总统宰尔·辛格访问金庙 ,经过一次次唇枪舌剑的激战后 ,谈判终于在9月29日有了结果 :军队在30日之前全部撤出金庙 ,当晚 ,印军悄悄撤出了占领4个月之久的金庙。军队的撤出 ,暂时获得的锡克教长老和温和派的谅解 ,但是 ,激进的锡克青年并不甘心接受曾遭侮辱的残酷现实 ,不断制造暴力事件 ,人民的生命财产又受到严重威胁。

不久前 ,她接到印度中央调查局的报告 ,锡克武装分子又在策划暗杀她的计划。她的卫队长也几次接到神秘的恐吓电话 ,要她好好准备接待他们的随时光临。对于这种威胁 ,她并不陌生 ,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对于一个连战场都去过的人 ,这种卑鄙的见不得人的暗杀又有什么可怕呢 ? 1962年 ,为了稳定局部的局势 ,她不顾军方的强烈反对和一再设置的人为障碍 ,乘飞机来到了提斯浦尔 ,一下飞机 ,她就去看望伤员 ,和骚乱地区的人们谈心 ,并且去前线慰问滞留的士兵 ,有一次她在前线巡视时 ,一颗子弹擦伤了同伴的腿 ,而她也几乎成了枪下之鬼 ,但她毫不惧怕 ,现在 ,她置身在戒备森严的总理官邸 ,

还会比战场危险吗？

然而，她错了。

人们往往会忽略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人们在这里最可能松懈。

刚才，当她走出住宅时，她那个美丽的意大利儿媳正在为她熨衣服，见她出门，立即停止干活，微笑着送她出门，并亲切的告别道：“婆婆，您走好。”见到这个贤慧能干，体贴丈夫孝敬老人的大儿媳，她又想起了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这个年仅 40 岁正成为国大党仅次于她的第二号人物的儿子，又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中。

当她快要走近办公室时，突然，3 个全副武装的卫士幽灵般出现在她的前面，就在她惊呆来不及发出呼救声的瞬间，三支直对着她的黑洞洞的枪口火光一闪，一颗颗子弹射进她瘦弱的身躯，当门外的警卫人员醒过神来，她，已倒在血泊中……

英·甘地的死，对印度人民来说，不啻是晴空霹雳，他们正在她的领导下，向贫困和动乱进军，然而，她却倒下了。

人们愤怒了，一场新的动乱又波及这个动乱不休的古老国度，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南部的喀拉拉邦首府特里凡得琅和其他许多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对锡克人骚乱运动。锡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殴打，甚至伤重致死，他们的财物被抢劫、被焚烧，他们的女人被侮辱。一时，印度成为锡克人的地狱。据当时正在新德里采访的法国记者诺朗报道，只要哪里有锡克人，哪里就会有暴力。他曾亲眼见到一个 10 来岁的锡克小男孩被数名印度教成年人围攻致死，而当时正在附近巡逻的印度警察却充耳不闻，不加干涉，当他请求这个警察救救那个小孩时，这个面带微笑的警察温雅地告诉他，他是不是发生了幻觉。

据后来印度官方统计，在英·甘地遇刺后的 3 天里，大约有 600 名锡克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面临这种混乱局势，就在 31 日下午宣誓就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些“纵火、劫掠、杀人等可耻事”，呼吁各族人民竭尽全力，恢复理智，使印度从这场一小撮误入歧途的人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中解脱出来。但是，他以及政府和各反对党领导人的动力，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被强烈的复仇愿

望驱使的人们已经丧失理智,不顾一切了。鉴于此,印度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军队进驻新德里、加尔各答等城市协助地方当局维持治安,在全印30多个主要城市实行宵禁,由于政府的有效措施,严厉打击了一切闹事者,各地纵火、抢劫和暴力事件逐渐减少,各地发生骚乱的城镇局势开始缓和并逐步得到控制。

英·甘地的不幸遇刺,也在世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使爱好和平的人们极为震惊。

10月31日上午,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先生闻讯后迅速赶到印度驻美国大使馆向巴杰帕伊大使表示哀悼。他说“这是一场可怕的悲剧。无法用语言表示我的悲痛。”并赞扬甘地夫人“是致力于和平、民主和人权的领导人”,“对她的为维护和平与人权作出的努力表示钦佩。”与此同时,正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也发表声明,宣称甘地夫人的逝世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民主事业是一次打击。“所有文明人都谴责这种令人震惊的暴力行为。”11月1日,中国总理驱车前往印度驻华大使馆,向卡特斯瓦兰大使对于甘地夫人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她的遇刺身亡,“是世界不结盟运动和人民以及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损失。”同时,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将派出代表团参加甘地夫人的葬礼。

1917年11月19日,尼赫鲁家族又迎来她新一代,英迪拉·甘地,这个印度未来的总理,出生在阿哈拉巴德市的欢喜宫里。

6岁时,英迪拉上了当地一所英国学校,但味同嚼蜡的课程使她逐渐对学校产生了反感,迷上了圣女贞德,这不仅因为贞德是个女孩子,而且是敢于同英国作战的法国英雄,因而贞德成为她崇拜的偶像。除此之外,还有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的,南美解放领袖玻利瓦尔。在这里,她第一次读到了《悲惨世界》,这本给她印象最为深刻的书,不仅使她对贫困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而且对“她的社会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9岁时,英迪拉随父母来到了欧洲,进入日内瓦国际学校,接着转入贝克斯新闻学院。身居异国他乡,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下生活,她的英语、法语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为她未来的外交活动提供了方便,

但是多病的母亲又病倒了。父亲却没有时间护理,不足9岁的英迪拉只好承担起侍候母亲的责任,与使女一起操持家务,日内瓦繁杂的生活培养了她的独立性,使她具有敢作敢为的优秀品质。

13岁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再度兴起,她祖父与父母相继入狱,家庭生活陷入了困顿。这时,英迪拉主动提出加入国大党,但因年龄太小未能遂愿,她把年龄相仿的伙伴们组织起来,自称为“猴子队”,从事救护、缝补、传递消息等工作,成为运动中的一员小将,深得圣雄甘地的赞扬。圣雄甘地是他祖父的朋友,在她的成长,具有很大的影响,16岁时,在圣雄甘地的安排下,在马德里排解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纠纷,并进行具体的指导。当圣雄甘地在被暗杀的前一天夜里,他还打电话要她去汇报近日的工作,并嘱咐她不要忘记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是亲兄弟,第二天,英迪拉就听到了圣雄甘地被一个印度教徒刺杀的噩耗,为此,她悲痛欲绝。

然而,1931年,当她的父母出狱后,她的祖父不幸病死,她失去了第一个最爱她的亲人。祖父去世后,她的父母便带她来到锡兰,印度南部地区,深入群众,广泛宣传独立民主的思想,播种革命的火种。这次经历,对英迪拉影响很大,吃人的种姓制度,男女不平等的不公平现象深深刺伤了她,她决心要打破这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1934年,17岁的英迪拉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考入桑蒂尼克坦国际大学。在这里,她遇到了世界闻名的印度著名文字、诗人、哲学家泰戈尔,他高尚的品性,“世界公民”的襟怀,强烈的民族感和爱国主义情操给英迪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泰戈尔也喜欢她,称她为“我们这里的瑰宝”。可惜好景不长,母亲卡麦拉肺病加重,需要到欧洲治疗,而这时父亲正在狱中,不能陪母亲去治病,只得由她去护送,她只好放弃了国际大学的学业,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同学和谆谆教诲她的恩师。与母亲一起来到瑞士。1936年2月,母亲死在异国的土地上,而她是她身边的惟一亲人。

母亲逝世后,英迪拉仍旧留在瑞士,1939年,在拜登学校通过牛津大学入学考试。当时,她未来的丈夫费罗兹正在英国伦敦的经济学院就读。费罗兹闯入她的生活已经很久了,他们的第一次相识是她14岁时参加的一次游行集会上。那次为了保持旗子不倒下他俩

奋不顾身地阻挡警察的围殴,后来,在一次政治集会上费罗兹将突然晕倒的卡麦拉护送到医院,从而获得卡麦拉的好感。从此,费罗兹和尼赫鲁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卡麦拉只是将他看成一个进步青年,并没想到他会成为她的女婿,费罗兹爱慕英迪拉的果断、能干,英迪拉对费罗兹的忠诚颇为倾心。但是,英迪拉明白,要与费罗兹结合,并非一件易事,曾几次拒绝了费罗兹的求婚。直到1941年,才在巴黎蒙马特大教堂的台阶上接受了费罗兹的求婚。

从此,英迪拉·尼赫鲁变成英迪拉·甘地夫人,并以这个名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甘地夫妇举行婚礼后,立即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这一年,正是国大党最紧张的时刻。大批领导人被逮捕。9月,在一次秘密集会上,英迪拉夫妇不幸被捕入狱。对监狱,英迪拉并不陌生,5岁时就去狱中探过父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后,终于赢得了独立。印度,这个自16世纪以来就沦为英国殖民地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国家,终于打破了英国的殖民枷锁,成为屹立在南亚次大陆的大国,这一天,年轻的英迪拉夫妇像孩子一样沉浸在喜悦中,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庆胜利。

这天,英迪拉的父亲尼赫鲁在新德里总理官邸宣誓就职,出任印度独立的第一任总理。父亲出任总理,这对一般人来说,应该是一件喜事,然而对英迪拉来说,却是一件忧喜参半的事,原来,自母亲死后,总觉得有愧于她的父亲不曾再娶,过着独身生活,英迪拉便承担了照顾他的日常生活的职责,这对于英迪拉来说已经够沉重的。尼赫鲁出任总理后,偌大的总理官邸不仅需要个精明能干的女管家,而且,他还需要一个既能照顾他生活,又能真正理解他思想的私人秘书,自然,她是惟一的人选。

自从她进入总理府后,就成为尼赫鲁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当其他国家的元首或外交官访印,英迪拉便成为当然的女主人,她替父亲作招待工作,每当尼赫鲁出访其他国家,英迪拉便陪同前往,1949年,她随父亲出访美国,1953年又来到了中国北京,受到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渊博的知识，老成持重的外交家风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经历，使英迪拉有机会接触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政治家，对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为她参与政治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个女人，她既想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领导人，又想过一种安稳平静的家庭生活。

1960年，她的丈夫费罗兹逝世。

1964年，尼赫鲁久病之后，终于不得不离开他留恋的人间，留下他开创的事业。

这一连串的打击，使英迪拉几乎屈服，然而，她终于挺过来了，送走了相依为命的老父之后，她迫于夏斯特里总理的苦苦哀求，出任新闻广播部长。本来，英迪拉想从此息影归山，脱离尔虞我诈的政坛，但是，夏斯特里知道，如果内阁里没有尼赫鲁家族的成员，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因此，夏斯特里就在就职的当天，正式邀请英迪拉入阁，后来又动员党内要人劝说，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得不入阁，但要求两个月后上任，她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夏斯特里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你（夏斯特里）的地位稳固了，我就根本用不着去了。”她确实不想入阁，可以借机辞掉这个职务。

但是，英迪拉入阁后，立即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夏斯特里的支持，在任部长期间，她协助夏斯特里平息南印度语言骚乱，又在印马冲突中维系了印度民心，从而使她成为“老太婆内阁中的惟一的男人”。

正当她全力辅佐夏斯特里总理时，1966年1月11日夏斯特里因心脏病猝逝于塔什干，印度政坛又出现了真空。

“谁来担任总理？”无论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家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不能不思考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很快，他们的目光骤然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她——英迪拉·甘地，尼赫鲁的女儿，现任新闻广播部长。

然而，她的提名却在党内出现了波折，党内反对派认为：英迪拉过于傲慢，而且太左倾。面对这种不值一驳的意见，她保持沉默。沉默，实在是一种很妙的玩意儿，有时候它是懦夫的标签，有时候却是强者的武器，一种力量的无形显示。

1月19日,她以355票对169票击败党内反对派领袖德赛。

1月24日,英迪拉宣誓就任印度第三任总理。从此,她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二位女总理,第一位是锡兰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

然而,就在她率领人民向贫穷与落后进军时,一股反对她的势力逐渐形成。

早在1967年,以德赛为首的辛迪加派在党的主席卡马拉季的支持下,进行反对她的活动,这导致了1969年的国大党分裂,国大党分裂成为国大党(执政派)和国大党(组织派),她是国大党的当然领袖。由于清除了党内反对派,因此,她又在1971年大选中获得胜利,连任总理。但是,1971年大选后,国大党(组织派)在德赛的领导下,联合印度人民同盟阿卡利党等四大政党组成人民阵线,在1975年全面向她发难,企图逼她辞职。在这种紧急形势下,她在儿子桑贾伊的帮助下,发动全面反击,6月25日,她以一名内阁部长遭暗杀、首席法官的生命受威胁为由,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取消新闻自由,对新闻进行全面检查。反对派精神领袖,贾·纳拉扬,印度政治生活中现存的惟一的甘地型领导人,被捕入狱。

德赛,英·甘地的劲敌,也被逮捕。

接着又是一批议员被投入监狱。

内阁重新改组,国防部长易人,工会主席齐治、费尔南德等20余人受到审讯。

紧急状态法的实行,暂时挫败了反对党的阴谋,但是遇到了激进派的坚决抵制,也引起了许多群众的不满。1年后,1977年3月,国大党在大选中失利,英迪拉辞去了总理职务。这次失败,给英迪拉一次猛烈的棒喝,使她认识到群众的真正力量。对以前的一切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首先进一步整顿了国大党,使国大党(执政派)精减成为国大党(英),从而保证了内部的团结。接着,又制订新的竞选纲领,纠正了以前的一些错误做法。当1979年大选开始后,她到处奔波,密切联系群众,每天行程均达200多英里,总计3万英里,每周会见选民100多万,同时,她审时度势,适时出击,严厉抨击政府的通货膨胀、犯罪率增加、生产下降以及官僚政治腐败等现象,在她的领导

下,国大党(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重新成为执政党,她也于1980年再度出任总理。

然而正当她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她却沒有意识到,她在这次竞选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8世纪,在印度北部有一个锡克人建立的独立王国。但是,随着英国殖民统治向内地深入,几次英——锡战争就使锡克王国变成了印度的一个邦。从此,锡克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印度各族人民并肩战斗,终于迎来了1947年的印度独立,印度独立后,锡克人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宗教传统和民族特点。这样,语言问题成为矛盾的焦点,当时,居住在旁遮普省的锡克人只占该邦人口的35%,按惯例,官方语言应由人口多少决定。因此,占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徒使用的印地语成为官方语言,于是锡克人为建立旁遮普语言展开了斗争。经过近20年的努力,1966年政府决定,把原旁遮普邦里的印度教徒聚居的地区划出去,另建哈里亚纳邦,而缩小了的旁遮普邦,锡克人占多数,旁遮普语就成了官方语言,但是,在划邦时印度政府却留下了一个隐患:将昌迪尔作为两个邦的共同首府和河水分配办法。这使得锡克人极不满意,同时,他们还要求更大的自治权。

当时,锡克人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是阿卡利党。这本来是一个以改革锡克教寺庙管理为宗旨而在1920年建立的宗教性组织,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政党。阿卡利党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一直是比较激进的国大党的反对党,在1977年国大党大选失利中,阿卡利党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当英迪拉在1979年开始竞选时,便在锡克人中寻找同盟军以反对阿卡利党,于是,她选中了贾·辛·宾德拉瓦尔,一个原教旨主义者,阿卡利党的劲敌。

宾德拉瓦尔原是一个普通的锡克教传教士,严格按锡克教规过着传统的苦行生活,因而颇受一些老年教徒的尊敬,同时,他的讲道充满激情,对青年教徒很有吸引力,因此,几年间,他就由一个鲜为人知的传教士,变成一个能左右旁遮普邦局势的最有影响的宗教领袖,被称为“锡克人的霍梅尼”。在这个邦的农村,他的讲话被质朴的农民视为“圣谕”,广为流传。

他不是法官,当地农民发生纠纷时,不找当地的司法机关,而长

途跋涉到金庙请求他来仲裁。

他不是教师。自小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成为广大锡克青年学生的崇拜对象,不少青年甚至甘愿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1979年,当英迪拉·甘地经人介绍认识他时,甘地夫人就被他的打扮所吸引:头上裹着宽阔的头巾,脸上留着浓密的长胡子,腰间佩着短剑,臂上戴着铜镯,一身传统的锡克人打扮。交谈中,她发现,宾德拉瓦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既可能成为她的盟友而保证她的党在旁遮普邦获胜,也可能成为她的敌人,而使国大党(英)败在阿卡利党的手下,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危险的潜在对手,不过,英迪拉相信她的能力足以制服他,从而使他为自己效力。人不能没有自信心,但是却不能过分,一旦跨过了那个度,就变成自负,而自负却是失败的先行者,人们因此会失去许多,甚至生命。

英·甘地在宾德拉瓦尔的支持下取得了对阿卡利党的胜利。

宾德拉瓦尔在英·甘地的扶植下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当宾德拉瓦尔羽翼渐丰时,他的本来面目彻底暴露出来。他公开鼓吹建立“卡利斯坦”独立国,并号召追随者采取暴力行动来实现这个目标。因而在旁遮普邦掀起的动乱的浪潮,成为国家统一的心腹之患。

1981年,宾德拉瓦尔因指使杀人嫌疑被拘留,引起了一阵抗议活动和暴力事件,警察当局只好以证据不足将他释放。为了便于指挥,1982年7月,宾德拉瓦尔到达金庙,在金庙设立了总指挥部。

金庙是锡克人的圣庙,对锡克人来说,就像麦加大清真寺对穆斯林一样重要。根据传统,军警不得入内。因此,宾德拉瓦尔在这里招兵买马,网罗了不少人,其中包括激进的青年领袖,全印锡克人学联主席阿姆列克·辛克,几名退休将军,在这些人的辅佐下,训练了不少武装人员。筹办到大量军火,于是,一个个暴力事件相继发生:

1983年4月4日,在阿姆利则附近,一批锡克武装分子同警察发生冲突,在双方的交火中,有20多人死亡,大约200人受伤。

4月25日,一名锡克人警官被枪杀在金庙门外。

10月初,一批武装分子拦截了一辆公共汽车,6名乘客被枪杀。

暴力事件几乎席卷了整个旁遮普邦,人们朝不保夕,几乎无法正

常生活下去。

英迪拉也感到极为震惊，她本来把解决锡克人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宾德拉瓦尔身上，但没想到他回报的却是子弹和炸弹造成的暴力事件，为了稳定那里的局势，1983年10月，宣布对旁遮普邦实行总统直辖统治。

1984年3月5日，又决定在旁遮普邦实行“紧急权力法”。

3月20日，下令取缔全印锡克人学联这个激进派组织。

然而，政府的所有和平努力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相反，是更为严重的骚乱和暴力事件的发生。

4月2日和3日，印度人民党领袖哈尔班斯·拉尔·卡纳和国大党议员雅·纳·蒂瓦里相继被暗杀。同时有情报说，锡克教极端分子已拟定一个名单，要暗杀一批官员，甘地名列其中。

为了掌握这个邦的局势，英迪拉·甘地推迟了出国访问的日期。然而，10天以后，这个邦38个火车站同时遭到袭击和破坏，于是，英迪拉·甘地决定增派大批保安部队，在各地大肆逮捕，并且在金庙周围布岗设哨，这一切并未收到明显效果。5月份，暴力活动层出不穷，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这时，锡克教温和派阿卡利党一改以往的“温和”，加入锡克人反政府的行列中去。

面临这种千钧一发的危急局势，英迪拉·甘地决定采取最后手段，6月1日，批准了军方准备了数日的“蓝星行动”。

6月2日，印军1.2万人开进圣城阿姆利则，6月7日，攻占金庙，在攻打金庙的战斗中，宾德拉瓦尔被击毙。

当宾德拉瓦尔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其他城市都爆发了锡克人的大规模示威。示威者不断高呼：“一个宾德拉瓦尔倒下去，一千个宾德拉瓦尔站起来！”此后，在印军中曾发生了多起锡克士兵的哗变。有些锡克教的青年人还发誓要为他报仇。

宾德拉瓦尔生前，在有些人眼里，犹如一个魔鬼，一个需要出动几万大军来对付的巨魔，使不少人又恨又怕，当他死后，新德里的《印度快报》曾以“一个魔鬼被驱除了”为题报道了他的死讯，然而，这个魔鬼并没完全被驱除，他那不散的阴魂依然徘徊在印度的上空……

10月31日,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

这终于为他报了仇,而且报仇的三个刺客他从来没有见过,更不用说其它什么密切关系,只是,他们是锡克人。

相反,他们却是他对手的“忠诚”卫士。

1984年10月初,新德里的一座锡克教庙宇,自从金庙事件发生后,这里曾一度热闹过,现在却变得冷清起来,一到夜晚,更是格外的冷寂。

这天深夜,突然来了三个目光炯炯有神、步伐坚定有力、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军人的青年,却身着便衣,只见他们推开一间虚掩着门的小屋。

屋里正中坐着一个40多岁的中年军人,见他们进来,没有让座,他们三人便在他的前面站着。

“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

“明白。”

“好,跟我来!”说完,他起身向大厅走去,三人默默无语地跟在后面。

“宣誓吧!”他在厅中站住,威严地望着他们,三人顺从地跪下。

一阵压抑的低沉声音在庙里响起,在这宁静的深夜,显得格外响亮,又阴森无比,使人毛骨悚然……

原来,他们在密谋一次神秘的行动,就在下午,他打电话命令那三人夜里来这座庙里接受最后的指示。他是印度军队中的一名少将,是宾德拉瓦尔的崇拜者,曾参与过军方几名锡克将军支持宾德拉瓦尔反政府的行动,宾德拉瓦尔死后,使他对国家和英·甘地产生了深仇大恨,发誓要用血来洗清他们的罪恶,在军队中策划了一次次哗变,但都失败了,便决定进行一次代号为66谋杀行动,因为那天是宾德拉瓦尔的忌日。

那三个军人是英·甘地的卫士,也是锡克人,早在几年前就是他安插在英·甘地身边的密探,为他提供了不少情报,现在,他要他们进行最后的解决。行动计划是,由本特·辛格投掷手榴弹以造成混乱,然后乘机由萨特万特·辛格和拉特·辛格射击,时间是10月13日上午,具体负责人是萨特万特·辛格。

10月13日,正当他们准备就绪行动时,英·甘地的身边突然增加几个保镖,原来她的卫队长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告诉他近日有人要刺杀总理,因而为她特别增加了三个保镖。突然出现的情形,使本特·辛格犹豫了,等他缓过神来,英·甘地的身影已消失在办公大楼里,他们只好推迟。侥幸的是,他们没有被发现,虽然被保镖看见,但却被以为是卫队长安排在这里的岗哨。这使他们蒙混过关,但他们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决定改变行动计划,不再掷手榴弹而是由他们直接接近英·甘地,在近距离内射击。时间是在10月31日。

似乎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帮助他们,或者是宾德拉瓦尔的阴魂在作怪,总之,几天之后,卫队长在英·甘地的反对下,取消了贴身保镖的护送,因此,10月31日上午,他们先是站在路旁,等英·甘地走近时,立即向她扫射,等门外的警卫人员闻声赶来时,已经来不及阻止他们了,他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毫不理会那两名卫士的行动,子弹全打在英·甘地的身上,事后一查,英·甘地身上共中了17颗子弹。本特·辛格和拉特·辛格当即被击毙,萨特万特·辛格身负重伤,送往医院抢救。

3天后,他供出了全部内幕。

又过了31天,少将被捕。

但是,他们也为宾德拉瓦尔报了仇。

宾德拉瓦尔,这个生前需要出动几万大军来对付的恶魔,死了还要兴风作乱,给印度造成了灾难。

三、被代号“黑猫”警卫的人

1984年11月11日,星期天,印度北部的一个沉静的空军基地。被丧失至亲的巨痛折磨得枯瘦如柴的印度新总理拉吉夫·甘地,默默地登上了一架停在机坪的安十二飞机,紧跟他的是新德里的拉克斯明纳拉扬庙的白胡子祭司拉莫差莱。

当拉·甘地走进机舱时,一眼就看到飞机新搭了一座平台,上面排放青红缎袋子罩青的篮子,被玫瑰花瓣和花环裹围住,在这些篮子

里 ,装着他母亲、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骨灰。就在 10 天前 ,10 月 31 日的上午 ,英·甘地被她的三个锡克卫兵刺杀在总理官邸里 ,当他接到噩耗后迅速从西孟加拉赶回时 ,他只能在全印医学科学院里 ,看到他敬爱的母亲 ,安详地躺在冰冷冷的手术台上 ,她的身上 ,从胸部到腹部密布着无数个大小不一的黑孔 ,那是吞噬她生命的子弹留下的罪证。那一刻 ,他的脑海里不停翻滚着的只有两个血红的大字 :复仇。

然而 ,几小时后 ,当他宣誓就任印度第六任总理时 ,他意识到 ,他不只是英·甘地的儿子。

11 月 1 日 ,在三一大厦举行了英·甘地的遗体告别仪式 ,那天 ,从早晨一直到天黑 ,共有 60 多万人参加。他们在门外排成长达 2 英里长的队伍。当他们走过英·甘地的遗体旁时 ,不时发出明显是拼命抑住的呜咽声。那时 ,他站在被鲜花覆盖着的母亲的遗体后面 ,望着缓缓走过的眼睛红肿的人们 ,他强烈地感觉到 ,母亲的死 ,不只是他家庭的不幸 ,也是印度人民的不幸。

11 月 3 日 ,在贾穆纳河畔举行了英·甘地的隆重葬礼。那天在 20 多万人参加的队伍中 ,不仅有印度军政要员 ,而且有来自世界各国的 100 多个外国代表团 ,其中 50 多个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率领的。他们中有希腊总理 A·帕帕德罗、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法国总理洛朗·法比尤斯等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巴基斯坦的总统齐亚·哈克将军 ,他是印度的仇敌。在非国家首脑率领代表团中 ,也是由政府高级官员率领的 ,代表美国的是当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

葬礼前后 ,他分别会见了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客人 ,他们都对他母亲的死深表同情 ,并高度赞扬英·甘地是世界民主、人权与和平的领导人。这些赞扬 ,对他母亲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当他和他们会谈时 ,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 ,他不仅是英·甘地的儿子 ,也是印度人民的儿子 ,更是他母亲所缔造的和平事业的继承人。

因此 ,他及时地制止了因母亲遇刺而造成的锡克人的骚乱。

他 ,从一时的冲动里平静下来了 ,理智战胜了感情。

然而 ,他绝没想到 ,7 年后 ,同样的灾难降临到他的身上 ,他也没有摆脱他母亲一样的厄运。

1991年5月27日中午,拉胡尔·甘地捧着装有父亲骨灰的铜罐,拖着沉重得像灌了铅似的双腿,来到恒河边上,在河心搭着的花环装饰的木台上,站立着他的母亲、妹妹。今天,他要在这里送别不幸逝去的父亲。当他走上木台,凝视着失声痛哭的母亲时,悲痛难忍。他打开铜罐,将父亲的骨灰撒入滔滔不息的圣水之中。

1991年5月20日,拉吉夫·甘地同夫人索尼娅在自己的选区愉快地投了票,为了更好地迎接5月23日和26日两轮投票的挑战,第二天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安得拉邦的维沙卡帕南去拉选票,当天傍晚,他拟从这个海港城市乘飞机去该邦首府马德拉斯从事竞选活动。但是,他的飞机在机场突然出了故障,等了好久也没有修好,他只好驱车去城里的政府宾馆,准备第二天再走。当汽车正跑在半路上时,他车里的传呼器突然传来了机场调度的声音,通知他飞机已经修好,他不用等明天再走了,于是他又调转车头返回机场,登上了飞机,直飞马德拉斯。他之所以这样行色匆匆,是因为他太焦急了,大选在即,虽然 he 已稳操胜券,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一旦选民突然间转向,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更何况,为了这次大选,他已准备了1年多。

当他到达马德拉斯,立即向该市的警察局长提出,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佩鲁姆布杜镇,这个仅数万人的小镇离马德拉斯有40公里远,虽然在他的竞选中不起什么重大作用,但是,他的口号是。“哪里有选民,哪里就是战场。”他必须到那里去和群众见面,但是,这个小镇治安力量薄弱,警察寥寥无几,而且这时天色已晚,这对于像拉吉夫这样一个激进分子重要的暗杀对象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因此,警察局长向他建议,是否取消今晚的行动,等明天布置好后再去,这实际上是一个好心的建议,但是,这样的建议对他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听到,每当他外出活动时,他的耳朵就灌满了类似的建议。

1984年6月5日,英迪拉·甘地为了清除锡克教极端分子的据点,下令军队实行“蓝星行动”计划,导致了军队攻打锡克人圣庙的金庙事件,从而激起了他们的愤怒,10月31日,她在一次由锡克人少将策划的暗杀行动中,不幸身亡。据少将供认,他们这次行动的目标还有拉吉夫·甘地,总统宰尔·辛格,只是因为他有事外出,总统正在国外访问,从而使他们侥幸地逃脱了死神的魔掌,但是,那些激进的

锡克武装分子并不就此罢休,不仅要用他母亲的血而且也要用他的血来为他们被军队打死的首领宾德拉瓦尔祭奠,一次又一次对他进行谋杀。1986年10月2日,当他在新德里向甘地墓献花时,一个锡克青年藏在附近的树丛中向他连发数枪,可惜这个刺客枪法实在不敢恭维,数枪之后,拉·甘地仍然安然无恙,倒把刺客吓跑了,因此,他的安全工作成为最伤神的事。他也不得不经常穿着防弹马甲,并且采取严密的措施。在他任总理时,新德里赛马场路7号总理官邸前的一条大街用一道道铁栏杆封锁,并布有层层岗哨。大门旁停有一辆急救车和一辆警车待命。安全部门还禁止飞机飞越总理官邸上空。他外出时,由数百名被称为“黑猫”的警卫人员组成安全圈护卫。

恐怖活动也严重威胁着他和他家人的正常生活,他的子女小时候成天关在家里,不能到学校上学,而由教师在家里授课,他们也不能同其他孩子交往,更不用说单独外出了。如果想出去一次,几乎比上天还难,总是在数名保镖的保护下匆匆走过公园或商店,但是,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当他们不能像普通的孩子们在父母亲的带领下公园游玩时,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围着自家的屋子绕圈子以打发时间,不止一次,他看到这样的情景:在夕阳西下的黄昏,他的大儿子,1971年出生的拉胡尔和他的小妹妹,比他小两岁的帕里安卡,孤零零地坐在草坪上,望着天空中美丽的晚霞发愣,夕阳的余辉沉重地涂抹在他们的身上,那一刻,他感到格外难受,觉得有愧于他们,然而却又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们是英·甘地的后代,拉·甘地的子女。

但是,这一切都成为反对党攻击的口实,长期以来,反对党对国大党不惜余力地大加攻击和诋毁,他的母亲英·甘地被他们称为“专横的独裁者”,对他则讽刺他高高在上,不察民情,不敢接近群众是不信任人民的表现,他就是在他的选民面前,也要在前呼后拥的保镖保护才敢迈出战战兢兢的一步。

因此,当1989年第9次大选失利后,他在总结教训时认为,脱离群众是他失利的主要原因,其实,脱离群众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而已。他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种族冲突和政府贪污腐化,但是,他却坚持认为是他脱离群众才导致大选的失败。

自从1991年3月文卡塔拉曼总统宣布将于5月举行印度独立

以来的第 10 次大选后，拉·甘地决心东山再起。重掌政权，信心十足地投入到大选中去，在这次竞选中，他一反常态，脱去了自从政以来一直不离身的防弹马甲，尽可能创造机会接近群众，力争树立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形象，他常常撇开保安人员，与选民们握手、交谈，有一次，他甚至将劝阻他的保镖们反锁在车里，使得保镖们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保护的他，淹没在人群里。又有一次，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独立节庆典上，他坚持拆掉讲台上的防弹玻璃罩，才去讲话。

他曾在一次美国记者对他的采访时说，他采取这种新的，没有安全措施的竞选方式，是因为现在他不是总理，因而无所畏惧，而且，他也相信“威胁总是存在，有什么办法？要么你参加竞选，要么你照顾自己的安全。”

然而，历史证明他错了，固然不能脱离群众而高高在上，但也不能不要安全去作无谓的冒险，拉·甘地 1984 年执政时，舆论界曾以“一个英勇的形象”报道了他。但这不是勇敢，而是冒险。

拉·甘地拒绝了那位局长的一再挽留，立即驱车前往小镇。当他赶到时，已是晚上 10 点钟。这时，小镇上聚集了 1 万多人欢迎他的到来，欢迎仪式在一个开阔的草地上举行，正如那个局长指出的，在这样一个保安措施简陋的小镇，进行集会真是太危险了，虽然这里的国大党（英）同志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但还是无法达到最低的要求。

拉·甘地精神抖擞地走下汽车，踏上红地毯，向用金盏花装饰的讲台走去，这时，人群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并潮水般地向他涌来。其中一个身穿橘黄色和绿色相间衣服的妇女向前涌来，似乎准备向他献花，陪同他的当地国大党负责人试图阻止。但拉·甘地示意不要拦她，并微笑着接过她的花环，这位妇女感激地一笑，接着弯腰鞠躬，像是向他行传统的印度教触脚礼时，突然一声巨响，浓烟四起……

在场的群众先是以为这是事先布置的欢迎仪式，但当看到横飞的血肉时才知道，这是一次爆炸，立即被这突然的打击惊呆了，紧接着就仓皇逃命，会场顿时乱成一团。人群中有人不断大声呼叫“我们的拉吉夫在哪儿？”但此时此刻，拉·甘地已经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叫声、喊声了。

事件发生后，地上横七竖八躺着 18 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到处是

残肢断臂。哪个是拉·甘地，人们一时也难以辨认。后来，他们发现其中有两具尸体被炸得最为厉害，一具是男尸，被炸得血肉模糊，头被炸掉一半，一条腿也被炸断，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其中一只脚上穿着洛特循运动鞋，他们断定这具男尸就是拉·甘地，因他来时正穿着这种牌号的运动鞋，但是，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另一条腿，尸体总算找全了。

据跟在拉·甘地后面几码远的一位当地记者后来报道：“当夜空中的爆竹声为一次猛烈的震动所打破时，我想这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过了好一会信我才明白这是一起爆炸事件，这时，只见一阵烟火之后，男男女女似乎像一群受惊吓的小鸟一样，夺路而逃，在发生爆炸的地方，只剩下一些断臂残腿和没有四肢的躯体。几秒前还在高呼‘拉吉夫·甘地万岁’的人群突然发出凄厉的哭喊：‘领袖在哪里？他在哪里？’然而这时他们衷心爱戴的领袖已经没有脸了，只剩下一个洞。”

当有人事后问起他时，他还心有余悸，说那是“一场从来没有做过的噩梦。”

拉吉夫·甘地，这个印度杰出的政治家，就在他即将摘取成功的桂冠时，一声巨响，无情地结束了他的梦想，他那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这一年他才 47 岁，离他母亲遇刺身亡的 1984 年不到 7 年。

斯里兰卡，这个和印度一衣带水的印度洋上的小岛国，和印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斯里兰卡的主要民族中，有两大民族：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都是发源于印度。然而，这两个兄弟民族却在这里结下了血海深仇。自从 1948 年，斯里兰卡和印度、巴基斯坦三国一起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后，也和他们一样陷入了无休止的民族冲突中。1956 年，由于斯里兰卡政府将僧伽罗语作为惟一的官方语言，引起了泰米尔人的强烈不满，不断制造反政府的骚乱，迫使政府让步，这时泰米尔人政党也组织起来，支持反政府的运动，这样，使得政府不得不在 1960 年宣布，泰米尔人使用的旁遮普语和僧伽罗语具有同样的地位，但这又遭到了僧伽罗人的反对。从此，僧泰民族冲突愈演愈烈，成为斯里兰卡的不治之症。

印度早就介入了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中，因为这与印度有一定

的关联。在泰米尔人中,有一部分是18世纪英国殖民者为了开发斯里兰卡,才迁过去的,被称为印度泰米尔人,当斯里兰卡独立后,他们没有取得公民权。从1953年开始,印斯两国政府就他们的国籍归属和遣返问题进行了长期谈判,但一直进展不大。70年代初,英·甘地执政后,立即改变了原来政策,变和平谈判为武装泰米尔人,支持他们的斗争。因此,她指示印度情报部门武装斯里兰卡泰米尔武装组织,据一位曾参与援助泰米尔人计划的印度官员透露,英·甘地曾拨款数百万美元为泰米尔人雇佣黎巴嫩和以色列军事教官,从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购买武器,先运抵泰米尔德邦,再分批通过保克海峡运抵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地区,于是,泰米尔德邦成为斯里兰卡反政府军的活动基地。

1978年,一个以泰米尔族青年极端主义者为主要成员的恐怖组织——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在斯里兰卡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宣布成立。

与此相呼应的是,1976年,由锡兰工人国大党、联邦党建立的联合阵线改组成为泰米尔联合解放阵线,他们在纲领中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自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泰米尔国”。

英·甘地之所以如此支持泰米尔人,是有她的算盘的:

如果泰米尔人取得锡兰国籍后,就不存在遣返问题,这就减轻了印度的负担。如果泰米尔人通过和平与暴力手段取得政权,必然会建立一个亲印的斯里兰卡国家,从而成为印度忠实的伙伴。

而且,通过援助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可以获得所有泰米尔人的好感,当时,在印度的泰米尔人达6000万,在这样一个民族纠纷激烈的国家,能够安抚好一个不安分的民族,无疑是清除了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炸弹。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她的援助泰米尔人的政策,虽然暂时稳定泰米尔人的分离情绪,但却留下了更大的隐患,不仅成为印斯不和的主要原因,而且,为她的儿子埋下了死亡的种子,这是她绝对不会想到的,如同她没有想到她的儿子在她的苦苦哀求下走上政治舞台其实也是向死神走出的第一步。

拉·甘地出任总理后 ,继续执行英·甘地的政策 ,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稳定 ,但在援助斯里兰卡反政府武装的政策上有了重大改变。拉·甘地虽然赞成泰米尔人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 ,却并不赞成他们闹独立 ,如果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独立成功 ,必然会影响到印度的泰米尔人 ,助长他们的分离倾向 ,加剧种族冲突 ,而且 ,从印斯双边关系上考虑 ,也不能不为了缓和而放弃援助泰米尔人的政策。1987年7月29日 ,拉·甘地访问斯里兰卡 ,同贾亚瓦德纳总统签署“关于斯里兰卡建立和平与正常状态的协议”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泰米尔人占多数的东北二省实现半自治 ,印度派5万名军队监督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反政府军停火 ,保证泰米尔人实现半自治。但在极端的泰米尔分裂主义坚持要在东北部建立独立的国家 ,继续同政府军进行战斗 ,印度军队卷入了斯里兰卡内战 ,同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多次交火 ,打死许多泰米尔人 ,而且 ,印军军纪败坏 ,烧杀奸抢 ,无所不为 ,泰米尔人因此对拉·甘地怀恨在心 ,蓄谋刺杀他 ,而且 ,早在1987年他访问斯里兰卡时 ,在机场检阅仪仗队时 ,一名泰米尔人士兵突然举起枪托向他头部猛击 ,他一闪躲 ,枪托从他肩部滑下。

1989年 ,国大党(英)在大选中的失利导致了拉·甘地的下台 ,1990年3月 ,印度新政府撤回了驻斯里兰卡的军队。

但是 ,新政府由于丧失民心 ,摇摇欲坠 ,只好宣布大选 ,眼看拉·甘地就要在大选中获胜 ,泰米尔人担心他上台后恢复1987年的印斯和平协议 ,便开始进行一次新的暗杀行动。

拉吉夫·甘地遇难后 ,情报和司法部门立即派人赶到现场调查。

在调查中发现 ,杀手所使用的炸弹是美国生产的“回旋加速亚甲基三硝基甲苯炸弹” 。这种炸弹爆炸时像有成千上万个直径1毫米左右的球形弹飞出 ,杀伤面积大 ,很容易击中目标 ,从现场躺着的18具尸体上都发现了这样的飞弹 ,爆炸力虽然如此之大 ,但调查人员发现 ,爆炸时没有留下弹坑 ,这说明炸弹不是埋在地下 ,也不是放在讲台上 ,那么这颗炸弹从哪儿来的呢 ?这时 ,调查人员注意到另一具被炸得最惨的女尸 :她上身被炸断 ,头被炸到4米之外 ,但脸部完全无损 ,她的背上还留着爆炸的痕迹 ,身旁还留有半截皮带、引爆装置和金属丝等。因此 ,调查人员认为是这名妇女将炸弹绑在背上 ,当她向

拉·甘地行触脚礼时，引爆了炸弹。她是谁？为什么心甘情愿充当这种自杀性的“人体炸弹”？人们立刻想到了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这个组织曾使用过这种“人体炸弹”。1990年8月，该组织的贾夫纳基地突然陷入政府军的重围，为了突围，派出一名15岁的小男孩身上捆满了可塑炸药去轰炸政府军的一个据点。

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是世界上纪律最严密、战斗力最强的武装组织之一，该组织领导人对下属实行极权式统治，下属对上级绝对忠诚，任何人不得抽烟、喝酒，男女私通者一律处死，所有的成员对敌人残酷无情。

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个妇女很可能同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联系，是接受该组织的指示干的。但是印度政府中有人并不同意这种分析。他们的理由是，拉吉夫·甘地今年3月初曾会见过猛虎组织的代表，表示愿意向该组织让步，拉·甘地还说服看守总理谢卡尔同意将该组织的伤病员送到泰米尔纳德邦治疗，猛虎组织的代表对这次会见很满意。

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各有理由，却没有有力的证据，人们感到非常厌恶。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5月25日印度中央调查局成立的“特别调查小组”，这个小组是由印度几个最著名的刑侦专家组成，专为破获这起政治谋杀案而设立的。

经过1个多月的明侦暗查，终于查清了这个案件的内幕。7月2日，印度中央调查局宣布，这件案已完全查清，7名重大嫌疑犯被逮捕，其中3名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4名为印度人，并已查明上述7人的幕后总指挥是西瓦拉西，现已在追捕中。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暗杀拉·甘地，1990年10月，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头头普拉巴卡拉在北部丛林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具体策划。为此，他们成立了4人行动小组，组长西瓦拉西，一个游击队的著名领导人和制造炸弹的专家，其成员包括苏帕、佳雅达利和穆鲁甘。佳雅达利20多岁，是泰米尔人，1987年以前是一个企业家的女儿，但是，这一年被前来围剿猛虎组织的印军侮辱后，她成为该组织的一员，苏

帕·混血儿,一个年仅20岁的美丽少女,同样的遭遇使她加入了猛虎组织。

西瓦拉西行动小组潜入印度后。立即在泰米尔德邦潜伏下来,一方面网罗人马,一方面寻找机会干掉拉·甘地,不久他们的小组里增加了几名新成员。

为了保证暗杀成功,他们进行了两次演习性质的行动,本来,他们已有两次机会,一次是拉·甘地参加泰米尔德邦首府的马里纳海滩集会,另一次是5月12日前总理辛格的集会,拉·甘地也去了。都由于无法接近拉·甘地本人只得放弃了,但是这两次演习使他们认识到,只有行触脚礼时才能逃过军警人员的各种设施接近谋杀对象。5月20日,当西瓦拉西得知拉·甘地将于21日去斯里佩鲁布杜尔镇参加群众集会时,不由得一阵狂喜,他们早就对这个小镇作了详细的侦查,知道这里治安力量最为薄弱,是理想的暗杀场所,因此,他们决定21日在这里动手。

5月21日,西瓦拉西一行4人来到了这个小镇,西瓦拉西的旅行包里,还有4个装好的炸弹,其中2个备用。到达小镇后,立即进入一个事先预订好房间的旅馆,稍事休息后,佳雅达利和苏帕来到了会场。这时,当地国大党(英)党员们正在舒拉曼的带领下忙着布置会场,苏帕向舒拉曼走去,告诉他她们来自康奇普拉姆的国大党党员,是拉·甘地忠实选民,希望能在晚上集会时向拉·甘地献花。舒拉曼告诉她们,只有持所在区的国大党领导人的介绍信,才能得到给拉·甘地献花的许可。苏帕听后感,这真出人意料之外,她们本来计划好利用献花的机会进行刺杀,可现在不允许献花,一切岂不是要泡汤?她的神态变化也使舒拉曼察觉到了,不过他认为只是因为不能献花而失望,因此,他告诉她们,以后还有机会的不要伤心。

他没有想到,这两个美丽的女人是死神的使者,是来向拉·甘地宣读死亡判决书的。

回到旅馆,他们立即向西瓦拉西报告。西瓦拉西听后也是一愣,他也没有想到,献花竟然要得到什么批准,现在再准备已来不及了。是继续行动还是取消这次行动呢?他一时也难以抉择,他陷入苦苦的思索中……

他想起了离开斯里兰卡之前，普拉巴卡拉曾专门设宴为他们饯行，宴会中，普拉巴卡拉，这个泰米尔人的英雄，亲自为他倒酒，并举杯祝他胜利归回。

他想起了苏帕、佳雅达利，这两个年轻的姑娘为了参加这次行动，几次向他请求，她们并非不知道行动的成功对她们意味着，不是鲜花，也不是美酒，而是同归于尽，当她们动身前，佳雅达利的父亲又被政府军枪杀在他的办公室里。

“干……”他下定了最后决心。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绝对不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由佳雅达利作为第一杀手，因她年龄大，经验也比苏帕丰富，而且复仇心切，利用群众欢迎拉·甘地时混乱中接近他，引爆炸弹。如果佳雅达利失败，就由隐藏在会场附近的苏帕进行第二次行动，一定要把拉·甘地的生命留在这里。

永远留在这里！

晚上9点钟，佳雅达利和苏帕来到了会场，为了不引起怀疑，佳雅达利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坐下。

当拉·甘地的车到达时，她立即随着欢迎的人群向前涌去，并迅速挤到了拉·甘地的身前，这时，下午见到过她的舒拉曼见她上前，心里格登一下，准备拦住她，但不明就里的拉·甘地阻止了他。佳雅达利心里一喜，将花环戴上拉·甘地的脖子后，趁势弯下腰去，使人们误认为她在行触脚礼，这时，她拉响了身上的炸弹……

佳雅达利成功之后，西瓦拉西和苏帕等人立即返回泰米尔德邦，准备南渡斯里兰卡，但是，印度政府已宣布国家进入一级戒备状态，边境已经封锁。

一个多月后，苏帕等人陆续被捕，但元凶西瓦拉西仍然逍遥法外。

人们等待着……

中篇 :世界反恐怖组织公布的 恐怖组织名单

西班牙的“埃塔”和“非法突击队”

在西欧国家中 ,西班牙的政治局势是动荡的 ,社会秩序也不稳定 ,西班牙国内的恐怖活动之猖獗几乎不亚于意大利。

西班牙的恐怖组织名目繁多 ,从这些组织的规模、活动能力和它们对西班牙政局的影响来看 ,“埃塔”是首屈一指。“埃塔”对西班牙社会的威胁和危害最大。

“埃塔”是巴斯克语“巴斯克民族与自由”的缩写。从“埃塔”这个名称来看 ,这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组织。它的目标是争取巴斯克地区的自治和分离。因此 ,有人把“埃塔”称为“巴斯克分离主义者”的组织。

巴斯克问题是西班牙国内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要想知道巴斯克问题的由来 ,还要从它的历史说起。

在法国的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交界处 ,耸立着比利牛斯山脉 ,古老的巴斯克族人分居在山脉的两侧。据 1979 年的统计 ,全世界共有 250 万巴斯克人 ,除了一部分在法国、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谋生外 ,大部分聚居在西班牙境内的比斯开吉普斯夸、阿拉瓦和纳瓦拉四省 ,大约有 150 万人。这四个省被称为巴斯克区。其面积有 1.76 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三点五 ,全区人口 240 万 ,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三。

巴斯克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有其独特的历史 ,有着区域自治的传统。15 世纪以前 ,巴斯克人实行民主选举部族委员会的制度 ,各部族都有自己的法律 ,称之为“法规”。西班牙立国后 ,西班牙的其它

地区都遭受过外族统治,唯独巴斯克地区仍保持着自治地位。历代君主都承认巴斯克的法规制度。巴斯克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享有独立性相当大的民族权利。直至1976年7月21日,当政的西班牙王室才废止了巴斯克的法规制度。因为,巴斯克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支持的是后来失败的一方。

此后半个多世纪,巴斯克人为恢复民族自治权而进行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巴斯克人与西班牙中央集权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936年,人民阵线掌权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批准了新的巴斯克自治宪章。允许巴斯克人在一种联邦形式范围内实行民族自治。同年,佛朗哥发动叛乱。他借助纳粹的炮弹破坏了巴斯克自治政府。对巴斯克自治政府所在地格尔尼卡进行了“饱和轰炸”,炸烂了巴斯克民族的象征——“格尔尼卡树”,几乎把这个美丽的小城夷为平地。随后,佛朗哥取消了巴斯克自治权,并宣布吉普斯夸、比斯开二省为“犯罪区”,对巴斯克民族实行了政治上的歧视。内战结束后,独裁政权捕杀了大批巴斯克民族主义战士,在巴斯克地区派驻大批军警,实行恐怖统治。这种高压政策,以及禁止巴斯克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激起了巴斯克人的强烈反抗。

许多青年组织起来,武装袭击当地驻军、警官和政府机构,巴斯克问题在佛朗哥统治的最后几年成为西班牙政治危机的导火索。1975年9月,佛朗哥在死前两个月,还亲自批准处决了5名巴斯克青年。

在如何解决巴斯克问题方面,绝大多数巴斯克人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争取尽可能多的自治权利,反对分裂。持这种主张的最主要的政治代表是“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巴斯克人主张巴斯克自决,持这种主张的主要政党有“人民团结”和“巴斯克左派”等。还有一个在1958年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中分裂出来的组织,这就是“埃塔”,它主张西班牙和法国的巴斯克区从两国独立出来,成立“巴斯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埃塔”成立后,以法国的巴斯克地区为基地,以三五人的战斗小组出没活动。以革命暴力反对法西斯统治者的暴力,惩罚了一些法西斯刽子手,甚至处决了佛朗哥原来的继承人布兰科。这些行动得

到了西班牙公众的支持和拥护。

1975 年 11 月 22 日 ,胡安·卡洛斯登基 ,结束了佛朗哥的长期独裁统治。新国王上任后 ,就宣布改革独裁体制 ,推行“政治民主化” ,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恢复巴斯克的地方自治。经过三年的反复协商 ,西班牙众议院宪法委员会和巴斯克议员大会代表团联席会议终于在 1979 年 6 月 21 日一致通过了《巴斯克区自治章程(草案)》(以下简称《章程》)。其中规定 :巴斯克人民为体现其民族性 ,在西班牙国内组成自治体 ,定名为欧斯卡迪(巴斯克区的民族名称)或巴斯克区 ,辖巴斯克区四省。

1980 年 11 月 11 日 ,《章程》生效 ,巴斯克区成为国内首批自治区之一。《章程》的通过 ,是长期以来巴斯克人民为争取民族权利而坚持斗争的成果 ,也是巴斯克区民族主义党派同中央政府相互妥协的产物。除少数组织和极右势力外 ,西班牙社会各界对此都比较满意。

随着西班牙政治生活向着代议制方向发展的进程 ,许多政党都获得了合法的地位。经过 40 年法西斯统治的西班牙人民渴望民主安定的生活 ,希望通过各政党、各派别的合作来巩固尚在建立中的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制度。同时 ,人们也不愿意看到“埃塔”再搞暴力活动。这个时候 ,“埃塔”内部发生分裂 ,分成“埃塔政治军事派”和“埃塔军事派”。分裂导致了内讧 ,“埃塔军事派”的人杀害了“埃塔政治军事派”的领导人。从此以后“埃塔”就逐步成为名符其实的恐怖组织。

“埃塔”声称 ,绝不会因为《章程》的通过而停止恐怖活动 ,自 1979 年起 ,“埃塔”搞的恐怖活动有增无减。每年大约有 100 人丧生 ,其中政府官员、军警是跟踪暗杀的主要目标。他们抢劫银行、爆炸电台 ,搞得人心惶惶 ,国内动乱不已。

“埃塔”组织的核心人物总共不超过 30 人 ,其中多明哥·伊图尔贝是最高决策人物 ,他是车床工出身。他直接掌握着“埃塔”的突击队、武器和资金。

“埃塔”整个组织分两大类 ,一类叫“非法突击队” ,是“埃塔”的主力军。所有影响重大的暴力活动都是由这种突击队搞的。据说 ,目

前有 7 个这种突击队在西班牙各地活动。另一种叫“合法突击队”，是由 20 岁左右的青年组成的。其成员一般都在“埃塔”基地受过两周左右的军事训练。他们基本上都有职业，平时生活很正常，靠自己的工资收入生活，在进行一些暴力活动之后照常工作。同时，这些青年对“埃塔”组织的内部情况一无所知，有点像“埃塔”的外围组织。这一来，“合法突击队”成员的被捕就不会危及“埃塔”组织系统的主要部分。最近几年，西班牙警方已经破获了三四百名这样的合法突击队成员，但是，“埃塔”组织并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害。近几年来，“埃塔”几经分化。有“人民团结”的左派参加，也混入一些法西斯极右分子，这些人借“埃塔”的武装活动制造混乱，反对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埃塔”宣称，“埃塔”搞恐怖活动的战略是要引起“行动——镇压——行动”这样一种螺旋形的升级，来激化国内的政局，从而造成所谓的“革命形势”，达到“结束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根据这样一种战略，“埃塔”搞暗杀活动几乎是无选择的。“埃塔”的成员有时接到的命令就是刺杀将军，杀死哪一个将军都可以。于是，恐怖活动接连发生。据统计，1977 年 10 月以后的三年中，“埃塔”暗杀了 254 人，绑架过 83 人，搞了 342 次大的爆炸。

最近十几年来，“埃塔”已制造了 1000 多起恐怖事件，他们主要使用三种恐怖手段：暗杀、绑架和爆炸。

暗杀是“埃塔”恐怖分子的拿手好戏。出于制造混乱的目的，“埃塔”暗杀的对象几乎是不加选择。头目们要求干掉一个将军，这意味着打死任何一个将军都行。在他们手下，已有许多名高级军官丧命，其中至少包括 8 名将军。至于身遭不测的普通警察和平民，更是数不胜数。据马德里《星期一报》透露，仅从 1977 年 7 月到 1980 年 7 月，“埃塔”就杀害了宪警、国家警察、检察长 193 人，无辜平民 94 人，另有 7 名市长和 6 名工业家遇害。

绑架也是他们得心应手的恐怖方式。他们选择的对象多是西班牙的政府官员和商人，外国人还没遭受过此类袭击。起初，绑架的目的是为了索取酬金来筹集活动经费，大部分被绑架者都在交纳赎金后获释。后来，他们把绑架的目的渐渐转向政治要求方面。1983 年 10 月，“埃塔”绑架了马丁·巴里奥斯上尉。恐怖分子释放上尉的条

件是 政府立即释放在押的 9 名恐怖分子。由于政府拒绝了这一政治讹诈 ,“埃塔”恐怖分子处死了马丁·巴里奥斯 ,并把他弃尸街头。

“埃塔”也比较擅长使用爆炸手段。他们既炸警察局、军营 ,也炸闹市区的商店、餐厅和停车场。1973 年 4 月 ,“埃塔”在马德里街头埋设炸药 ,炸死了佛朗哥的原定接班人、政府总理卡雷罗海军中将 ,使人们拍手称快 ,但后来 ,他们在西班牙旅游区搞爆炸 ,尤其经常在海边安放炸药 ,影响西班牙的旅游业 ,破坏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 ,引起了旅游区居民的强烈反对。

几十年来 ,“埃塔”分子凭借机警狡诈的反应 ,诡秘的行踪 ,制造了一起起恐怖事件 ,干下了一系列血腥勾当 ,对西班牙社会产生严重的威胁和危害 ,被称为“西班牙最准的短剑”。

只要一提到这把“短剑” ,西班牙人就会禁不住内心震颤 ,想起一幕幕人们被害的惨烈场面。

意大利的“红色旅”

人们曾把意大利称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看来有些道理。意大利国内搞恐怖活动的组织名目繁多，成员复杂，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就这些组织的思想倾向而论，大致可分成“左”与“右”，前者多半出现在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的群众运动高涨时期，后者主要指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势力。“左”派与“右”派组织所宣扬的目标虽有着天壤之别，但就他们搞的恐怖活动来看却是大同小异，令人难以分辨。这两类组织的存在和他们搞的恐怖活动使意大利社会处于动荡之中。意大利国内这种恐怖活动繁多，各种组织林立的情况同意大利的政治、社会状况和历史渊源不无联系。

意大利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就尝到法西斯主义统治滋味的国家之一。墨索里尼的反动统治延续了 20 年之久。战后，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统治是虚弱的。虽然有美国为后盾，它仍是当时欧洲最不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这表现在阶级矛盾尖锐、政局动荡和政府更迭等方面。战后，意大利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很快，但也遇到不少困难，失业人数较多，不少人受到来自经济上的威胁和打击，这些人感到被社会抛弃了。那些对社会不满的人成立“左”派组织，走上搞恐怖活动的道路，“红色旅”就是一个典型。而意大利的黑手党早就存在，它搞的恐怖活动使一些人受到影响。

1968 年，意大利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继出现高潮。

1969 年秋天，意大利的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掀起了“秋热”工潮。

在这种情况下,“红色旅”开始酝酿成立。它的创建人和最早的成员有的是米兰工业城市中西门子工厂中的工人,有的是都灵市特伦多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创建人之一雷纳托·库乔就是特伦多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这些人在不断参加当时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的同时,逐渐产生了组织城市游击队的想法,他们从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南美洲的格瓦拉城市游击队的模式中获得启发和鼓舞,从传统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革命思想中取得经验。到了1969年底,“红色旅”成立了。它的徽号是一枚环绕着圆圈的五角星。它的创建人除了库乔,还有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

如果说,库乔为“红色旅”奠定思想基础的话,那么,社会学家乔治·塞梅里亚则为它制定了组织原则。红色旅的组织极为严密,它的最基层单位是小组,成员人数不超过5个,其中只有一个人同上级联系。每六个小组组成一个“核心”,在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再由各地的“核心”组成旅部。从而形成像金字塔一样的组织系统。平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一个小组的成员落网,绝不会牵连到其他小组。

从1969年底成立到70年代初是“红色旅”的初创时期。那时,它主要是以米兰市为中心,组织、训练所谓“历史性的核心”。“红色旅”中的学生们在工厂策动罢工,并向工人宣传“革命”的思想,力图促使意大利发生革命。

与此同时,“红色旅”进行了最初的“战斗”,这就是名为“使权力机构残废”的活动。

在罗马的国会大厦前,在威尼斯机场,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相继发生射击官员膝盖的事件。

“红色旅”认为,政府官员是为权力机构效劳的,官员的残废象征着政权的瘫痪。除此之外,“红色旅”还纵火烧毁或炸掉一些私人企业,袭击保守派政治家和右翼活动分子。

在“红色旅”活动的初期,行动经常得手,成员不断增多。这个组织似乎有理论、有纲领,鼓吹走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标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组织。这一切强烈地吸引着社会各阶层中对现实不满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红色旅”在这一时期很快发展

到 400 多人。

1974 年 9 月，“红色旅”的两个“历史性领袖”——雷纳托·库乔和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一批骨干成员。这标志着它初期阶段的结束。而它的所谓“第二代”活动分子则在杀人的标记下开始了新阶段的恐怖活动。此后，意大利不断受到“红色旅”的恐怖活动的冲击。

“红色旅”一直擅长于搞绑架活动。1973 年 12 月，它由于绑架了都灵的非亚特公司的人事部长埃托雷·阿梅里奥而大出风头。1974 年 4 月，它又绑架了热那亚的检察官马里奥·索西。

1975 年 2 月，库乔的妻子玛格丽塔·卡戈尔组织了劫狱，把库乔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她自己则在行动中被警方击毙。同年夏天，库乔再度被捕。然而，对库乔的审判却迟迟进行不下去，库乔在法庭上不断对审判者发出威胁，“红色旅”分子在外面极力阻挠审判，并扬言再次劫狱。

柯罗希是都灵市一位有声望的律师。政府指定他给库乔担任辩护律师。库乔对此不屑一顾。柯罗希并不因为他的拒绝和威胁而放弃为他辩护，仍然收集资料，做出庭的准备。没过多久，柯罗希在距离他自己的寓所只有咫尺的地方被人枪杀了。他手中还拿着装有为库乔辩护的材料文件包。“红色旅”称此事是它所为。

审判拖了很久才重新开始。当时法院的大法官好不容易才组织了一个陪审团，并定于 1978 年 3 月 16 日进行新的审判。可是，就在审判的前一天，3 月 16 日，发生了“红色旅”绑架意大利当时的总理、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主席阿尔多·莫罗的事件。这次绑架震惊了意大利，也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

“红色旅”在绑架了莫罗之后，不断地发出公告，要求同政府对话，要求用莫罗交换库乔。“红色旅”还发表了莫罗本人的多达 80 封的亲笔信。莫罗的信呼吁政府答应“红色旅”的要求。这一切都受到政府的拒绝。政府持不同恐怖分子对话的强硬立场。失望的“红色旅”感到莫罗失去了要挟政府的作用，就在扣押他 56 天之后，将他枪杀。以此给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红色旅”杀害莫罗的行径受到意大利公众普遍的指责。人们开

始疏远“红色旅”，一些过去同情、支持它的人也纷纷改变了立场。它在意大利人民中间的形象变得异常丑恶。可以说，绑架并杀害莫罗是“红色旅”达到极盛时期的标志，也是它开始走向衰落的起点。

“红色旅”内部也出现了混乱。从那时起，“红色旅”分裂成两派：一派叫“军事派”，主张用恐怖手段杀害一切“敌人”；另一派叫“运动派”，主张从事推翻国家机器的活动，但也不过是空谈“革命”。

1978年以后，“红色旅”在新的领导人马里奥·穆雷蒂——一个34岁的米兰西门子工厂的电工——周围重新整顿组织起来。穆雷蒂1975年以来专门负责与国内外其它组织的联系。

意大利警方在对付“红色旅”方面曾一度无能为力。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警方获得一些重大突破，破获了“红色旅”几个武器库，逮捕了“红色旅”的许多活动分子，其中包括它的最高层领导人。于是，警方认为，“红色旅”这个最危险的恐怖组织已经被摧毁了。但是，警方做了错误的估计。“红色旅”的活动到了80年代仍然没有停止，只不过是它的活动能量不如从前了。

1980年1月，“红色旅”分子暗杀了意大利西西里区议会的议长马塔雷拉。

1980年4月，“红色旅”米兰纵队袭击意大利天民党的米兰地区办事处，造成四人腿部受伤。当人们闻讯赶来时，只见前众议院议员纳迪尔·泰德索比和埃罗斯·罗比安以及另外两个受害者躺在血泊中。

1980年12月，“红色旅”绑架了那不勒斯市负责监狱事务的官员乔瓦尼·杜尔索，要求关闭建立在撒丁附近一个岛上的中世纪地牢式的监狱。这一次它达到了目的。

1981年4月，“红色旅”绑架了那不勒斯市的政治活动家、天民党中央负责住宅事务的部长齐罗·齐里罗。“红色旅”扣押了齐里罗，还使用录像，显示出他的形象，并威胁说要杀死他。“红色旅”分子提出的要求是：关闭市内公园，把空闲的私人住宅分给在1980年地震中失去住处的人。当它的这些要求得到满足时，它宣布“齐里罗妥协”已经达成。“红色旅”分子勒索了天民党和齐里罗家庭的100万以上的赎金之后，就释放了齐罗·齐里罗。

1981年上半年,“红色旅”扣押着三名被绑架的人质。一个是某化学公司的经理,后来由于这个经理拒绝同“红色旅”分子合作而遭杀害。另一个是阿尔法汽车制造厂的经理伦佐·桑德鲁奇,释放他的条件是,要这个工厂放弃一个解雇工人的计划;同时,在1980年9月被解雇的500个工人要重新被录用。当这些要求得到满足时,“红色旅”米兰纵队释放伦佐·桑德鲁奇。第三个人质是一个前“红色旅”成员的兄弟,那个“红色旅”分子在被捕后向法庭自首坦白了,于是它就扣押了他的兄弟作为报复。

到了1981年底,“红色旅”又进行了一次轰动世界的绑架活动。这次绑架的对象是“北约”组织在南欧地面部队的指挥官、美国陆军准将詹姆斯·多齐尔。这是“红色旅”第一次绑架一个外国人。

后来,据绑架多齐尔的“红色旅”头目安东尼奥·萨瓦斯塔交待,他们打算绑架一个“北约”的美国将领,以扩大影响,赢得更多的支持。但是,他们不知道应该绑架谁。在维罗纳,他们买了一本关于美军官兵的小册子,从书上得知多齐尔是在维罗纳的“北约”基地任职的惟一美国将领。于是,他们就把他当成目标。

12月16日,“红色旅”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的一所公寓里绑架了多齐尔,并把他扣押在维罗纳附近的帕多瓦的宾得蒙大街二号公寓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就在这个“人民监狱”对“北约组织的刽子手”进行“人民的审判”。

绑架多齐尔并不是偶然的行动。1981年下半年,“红色旅”就曾宣称,要从秘密活动组织走向高度集中的政党,进行全面的斗争。其首要目标是美帝的多国中心。还宣布要建立“恐怖国际”,以“红色旅”和联邦德国的“赤军派”为中心,并联合西班牙的恐怖组织“埃塔”和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多齐尔事件”就是红色旅的一次政治示威行动。

然而,“红色旅”这次行动彻底失败了。

多齐尔被绑架之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配合下,意大利保安机关调动空前规模的力量,进行了大搜捕。警方还以“多齐尔之友”组织的名义悬赏170万美元,征求有关多齐尔下落的重要情报。同时,警方还采取有重点地袭击“红色旅”据点的办法,逮捕了一些恐怖分

子 ,缴获了大量的重要材料。

被称为“红色旅”的“理论家”的吉奥万尼·申柴尼是这个组织的重要领导成员。他原是大学教授 ,一年前转入地下 ,警方一直在追捕他。1984 年 1 月 9 日 ,警察终于在罗马郊外的一间学生宿舍里把他逮捕了。这就是根据头一天被捕的两名恐怖分子提供线索找到的。

据统计 ,意大利警察当局在营救多齐尔和逮捕“红色旅”的活动中 ,逮捕了 130 多名“红色旅”分子和嫌疑分子 ,其中包括一些“红色旅”的重要头头、破获了 35 个“红色旅”的据点 ,缴获了大量机密文件和武器弹药。

1982 年 1 月 28 日 ,警察冲进了宾得蒙大街二号的“人民监狱” ,成功地救出了多齐尔 ,并且当场逮捕了 5 名“红色旅”分子 ,其中 2 名是警方早已追捕一年多的“红色旅”的重要成员。这两个人是“红色旅”罗马支队的头目安东尼奥·萨瓦斯塔和他的女友爱米利姬·利贝拉。他们曾拒捕逃脱 ,并被缺席判处有期徒刑 30 年。这次警方终于抓住了他们。

“红色旅”这个意大利社会和欧洲“革命”思想的混合畸形产物 ,1982 年又一次受到致命的打击。过去曾经表现得顽固不化的“红色旅”分子中的许多人都承认自己失败了。

皮斯是前“红色旅”的骨干分子。他在 1980 年 2 月 ,被捕后向法庭供认 ,他曾经在“红色旅”的一个基层组织中参加了 16 次恐怖袭击活动。他说 ,“我在红色旅呆了六年 ,现在认识到我们的斗争已经失败。这就是我同当局合作的原因。”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982 年 6 月 9 日的一篇题为《悔过的‘红色旅’分子》的文章介绍 ,有不少“红色旅”分子由于绑架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的案件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这些人中一部分是“悔过者” ,他们转变了立场 ,并向法官供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另一部分人则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继续采取敌对态度。这两部分人互相仇恨。但是 ,他们都承认 ,“红色旅”的强大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绑架多齐尔的头子安东尼奥·萨瓦斯塔和他的女友爱米利姬·利贝拉也悔过了。随之还有一些人转变了立场。他们承认 ,“红色旅”的目的没有达到 ,他们的斗争失败了。

1983年1月27日法新社罗马分社的消息说,囚禁在帕尔米高级治安监狱里的前“红色旅”领导人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他们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这件声明由《共和国报》公开发表,文件的署名是“帕尔米集体领导”,主要领导人1974年被判为终身监禁,后来曾逃跑,又被重新审判的意大利“红色旅”创建人之一雷纳托·库乔。

尽管“红色旅”受到严重挫折,它并没有就此从意大利的政治舞台上消失。1983年5月,“红色旅”新的领导机构又出现了。它发表了一份长达28页的文件,声称“为了制定新的斗争纲领和路线,并创立战斗的组织,我们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实行了战略退却”。

到了1984年,新的恐怖活动又出现了。2月15日的傍晚,在罗马的繁华市区,一辆高级轿车停在一座二层楼房的前面。突然,有三个人从街对面停着的一辆蓝色卡车上跳下来,向那辆轿车猛烈扫射。开轿车的司机高喊着让车里的人卧倒。汽车的厚钢板和三层防弹玻璃挡住了子弹的袭击。这时,一个恐怖分子扫射小汽车后窗的边缘。一颗子弹穿过了后窗边缘的橡胶圈,击中了一个美国人的头部,他当场死亡。他就是驻西奈的多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负责人,住在罗马的56岁的美国外交官利蒙·亨特。事情发生后半小时,米兰广播电台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说袭击事件是他们干的。意大利当局确信这个组织是“红色旅”的又一个极端分子的派别,这次事件表明,经历了两年的失败之后,“红色旅”又再次兴起,开始活动了。

尤其让意大利当局担忧的是,“红色旅”的逃亡国外的恐怖分子可能已经和中东一些激进的伊斯兰国家的恐怖分子合流了。被杀的美国人亨特并不是高级官员。他遭暗杀显然是与中东的局势有关。是他担任的职务使他成为袭击的目标。

意大利当局认为,亨特暗杀案是自1981年绑架多齐尔的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恐怖事件。

看来,“红色旅”还顽强地存在着!

意大利的“黑手党”

玛菲亚

今天 ,黑手党已经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恐怖组织 ,美国的黑手党早已蔚为大观 ,成为左右美国政治的一大势力 ,据说 ,美国总统肯尼迪就死于黑手党之手。俄罗斯的黑手党我们也已经耳闻 ,在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黑手党更不是一个新鲜名词。但是 ,黑手党的老巢却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而其存在的时间 ,竟然长达 8 个世纪 ! 这个记录足以令其他恐怖组织自惭形秽 ,因为它们大多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才产生的。

黑手党的意大利名称是“玛菲亚” ,中国人称其为黑手党 ,其实玛菲亚这个词与黑手党的意思没有任何关系。传说 ,以前的黑手党分子作案后习惯在现场留下一些印记 ,如一只黑手 ,交叉的骷髅 ,因此 ,中国人习惯称其为黑手党。应该说 ,这个名称比它的意大利原名更形象 ,更贴切。

今天的黑手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恐怖组织 ,但是 ,当年的玛菲亚却并不是如此。它原本是一个贫苦农民为求生存而联合起来的秘密帮会组织 ,因此 ,当年它的成员无一例外来自农村 ,出身都很贫穷 ,成员之间经常互相帮助 ,能够同舟共济。因此 ,它与当年中国的绿林好汉、与英国出现的打家劫舍的罗宾汉有相同之处。如果农家妇女遭到贵族摧残而官府又拒绝审判强奸犯时 ,玛菲亚会自作主张将罪犯处死。如果警察无端欺负一个贫民 ,玛菲亚也会帮他出头 ,处死那个

警察,即使是邻居间发生纠纷,玛菲亚也会不请自到,帮助他们分个是非曲直。因此,年复一年,黑手党在西西里的作用日趋突出,变得比政府还要权威,西西里人渐渐地离不开黑手党了。在他们的生活中,黑手党变得像一日三餐一样重要。能成为一名黑手党成员,自然是一件崇高的事情。黑手党首领所到之处,村民会列队欢迎,男人争着握手,女人则争先送吻。1954年老死家乡的黑手党首领唐·维齐尼,虽然本人目不识丁,但其葬礼之隆重,连意大利国王也会嫉妒。乌黑的高头大马,拉着维齐尼巨大的灵柩,在长街上缓缓行走。成千上万的村民如丧考妣,低头紧随其后,牧师竭尽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词汇全部奉献给维齐尼。巴勒莫的市长这样评价维齐尼:“他是穷人的朋友,从来没有忽视过求助他的人。”教堂的铭文是这样写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讲信用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一个值得依赖的人。”有这样的评价,维齐尼上天堂是没有问题了。

黑手党分子把荣誉和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有的黑手党分子,穷得家徒四壁,连张床也没有,但是,为了在人前摆阔气,他加入黑手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件丝绸衬衣,然后招摇过市,他们不仅留恋自己所属的“光荣社团”,而且还陶醉在“我们的事业”中。一名黑手党分子已经上法庭成了被告,但他还是一本正经腑诉法官:“法官先生,当您年老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您一想起我们今天的会晤你就会懂得,我非常认真地遵守了大自然的规律并且正面而自觉地履行了职责。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黑手党自成立伊始,就是一个崇尚暴力的组织。它有为穷人出头、替百姓伸张正义的一面。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意大利的黑手党就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黑手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蜕变成一个从抢劫、暗杀、绑架、投机倒把、开妓院到走私、贩毒无恶不作的令人切齿痛恨的犯罪团伙。他们凭借暴力,控制了西西里岛上的畜牧、屠宰、果园和港口,并向私人业主收取保护费。丰收时节,如果农民不邀请黑手党成员充当保护者,那么,黑手党就会在一夜之间将庄稼全部破坏。如果他还执迷不悟,那么,黑手党会毁掉他的全部牲畜,用血腥的方式告

诉他 :你是活够了 ! 竟敢无视黑手党的存在 ! 最后 , 农民只好就范 , 请毁掉他庄稼的黑手党分子充当自己的保护人 , 并把一半收成交给黑手党。通过这种方式 , 黑手党在西西里全岛确定了自己的权威 , 并把这种权威扩展到整个意大利 , 进而扩展到全世界。

黑手党的性质发生蜕变 , 但是一些做法却传了下来。加入黑手党是一个“高尚”的事业 , 全体黑手党分子要以此为荣 , 西西里黑手党组织的名称就叫“我们的事业”。在吸收新成员时 , 黑手党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先在蜡烛上方燃烧一张画有颅骨和两根交叉骨头的纸 , 然后主持人振振有词地朗读一遍黑手党的宗旨 : 加入黑手党后 , 要惩强扶弱 , 杀富济贫。然后 , 他用针将宣誓人的一只手指刺破 , 让血滴在圣像上 , 接着 , 让圣像在宣誓者的手上点燃 , 宣誓者必须忍受火的烧灼 , 不停地将圣像从一只手倒腾到另一只手 , 并宣誓 : “我以自己的人格宣誓 , 忠诚于我们的团体 , 就像我们的团体将会忠于我一样。这幅圣像正在化为灰烬 , 再也不能变成纸了。我的鲜血正在流淌 , 永不复返。我也永远不能脱离我的团体 , 如果我不能信守誓言 , 我的肉体也会像圣像一样燃烧。”经过这一番庄严的宣誓 , 一个黑手党分子就诞生了。

维系黑手党的是严格的纪律 , 这就是所谓“七诫” : 一、守口如瓶 ; 二、组织高于个人 ; 三、不得违抗上级命令 ; 四、不得叛变自首 ; 五、对家人保密 ; 六、不得擅自搞绑架票活动 ; 七、兄弟之间严禁斗殴。一个人一旦加入黑手党 , 他就不再属于自己了 , 而是必须听从组织的。除非经组织批准 , 否则不准中途退出黑手党。曾有一位黑手党的家长想洗手不干 , 但是黑手党的纪律不允许他这样做 , 他只得继续干下去 , 直到被杀。至于对付黑手党内部的叛逆分子 , 黑手党更是毫不留情。1973 年 , 黑手党分子莱奥纳尔多·维塔莱曾向一名警察供出了巴勒莫市前市长维托·钱奇米诺与黑手党有牵连 , 他立即遭到了黑手党的报复。他被关在狱中 , 遭到毒打 , 后来又被送进疯人院 , 继续受折磨。最后 , 他被从疯人院里放了出来 , 却被杀死在大街上。黑手党杀死叛逆者后 , 通常会在他的嘴里塞上一个小木塞 , 以警告那些告密者。因此 , 黑手党分子被捕后 , 宁死也不愿坦白。这就使政府的扫“黑”行动增加了难度。

黑手党的组织结构也十分复杂。每一个黑手党分子都是一条“好汉”，他们是黑手党的基本细胞，每条“好汉”隶属于一个家族。家族里有家长、副家长，负责管理家族日常事务。1990年，意大利的黑手党共有142个家族，其中有42个大家族。家族之间通过一个委员会联系。在意大利，凡有黑手党的省份都有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可以在任何一个家族的势力范围内杀人，而不用通知家长。当委员会决定杀人时，它就组织一个行刑队，行刑队长有权挑选队员。他们的行动，除执行者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委员会上面还有一个由11人组成的委员会，称11人委员会，地点设在巴勒莫，这是黑手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凌驾于所有黑手党家族之上，也是黑手党世界最高的权力机构。11人委员会里面有一个教皇或教父。像格列科，就曾黑手党的教皇。这是黑手党内的最高职位。

意大利黑手党也曾几起几落。对黑手党打击最大的是1922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登上台。最初，黑手党曾支持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但在法西斯政权建立后，黑手党却不在容于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本性是独裁和专政，法西斯党大权在握，岂能容忍旁边还有一个黑手党，因此，墨索里尼“革命”成功，首先就拿昔日的盟友开刀。大批黑手党徒被处死，更多的黑手党“好汉”被关进了监狱。墨索里尼翻云覆雨，黑手党措手不及，遭到重创。不少黑手党分子不得不漂洋过海，到美国去寻找生路。美国取代西西里，成为黑手党世界的中心。整个法西斯统治时期，黑手党在意大利都处于被打击的地位，大批黑手党分子被关进了法西斯的监狱，剩下的漏网之鱼或是躲上了山，或是洗手不干了。黑手党元气大伤。人们想，这只不死鸟这次也许真的死了。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一个错误使黑手党奇迹般地死而复生。1943年盟军准备在西西里岛登陆。为了减轻伤亡，美国人找到了逃到美国的黑手党分子，要求他们与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分子联络，在盟军登陆时作内应，里应外合，一举打破墨索里尼的防线，条件是战后让黑手党复兴。没有犹豫，黑手党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一批黑手党分子潜入西西里岛。他们与关在监狱里的黑手党分子取得了联系。在美军登陆那天，凭着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

他们居然劝说三分之二的士兵开了小差。结果 ,美军顺利登陆。胜利了的美国人不忘前约 ,打开了法西斯的监狱 ,久陷囹圄的黑手党分子重见天日。1944 年 11 月 ,美国人与黑手党在巴勒莫举行会谈 ,推举黑手党人出任西西里的行政长官。卡洛·维齐尼等一批重要的黑手党头目 ,在美军的推荐或支持下 ,出任巴勒莫地区许多城镇的镇长或市长 ,有的还担任了省长职务。卡洛·维齐尼的儿子还当上了美军驻巴勒莫司令部的翻译。黑手党利用美军、政界人士 ,在当地大肆扩大势力聚敛财富。由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 ,美国人战后利用黑手党来对付共产党 ,黑手党的势力盛极一时。黑手党的头目与意大利的政客广泛结交 ,毫无顾忌。战后 ,整个意大利由于战败而不得不勒紧裤腰带 ,黑手党却通过传统的生财之道——控制市场 ,控制水源 ,从而大发横财。战后黑手党还发现了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 ,这就是走私毒品和香烟。意大利人酷爱美国的香烟 ,而香烟在意大利属于国家管制商品 ,黑手党就在境外大肆搜罗美国香烟 ,然后偷运入境 ,通过这种途径大发横财。当毒品交易兴起后 ,有些黑手党又走私毒品。通过这些非法手段 ,黑手党的财富飞速膨胀起来了。60 年代以后 ,意大利的经济出现起飞 ,黑手党的财富也呈几何级数在增长。它与政客勾结 ,从事工程承包 ,大发横财。

秘鲁“光辉道路”

古斯曼传奇

现年 57 岁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是秘鲁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名震遐迩的秘鲁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的首领,也是秘鲁国内最值钱的首号通缉要犯。秘鲁当局为他的项上人头开出了 100 万美元的高价。就连藤森总统本人也称之为“残忍的天才”。有人说在秘鲁只要一提及古斯曼就足以让人心惊胆战。曾有这么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一个来自美国的观光客问当地小孩拉丁美洲什么最有名,回答令他大为吃惊。孩子首先提到了“古斯曼”,见对方一脸疑惑,又补充说:“还有亚马逊河。”

绵延 6000 多公里的亚马逊河抵不上一个古斯曼,这并非危言耸听。在过去的 22 年中,亚马逊河在秘鲁境内的河段仅仅淹死过几百人,可古斯曼的“光辉道路”成立 22 年来,他所进行的武装破坏却有上万次,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 3 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250 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秘鲁外债的总和。与古斯曼的赫赫“武功”相比,喜怒难测的亚马逊河毕竟是逊色多了。

古斯曼于 1934 年 12 月 3 日出生在秘鲁阿雷吉帕省一个巨商之家。但是,他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是一个私生子。这个迥异于常人的秘密自他懂事起就折磨着他,并对他后来走上反社会的道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 岁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他先由舅舅们抚养,后来他的父亲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收养了他,他被送入一所基

督教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过惯了寄人篱下生活的古斯曼不爱说话,但意志坚硬如铁,又博闻强记,天资过人,熟悉他的老师和亲戚都说,他最适合读书,如将来能在学海遨游,一定前途无量。中学毕业后,古斯曼果然顺利地进入了圣奥古斯丁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此时的他对学业用力甚勤,给不少人留下了“读书种子”的好印象。没有人想到,古斯曼在此期间最着迷的却是当时流行的激进思想。在他的眼中,镇压过反对派、搞过大清洗的斯大林是一名“不彻底的革命者”。有幸领教他的固执的人也根本未曾料到,以后笼罩秘鲁长达22年的极左恐怖组织“光辉道路”的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在这个时候就已在古斯曼心底酝酿并抽枝展叶了。大学毕业后,古斯曼接受了阿亚库乔大学校长的聘请,成为该校的哲学教授,不久即蜚声校园。他的滔滔不绝的口才,他的坚毅、执著,在同事、学生中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对他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为“香波”,意为只要沾上一点,大脑马上就会被“洗得清彻透明”,而且永远散发出让人难以忘怀的“余香”。古斯曼在校园中广结同道,他虽然没有把阿亚库乔大学建成秘鲁的哲学中心,却成功地把它变成培养信徒的摇篮。也正是在阿亚库乔大学,他结识了芳龄16、貌美如花的少女奥古斯塔·拉托里。她是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其时尚未走进大学校门。拉托里一开始并不喜欢这个大她10岁的“教授”,一直在躲避他那肆无忌惮的追逐目光。可古斯曼却并无后退之意,为了赢得拉托里的芳心,他每天坐在她的家门口,让她在无可躲避的目光下进进出出。拉托里先是被这位古怪执拗的“静坐者”弄得心烦意乱,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也就从不习惯到习惯,并为他的爱所感动,最后还疯狂地爱上了他。不久,古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同奥古斯塔结为连理,成为当地人们艳羡的一对佳偶。事业与爱情的丰收使古斯曼从小潜伏的自命不凡的性格得到“发扬光大”。他深信,自己不仅是一个忠贞的情人、伟大的导师,而且是秘鲁未来社会的当然领袖,“肩负着民族和世界革命的重任”,要解救秘鲁人民于水火中。凭着这种幻想点燃的理想之火,1964年,古斯曼加入了秘鲁当时最大的左翼组织——“红旗”。凭着丰富的理论素养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古斯曼很快在“红旗”里崭露头角。1967年,经过几番明争暗斗,他成

为“红旗”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是,古斯曼本人对“红旗”的行动纲领并不满意,因此,登位后立即着手改革,于1970年用“光辉道路”取代了“红旗”,他自己仍然任最高领袖。

古斯曼对“光辉道路”情有独钟,这源于他对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崇拜。所谓“光辉道路”就是“走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指引的光辉道路”的意思。它主张建立“印第安式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恢复古印加的自然农业生产模式,政治上建立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应当说,古斯曼这些理论主张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极强的针对性和诱惑力的。秘鲁是印第安人的故乡。古代,印第安人曾在此建立过印加帝国,创造过璀璨的印加文明。但是,自1533年起,西班牙殖民者就入侵印加古国,征服了秘鲁。秘鲁人民为争取自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直到1821年,他们才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赢得了独立。但是,独立后的秘鲁并没有走上一条康庄大道。秘鲁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宁,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秘鲁的军人政变屡有发生。长期的动荡影响了秘鲁经济的发展。到90年代,秘鲁的经济已经趋于崩溃,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外债高达200亿美元。70%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在秘鲁的800万劳动人口中,有100万人长期失业,另外的50%处于半失业状态,而月通货膨胀率则高达30%。10个6岁以下的儿童中,有6个营养不良。而古斯曼所在的阿亚库乔山区又是秘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位于秘鲁中部,曾是古印加帝国的中心,当地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印第安人的后裔,他们的耕种地方式落后,风俗习惯奇异,常常是人们打趣嘲笑的对象。到了60~70年代,虽然现代文明的春风也徐徐吹进了这片土地,但它对当地仍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经济基础撼动甚微,相反,涌进来更多的是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名目繁多的盘剥。因此,古斯曼的这些主张极大地迎合了当地贫困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渴望摆脱歧视和剥削的心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光辉道路”很快就在这里扎下根来,并不断发展。

古斯曼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他依托阿亚库乔大学,将触须伸向了秘鲁的各个大学,建立起“光辉道路”的各个支部和

外围组织 ,又依托阿亚库乔山区 ,在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等省的农村中也建立了基层组织 ,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农民、大学生、工人等各个社会层次参加的严密网络。古斯曼对成员要求极高。首先 ,他要求每个参加“光辉道路”的青年男女必须一方面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 ,培养对印第安农民的感情 ,一方面聚在一起探讨社会问题 ,分析时弊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只有经过这两重锻炼后 ,他才有资格加入“光辉道路”的外围组织。此后 ,再经过长期的“实践” ,能完成组织交给的各种任务 ,如绑架、勒索、爆炸、暗杀、传递情报等活动 ,证明自己的忠诚和能力 ,才能正式加入“光辉道路”的核心小组 ,成为“战士”或“斗士”。古斯曼认为 ,只有这样 ,发展的成员才能做到思想成熟 ,立场坚定 ,为“光辉道路”献身。

按规定 ,核心小组成员白天照常生活和工作 ,只有晚上才从事组织委派的秘密活动。每个核心小组成员一般是五至九人 ,其中一人为组长 ,两人负责行动 ,一人负责培训和发展成员 ,还有一人负责思想教育。小组与小组间单线联系 ,没有任务时不相来往。小组成员一般不允许在自己居住或工作的地区活动 ,这一方面是避免暴露身份 ,另一方面是防止他们由于亲情与家乡观念 ,执行任务时下不了手。另外 ,组织内部的纪律也非常严明 ,对那些行为不检点、不服从命令的人 ,古斯曼从来都是不手软的。

“光辉道路”的各级组织都要接受军事与政治双重领导 ,一般以政治领导人为正职 ,除非有大的军事活动 ,军事领导人才能暂时升为正职 ,每个小组以上建立有不同层次的组织 ,最高层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古斯曼本人兼军事与政治组织的双重领袖职务。

“光辉道路”的主要资金渠道是“税金” ,它通过向其控制的众多农民和收购古柯叶的毒品贩子征收“产品税” ,每年可获得 200 至 400 万美元的高额利润。这笔资金的管理很严 ,一般用于组织内部成员的生活、活动 ,偶尔也用作成员的司法诉讼费 ,无关人员很难启动这笔巨额资金。

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内部构造来看 ,“光辉道路”都如同古斯曼精心设计的“常山蛇阵” ,击尾头迎 ,打身肢动 ,各个环节攻防应变灵活

自如,令进攻者防不胜防,因此人们都称“光辉道路”是秘鲁社会中最有组织的一个集团。

其实,领教过“光辉道路”厉害的人都知道,古斯曼控制“光辉道路”靠的不仅是他超一流的组织能力与手段,那令人叹为观止的蛊惑性宣传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只要你加入这个组织,就无时不在接受他那浓浓“香波”的沐浴与洗礼,他的组织成员人手一本《沿着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光辉道路前进》的小册子,每个人除了记住其中的基本观点外,还必须背诵出其中每一句话。这种领导艺术牢牢地控制着成员的情感世界、思维方式,使广大的追随者成为其随心所欲的应用工具。一旦他们丧失了自身的判断能力与思维功能,古斯曼的言论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圣旨”,靠着这种独特的本领,古斯曼稳稳地安坐在“光辉道路”的“教皇”之位,每日接受着“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他们尊称他为“贡萨洛主席”,是拉丁美洲的“普卡·因蒂”,意为“红太阳”。这种类似宗教的“洗脑”工作可以说是彻底的,以至一些被关进监狱里的“光辉道路”成员每天在服完类似中世纪的劳役后,还要无休止地背诵“贡萨洛著作”。

应该说,“光辉道路”最初的宗旨是反映了印第安农民的要求的,古斯曼希望推翻秘鲁现政权,按自己的“主义”来治理秘鲁,把秘鲁治理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从这一点看,“光辉道路”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恐怖组织,古斯曼也不是生来就是一个魔头。没有他在阿亚库乔大学的哲学基础,古斯曼不会凭空构想出他的改革社会的蓝图,没有阿亚库乔地区落后的经济基础与尖锐的阶级矛盾,古斯曼的思想也不会找到信徒。因此,“光辉道路”最初应该是一个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而不是后来人人切齿痛恨的恐怖组织。

“光辉道路”最初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山区省份,这些省份经济落后,主要是印第安农民,“光辉道路”在这里可以找到支持者。他们在这里伏击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地主庄园,洗劫银行和工商企业,为进一步活动筹集经费,弥补因组织迅速扩大而出现的入不敷出的财政局面。

1980年,秘鲁结束了长达12年的军人统治,首次举行了自由选举。对于饱受军阀统治的秘鲁人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可古斯

曼却错误地估计了这件事的意义,认为自由选举是资产阶级搞的老一套,这意味着秘鲁会加速资本主义化,对革命运动是一种危害,因此必须迎头痛击,以切断资本主义对秘鲁的渗透。“光辉道路”的战略重心立即转移,古斯曼率领他的勇士们从乡村走向城市,宣布对秘鲁政府全面实施“人民战争”。他们在阿亚库乔捣毁了一个投票站,以破碎的瓦砾与燃烧的大火揭开了城市暴力活动的序幕。

1982年3月,古斯曼指挥200名武装人员打开了阿亚库乔的监狱,放走了200多名犯人。在秘鲁朝野一派喧哗声中,古斯曼代表“光辉道路”宣布,这不过是牛刀小试,武装斗争将进入第二阶段“游击阶段”。此时“光辉道路”一方面利用前几年在安第斯山区和亚马逊贫困地区建立的根据地与地方政权组织,向政府频频出击,攻城略地;一方面又将土地分给群众,广泛施恩于民众,向秘鲁的下层组织渗透,使全秘鲁25%的县一级政府都受到了古斯曼的影响与控制,一些边远地区县政府甚至由“光辉道路”的“人民委员会”取代,秘鲁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无法行使权力。

此外,“光辉道路”还在境外广结盟友,与德国、法国、瑞典和墨西哥等国家的恐怖组织结成伙伴,并拉拢其他一些国家的恐怖组织。8个国家的39个组织建立起“光辉道路”的支持网络,为“光辉道路”的恐怖活动提供国际援助,至此,“光辉道路”实际上成了国际性的左翼行动组织。

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古斯曼又宣称“光辉道路”的武装斗争转入了“战略均衡稳固阶段”。这意味着古斯曼认为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与秘鲁政府正面对抗了。此后,“光辉道路”的暴力活动步步升级,“武装斗争”实际上就是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打击的对象已经不分青红皂白,使用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恐怖组织,活动范围也从乡村扩展到首都利马等大城市。仅1986年8月,秘鲁经济和财政部、能源和矿业部、劳动部就先后发生多起爆炸事件,接着首都利马的一些高压输电塔也相继遭到破坏,使秘鲁的社会财产和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截至1988年6月,这类暴力活动已经导致9000人死亡,其中包括政府官员、执政的人民党成员和反对派阵线左派联盟成员、政府军军

官、警察以及“同政府军进行合作”的农民。如果说，“光辉道路”在萌生的时候还不乏一定的反剥削、反苛政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此时的“光辉道路”就完全扯去了自己身上披着的体面外衣，堕入了恐怖主义的泥潭了。他们惟“左”为上，惟“左”是从，认为只要能对秘鲁政府产生威慑作用，就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做。极左恐怖组织的理论被古斯曼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古斯曼看来，他们的行动不仅要消灭政界、军界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及政府军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在秘鲁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公众丧失起码的安全感，从而对政府失去信任，以便为武装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如果政府无力控制恐怖活动，那当然正合其意。如果政府为了控制局面而采取镇压措施，那么随着双方刀对刀、枪对枪的血与火的较量，政府将被迫采取严厉、残酷的手段，从而暴露其反民主、反自由的真实面目，这样也能唤醒更多的人拥护“光辉道路”，从而实现其武装夺取政权的目的。为了实现其目标，走火入魔的古斯曼对一切怀疑和阻碍其左倾极权的人都痛下杀手，连他“静坐”两年才苦苦追求到的奥古斯塔都不放过。开始几年，他还能容忍作为“光辉道路”二号人物的妻子提出的不同意见，可当他发现后者对他的政策问题提出批评时他就忍不了了。他迅速地为她指明了“光辉道路”：人们发现她在自己住处无缘无故地自杀身亡。不久，埃莱娜·伊帕拉吉雷便取代了奥古斯塔的位置。

自“光辉道路”成立以来，秘鲁政府就一直对其采取围剿，但都未能奏效。这个结局助长了古斯曼刚愎自用的气势，数年的暴力行动虽然连连得手，但是离最后胜利总有一步之遥，这也使古斯曼日渐急躁，再加上藤森总统对恐怖分子毫不留情的打击，刺激了古斯曼傲慢而脆弱的神经，使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光辉道路”的战略反攻阶段到了。由此，“光辉道路”的恐怖活动有增无减，首都利马更成为其攻击的首选对象。1992年2月11日，“光辉道路”一天之中就在利马制造了36起爆炸事件，其中一起就发生在美国驻秘鲁使馆旁，当场炸死了两名守卫使馆的警察。7月16日，古斯曼又成功地导演了利马大爆炸。在利马繁华的米拉弗雷斯商业区，“光辉道路”引爆了两辆装有300千克炸药的汽车，造成2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0多座建筑受损，创下了自1980年以来由暴力事件造成伤亡的最高纪

录。一时间 ,国外游客视利马为“死亡之城”或“恐怖之城” ,以至秘鲁参议院安全委员会主席伯尔也无可奈何地说 :“利马现在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 ,每天都有恐怖事件发生 ,‘光辉道路’正在将国家带入一个黑暗时代。”6月5日凌晨 ,“光辉道路”将一辆装有600千克炸药的汽车引爆。炸毁了利马的一家电视台 ,炸死炸伤20余人 ,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计。

丧心病狂的古斯曼眼中似乎再也没有一块平静的地方 ,无论是军事部门、警察机构、外交使团 ,还是研究单位、商业中心、工厂企业、民宅学校都成了他的眼中钉 ,他千方百计地要将它们铲除干净。仅1992年上半年 ,“光辉道路”就制造了近700起暴力事件 ,造成4000余人死亡。在一系列的爆炸声中 ,秘鲁成了世界上恐怖活动最密集的国家之一 ,患了“恐怖癌症”的秘鲁让古斯曼与“光辉道路”这个血腥的恐怖组织名扬世界。

古斯曼看来与胜利只有一步之遥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接管政权的准备 ,但是 ,他高兴得太早了 ,在他的夺权道路上出现了克星。他就是秘鲁新总统藤森 ,一个颇有“武士道”精神的日裔秘鲁人。

阿布·尼达尔的“恐怖公司”

风平浪静的爱琴海上 ,载重 688 吨的希腊游船“波罗斯城”号正在破浪前进。来自美国、英国、瑞典、法国等国家的 471 名游客 ,在饱览了爱琴海各岛的旖旎风光后 ,正在返回雅典的途中。此时已是夕阳西沉彩霞满天了。再过几个小时 ,游船就会到达特罗卡德罗港 ,那是他们此行的终点站 ,在那里他们还要游览雅典古城 ,一睹古希腊文明的风采。因此 ,大家的兴致都很高 ,没有人意识到 ,危险正在悄悄临近。

船行 40 分钟 ,甲板上一个 20 多岁、肤色黝黑的年轻人突然从背包里抽出冲锋枪 ,对着甲板上的游人就是一阵狂扫 ,跳跃着的子弹像飞蝗一样扑向没有任何准备的游人。或许是由于晚霞迎面照在他的脸上 ,或许是因为嗜血的野性得到了营养 ,凶手的脸上一阵泛红 ,露出狰狞的形象。几乎在他动手的同一时刻 ,船舱里突然窜出两个蒙面人 ,他们一手端着枪 ,一手举起手榴弹 ,对着游人狂扫滥炸。顷刻间 ,游轮变成了屠场。毫无准备的游人四散逃去 ,有的躲进船舱 ,有的干脆跳进了大海 ,船上一片混乱 ,三个凶犯打完了枪膛中的子弹 ,扔完了背兜里的手榴弹 ,乘着混乱 ,跳上一旁接应的快艇 ,扬长而去 ,只留下尸横遍地的游艇和痛苦呻吟着的游人。事后检查 ,这一场血腥的屠杀 ,造成 9 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这是 1988 年 7 月 11 日。

事发突然 ,471 名游客 ,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直到子弹飞上来与他们“亲吻” ,他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一位双脚中弹的法国人事后心有余悸地说 :“我当

时正在甲板上 ,突然听见自动武器的声音。我刚转过身 ,就中弹摔在甲板上。我看到了正在射击的人。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以为这大概是在开玩笑。但当我看到其他人也摔倒在甲板上 ,我才相信这是真的。我还看见一个人在换弹夹 ,然后他又把一颗手榴弹扔向烟囱 ,引起了大火。”

这当然不是什么开玩笑 ,游客自己已经有切身体验 ,而犯下这一恐怖罪行的人 ,马上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他们不是在开玩笑。两天后 ,黎巴嫩一个团体给西贝鲁特一家国际新闻机构送去两页纸的声明。声明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巴勒斯坦人民革命烈士组织——阿布·杰哈德部队——对‘波罗斯城’号游轮上的几十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美国和英国士兵发动了突然攻击。这次攻击是为了对犹太人——美国人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海湾地区屠杀和歼灭阿拉伯人及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愚蠢地对犹太人罪行表示支持的报复。对游轮的袭击不是针对希腊人民的 ,他们正在对其政府施加各种压力 ,要求政府限制以色列人的活动 ,限制美国人及其西方盟国在希腊的活动。”

阿布·杰哈德部队？巴勒斯坦倒是有这么一支部队 ,它的领导人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力量副总司令阿布·杰哈德。但是 ,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主流派并不从事恐怖活动 ,他们从事的是正大光明的武装斗争 ,与恐怖活动完全挂不上钩。1969 年阿拉法特刚刚从事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时 ,就明确反对恐怖活动 ,认为它给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损失。1970 年 8 月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 ,禁止劫持民用飞机 ,1974 年底 ,阿拉法特更是宣布 ,巴解将清除那些犯有恐怖罪行的人 ,倒是有一帮人 ,包括以色列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 ,他们敌视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 ,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说成是恐怖活动 ,大肆打击。因此 ,恐怖分子声称他们是阿布·杰哈德部队 ,那肯定是栽赃 ,不可能是真的。

但是 ,恐怖分子分明是阿拉伯人 ,他们的肤色证明了这一点 ,阿拉伯文声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 ,他们为什么要栽赃于阿布·杰哈德呢？要知道 ,巴解组织才是巴勒斯坦人的真正代表 ,他们这样做 ,对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有害无益。而且 ,他们声称他们的目标是美

国人、犹太人和英国人,但事实上,游轮上的美国人总共不到 10 人,罹难的大多是法国人,有 34 个法国人受伤,而法国政府是西方世界里最早公开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戴高乐总统甚至中止了与以色列的军火合同,已经准备交货的四艘快艇被法国政府扣在港口。后来,以色列特工部队以海盗手法,开走了这些快艇。法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降到冰点。

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明确的对象。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恐怖行为,绝不可能是巴解组织所为。希腊政府立即组织力量破案。帕潘德里欧总理中止休假,部署破案事宜。希腊警方悉数出动,缉拿恐怖分子。到 7 月 20 日,案子终于有了眉目。希腊公共秩序部长塞希奥蒂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初步确定四名恐怖分子参与了这次游轮袭击事件,其中三人持黎巴嫩护照,于 5 月初从贝鲁特经贝尔格莱德来到希腊。袭击小组的头目是阿布·尼达尔集团的赫加比·贾比拉,又名卡达·萨米尔·穆罕默德,他持有利比亚护照,6 月 1 日从哥本哈根乘飞机来希腊。

阿布·尼达尔!原来是他干的。怪不得恐怖分子要说他们是阿布·杰哈德部队的,原来纯粹出于栽赃目的。是的,只有“恐怖公司”才会有如此灭绝人性的行径,也只有它,所干的恐怖行径能如此干净利落。毕竟是世界头号恐怖组织,“恐怖公司”出手,不用说只杀死 9 个人,就是“波罗斯城”号的游人全部被杀死,人们也不用过分奇怪。因为它既然被称为“恐怖公司”,干起这类恐怖行径恐怕是不会眨一下眼睛的。

阿布·尼达尔,这位有“沙漠飞狐”、“神秘的谋杀大师”之称的人,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他领导的组织,在西方新闻界有“恐怖公司”之称。在中东乃至整个世界,阿布·尼达尔和他的组织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自 1986 年起,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发出国际通缉令,捉拿这个超级恐怖分子。但是,两年过去了,阿布·尼达尔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接连制造了几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

1986 年 9 月 6 日,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一所犹太人教堂里,一群犹太人正在祈祷。正当他们跪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给他们赐福

的时候 ,两个年轻人悄悄地走进教堂 ,锁上大门 ,然后 ,从背包里抽出机枪 ,对着人群就是一阵猛扫。两名凶手一口气射出了 100 多发子弹 ,结果 ,29 名犹太人 ,只有 7 人死里逃生 ,其余全部遇难。而凶手在发泄完仇恨之后 ,又引爆了手榴弹。土耳其警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有人认出了凶手脸上的伤疤 ,并肯定地说 :“他在阿布·尼达尔的营地受过训练 ,他是‘恐怖公司’的人。”人们这才知道 ,狡猾的“沙漠飞狐”此次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欠下了 22 条人命。飘忽无定、精心策划、手段狠毒 ,符合“恐怖公司”的特点。阿布·尼达尔自己就说过 :“我这个只在夜间行动的幽灵 ,使得敌人胆战心惊 ,夜不能寐。”确实 ,阿布·尼达尔的所作所为令人切齿痛恨。他干过迄今为止伤亡最重的劫机事件 ,暗杀过 100 余名外交官 ,死在他手下的人已经是成千上万。他所制造的恐怖行动。曾经是第五次中东战争(黎巴嫩战争)的导火线 ,使中东和平进程数次中断。因此 ,只要阿布·尼达尔存在一天 ,人们就一天不得安宁。

阿布·尼达尔怎么会变成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公司”的老板的?他是不是生来就嗜血成性 ,以致不杀人就无法生存?确实有很多人这么认为 ,以美国、以色列为首的西方舆论就这么看待阿布·尼达尔。在他们看来 ,阿布·尼达尔青面獠牙 ,生来就是一个恐怖分子。但实际上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正是中东特殊的政治格局造就了阿布·尼达尔一帮恐怖分子。没有巴勒斯坦问题 ,也就没有阿布·尼达尔和他的“恐怖公司”。

盲教士谢辛的“哈马斯”

自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就与当年的犹太人相仿,开始了离乡背井的生活。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终于自己拿起武器,开始了恢复自己民族权利的斗争。但由于以色列的严厉打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始终不能在巴勒斯坦本土站稳脚跟,巴解组织只得移向临近的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第五次中东战争(也称黎巴嫩战争)后,巴解总部甚至不得不退往突尼斯,这种局面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反以斗争。

但是,留在巴勒斯坦的人民并不甘心受以色列的奴役,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斗争。随着巴勒斯坦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这种斗争也变得更加激烈了。1987年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起义,就是巴勒斯坦人在本土进行斗争的最好证明。在这种斗争过程中,诞生了巴勒斯坦本土的领导机构——哈马斯。

哈马斯创建于1988年,但它实际上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反以斗争是相始终的。哈马斯的领导人是谢赫·谢辛,这是一个终日与轮椅为伴的老人,正是他,导演了被占领土上一幕幕令以色列胆寒的恐怖事件。

谢辛出生于1935年,其父是当地的富豪,与阿布·尼达尔一样,谢辛的家产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被以色列剥夺,谢辛变得一贫如洗。四年后,他因摔伤致残,从此一病不起,只得靠传教讲道为生。这样的经历极容易使他走上宗教道路。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中东产生了伊斯兰复兴运动,极端宗教思想

盛行。因此,谢辛加入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兄弟会在埃及是一个非法组织,因此,谢辛也曾经被捕入狱,在监狱里呆了45天,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谢辛着手扩充兄弟会在加沙的势力,建立了穆斯林兄弟会加沙分会。1973年,谢辛成立了伊斯兰中心,很快成为当地一支强大的宗教、政治力量。当时,以色列为了对付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支持了谢辛的活动。由于得到了大量的财政援助,谢辛的势力急剧膨胀起来。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谢辛更是一个鼓舞。他意识到,在中东这块土地上,要真正做到有影响,必须有实力才行。因此,他放弃了过去那种纯粹的宗教宣传和政治说教,转而从事军事斗争。谢辛的活动为以色列所不容。因此,谢辛再度入狱,被判处13年徒刑,后来被释放了。在反以斗争中,谢辛的思想与阿拉法特完全不一样,与极端激进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倒很相似。而且,对巴解组织久居国外,谢辛也颇有看法。因此,他不承认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领导力量,而想另起炉灶。1987年爆发的巴勒斯坦民族大起义正好为他提供了这个条件。当时,巴解只能从国外遥控指挥这场起义,并且向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经济援助;但是,谢辛的组织则不一样,它一直在被占领土上活动,在人们心中颇有威信。从谢辛开始,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十分清廉,救济贫民工作相当出色,因此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据民意测验表明,谢辛在加沙的支持率达到了40%,在约旦河西岸的纳布斯,谢辛的支持率竟高达60%,这对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主流派是一个严峻挑战。因此,当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建立后,伊斯兰运动公开要求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中得到40%的名额,但遭到了巴解组织的拒绝。在1988年初,谢辛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其阿拉伯文缩写为哈马斯。成立时,哈马斯发表过《伊斯兰抵抗运动盟约》,声称巴勒斯坦是伊斯兰的土地,解放巴勒斯坦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其奋斗目标是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开展圣战,只有圣战才能拯救巴勒斯坦人,也只有通过圣战才能收复全部被占领土。因此,谢辛的目标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与其他极端的激进派别一样,谢辛也反对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妥协,圣战是解救巴勒斯坦人苦难的惟一武器。他反对

与以色列有任何接触,并发誓要清除巴勒斯坦人中的妥协分子。因此,自马德里中东和谈开始后,哈马斯一直表示反对。它曾联合人阵(总指挥部)、民阵等10个巴勒斯坦组织,发表声明,要求巴解退出和谈,并指责阿拉法特对以色列妥协让步,并说和会签署的任何文件对巴勒斯坦人没有约束力。哈巴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甚至说:“不要相信阿拉法特,他求生的本能必然驱使他欺骗你们。他要消灭哈马斯,因为他知道他不能这么做,他将被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换掉。”

哈马斯成立后就逐渐由一个政治、宗教组织演变成一个军事组织,它的组织体制与爱尔兰共和军颇为相似。它分为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前者的身份一般是公开的,他们主要从事管理清真寺、教育、医院等社会福利工作,并积极参加地方各商会、工会和学生会的选举,组织反对以色列占领者的游行、罢工活动。而军事组织的成员身份是隐蔽的,采取单线联系,各个战斗小组之间互不通气。他们主要从事对以色列的军事斗争,被占领土上的恐怖活动绝大多数系他们所为。哈马斯曾向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发出号召,要他们杀死每一个以色列士兵和犹太人。这种说法与“恐怖公司”和人阵(总指挥部)等恐怖组织的作为毫无二致。因此,自哈马斯成立后,被占领土上的反以恐怖事件就愈演愈烈,不断上演一幕幕血淋淋的惨剧。

1992年12月7日凌晨,3名以色列士兵乘坐吉普车在加沙进行例行巡逻。当汽车行至加沙北部的拜特利格亚村时,迎面驶来一辆卡车,强烈的车灯刺得以色列士兵眼睛都睁不开。就在这时,一阵密集的子弹射向了毫无思想准备的以色列士兵。凶手一边开枪还一边高喊:“真主伟大!”几分钟后,卡车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就在同一时刻,在约旦河西岸的哈利勒镇,一名以色列士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不用说,这是哈马斯干的。对此,哈马斯也不想否认,事后发表了声明。哈马斯的恐怖行为引起了以色列警方的大搜捕。数百名以色列警察在被占领土上进行了详细搜查,但几天过去了,凶手还是不见踪影。

12月13日,29岁的以色列警官托勒达诺告别妻子,前去上班,但上班时间过了,他的同事却没有发现他。不久,警方接到电话,托

勒达诺已经落到哈马斯游击战士手里 ,如果以色列想保住他的性命 ,最好在当天晚上 9 点前释放谢辛。消息传出 ,以色列政府十分紧张 ,开会讨论对策。会议决定 ,要尽力援救警官 ,但对于哈马斯提出的要求 ,以色列政府不予理睬。以色列采取这种对策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在以色列历史上 ,还没有因为恐怖分子要挟而妥协的先例 ,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因此 ,政府出动安全部队在加沙地带进行了大搜捕 ,同时警告哈马斯 ,不要伤害警官。政府在电视台的阿拉伯语节目中让正在服刑的谢辛露面。谢辛说 ,被绑架的警官应该获得释放 ,但是 ,绑架者的一些要求应该得到满足。因为被占领土上的流血事件本来就是以色列的占领引起的 ,以色列难道不应该对此负责 ? 如果消除被占领土本身的外部环境 ,事情本身就可改变一切。

时光飞逝 ,绑架者规定的期限过了。大搜捕一无所获。以色列没有释放谢辛 ,哈马斯也没有释放托勒达诺警官。当天 ,哈马斯在约旦首都安曼发表一项声明 ,说愿与以色列政府谈判解决绑架问题 ,但以以色列警方强调 ,现在托勒达诺警官生死未明 ,不可能坐下来与哈马斯谈判。当天晚上 ,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电视上发表讲话 ,严厉谴责这起恐怖活动 ,指出绑架者的目的是破坏正在进行的中东和谈。他相信警官仍然活着 ,因此准备与哈马斯谈判。但是 ,拉宾的讲话没有得到回应。

15 日下午 ,托勒达诺警官终于被发现了。一名阿拉伯妇女在耶路撒冷至杰里科的公路边发现了警官的尸体。验尸结果表明 :警官在被发现前 36 小时遇害 ,也就是说 ,哈马斯一分钟也没有拖延 ,期限过后立即处死了警官。以色列的头头脑脑们面对这一结果 ,一个个面面相觑。心狠手辣 ,说一不二 ,这历来是以色列的作风。现在 ,哈马斯把这一手也学了去 ,用在以色列身上 ,处置了托勒达诺 ,手段干净利落 ,颇有以色列人的风范。

1994 年 10 月 4 日 ,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中心商业区车水马龙 ,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辆公共汽车正驶在中心广场上 ,突然一声爆炸惊天动地 ,正在行驶的汽车爆炸了。霎时间 ,广场上空烟雾腾腾 ,血肉横飞。硝烟散去 ,人们只发现扭曲的汽车和一些残肢断臂 ,21 名乘客死于非命 ,其中还有一名凶手。他随身携带炸弹混上

坦全国委员会已经与以色列达成了协议 ,这个协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对巴以双方都有约束力。但是 ,哈马斯肆无忌惮的恐怖行为正在危及这个协议 ,对巴勒斯坦自治当局更是一种威胁。以色列国内本来就有一帮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们反对政府与巴勒斯坦人和谈 ,希望建立大以色列。哈马斯的行为 ,正好为这帮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推翻协议、中止巴勒斯坦的自治提供了借口。因此 ,阿拉法特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此外 ,哈马斯的行为也是给自治政府增加压力。在一些以色列人眼中 ,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 ,他们并不区分阿拉法特和哈马斯 ,因此 ,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阿拉法特的自治政府头上 ,向他施加压力。阿拉法特是左右为难。如果不约束哈马斯的行动 ,很明显以色列那边不好交代 ;如果对哈马斯动武 ,兄弟阋墙 ,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也没有好处。阿拉法特曾说 ,巴勒斯坦内部的自相残杀 ,将使巴勒斯坦建国的梦想破灭 ,因此 ,自治政府建立后 ,阿拉法特曾试图与哈马斯搞好关系。但是 ,哈马斯的行为不仅没有收敛 ,恐怖活动反而越搞越大。有一位哈马斯分子透露 :“那些头头们要杀死所有和阿拉法特合作的人 ,让形势恶化 ,迫使以色列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他们还要揭下阿拉法特的假面具 ,迫使他站在以色列一边来反对我们。”“我们要孤立他、削弱他 ,恐吓他。”哈马斯内部甚至有人建议像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那样袭击外国人 ,在巴勒斯坦营造一种恐怖气氛 ,最终使自治当局垮台。这种计谋 ,阿拉法特清楚 ,以色列政府也清楚。万般无奈之中 ,阿拉法特决定对哈马斯采取行动。

1995年4月11日 ,巴勒斯坦自治当局的警察部队开始对哈马斯采取行动。警察直接闯入居民家中抓人 ,并与抵抗者交火 ,一时间 ,整个自治地区枪声四起。近百名哈马斯运动成员走上街头 ,高呼“真主伟大”的口号 ,进行示威游行 ,抗议自治当局抓人。结果 ,有300余名哈马斯分子被捕 ,许多成员转入地下。据以色列电台广播 ,巴勒斯坦警方不仅抓到了大批激进的伊斯兰分子 ,还捣毁了哈马斯的许多办事机构 ,缴获了一些文件。针对自治当局的行动 ,哈马斯也发誓要进行报复。他明确表示 ,哈马斯不会交出自己手中的武器 ,抵抗战士手中的武器将用来自卫。

自治当局行动引起各方关注。阿拉伯国家呼吁和解,巴勒斯坦人民也希望和平。因此,自治当局也与哈马斯进行了谈判。结果,自治当局同意哈马斯领导人配备武器,但这些武器必须经过登记。哈马斯与自治当局的关系这才有所缓和。

自以色列吞并了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以来,巴勒斯坦人民就没有停止过抵抗。在建立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这一点上,巴勒斯坦各方都有共同语言,但在斗争方式上,各方一直存在分歧。一些组织发动非正规战争,走上了邪路,沦为恐怖分子。今天,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在建立自己的家园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在建立巴勒斯坦国的问题上,巴勒斯坦人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应该说,经过数十年的武装斗争,巴以双方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以色列内部出现了主张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鸽派”,绝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认识到,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共处已经不可避免,消灭巴勒斯坦人,建立“大以色列”的主张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巴勒斯坦人中也有人意识到,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后不会再有国家不惜代价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斗争了。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人的斗争策略也应该有所调整。如果说,在巴以争端刚刚开始时,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动还可以说是一种斗争手段或是对以色列强占巴勒斯坦人家园的一种报复,因而还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声援。那么,在国际局势出现重大转折、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共同声讨的对象的今天,巴勒斯坦人再坚持恐怖手段,那就不合时宜了。是面对现实,采取合法斗争手段,与以色列和平共处,建立一个新的巴勒斯坦?还是坚持“消灭犹太人”的立场,最终走进死胡同,这是摆在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面前的问题。有没有勇气正视现实,有没有勇气否定自己?巴勒斯坦能否成为一块没有硝烟、没有恐怖的净土,谁也说不准。

美国“三 K 党”

美国的三 K 党是美国的一个有着很长历史的奉行种族主义的恐怖组织。它成立于 1886 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那是些狂叫“白人至上”的昔日奴隶主、庄园主们组织起来的。

1865 年 ,美国田纳西州。

在一个名为帕拉斯基的小镇上 ,有 6 名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南方邦联军队的青年军官 ,由于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南方的失败感到痛苦 ,自发成立了一个俱乐部“KU—KLUX—KLAN”。

这本来只是一个娱乐性的活动组织。其名称的由来也很简单 :前两个字来源于希腊文 ,原意指圆圈 ,引申为“帮会” ;第三个字意思为苏格兰氏族 ,因为这 6 个青年军官都是苏格兰后裔。

以后 ,人们便将这个俱乐部简称为“三 K 党”。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 ,这 6 名青年军官穿着白色长袍 ,戴着白色风帽 ,举着火把 ,骑马冲过小镇的街道 ,在小镇周围来回奔跑。当时 ,他们也许是在仿效其苏格兰祖先高举火十字架驰骋原野进行战斗的壮举 ;也许是为了表演一下他们娴熟的骑艺 ,一展骑士的风采 ;也许什么都不是 ,仅仅是心血来潮而已。这 6 名三 K 党的创始人根本没有想到 ,他们创建的娱乐组织日后竟演变为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 ,他们黄昏时的浪漫举动竟成为三 K 党传统的恐怖仪式。

三 K 党势力越来越大 ,参加的人员越来越多 ,很快成为美国的一股政治势力和南方庄园主镇压黑人的工具。

当时 ,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南方各州新解放的黑奴总数达 400

多万人,他们目不识丁,终日流浪街头。战后立法规定,在政府机关和行政执法等部门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黑人参加。于是,南方许多城镇公职人员,包括法官、法庭书记和警长等职,均部分改由黑人担任。但这些职务对于连起码的读写能力都没有的黑人来说,是根本不能胜任的。这样,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同南方的严酷现实发生了冲突。本来就心怀不满的一些白人更加仇视黑人,并正在寻找机会把这种情绪发泄出来。

三 K 党的出现,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很快,大批对现实不满的白人加入三 K 党,使之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组织。

不过,初期的三 K 党并不赞成激烈的暴力行动,他们的目的只是自保。最初的领导人物大多是当地有一定声望受人敬重的人,其中包括许多内战时的退伍军官。他们只是偶尔对个别行为不轨的黑人给予相应的“惩罚”,并没有什么过火的举动。

但由于这种“惩罚”卓有成效,特别是满足了这些白人“高贵”的虚荣心,使他们重温到过去那种高人一等的旧梦以及享受到种种权势。因而这种“惩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出格,许多成员借题发挥,滥杀无辜。于是,许多初创时反对暴力的成员宣布退出组织,剩下的和后来新加入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就控制了三 K 党。

到 1867 年,三 K 党终于演变成一个对黑人施行暴虐的恐怖组织。一时间,恐怖活动在南方各州蔓延,并逐渐发展到全美国,大批黑人惨遭杀害。

三 K 党的宗旨就是不择手段地维护白人至高无上的地位,阻止黑人或其他种族获得平等权利。

三 K 党在组织形式上有浓厚的封建、神秘色彩。它所管辖的地区叫“南方无形帝国”,下设大区、省、地方辖区。三 K 党最高领导被称为“大巫”,大区的首脑叫“大龙”。省的头目叫“巨人”,地区的头目叫“独眼龙”,负责安全保卫的叫“夜莺”。三 K 党的这些古怪称号,一直保留到现在。

南方联盟的骑兵将领内森·福雷斯特是第一任“大巫”。

三 K 党有自己的党旗,是黄底红边的三角形,上面绣有黑龙。

三 K 党在进行恐怖活动前,通常要举行这样一个仪式:

当夜幕降临时 ,一队队白人男女举着火把 ,声嘶力竭地喊口号 ,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片空旷的野地里。他们在空场地中央竖起一排巨大的十字架 ,然后浇上汽油 ,点火燃烧 ,这被称为“火十字架号召”。冲天的火光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这些三 K 党徒们 ,个个身穿白色长袍 ,头套面罩 ,还顶着一个尖尖的白帽子。他们在大火边静静地站着 ,手臂平举 ,似乎也都变成了一根根白色的十字架。

火光逐渐熄灭 ,大地又是一片黑暗。这时 ,发出一片疯狂的嚎叫声 :“绞死黑人 !”“白人万岁 !”

仪式结束后 ,三 K 党徒们迅即出动。他们四处焚毁黑人房屋 ,鞭笞和枪杀刚刚获得自由的黑奴。他们破坏那些刚获得自由的黑人耕作的种植园 ,焚烧那些有黑人小孩上学的学校和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堂 ;他们私设公堂 ,对黑人进行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直至死亡。

一时间 ,三 K 党的恐怖活动如同洪水猛兽般肆虐 ,党徒们以残暴的手段对黑人实行私刑、绑架和屠杀。三 K 党发誓要捍卫白种人至高无上的地位 ,企图用血腥暴力来压制和剥夺刚获得解放的黑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三 K 党的势力日益增长。借助于恐怖活动 ,影响也从南方扩大到东部、西部 ,最终扩展到全国 ,成了美国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从那以后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 100 年间 ,三 K 党三起三落 ,经历了几度兴盛、几度解体的罪恶历程。

1868 年 ,三 K 党拥有党徒达 50 万人 ,进入了它的罪恶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

然而 ,好景不长。

美国联邦政府已认识到 ,三 K 党的存在对美国社会危害极大 ,决定采取果断措施 ,坚决打击这些害群之马。

美国国会针对三 K 党的恐怖行为 ,于 1871 年 4 月 20 日通过了著名的《三 K 党法案》。这一法案的主要内容是 :宣布取缔三 K 党 ,并赋予总统在必要时可以动用军队镇压三 K 党的权力。联邦政府有权力镇压威胁公众权利的秘密组织 ,并且把这些秘密组织的活动确定为反对联邦国家的叛乱 ,这就从法律上取消了三 K 党作为团体

组织存在的依据。

与此同时 ,国会又通过了另一项法令 ,让南方各州继续享有内战以前的政治权益 ,这就缓解了南方白人的不满情绪 ,从而使三 K 党的发展失去了客观基础。

这两项法令的实施 ,对三 K 党的打击是致命的。三 K 党陷入绝境之中。

1877 年 ,三 K 党被迫宣布自行解散。

三 K 党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低谷期。

虽然三 K 党遭到了灭顶之灾 ,但是 ,百足之虫 ,死而不僵 ,它的阴魂始终未散。

到了 20 世纪初 ,三 K 党幽灵再现。一大批死心塌地的种族主义分子在威丁·西蒙斯领导下 ,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宣布重新成立三 K 党。他们还积极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如经营宗教用品、服装和书籍等 ,赚了不少钱 ,作为三 K 党活动的经费。

三 K 党终于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东山再起了。原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社会面临着空前的巨变。政治、经济矛盾突出 ,战后退伍的黑人不愿再作二等公民 ,奋起抗争 ;国内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国外大批移民蜂拥而入 ;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几次爆炸案 ,更使美国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三 K 党乘机招兵买马 ,扩展势力。它提出的口号是 :抵制外国移民 ,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工会力量的扩大。三 K 党罪恶历史上的极盛时期是 20 世纪的 20 年代。它曾拥有党徒达 500 万之众。它的势力渗透到政府机关、法院、警察局等机构。从地域分布看 ,原来一直是南方和中西部三 K 党势力较大 ,而此时北方的三 K 党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南方。三 K 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把 14 名三 K 党徒当选为参议员 ,有 11 名三 K 党徒担任过州长 ,许多政坛显要也秘密加入了三 K 党。例如 ,美国总统哈定在任职期间加入了三 K 党 ,另一位总统杜鲁门早在密苏里州任法官时就是一名三 K 党徒了。

这一时期 ,三 K 党的恐怖暴行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 20 年代里 ,三 K 党秘密或公开地残杀了 900 多名黑人。

1921 年 ,三 K 党徒曾于光天化日之下 ,在上万名白人的围观中 ,于康明镇绞死了 2 名无辜的黑人。

另外 ,犹太人、天主教徒、共产党人、有组织的劳工、外国移民等 ,都成了三 K 党的杀害对象。

由于三 K 党势力迅速膨胀 ,恐怖事件大幅度增加。事件发生最严重的路易斯安那州 ,州政府竟无法控制局势 ,而不得不公开请求联邦政府帮助平息祸乱。该州州长曾伤心地说 :“路易斯安那州三 K 党对法律视若无睹 ,我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州警 ,许多立法官和执法人员都是三 K 党成员。”

20 世纪 30 年代 ,三 K 党再一次进入了不景气的年代。由于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胡佛等大力打击三 K 党 ,也由于这个组织发生了内讧 ,三 K 党能量降低 ,成员数量锐减 ,不得不收敛行迹 ,蜷缩起来。

到了 60 年代 ,三 K 党又一次卷土重来。

当时 ,美国新兴的黑人民权运动方兴未艾。美国的黑人虽然早已在南北战争后获得了解放 ,得到名义上的平等 ,但他们实质上取得的只是“隔离的平等”。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黑人实际上仍然是二等公民。为此 ,黑人民权运动者主张打破种族歧视的樊篱 ,获得一视同仁、不分肤色的真正平等。

与此相反 ,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为对抗黑人的民权运动 ,竭力煽动白人“争取本身的生存权利”。同时 ,美国的极右翼势力抬头 ,掀起了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狂潮。

在这两股反动势力的推波助澜下 ,三 K 党改头换面 ,第三次出山了。

他们成立了 7 个“美国三 K 党联合会”。公开宣称为白人争取权益 ,并打击共产主义。他们胡说黑人民权运动是“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搞的鬼 ,企图控制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他们还恶狠狠地宣布 :在最后一个少数民族死去或掉进大海之前 ,三 K 党人决不停止战斗。这伙种族主义的狂徒在密西西比州纳切兹的黑人社区燃烧了 3 个巨型十字架后 ,正式宣布三 K 党复活了。

不久,三 K 党徒迅速发展到 1.4 万人。在这批狂徒的策动下,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对民权运动的参加者进行暴力袭击,并于 1965 年达到高潮。这一年,在阿拉巴州的公路上,三 K 党徒们公然残杀一名黑人民权工作者,激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

美国国会也不得不宣布将对三 K 党进行审查。

盖洛普民意测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美国人中,支持三 K 党的仅占极少数,而对三 K 党持厌恶态度的占美国人的 94%。

三 K 党的第三次出山,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特别是在 60 年代,美国经济一直比较平稳地发展,种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淡化,黑人和外国移民在生活和就业方面不对白人构成威胁,而且暴力行动使大多数美国人感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安定受到影响,因而转而反对暴力。这就使三 K 党的那一套失去了市场,吸引不了更多的人参加。

于是,在一阵闹哄哄之后,三 K 党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三 K 党徒人员大减,一下子降到 4000 多人。三 K 党又一次隐蔽起来。

德国“红军派”

联邦德国的“红军派”原来是“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它的最初创建人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到了 70 年代后期 ,这个集团的四个主要领导人 :巴德尔、迈因霍夫、因斯林和拉斯帕都被逮捕入狱。后来他们由于感到斗争的失败而在狱中绝望自杀。从那以后 ,这个集团的残余势力就以“红军派”的名称进行活动。在西方的报刊中 ,“红军派”和“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两个名称所指的是同一个组织。

战后的联邦德国 ,在大量美元的援助下 ,经济奇迹般地恢复并发展 ,随之而来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富者腰缠万贯 ,灯红酒绿 ,脑满肠肥。贫者没有住房 ,没有职业 ,整天为生计操劳而不得温饱 ,还有一些人流浪街头 ,无家可归。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对社会强烈不满的青年开始行动起来 ,一些青年大学生更活跃 ,他们常常于星期天和节假日 ,在公园或戏院的一处 ,举行即兴辩论 ,讨论医治社会的“灵丹妙药”。在这些辩论者中 ,有一位十分引人注目的青年学生 ,他就是安德烈亚斯·巴德尔。

巴德尔 ,1943 年出身于慕尼黑的一个中产者家庭。由于受父母娇惯 ,从小养尊处优 ,表现出极强的叛逆性 ,常常因反抗管教而离家出走 ,久而久之 ,变得脾气暴躁 ,目中无人。1968 年 ,巴德尔正在法兰克福的一所大学社会系学习 ,当学生们进行街头论战、搞街头武斗时 ,他寻找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斗争方式” :放弃文科专业的学习 ,做一个自由撰稿人 ,笔伐德国资本主义。

他在文章里 ,竭力向学生们灌输 :在现在的德国社会 ,达官贵人

们过着骄奢的生活 ,而青年学生深受煎熬 ,被他们抛弃了 ,他们已不代表学生的利益。青年们只有自己解放自己 ,把自己武装起来 ,随时都要手持武器 ,同警察作战 ,因为穿警服者是达官贵人利益的保护者 ,所以要同他们算账 ;必须袭击政府官员 ,因为他们是达官贵人的走狗 ,所以要清算他们。

为了表示他行动坚决 ,号召组织未来的集团成员 ,他放火烧了法兰克福的一家百货公司。这一着果然有效 ,立刻引起当时极左派“女英雄”迈因霍夫的赞许和支持。

乌尔里克·迈因霍夫 ,1934 年出生 ,父母早逝 ,由养母照看 ,直到大学毕业。她相当漂亮而且腼腆 ,有教养而且性格达观 ,文才很好 ,非常健谈。大学读书时 ,她经常愉快地周旋于各种鸡尾酒会 ,受到许多人的赞赏 ,后来被推荐为一个刊物写政治评论 ,渐渐地 ,她成为这个专栏的作家。巴德尔的暴力行动 ,使她欣喜若狂 ,她似乎发现了一个新的志同道合的“战友”。于是在专栏文章中公开支持 ,指出 这次行动的“进步性” ,不仅在于毁掉消费社会的一些次品货 ,而在于胆敢破坏法律。安逸的德国公民 ,谁会关心越南战争中被烧死的孩子们 ? 为了让他们尝尝越南战争的滋味 ,唤起他们的觉醒 ,必须用暴力对现有社会的制度进行挑战 !

从此之后 ,她追随巴德尔到了柏林 ,投入到大学生的自由运动中 ,并参加了巴德尔组织的暴力活动 ,全力以赴地从事招募和策划工作 ,公开结成了“巴德尔—迈因霍夫帮”。后来 ,这个恐怖组织又以“建立红军”为目的 ,改称为“红军派”(REDARMYFAC1ION)。

成立初期 ,“红军派”约有 22 名核心成员 ,他们大多到国外受过专门训练 ,与国际的一些恐怖组织有密切联系 ,其重大的恐怖活动也往往得到国际恐怖组织的声援和配合。他们周围约有 200 名左右的一般成员 ,为核心成员的恐怖活动做准备工作 ,并随时准备补充核心成员 ,进行恐怖和暴力犯罪活动。另外 ,他们背后至少有 2000 名积极的同情者 ,这些人都经过核心成员的严格审查 ,他们大多有自己的职业、学习岗位和住房 ,其任务是掩护核心成员的活动 ,如提供住房、收集情报等等。他们里外三层 ,构成一个极严密的小群体。

在“红军派”的人员构成中 ,女性约占一半以上。她们也像男人

一样 ,拿枪杀人 ,还充当情妇、助手和顾问 ,用处甚多。她们常常偷运武器 ,从监狱中带出文件 ,利用德国社会尊重妇女的传统而逃过检查 ,正像迈因霍夫所卖弄的那样 :在他们的组织中 ,妇女感到非常满意 ,她们喜欢枪 ,并促使和鼓动男人们干更大的暴力行动 ,对待敌人 ,应该毫无女性的温柔和怜爱。

“红军派”经常采用的恐怖方式是暗杀、绑架和爆炸。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 ,他们的恐怖对象是美国驻联邦德国的高级军事人员及美军设施。1972 年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先后被捕入狱后 ,特别是两人分别于 1976 年和 1977 年在狱中自杀后 ,“红军派”的打击目标便转向国内 ,重点对象是本国的警察、法官、工商界和政界的头面人物。

战后一直生活在和平条件下的联邦德国人 ,想象不到恐怖活动到底给人们的生活和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他们来说 ,恐怖可能是拉美国家发生的事情。他们压根儿都没想到 ,那些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大学教育的男男女女 ,会变成一群杀人抢劫的政治歹徒 !他们不愿正视这个现实 ,然而 ,事实毕竟是事实 ,自从“红军派”成立后 ,联邦德国不再平静 ,一连串的爆炸、暗杀、绑架 ,使许多人断送性命 ,使许多人心惊胆颤。

日本“赤军派”

1969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岁月!

当左派学生运动席卷西欧各国,并最终酿成左派恐怖浪潮时,日本的激进大学生也蠢蠢欲动起来。

在美军占领的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年轻学生,看到了社会的弊病,憎恨美军占领者的颐指气使,抨击当政者的无能,要求奋起拯救社会。他们从反对校规到反对越南战争,从要求绝对自由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口号越喊越激进,行动越来越激烈。

11月25日,当北太平洋寒流来临之后,京都大地已披上茫茫白色。

这天早晨,京都大学的学生们又罢课了。他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喊“要人权、要自由”的口号,顶着寒风,踏着积雪,向防暴警察的队伍扑去。

在队伍的前头,一个浓眉大眼、身体健壮的高个青年,正举着喇叭,边走边鼓励学生们:“砸碎锁链,就能得到自由;破坏旧世界,就能建立新生活。面对警察,就看我们的斗争了。”

在他身边,有一个身高1.7米的女性,她一张瓜子脸,配上垂肩黑发,显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尽管寒风冻得她双颊通红,她还是挽着那男子的右臂,向前走去。他,叫奥平刚,是京都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外联课长。她,叫重信芳子,被誉为京都大学的女杰。是他俩,带头发起了这次罢课示威游行。

警察和学生队伍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双方在对峙着,剑拔弩张!

学生队伍中最先掷出雪球，接着又投出燃烧弹，警察则用高压水枪和警棍回击，双方战作一团。结果，奥平刚和其他5名学生被捕入狱。

恋人的被捕，使重信芳子愤恨不已。在一个个寒风凛冽的黄昏，重信芳子在户外踱着步，在一个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她在辗转反侧地思考着。沉重的思绪大大改变了她开朗的性格，她变得异常沉静。

半个月后，奥平刚获释归校，重信芳子非常高兴。但奥平刚的眼神告诉她，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学生运动要有所成就，仅同防暴警察进行徒手搏斗已经不行了，必须选择新的斗争方式。成立一个真正的组织。

从此之后，奥平刚和重信芳子出双入对，时常出现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操场上。他们谈论着西欧学生运动的最新进展，讨论着新的斗争手段，酝酿着组织的建立。在别的学生眼里，他们这对恋人真正放弃了原来的思想，但他们想不到，短暂的平静往往孕育着更大的风暴。

这样的平静持续了不到10天。经过紧张而热烈的讨论，他们在60年代最后一个圣诞节之夜，把一份份宣言贴到校园的各处。

宣言指出：你们只有拿起枪，举起炸弹，在我们的武装面前，胜利的曙光已在召唤你们！欢迎你们加入革命组织——赤军！！

这份宣言不胫而走，融进了左派学生的思想，震醒了日本政府的安宁梦。

重信芳子和奥平刚紧锣密鼓，加快了行动的步伐。他们利用学生自治会这个合法团体，公开地发展成员，又暗地里建立各层组织。

“赤军”的领导机构是政治委员会，负责制订行动计划，选拔心狠手毒的恐怖分子作领导成员。它下设组织部、军事部和后勤部，组织部负责扩建组织，吸进激进的年轻人，送到中东地区培训；军事部主要进行突击活动；后勤部则负责采购枪支弹药，准备活动基地，筹集行动经费。

“赤军”的组织成员主要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国内的“赤军连”，它由重信芳子和奥平刚组建，鼎盛时曾有200多人。后来，由于重信芳子和奥平刚把活动重心放在国外，

“赤军连”分裂成许多小宗派，他们时而联合行动，时而互相倾轧，难以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大大削弱了“赤军”的力量。

另一部分是国际行动支队，队员与重信芳子保持单线联络，其重大活动也由重信芳子组织策划。国际行动支队的总部起初设在贝鲁特，后来，由于中东局势大乱，欧洲各国警察严密关注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活动，大大影响了“赤军”的训练和行动计划，聪明的重信芳子便带领人马随日本留学生、游客和日本商人，悄悄淹没在日本人海中，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欧洲警方逐渐对“赤军”的存在感到不安，法国、瑞典都在日本人聚居的社区进行搜捕，并悄悄地把一些日本人驱逐出境。重信芳子见欧洲气候已不利，转而面向东方，着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组建活动基地。

搞劫持活动、扣押人质、勒索人质并迫使日本政府作出让步，这是“赤军”的惯用伎俩。“赤军”横行全球，攻击对象时而是飞机，时而是轮船，有时则是外国大使馆。他们计划周密、手段残酷，往往一箭三雕，在第三国袭击第二国，再向日本敲诈勒索，恐怖活动的成功率之高，是其他恐怖组织所望尘莫及的。

“赤军”声称，它要为日本带来革命，要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作出贡献。因而，他们施行恐怖的对象多是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重点打击这些国家，损害这些国家的国际威望。相对而言，他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似较同情，还没有对这些国家发动恐怖袭击。

“赤军”刚一成立，便小心翼翼地伸出头来，走上了国际恐怖活动的前台，成为恐怖组织中的新军。

想当年，在太平洋战争的硝烟中，那些用狂热的武士道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熔铸成的“神风敢死队员”，带着“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不顾一切地驾机对目标进行飞蛾扑火式的自杀撞击。在那轰然爆炸的一瞬间，血溅长空，粉身碎骨。

今天，“神风敢死队”阴魂不散，并借尸还魂，附加在“赤军”身上。“赤军”自称为当代的“神风敢死队”，高喊“世界革命”的口号，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献身。他们煽动着恐怖主义的翅膀，不断撞击着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撞击着亿万平民的和平生活，威胁着芸芸众生的性命。

法国的“直接行动”

1979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里,4个男女正在窃窃私语,柔暗的灯光照在他们脸上,只见其中一个男子一会儿在纸上圈圈点点,一会儿抬起头皱眉苦思,他身边一女子长得秀丽动人,不时地发出浪声笑语。

这一切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在巴黎,经常有一些大学生走出校园,在公共场合集会议事,甚至于唇枪舌剑地互相攻击,这类事件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很平常的事,只要不危及社会秩序和人身安全,巡警是不会过问的。

然而,善良的人们绝想不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咖啡桌上,这样4个普普通通的男女正在策划一个重大的阴谋:成立一个极左翼的恐怖组织!

那男的叫鲁依昂,具有恐怖分子特有的素质:脾气暴躁,性格坚定残忍,平常脸色铁青,难得一笑。他旁边那漂亮女子叫梅尼贡,看外表,人们绝对不会相信她是恐怖组织的最初成员。

午夜12点,咖啡店打烊了,这个恐怖组织——“直接行动”也产生了。

第二天,《巴黎日报》便接到了他们的“行动纲领”。他们宣称: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腐朽、最颓废的社会制度,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在内的政府是社会和人民的压迫者,必须坚决铲除。在巴黎,他们将以具体的实践行动,来清洗美帝国主义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腐朽,再创另一个“巴黎公社”。

他们的口号冠冕堂皇,可是,他们的行动方式是谋杀、绑架和劫持,制造爆炸事件。他们所从事的一系列恐怖活动都对准法国政界、司法和军事要人,有时殃及平民百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所干的那些勾当,实在是对巴黎公社战士英灵的一种亵渎。

成立初期,“直接行动”的骨干成员只有4人,一般成员30人左右,外围同情者也只有150人。无论是组织规模、活动能力,还是对法国政局的影响,与德国的“红军派”、意大利的“红色旅”都难以相提并论,“直接行动”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小弟弟。但是,他们却准备利用巴黎特殊的自然条件 and 政治环境,大干一场,争取在国际恐怖组织中露露脸。

措施之一是建立秘密情报系统。

他们的总部设有档案室,《私有化档案》收存了一些重要人物对私有化的评论。《首脑档案》是欧洲各国头面人物的情况专集,还为法国总理希拉克专列一份《希拉克档案》,其中包括总理的10名最亲密的助手、顾问和密友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照片。《参谋部档案》收集了社会党人、前国防部长保尔·基莱办公室的全班人马和三军参谋长的资料。《奥尔赛滨河路》卷宗反映外交方面的情况,里面特别抄有法国对外关系部分析和预见中心的全部成员名单。警察和司法界也分别立有卷宗。

所拍的录像带全与他们的打击对象的私生活、家庭和工作情况有关。他们录制情报的办法同特工人员一样,先派人把录像机隐藏在家里或工作地点附近,录像带连续运转两小时后,再派另一名成员取回,最后交鲁依昂整理。整理出来的重要结论都记录在练习本上。受到监视的人的行动规律都绘成图并标以箭头,还标有红色的反向箭头,以备紧急撤退时用。如果恐怖对象是知名人物,他们就从电视里收集资料,再剪辑复制。通过这些办法,“直接行动”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措施之二是加强舆论宣传。

“直接行动”十分善于利用舆论工具。它自称是“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要发动西欧游击战,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象征性恐怖的打击”。进行暗杀时,一般都在恐怖对象身上留下组织的标志:一个五

角星 ,下面写着该组织的缩写 A.D.。恐怖活动成功后 ,都发表长篇声明 ,详细说明他们的行动动机。

为了加强国际联系 ,它还在 1983—1984 年间出版地下刊物《国际》。到 80 的代中期 ,它已与欧洲各国极左翼恐怖组织建立了联系 ,并把联合行动扩展到美国、加拿大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措施之三是加强组织建设。

“直接行动”分设国内部和国际部。国内部由鲁依昂亲自负责 ,主要是在大学生中吸收激进分子 ,然后送到总部附近的一处秘密营地进行训练。训练结束后 ,由骨干成员带领参加恐怖活动 ,只要能够证明最残忍、最心狠 ,就可以成为该骨干成员的助手 ,参加所有的恐怖活动 ,而被淘汰下来的成员 ,则以学习、工作岗位作掩护 ,为骨干成员提供后勤保障。国际部由希比亚尼负责 ,国际部的成员也由核心成员组成。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接待来法的国际恐怖组织成员 ,配合他们在法国的活动 ,尔后帮助他们转移。同时 ,他们还应国外恐怖组织的邀请 ,到国外接受训练 ,相互传授从事秘密暴力活动的方法和持械抢劫的技术 ,支援国外恐怖组织的活动。

为了便利国际部成员出境和国际恐怖组织来法 ,“直接行动”总部存有法国警察局长发文签字的剪贴 ,有各种姓名和各种身份、职业的伪造证件 ,有不少盖有巴黎市大印的空白身份证和欧洲各大国移民局的印章。专职负责国际部的希比亚尼 ,竟为自己伪造了一份法国对外关系部官员的证件。

他们还建立了外围组织“西欧各国保卫政治犯国防委员会” ,不惜重金 ,在维埃纳省首府普瓦提埃租了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建立了国际联络中心 ,吸收欧洲的一些律师、教授、学生、作家等参加该组织。

所有的这一切 ,使得“直接行动”羽毛丰满 ,短时间内便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 ,暗杀、绑架、爆炸 ,无所不为。规模越来越大 ,手段越来越残酷 ,很快跻身于世界十大恐怖组织之列 ,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面对它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 ,法国警察与国际刑警驻巴黎总部联合行动 ,严厉打击 ,并派人打入该组织内部。但是 ,“直接行动”头

子们似乎有警觉,他们从一系列据点被侦破的教训中,收敛了活动,杀害了警方的内线,接着,在80年代中期,掀起了新一轮恐怖浪潮。

这时,在法国,只要提起“直接行动”,人们都谈虎色变,毛骨悚然,不觉想起奥特朗将军和贝斯被害案件。

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军事对抗的升级,西欧集中了大量部队、军事设施和现代化武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痛苦的西欧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他们不断通过和平请愿等方式,来表达反战反核的愿望。但是,“直接行动”却肆意歪曲人民的本意,采取了极端行动。

1985年1月14日,一份用法文和德文写的“直接行动”和“红军派”联合公告,被送往巴黎法新社,两个恐怖组织宣布合并,成立“西欧政治军事联合战线”。公告扬言,把北约组织及其决策者和西欧联盟作为敌人,重点暗杀两国的重要人物。

“直接行动”拟定了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他们开列了348名从字母A到Z的暗杀对象名单,这些名单中有各大公司的董事长,许多海陆军将军,战术空军司令,海军参谋长,国务秘书和飞机试飞员等人的名字。他们根据行动计划中字母的先后次序,对暗杀的重点仔细排队。

暗杀对象从A开始,这一下,奥特朗将军首当其冲,成为“直接行动”的第一个暗杀目标。

奥特朗将军是法国国防部国际事务局局长,专门负责军火出口业务。他受命担任这个职务以后,积极发展同中东一些国家的业务,努力把幻影战斗机、响尾蛇导弹等抢手武器打入中东市场,这引起了中东的一些恐怖组织的追杀。他几次死里逃生。

他居无定所,生活起居无规律可循,出入经常更换汽车,意在使冒险的工作具有绝对的安全系数。但是,他还是没有逃脱“直接行动”的手掌,他的私生活和职业活动已被详细地列入档案,他的日程安排、活动习惯也被恐怖分子掌握得一清二楚。等待他的将是恐怖的陷阱。

1月24日清晨,奥特朗将军卧室的电话铃声大作,法国对外关系部的一名官员让他立即驱车前去商讨对中东军火出口政策。将军

毫不迟疑地起床洗漱。他知道 ,军火系统的将军们的电话是绝密的 ,政府机关里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 ,对外关系部也只有两名官员知道。同时 ,军火出口事宜也经常与他们联络 ,前几天还打过交道 ,约定几天再商讨一次。

将军一身便衣 ,快步下楼。按照常规 ,他的司机将在车门口等着他 ,两名安全人员也坐在后面的汽车上 ,担任他的保卫工作。

但今天的情形却很反常 ,后面的保卫车不见了 ,司机没有等在车门口 ,代替他的是一位年轻妇女。她手里拿着鲜花 ,正“深情”地看着将军。

奥特朗正在迟疑间 ,只见那位漂亮妇女走上前来 ,“先生 ,买花吗 ?”她边说边向花束边移动着右手。她右手拿出来的不是鲜花 ,而是一支手枪。

将军惊呆了。

接着 ,两个男人从车中走出 ,推推搡搡地把将军塞进汽车 ,这一切都发生得天刚刚亮的瞬间 ,街上行人稀少 ,没有任何人看见。

至此 ,将军才明白了一切 :军火系统将军们的电话号码泄密了 ,对外官员的活动也受到了监视 !想到这里 ,他不由一身冷汗 ,极力去追想过去的工作 ,哪里会出现遗漏呢 ?

随即 ,车开走了。奥特朗眼睛被蒙着布 ,嘴被塞进了棉花 ,身体被五花大绑 ,放在两排座位之间的空档里。

原来 ,那个手持鲜花的女人就是梅尼贡 ,整个绑架活动是由她组织策划的。坐在后排座位上一言不发的男子是鲁依昂 ,今天他亲自督战 ,指挥汽车把奥特朗弄到了巴黎市郊区。

上午 10 点 ,他们派报童把一份声明送到了对外关系部。那位对外关系部的官员正在焦急地等奥特朗 ,想不到 ,人没等到 ,等来的却是将军被绑架的噩耗。

声明指出 :如果要释放奥特朗 ,法国政府必须公开中子弹的秘密 ,同时释放“直接行动”在狱人员 ,否则 ,奥特朗必将遭到惩罚。

接到声明后 ,那位官员火速报告了内政部。经过紧急磋商之后 ,法国政府在午间广播中断然拒绝这一“政治讹诈” 。鲁依昂闻讯 ,暴跳如雷 ,对奥特朗进行了非人折磨。

他们扒光了奥特朗的衣服 ,给他身体接上安全电流 ,不断地电击 ;鲁依昂指使两名恐怖分子用烟头轮番烧烫着他的敏感部位 ;夜深人静时 ,又把他拉到野地 ,受着冷风寒气的侵袭。

到午夜时 ,奥特朗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但他仍然不屈不挠。

最后 ,鲁依昂无计可施 ,将他残杀于荒郊野地。随之 ,他们逃得无影无踪。

1985 年和 1986 年 ,是“直接行动”异常活跃的两年 ,它的国际部成员不仅经常出入欧洲邻国和中东地区 ,参加那里的国际恐怖活动 ,而且还带领国内部的成员 ,经常“光顾”北约设在法国的军事基地、设施和有关人员 ,大有“全线摧毁法国资本主义”之势。

为了对付“直接行动”的猖狂活动 ,法国警察采取各种手段 ,设暗哨 ,派坐探 ,紧紧跟踪“直接行动” ,决心清除这个危害社会的毒瘤。

法国警察一举抓获“直接行动”的 4 名要犯 ,震动了全国各界 ,纷纷祝贺。同时 ,也引发了朝野的一场新风波。

执政党之一——保卫共和联盟的总书记公开说 ,如果鲁依昂、梅尼贡在 1981 年不被放出来 ,贝斯等人也不会冤死枪下 ,暗喻当年社会党政府借新总统当选 ,对身陷囹圄的“直接行动”成员实行大赦 ,结果害人不浅。而在野党、社会党则猛烈抨击执政党歪曲事实。密特朗总统也怒不可遏 ,他发表讲话 ,公开指责这是“卑鄙、肮脏的政治手段”。

作为一个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 ,“直接行动”由领导成员、核心成员和外围同情者组成 ,它有总部、据点和一般的逗留点。现在 ,警察仅抓获了他们的领导成员 ,“直接行动”仍有很强的活动能力 ,大批恐怖分子困兽犹斗 ,法国警察反恐怖的任务仍很艰巨。同时 ,这次捣毁的只是“直接行动”总部 ,一系列的活动据点 ,警察仍不得而知 ,希比亚尼身上的一串钥匙清楚地说明 ,他们的活动据点仍很多。

因此 ,“直接行动”下面到底有多少成员 ,他们的据点在哪里 ,一时难以查清。已经累得精疲力竭的法国情报总局局长并不轻松地说了一句 :“刚刚落下的仅是第一幕 ,全剧远未结束 !”

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卡特尔”

埃斯科瓦尔本来也是一个良家子弟 ,父亲是本分的农民 ,母亲是个小学教师。1949 年 12 月 1 日 ,他出生于麦德林西南的小镇恩维加多 ,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由于家道贫寒 ,埃斯科瓦尔的童年岁月想必不会很幸福。

可是今天人们却知道哥伦比亚有一个麦德林 ,麦德林有一个埃斯科瓦尔。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埃斯科瓦尔生活在一个毒品世界。

有句俗话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无钱只好做推磨鬼。埃斯科瓦尔就做过这种推磨鬼。偷自行车虽然风险很小 ,但毕竟获利菲薄 ,不能使埃斯科瓦尔暴富。眼看着周围的人们因毒品生产和贩卖而暴富起来 ,埃斯科瓦尔的眼也红了。他决定也从事这一本万利的买卖。于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枪击训练后 ,埃斯科瓦尔踏入了这一万劫不复之路。1976 年 ,他带着 20 公斤的可卡因意外失手。如果在今天 ,等待他的将是断头台 ,但当时的麦德林却没有毒品犯罪这一说。因此 ,埃斯科瓦尔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 ,反而雇人杀死了逮捕他的警察和接手审理此案的法官。最后 ,竟然一把火把法院烧了。这样 ,存放着他罪证的材料统统被付诸一炬。由于缺乏证据 ,法官眼睁睁地看着埃斯科瓦尔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拘留所。此后 ,他带领农民精心种植古柯 ,并进行技术革新 ,原来每年最多收获两次的古柯 ,在埃斯科瓦尔的调教下 ,竟然能收获四次。这样 ,埃斯科瓦尔声名大噪。此后 ,他不断罗织羽翼 ,势力不断扩大。

1981 年 12 月 2 日 ,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一天 ,埃斯科瓦尔刚

过 31 岁生日 ,就被推举为麦德林卡特尔的首领。在他的经营下 ,麦德林卡特尔规模更加扩大 ,组织更加健全。大量的毒品工厂有了现代化的设施 ,卡特尔有了一批精通走私之术的技术专家 ,更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私家军队。埃斯科瓦尔成了世界头号毒王 ,麦德林卡特尔则成了一个从事毒品生产、贩运的跨国公司 ,其管理水平足可与世界最杰出的跨国公司比肩。不义之财滚滚而来 ,埃斯科瓦尔有了自己的飞机 ,其数量足可让哥伦比亚国家的空军黯然失色。他还在南美几个国家拥有宾馆 ,在美国拥有 200 套公寓 ,在麦德林还有一个动物园 ,即使是哥伦比亚全国的动物园里的动物数量加在一起 ,也比不上他的动物园。埃斯科瓦尔成了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富人之一。

美国毒品管制局前局长威廉·尤特对埃斯科瓦尔的组织曾有过这么一个评价 :“它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凶恶、最危险、最残暴、最大胆也是最有钱的犯罪组织。与这个集团相比 ,美国的黑手党就像小学生 ,日本的山口组织就像教堂里的唱诗班。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危害着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与幸福。”

这就是世界各国禁止毒品贸易 ,并将类似埃斯科瓦尔这样的贩毒集团称为犯罪集团的真正缘由。正因为有了埃斯科瓦尔 ,今天的哥伦比亚成了世界毒品之都 ,而哥伦比亚政府也成了习惯于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的美国政府的攻击对象。

哥伦比亚也不纯粹是毒品贸易的受害者 ,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有毒品贸易以来 ,哥伦比亚的谋杀案直线上升 ,死于毒品的人数也有增无减。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城市 ,而贩毒之都麦德林则有“杀人城”、“谋杀之都”及“拉丁美洲最危险的城市”之称。在麦德林 ,发生谋杀事件不是新闻 ,相反 ,如果哪一天未发生谋杀事件 ,那么这条消息完全可以成为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更重要的是 ,毒品已经渗入哥伦比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埃斯科瓦尔的私家军队已经控制了哥伦比亚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 ,麦德林市已经成为一个“国中之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哥伦比亚整个国家到处散发着毒品的气息 ,毒品成为危害哥伦比亚社会稳定的一个毒瘤。这也是哥伦比亚有识之士誓死禁毒的原因。

1989年8月16日,哥伦比亚39岁的高级法官马斯特拉斯·卡洛斯·巴伦西亚在他的汽车上被4名从后面赶上来的摩托车手开枪打死。巴伦西亚被杀的原因就是他执行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指示,公布了对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逮捕令。8月17日,49岁的警官瓦尔德马·富兰克林·金德罗也因同样原因被害。1989年8月18日晚,力倡禁毒的总统候选人加兰在首都波哥大西郊的索阿查广场被两名杀手打死,加兰是三天内的第三位受害者。而就在十几天前,加兰已经遭到过一次暗杀,只是因为警方得到情报后,反应及时,加兰得以死里逃生,但是他终未逃脱毒品罪犯的死亡追杀。

此后的几个月中,又有两位总统候选人遇难。

1990年3月22日,哥伦比亚爱国联盟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贝尔纳多·哈拉米略在他的妻子玛丽亚及10多名青年保镖的陪同下出现在哥伦比亚的国际机场售票厅。一名腋下夹着一卷报纸的青年人向他们打招呼,并伸出手来准备与他握手。哈拉米略不知对方是谁,正在思考是否与他握手。就在这时,青年人突然将手抽回,同时从腋下拔出一支微型冲锋枪,对准哈拉米略就是一梭子子弹。哈拉米略立即倒在血泊之中。6发子弹击在他的胸口,2小时后他死在医院的抢救室里。而那名行刺的安德烈斯·古铁雷斯只有17岁,他既不是哈拉米略的信徒,也不是他的反对者,在此之前,他对哈拉米略还一无所知。只是在21日,有人找到他,愿意出650万美元,让他第二天在机场干掉哈拉米略。在这个贫穷的国家,650万美元是个天文数字。一般情况下,人们只要出10美元就可以雇到一个杀手,出200美元就可以雇到一个职业杀手,而古铁雷斯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答应了对方的要求,收下了他的钱和冲锋枪。一个总统候选人就这样死于非命。暗杀事件发生后,一男子打电话给电台,声称暗杀事件是贩毒组织麦德林卡特尔所为。

一个月后的4月26日,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一架飞往西部城市巴兰基利亚城的波音707客机已经起飞,突然,从飞机尾部传来一阵激烈的射击声。一位20多岁的青年人从机舱的厕所里取出一支微型冲锋枪,对准20号座位上的乘客一阵狂扫。名叫卡洛斯·皮萨罗的“四·一九”运动总统候选人立即血流如注。他的保镖立即开枪

还击,但已经迟了,凶手尽管被击毙,但他们的主人也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断气。皮萨罗的遇刺在哥伦比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四·一九”运动在哥伦比亚曾是一个游击队组织,也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哥伦比亚政府费尽力气也没有把它剿灭。只是到1990年3月,它才与政府达成协议,交出武器,成了一个合法的政治组织,成为哥伦比亚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它的领导人皮萨罗因而成为几个政党联合推出的总统候选人。皮萨罗的被害,在哥伦比亚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谴责这一暴行。哥伦比亚政府不得不宣布中小学停课,由最高法院和警方联合调查此案。后来发现,这一事件又是麦德林卡特尔所为,只不过他没有亲自出手,而是假手于哥伦比亚某极右的军事组织。这一行动对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毫无疑问是一次沉重打击。

当然,上面列举的仅仅是麦德林卡特尔所干的几件较为突出的非法勾当。至于说他死于手上的其他次要一点的人物,就更多了。据统计,从1982年至1987年,死于与毒品有关的政治家有108人,法官157人,新闻记者17人,警察1536人,军人408人,游击队员118人,其他公民3100人。这7年因而获得“死亡的7年”的外号。其他年份是否就好一点呢?远非如此,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糟。1989年发生了88次大屠杀,每次屠杀至少有5人遇难。1992年11月8日,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全国处于国内动乱状态,1993年2月6日又宣布将动乱状态延长90天。为了对付毒品犯罪,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设立“特别程序”法庭,并颁布法律,认可了这种特殊体制。在这种特别法庭上,对罪犯的审判是不公开的,你在这个法庭上看不到一个主控官,也看不到威严的大法官,更看不到为正义举证的证人。没有一个大法官不怕死,更没有一个证人为了举证一个罪犯而愿意在法庭上露面。一个公开声称要与毒品贩子作对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勇士,作出这项决策是要有非凡勇气的。像加兰这样公开与毒品分子为敌的人实在难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人们的极大尊重。但是,在死亡面前,敢于作出这种决定的人太少了。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在哥伦比亚这块土地上,没有一个法官能够安全地避开贩毒集团的威胁。

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哥伦比亚 ,法官、警察、政治家是恐怖分子“优先”考虑的目标 ,因为只有这些人敢于同他们作对。或是出于职责 ,或是出于良知。因此 ,死于恐怖分子之手的司法人员屡见不鲜。

1984 年 4 月 30 日 ,力主扫毒的司法部长罗德里格斯·拉腊首先罹难。正是他首先揭露身为哥伦比亚议会候补议员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是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的第一号人物。他力主将那些毒品巨商引渡到美国受审 ,因为在哥伦比亚已经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对毒梟进行公开审判。结果 ,他被认为是麦德林卡特尔威胁最大的人物。这样 ,死亡之神也就光顾了他。

1985 年 11 月 ,麦德林卡特尔支持的暴力组织占领了哥伦比亚的最高法院大楼 ,11 名大法官落入敌手 ,惨遭杀害。最后 ,政府不得不出动装甲车才冲进大楼 ,消灭了这帮歹徒。

1985 年 12 月 17 日 ,哥伦比亚第二大报《旁观者报》的记者吉列尔莫·卡诺因为著文抨击毒贩 ,批评最高法院不执行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引渡协议而被列入死亡名单。

1987 年 ,哥伦比亚最大的左派政党爱国联盟主席帕尔多·莱阿尔惨遭杀戮。

1988 年 1 月 24 日 ,哥伦比亚总检察长卡洛斯·毛罗·奥约斯在路上遭持枪歹徒的袭击 ,奥约斯身受重伤 ,苦苦哀求歹徒将他打死 ,但歹徒连他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没有满足。当天晚上 ,人们在麦德林郊外发现了血肉模糊的总检察长。两天之后 ,另外一位著名的反毒人士、库库塔市的市长拉蒙·迪亚士及其夫人也“荣幸”地进入死亡名单。

接下来的是加兰、哈拉米略、皮萨罗……

哥伦比亚向埃斯科瓦尔宣战。加维利亚总统命令军警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埃斯科瓦尔。哥伦比亚的邻国也进行配合 ,委内瑞拉的国民警卫队已经作好准备 ,防止埃斯科瓦尔窜入本国。

美国也一反过去对哥伦比亚的批评态度 ,积极支持哥伦比亚向埃斯科瓦尔宣战。大批高新技术仪器运入哥伦比亚 ,帮助缉毒大军侦查埃斯科瓦尔的踪迹。哥伦比亚对埃斯科瓦尔悬赏 140 万美元 ,后来又追加到 600 多万美元 ,再加上美国原先许诺的 200 多万美元 ,

埃斯科瓦尔项上人头的价格已经达到 800 多万美元 ,成为这个世界上值钱的一颗脑袋。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随着埃斯科瓦尔的项上人头越来越值钱 ,很多人看上了这笔致富的买卖。很多人心存侥幸 ,万一能逃过埃斯科瓦尔的毒手 ,岂不是可以独享这 800 多万美元 ! 因此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通风报信者的行列。八个月时间内 ,警方收到 8.6 万个举报电话 ,2 万封举报信件。警方根据这些举报频频出动 ,先后逮捕了 1300 名嫌疑分子 ,击毙了 48 名毒品贩子。

20 分钟的枪战后 ,平台上已经血迹斑斑。在一次围剿中 ,突击队员发现 ,已经没有人抵抗了 ,于是进行搜查。平台上留下了三具尸体 ,这里面是否有埃斯科瓦尔 ,不得而知。法医紧急赶到 ,经鉴定 ,那个小个子男人就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 ,他身中数弹 ,但手里还握着手枪 ,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空 ,似乎在问老天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击毙埃斯科瓦尔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 ,哥伦比亚人民的反应是不同的 ,大部分国民都对这个消息感到兴奋。这是政府对毒品宣战以来取得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在哥伦比亚的毒品史上 ,它至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1998 年公布的世界恐怖组织名单

中 东

阿布·尼达尔组织——巴勒斯坦的组织

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哈瓦特迈赫派

哈马斯运动(伊斯兰抵抗运动)——巴勒斯坦的组织

巴勒斯坦伊斯兰真主党——沙卡吉派

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阿布·阿巴斯派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

真主党——黎巴嫩的亲伊朗组织

人民圣战者组织——伊朗的反对派

伊斯兰组织——埃及的圣战组织

保卫犹太人联盟——犹太人的组织

卡汉组织——犹太人的组织

北 非

伊斯兰武装组织——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组织

亚 洲

奥姆真理教——日本的教派组织。1995 年东京地铁毒气案就是他所为。

阿布·赛义夫组织——活动于菲律宾南部和巴尼拉的伊斯兰组

织

图帕克·阿巴鲁革命运动

哈拉卡特·安萨尔组织——争取让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的一个伊斯兰组织

日本赤军派

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

欧 洲

民族和自由组织——西班牙巴斯克的分离组织

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土耳其的库尔德分离组织

11月17日革命组织——希腊的左派团体

革命的人民解放党(阵线)

南美洲

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持不同政见者)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民族解放军——哥伦比亚亲卡斯特罗的游击组织

光辉道路——秘鲁的游击组织

下篇 :世界反恐怖特种部队档案

以色列“摩萨迪”

世界上最著名、最成功的反恐怖特种部队

今天是以色列的议会日。

当以色列国家电视台的摄像机 ,对准了正在议会讲坛上发言的贝京总理时 ,以色列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 ,同时出现了这位“独眼总理”的近景特写。对于这位曾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现总理 ,大多数以色列国民持的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作为极端的利库德集团党魁 ,贝京一向以好战著称。

但今日此时 ,正当他慷慨陈辞的同时 ,在相距 1000 公里的底格里斯河畔 ,另一座历史名城里 ,一个身着将军礼服的魁伟男子正在记者们闪烁不停的闪光灯前 ,发表措词激昂的讲话。

他就是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

为了抗衡以色列的核军备 ,伊拉克 20 年如一日 ,锲而不舍地推行本国的核计划。按照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伊拉克最终将建成若干个重水型核反应堆。任何一个稍有物理知识的人都知道 ,拥有核反应堆 ,就能生产出装配核武器所需要的放射性核原料。

尽管以色列“摩萨迪”特工 1979 年曾在法国炸毁过一套伊拉克核设备 ,但萨达姆总统矢志不移 ,反而更加坚定了建立核军备的决心。

在几天后举行的是否对伊拉克核反应堆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以色列内阁会议上 ,贝京用一种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口吻最后拍板。

会后，一队防弹车沿着耶路撒冷旧城曲折迂回的街道驶向郊外。在靠近“死海”的一处沙漠林荫中，随着一扇重达 30 吨的钢甲防爆门的开启，汽车驶入了一个恍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山洞”，一个金碧辉煌的地下世界瞬间呈现在眼前。这里是以色列绝密的军事情报中心，全部设施都隐藏在距地面 40 米的洞穴中。以色列空军司令艾弗里、以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萨古伊先后从车内钻出，从第三辆汽车中下来的是“摩萨迪”局长霍菲。

由值班军官领路，艾弗里和霍菲一行来到了中央控制大厅。

这里装有 7 套世界上最先进的全球定位和网络通讯系统，坐在操纵台前的转椅上，就能通过以色列自己发射的卫星——“地平线”号观察整个世界。由人造卫星、地面预警雷达、电子侦察飞机、遥感变送器构成的电子监测网用一束束看不见的电波，紧紧裹住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就好像地球被“浓缩”后放在了这里。

指挥台正面墙上，数个彩色大屏幕显示器(GRT)正同时显示着世界各“敏感地区”的军事态势图。通过与美国间谍卫星的定时传输系统并机联网，这里可以调看、复制由美国卫星上高分辨率摄像机拍摄的地球上任何地方的高清晰度照片。

霍菲的眼光，落到了屏幕上出现的一个白色建筑群的中央，这是正在建设中的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工程。

值班军官的手指向一个半地下建筑物，操纵机器的技术人员立刻将这一画面放大。随后，按动打字键，一行希伯来文字出现在屏幕下侧：反应堆堆体厂房。

霍菲这时才抬起头，他的目光，恰巧同艾弗里的目光碰到一起，他们相对而视，艾弗里则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为了获得伊拉克核反应堆的精确坐标位置和发动袭击所必须的激光制导炸弹，以色列人像往常一样，要求他们的庇护神——美利坚合众国提供支持。

“最重要的是争取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协助！”这是贝京对以色列访美特使交待的最后一句话。多少年来，以色列每逢决定重大事件都要先通报美国。

信息很快反馈回来：美国不同意以色列利用美国的情报和技术，

去做刺激伊拉克情绪的事情。毕竟 ,伊拉克拥有巨大的石油资源 ,且控制着国际战略通道——波斯湾。

美国的总统国际事务助理对以色列特使说 :美国支持以色列对直接危害其生存的敌方目标 ,实行有限度的打击并乐于提供这方面的帮助。但是 ,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目前尚未运转 ,即便是核反应堆投入运转并开始生产核燃料 ,数年内 ,亦不影响该地区的军备均势 ,故美国政府目前无意改变既定的对伊政策。

资源是一种最好的防卫。

伊拉克在地理概念上是一个小国 ,但在石油世界里 ,它却是个“大国” ,其石油产量早在 70 年代以前 ,就步入了世界前 10 名之列 ,最大的买主之一就是美国。为了这珍贵的“工业血液” ,也为了美利坚数以亿计的轮子 ,美国不想轻易得罪阿拉伯产油国中的任何一个。

官方渠道堵死了。但“摩萨迪”毕竟是“摩萨迪” ,他们找到了多年合作共事的老朋友——CAI(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反复的考虑 ,美国中央情报局私下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卷只有 20 克重的缩微胶卷。

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天平上 ,美国人感情上永远是倾向以色列的。

“美国人够朋友 !”惊喜万分的以色列技术人员刚刚把整理完毕的资料送到霍菲的办公室。

霍菲正在办公室伏案疾书。这位 1974 年上任的“摩萨迪”局长向以严肃、冷酷著称。他的前一个职务是以色列“军中之花”第 101 伞兵突击旅副旅长 ,他的直接上司阿里尔·沙龙——以色列的“巴顿将军”曾任该旅旅长。

霍菲把 101 伞兵突击旅的战斗作风全部移植到了“摩萨迪” ,这个凶猛无情的组织变得更加凶狠可怖了。

“摩萨迪”局长的亲笔签字使这些绝密情报以最快的速度传向各有关部门。

三天后 ,一个与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一模一样的同比例的模型。在以色列与埃及接壤的内格夫沙漠出现了。

第五天下午 ,以色列空军轰炸机群便对“目标”进行了第一次“轰炸”。

准备执行“巴比伦行动”的空中特遣队的六架 F-15 战斗机和

八架 F-16 战斗轰炸机已经做好了起飞准备 ,一字排列在跑道尽头。

为了掩人耳目 ,这 14 架飞机的垂直尾翼上 ,全都漆成了某阿拉伯国家的军徽。

以色列与伊拉克之间隔着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 ,为了穿越这些敌对国家而不被发现 ,以色列可谓费尽心机。

这 14 架由美国援助的世界最先进飞机是即将开始的“巴比伦行动”的主角 ,它所具有的全天候远距离奔袭攻击能力 ,使以色列决心对伊拉克核反应堆设施 ,进行一次地球上罕见的“外科手术打击”。

天边的夕阳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演员 ,正企盼着早点回家到背后群山去卸妆。它仿佛知道 ,在这个不安宁的世界上 ,夜幕一旦拉下 ,魔鬼就会把罪恶降临。

“巴比伦行动现在开始 !”

耶路撒冷时间下午 4 点 ,以色列各海、空军基地 ,各战区司令部 ,“摩萨迪”驻海外情报站 ,担任奇袭任务的空军第二飞行大队 ,同时接到了空军司令艾弗里将军的命令。

6 架 F-15 战斗机机腹下 ,总推力为 20 吨的两台 F100-PW-100 型涡扇发动机喷管立刻吼叫起来。紧接着 ,八架 F-16 战斗机发动机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大轰鸣 ,强烈的尾喷气流顿时吹得沙飞石走。

“啪 ! 啪 ! 啪”三发红色信号弹在塔台上空腾起。这时 ,带队长机巴哈里上校的耳机中 ,传来了塔台指挥官“起飞”的命令。

外挂导弹和副油箱 ,担任战斗掩护的 F-15 战斗机起飞了。

载着激光穿甲爆破弹的 F-16 战斗轰炸机起飞了。

电子战王国的“千里眼”E-2C 预警机 ,早已升空待命。

太热了。

跑道上升腾起一片热雾 ,飞机轮胎似乎在熔化 ,粘糊糊地升不起来。满载高辛烷航空油的大型空中加油机 KC-10A ,仿佛一头负重的老牛 ,4 台功率强劲的发动机吃力地咆哮着 ,直到跑道尽头 ,飞机才腾空。

机群绕场上空一周 ,编队完毕后 ,转舵向西北方向飞去。

这是一只钢铁长臂 ,它几乎囊括了人类军事科技的全部最新成果。从现在起 ,它就要以每小时 1000 公里以上的速度 ,朝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那块低地飞去 ,这一次 ,“大卫长臂”要砸烂的目标是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 30 公里处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

以色列总参谋部军令处对所有军事行动都有备案 ,但此时 ,值班军官对面计算机屏幕上 ,莹绿色的字符显示却是 :军事演习。代号 :巴比伦行动。

战争的机器已经开始运转 ,但却被装上了“消音器”。极善此道的以色列人知道 :惟有隐蔽性最大的突袭 ,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尤其是这种“高技术、低强度”的“外科手术”式战争 ,突然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先发制人所具有的优势。

战争 ,对于有准备的一方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场演习的重复 ,但对于毫无准备的另一方 ,却绝对意味着灾难。

按照霍菲的要求 ,早已潜入伊拉克的“摩萨迪”特工 ,从巴格达传来了“一切正常”的密码电报 ,在那个至今仍不被人知的隐秘制高点上 ,通过一架西德“蔡司”公司的大倍率望远镜 ,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一切 ,全部被“摩萨迪”一览无余。

除此之外 ,一个精干的特别爆破小组正秘密向那里靠近 ,万一飞机轰炸未能彻底摧毁反应堆 ,那么 ,剩下的“活”将由他们乘乱进行。

天上 ,地下 ,一张密不透风的巨网已经织好 ,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在劫难逃了。

以色列 8000 米高空 ,从把沙特阿拉伯与埃及西奈半岛自然分开的亚喀巴湾最北端 ,沿约旦——沙特边界 ,经恰卡勒——木道瓦拉——哈拉尔阿马尔一线 ,循着预定迂回航线向东北飞去。

带队长机巴哈里瞥了一眼舱外 ,几朵晚霞正向后掠去 ,机翼下方就是西奈半岛的尽头。这地方他太熟悉了 ,那深黄色的沙漠 ,既是当年法老们生息过的地方 ,也是他——一个参加过 3 次阿以战争的老兵血洒长空的战地。至今 ,在他的左臂肿骨里 ,还有一颗埃及高射机枪的子弹头。如今这里钻塔林立 ,在这看似荒瘠的沙漠下面 ,涌动着的可能是无价的石油啊 !由于实行全航程无线电静默 ,耳机里 ,只有

在机群左侧 2 万米上空飞行的电子干扰机发出的“噬噬”的电流声。再往后,这架 E2—C“鹰眼”式预警飞机,就将与机群脱离,沿以色列——约旦边境作往返巡逻飞行。从它功率强大的电子吊舱中发出的有源干扰信号,将会使叙利亚和约旦所有的苏制警戒雷达出现“迟钝”。这样,在他们的雷达扫描器上,由这 14 架飞机密集编队所产生的反射波投影,仅相当于一块带电的高空积雨云。飞机在折转约旦——沙特边境“Z”字形拐点最西端的卡夫镇上空时,耳机中传来了一阵频率极高的快速发报声响,在天线杂波“噼啪”声的干扰中宛如一汪清泉。按照预定约定,这是基地指挥部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暗号,告诉他们,在伊拉克方向,一切未见异常。巴哈里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了。下面的事,就是应付沙特空中警戒区值勤官的查询。他知道,在沙特由美国引进的最新式雷达监测系统面前,一切都是无效的。很快,在国际通用的应答频道上,出现了沙特空中管制官的英语询问。很显然,沙特警戒雷达已经发现了这个机群。

“约旦空军,例行训练。”巴哈里用流畅的英语回答。沙特空中管制官信以为真了。沙约两国素来交好,军机偶入国境是常有之事。巴哈里确认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再注意他们这批“约旦空军”之后,用“黄沙丘”这句暗语,向总部发回了表示飞行顺利的密语电报,以色列空军总部将从这短短的几个字中,了解突击队的飞行情况。

尾随的 KC-10A 加油机左翼下,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红色信号。这是加油机悬垂着的加油管上方的红色指示灯。为了保持静默,空中加油只能由事先约定的灯光信号进行联系。在能见度大大降低的暮色中,只有一丝蹒跚于天边的太阳发出的微弱眩光,高速战斗机驾驶员完全凭借平时练就的高超技术,完成了别人白天都感到困难的动作。

6 点 10 分,突击机群飞临伊拉克领空。巴哈里上校驾机飞在编队最前方,只见他一推操纵杆,紧随其后的另外 13 架飞机骤然降低高度,进入伊拉克雷达“盲区”。

从这时开始,为了保持袭击的最大突然性和防备遍布伊拉克的苏制“萨姆”导弹,以色列机群又一次采取了它惯用的低空突防战术。空袭,将从 60 米左右的“树梢”高度开始。

下午 6 点 30 分 ,千里奔袭的以色列轰炸机群飞抵目标上空。

从空中望去 ,整个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工厂像一具凝固的塑像 ,在落日的余辉映照下 ,白色的建筑群呈现出对比强烈的高反差。以色列飞行员们惊喜万分 ,触摸投弹按钮的手指开始发痒。

按照袭击方案 ,担任攻击任务的 8 架 F-16 战斗轰炸机迅速爬升转舵由西向东 ,用俯冲姿态进入目标区投弹轰炸。采用这种方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此时 ,飞机自西向东背向阳光发动攻击 ,视野清晰 ,可以准确投弹 ,保证命中精度。而驻守厂区的伊拉克防空高炮部队 ,对从太阳方向飞来的敌机却只能迎着阳光射击 ,准确性必然大打折扣。

待轰炸结束 ,即将降临的夜幕又可成为以机摆脱伊拉克截击机群的最好屏障。

机关算尽 ! 自然因素被犹太人利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攻击的第一枚炸弹是由驾驶 F-16 的巴哈里投下的。这枚高爆激光制导炸弹 ,从距反应堆体 550 米的空中径直落下 ,由重力加速度产生的巨大动能 ,使炸弹垂直贯穿了敷在反应堆堆体顶层、厚达数米的防爆水泥隔层 ,引起了反应堆体内部猛烈爆炸。

紧随其后的另外 7 架 F-16 ,依次飞过带队长机的中心投弹点 ,投下了 14 枚炸弹 ,扩大了对反应堆核心部位的破坏效果。

这时 ,伊拉克的防空火炮开始还击。苏制 6 管速射高炮的串串火舌 ,在空中交织成数道烟幕 ,硝烟和横飞的弹片充斥半个天空 ,附近居民门窗的玻璃全部被震碎 ,人们像往常躲避伊朗飞机空袭一样 ,纷纷躲进防空掩体。完成第一拨攻击的以色列机群 ,此刻又绕回了背向阳光的西方。附近伊拉克空军机场正在开晚饭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截击群升空至少要 20 分钟 ,于是 ,巴哈里下定决心 ,把担任警戒掩护的另外 6 架 F-15 也投入轰炸编队。6 架 F-15 战斗机从 5000 米高度冲向地面 ,加入了第二拨攻击。

呼啸而来的以色列轰炸机全部打开了加力装置 ,雷爆般的轰鸣震撼着大地。“胡辛 ,我们已接近目标 ,把前方右侧挂有防空伪装网的建筑物摧毁 !”F-15 战斗机的长机飞行员通过机内通话器提醒僚

机。

25 岁的僚机驾驶员加卜莱·胡辛的右手拇指在红色投弹按钮上使劲按了一下,悬挂在机翼下的两颗 250 磅的“白星眼”激光炸弹立即沿激光波迅速朝目标飞去。摧毁反应堆主体之后,以色列机群按预先分工,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反应堆附属设施进行破坏性轰炸。随着一阵猛烈的爆炸声响,一架超低空飞行的 F-16 用火箭助推炸弹击中核反应堆体另一侧,埋在地下 6 米深处的核废料存贮罐被击中,巨大的烟柱立刻冲天而起,浓烟席卷烈焰,火柱高达数百米。

14 架以色列飞机在奥西拉克反应堆上空横跃翻飞,如入无人之境。内格夫沙漠的数百次演练大大地帮助他们。“命中目标!”“目标起火!”激动的驾驶员不待脱离目标区,便争先恐后地向带队机长报告情况。

当以色列飞机把 16 吨炸弹倾泻完后,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已经荡然无存。

一切才刚刚开始,但似乎又一切就此结束。在高爆炸弹的成千上万块金属颗粒的冲击下,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心脏”部位:生产铀 238 的反应堆机房已成一片废墟。

巨大的粒子射线屏蔽钢罩被撕成几块,歪七扭八地躺在残垣断壁之中,安放巨型计算机的中央控制室房倒屋塌,千疮百孔,缕缕黑烟随着晚风四散飘游。

一位在轰炸现场不远处目睹了这一切的法国核物理专家,在他的《援建日记》最后一页写道:炸弹几乎一米不差地落到了反应堆堆体上,主建筑彻底被毁,水泥顶盖被掀掉,辅助设施损毁严重,反应堆完全报废。

这就是结局。

三天后,在一片晦暗气氛中,法国援建团由巴格达登机回国了。

临行前,援建顾问团团团长,一位著名的法国核设备公司执行总裁,与伊拉克总统侍从室主任通了一次电话:“……重建反应堆需要 5 亿以上的美元和大约 5 年的时间,如果伊拉克政府能够确保安全的话。”总裁挂断了电话。

6 月 8 日早晨。一叠照片送到了以色列总理贝京在耶路撒冷的

办公室 ,这是昨天空袭行动的效果检查 ,刚刚由美国最尖端的 KH—11 卫星定时传输系统发来的。照片表明 ,造价 4 亿美元的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全部选定目标均被彻底摧毁。

美国“绿色贝雷帽”

世界上最庞大的特种部队 ,也是活动范围最广、活动最为频繁的特种部队

美国特种部队的先驱——第一特种任务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42 年 7 月 9 日在蒙大拿州的哈里逊堡正式成立 ,是由美军和加拿大军队混合组成的部队。司令官是罗伯特·福莱德里克陆军少将。这支部队成立后不久便被派往欧洲。

开始 ,这支部队预定在德方的挪威实施破坏作战。后来 ,根据情况需要 ,被派往意大利战场 ,他们为夺取马焦山附近的莱德芳萨高地进行了 36 天浴血奋战 ,名扬沙场。由于第一特种任务部队占领了这个重要据点 ,从而为美陆军第 5 军北上那波利打开了通道。

这支部队后来在法国被解散。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 ,却因其活动神出鬼没 ,使德军闻风丧胆 ,被德军称为“魔鬼旅”。

箭与剑交叉的浮雕 ,是在这支部队的筹备时期 ,由当时的国防部长于 1942 年 2 月 26 日批准配戴的徽章 ,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它同贝雷帽一起 ,成了“绿色贝雷帽”部队的象征。

美国特种部队先驱的另一支部队 ,是弗兰克·麦里尔率领的第 5306 混成部队 ,人们称之为麦里尔袭击队。这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这支部队在缅甸北部打过 5 次大仗 , 17 次小仗 ,使日军大伤脑筋。这支部队的一部分 ,曾长途跋涉数百公里 ,克服重重困难 ,穿越缅北平原 ,夺取了位于重要战略据点密铁

拉附近的日军机场 ,彻底摧毁了日军在缅北的空中优势。

提起美国特种部队 ,不可忘记第二次大战时期活跃在欧洲和太平洋的突击队。

美国的第一支突击大队是 1942 年 6 月 19 日在爱尔兰的加里库法科斯诞生的。这支部队参加过北非作战 ,在突尼斯攻击战中进行了奋勇顽强的作战 ,率先突破沙漠之狐——隆美尔的防线。后来 ,在意大利战场曾参加过攻克杰拉、萨莱尔、卡米诺的战斗。当盟军在欧洲发起反攻时 ,它作为先头部队为在诺曼底建立滩头据点立下了赫赫战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共成立了 6 支突击大队。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美军方高层人士认为 ,突击队作为非正规作战部队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遂于 1944 年 8 月 15 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班他兵营宣布解散。

在杜鲁门总统任职期间 ,当时的心理战中心所属的一支特种部队 ,由堪萨斯州赖利堡调到北卡罗来纳州布雷格堡 ,于 1952 年成立了第 10 特种作战部队。这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前身 ,队长是阿托·邦克陆军上校。

邦克上校早在几年前就积极地宣传成立敌后游击部队的必要性。朝鲜战争一爆发 ,他的意见便被采纳 ,终于成立了特种部队。这样 ,10 年前由福莱德里克少将创立的特种部队又得到了恢复。1953 年 ,以派驻西德的第 10 特种作战部队留守部队为主体 ,在美国的布雷格堡成立了第 77 空降特种部队。第 77 空降特种部队经过多次扩编 ,逐步扩大 ,最后全部承担了原第 10 特种作战部队在美国本土的任务。1957 年夏 ,又以第 77 部队的一部分为主体 ,成立了第 1 空降特种部队 ,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应急力量部署在冲绳。1960 年春 ,第 77 空降特种部队改编为第 7 空降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虽然新编了几个 ,但第 7 空降特种任务部队至今仍然是特种部队的核心 ,担负着支援和指导国内外训练现役军人和预备役军人的任务。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后 ,为了赞誉他的功绩 ,美国把位于布雷格堡的特种战争中心改称为约翰·F·肯尼迪特种战争中心。

绿色贝雷帽部队在美陆军中是一支独特的部队。它的编制不是

通常的团、营、连、排建制,而自有其独特的编制系统。1974年改编后的编制,由司令部、支援中队、通讯及维修中队和若干作战大队组成。

作战大队才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核心。大队下设大队部和若干个作战中心。作战中队又设中队部和若干个作战组。在“绿色贝雷帽”部队中,由12人组成的作战组是基本作战单位,是执行作战任务的中心。

“绿色贝雷帽”部队的训练十分严格,通往“绿色贝雷帽”部队的道路是艰难的,要将一名普通陆军士兵训练成合格的特战队员,其条件必须是下士以上军衔,在陆军服役期间不能有任何不良记录,而且必须是自愿签约服役的。进入特种作战部队的“门槛”测试,包括一系列体能测试与智力测试。没有通过测试的将遣返原部队继续服役,不留下任何记录。初选合格者则继续接受一项为期3周的“特种作战能力评价与甄选”测试,通过测试者(主要为空降技能)将返回原部队继续服完役期,然后再返回布拉格堡接受“特种作战验证课程”的训练。特种作战验证课程为期6个月,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课程为一般军事技能如射击、爆破及通讯等的训练,第二阶段的课程为野战技巧训练,最后是第三阶段的求生训练。基础军事与特种作战专业之后是为期16个月的外语训练。语言学校毕业后,才正式成为特种作战部队的一员。结业后被分配到特种任务部队的队员,还要从老队员那里充分接受应用技术训练。内容有如何运用和提高已掌握的技术,以及最大限度地有效应用有关技术的方法。队员通过上述一系列训练后才能成为合格的特种部队队员。不论到世界任何地方,不管是大海还是高山,不管是地面平坦还是凹凸坎坷,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总之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进行空降、潜水,从事山地战、丛林战、沙漠战、滑雪战、游击战等等特种作战。

经过严格训练,12名作战组的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可以顶50名一般队员,可以训练1.5万名当地人。

提到“绿色贝雷帽”部队,还必须谈一谈贝雷帽的来历。在考虑这支勇敢的特种队员拿什么作标志时,当局想到了英国突击队戴的

绿色贝雷帽。因而,“绿色贝雷帽”被美军特种部队采用后,便成了美军特种部队的象征,并被原封不动地当成了对其队员的别称。

开始,美陆军的同级将领对这个不同一般的帽子并不中意,采用后又一度停用。然而,对特种部队表示出异常关心和全面支持的肯尼迪总统认为,这种帽子作为队员们勇敢地克服未来的种种困难、执行艰苦任务的象征,是很相称的,并指示队员们要自豪地戴上它。因此,美国的特种部队又重新采用了贝雷帽。与此同时他们还继续沿用1942年经国防部长批准戴用的两支箭和短剑交叉在一起的徽章,把它佩戴在帽子上方。

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遭暗杀时,最感悲痛的是“绿色贝雷帽”部队。

当总统遗体在华盛顿阿林顿公墓安葬时,“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代表作为仪仗队参加了葬礼。当安葬仪式快要结束时,弗朗希斯·拉迪上士满面悲痛地摘下自己的贝雷帽,放在美军最高司令官、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坟墓上。总统因热爱特种部队而把绿色贝雷帽授予特种部队,如今,被热爱者又将它归还给了总统。绿色贝雷帽至今仍同陆、海、空军军帽一起,静静地安放在阿林顿公墓肯尼迪总统的墓中。

今天的美国特种部队,不同于越战时期的“绿色贝雷帽”部队。虽然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战士中的战士,但今日美国特种部队却具有相当严实的组织架构和作业方式,其训练的目的,不但要应付如“沙漠风暴”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必须面对无法预测的形势。如索马里及中非等地的紧张状况。据他们自己表示,现今作战部队与昔日“绿色贝雷帽”的最大差异,在于目前较以往运用更大量的指挥、管制与通讯的技术和装备。

现在美军特种部队的专门管理机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位于佛罗里达州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内,其下辖机构包括: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下辖著名的第82空降师以及三角洲特种作战部队和第75旅骑兵团等);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下辖著名的海豹特遣队及特殊小艇部队等);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等。

在80年代,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部署在几十个国家,执行了许多

特种作战任务。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第7特种作战队被赋予“黑色特遣队”的行动代号,配合其他美军部队的行动,此次战役,“黑色特遣队”最大的成就是在巴库拉河大桥上成功地挡住了巴拿马国防军的增援行动。在海湾战争中,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几乎参与了每一阶段的行动。

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是各国中参战最多的特种部队之一。虽然在大多数行动中他们取得了成功,但失手的例子也不断出现,而且每次都弄得沸沸扬扬,不堪收拾。除了德黑兰人质事件外,1993年在索马里的失败是另一次较为突出的事例。

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但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关键在于秘密、准确与迅速。要以不惊扰敌人的秘密手段潜入敌后,在完成任务后即迅速撤离。如果惊扰了敌人,由于配备的皆属轻型武器,特种部队除了逃走外,是没有能力与包围的敌军对抗的。对照以色列特种部队历次的成功与美军特种部队的屡次挫败,如果说原因是美军训练不足,这是不公平的。美军特战队员骁勇善战,其训练与装备也是一流的。问题出在哪里?毫无疑问,美军对特种部队的使用与组织指挥上尚有若干不足,很多地方忽略了特种部队的作战特性,于是频频失误便在所难免了。

1979年11月4日清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霍梅尼的拥护者涌向街头,抗议美国接受巴列维国王的避难。人们在市内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一路高呼“引渡巴列维!”“打倒美国!”等口号。

不久,这支气势雄壮、愤怒无比的游行队伍来到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附近的一条大街上,举行集会。大使馆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见势不妙,立即分头行动,把住使馆的各个出入口,并全神贯注地在使馆大门口巡逻站岗。

上午10点半,一些游行者的绕开陆战队守卫的大门,突然从使馆的高墙上翻过去,人们蜂拥而入,大使馆内的美军士兵只得用催泪弹进行抵抗。人们不顾一切,迎着催泪弹,拼命地冲进了大使馆。

人们将使馆内人员,含秘书、武官等外交官53人扣作人质,并给外交官蒙上眼睛,把他们统统集中到正楼附近的建筑物里关了起来。此外,正当伊朗人冲进大使馆时,主持使馆工作的临时代办雷思,恰

巧同其他两名外交官在伊朗外交部 ,于是也被扣作了人质。

当日傍晚 ,伊朗外交部发表了一项声明 ,措辞强硬地谴责了美国 :“事件反映了伊朗国民的情绪。美国接受巴列维严重伤害了人民的感情。必须把巴列维国王送回伊朗 ,否则 ,美国人质将会受到审讯。”

次日 ,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声明支持学生的行动 ,要求美国引渡巴列维国王。

全世界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美国朝野一片沸腾 ,国民上下群情激奋 ,呼声迭起。在受到巨大压力的同时 ,白宫开始酝酿以武力夺回被扣押人质的计划。

其实 ,武装营救人质的问题 ,早已提上五角大楼的议事日程。就在事件发生后还不到一周 ,“三角突击队”就已接到预先号令 ,准备采取远程偷袭方式 ,武装袭击德黑兰美国大使馆 ,消灭守卫人员 ,救出人质 ,将他们安全带出伊朗。

圣诞节之夜 ,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特别作战情报室里坐满了人 ,国防部长琼斯正在召集中央情报局官员 ,陆、海、空三军首脑 ,贝克韦斯上校等人研究磋商武装营救人质的行动方案。像这样的会议 ,已经开过 6 次了。

会议由琼斯主持。“诸位都知道 ,一个多月来 ,我们为了营救被扣人质 ,已经作了多方努力 ,但收效甚微 ,伊朗无动于衷。卡特总统命令我们拟定一个方案 ,适当时机以武力一举救出人质。我们根本不想这样做 ,但因为球已逼到了网前 ,我们别无选择。希望大家根据最新获得的情报和上几次讨论的情况 ,对武装营救人质的方式、路线、行动预案 ,继续发表意见。”

连日来 ,他们在商讨营救方案过程中 ,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情报 ,准确可靠的情报。例如 ,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是个什么样子 ,内部如何布局 ? 人质被关押在大使馆的哪个地方 ? 是集中在一起 ,还是分散在几处 ? 谁在看守人质 ,有多少兵力 ? 一旦伊朗人遭到攻击 ,附近有哪些部队可能赶来增援 ? 德黑兰周围有没有可供袭击部队停留的隐蔽地 ? 等等。缺乏情报就等于在拳击场上被人蒙上了眼睛 ,如

何能定下决心？为了搞清上述情况，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一个特工小组立即展开了活动。他们很快搞清了有关情况，还购买了5辆卡车和2辆运货车，租了一所仓库，作为接应突击队时使用。

美国大使馆位于德黑兰罗斯福大街，占地27英亩，大体有一座小型的大学校园那么大，里面有14栋不相连的楼房和平房，人质分散关在2栋楼房里。其中，大使馆办公楼有31名人质，大使住宅里有19名人质。另外2名人质同发事当天正在伊朗外交部办事，被关押在外交部大楼。负责看押人质的主要是伊朗警察和学生，戒备程度不高。大使馆外面，是伊朗的革命卫队，战斗力较强。还有，德黑兰驻有伊朗的一支高度机动的武装部队，装备有英国的弗奇顿、美国的M48和M60AI中距坦克，苏联的ZSU—23—4装甲炮等令人生畏的武器，但这支部队远离市区，在理想状态下，赶来增援也需一个半小时。另外，德黑兰东南部的沙漠地区有二处便于隐蔽部队的地点，那里土质坚硬，可以承受大型运输机起降。

“既然所需的情报都送来了，还等什么，该是作出抉择的时候了。”琼斯由于心情焦急，语调显得有些激动。

“我提一个方案。”一位空军准将打破了沉寂。“我的意见是使用大型运输机，将‘三角突击队’空降到德黑兰郊外，然后骑自行车通过德黑兰大街，冲进大使馆。”

空降？谈何容易！德黑兰郊外尽是些高低不平的丘陵地，突击队在那里空降，按照概率大约有7%的人会扭伤脚腕子，要是执行其他任务这还好说，可眼下是营救人质，“三角突击队”拖着这么一群断了腿的人，如何能将人质从虎口中救出来？救出来又如何能安全退回？至于骑自行车通过德黑兰大街，荒唐！美国人和伊朗人，3岁的小孩也能区别出来，如何能隐蔽行动，贝克韦斯不满地瞪了那位空军准将一眼。

“我看可以采用卡车方案。”又有人站起身来说，“先用大型运输机将突击队运到土耳其，再从那里乘预先购置的卡车把突击队接进德黑兰。因为土耳其每天都有大量卡车通过国境，从陆路进入伊朗，他们不会疑心的。”

嘿！卡车方案？乍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其实不然。这个方案

如要付诸实施 ,危险性可以说是 99.9% ,成功的希望等于零。因为土耳其边境距德黑兰 ,足有上千公里远 ,如果在伊朗边境检查时遇到一点麻烦 ,海关人员打开一辆冷藏车 ,发现里边装的不是啤酒 ,而是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 ,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人赞成“卡车”方案。

会议冷场了。

琼斯将军瞧了贝克韦斯一眼 ,努了努嘴 ,用征询的口吻说道 :“上校 ,谈谈你的意见吧。”

对这次营救行动方案 ,贝克韦斯早有考虑 ,只不过出于对这些将军的礼貌 ,不愿过早地显露罢了。

贝克韦斯的方案整个行动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 ,使用空军的 6 架 C—130 运输机 ,装载 97 名“三角突击队”队员和所需燃料、设备。从美国本土的波普机场起飞 ,经飞埃及 ,在基纳机场加油后 ,穿越红海 ,南下进入曼德海峡 ,沿阿拉伯海 ,绕哈德角 ,从查赫巴尔插入伊朗领空 ,然后直飞德黑兰东南约 180 英里处 ,于夜间降落在在一块沙漠盐碱地上。那个地方 ,他给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沙漠 1 号”。

与此同时 ,抽调 8 架直升飞机 ,从停泊在阿拉伯海上的“尼米兹”号航母上起飞 ,赶往“沙漠 1 号”会合。

第二步 ,“三角突击队”队员乘上加过油的直升飞机 ,直奔德黑兰郊外的另一个隐蔽地——“沙漠 2 号”。到达后 ,直升飞机和突击队员在那里潜伏一个白天。

第三步 ,C—130 运输机于第二天夜间飞至“沙漠 2 号” ,与此同时或稍后 ,突击队员在“青蛙”小组的接应下 ,乘上预先购置的汽车 ,秘密进入德黑兰。到达罗斯福大街后 ,兵分三路 ,蓝队从大门突入使馆 ,直趋大使馆办公楼 ,营救那里的 31 名人质 ;白队从大使馆东侧越墙而入 ,扑向大使住宅 ,营救那里的 19 名人质 ;红队冲向伊朗外交部大楼 ,营救被关在地下室里的 2 名人质 ,人质救出以后 ,各组到使馆足球场会齐 ,从足球场登上刚刚降落的直升飞机 ,撤回“沙漠 2 号”。尔后 ,直升飞机返回航母 ,人质和突击队员换乘 C—130 大型运输机 ,撤离伊朗。

届时 ,卫星和高空侦察机为“三角突击队”提供情报和通信保障。

8架直升飞机中的武装攻击直升机将飞临大使馆上空巡逻,假如伊朗的革命卫队敢轻举妄动,就让他们尝尝格林机炮的厉害。

“哦,不错。”琼斯一面听贝克韦斯的介绍,一面颌首称赞,“我可以以此为基础,制订一个营救方案。这个方案,就叫‘饭碗’行动吧。至于行动的具体时间,我向卡特总统汇报后再决定。”

无人提出异议。

散会后,贝克韦斯回到兵营,在黑板上画了一幅漫画:“三角突击队”的队员们,扛着机枪,穿着芭蕾舞超短裙,在美国大使馆跳着足尖舞。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三角突击队”在焦急等待中,迎来了1980年。

1月平安地过去了,2月悄悄地溜走了,3月也不见什么动静,4月的日历又翻过了一半,可是,“三角突击队”仍没有接到武装营救人质的命令。

本来,2月底至3月初,正是伊朗的冬春交替时节,从电视新闻中可以看到,那段时间里,德黑兰的气温比较低,使馆区的武装警卫人员警惕性也比较差,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围着火炉取暖、打盹,这对于武装营救人质行动来说,是多么好的天赐良机啊!但是,却白白错过了。

据说,卡特总统早已批准了贝克韦斯上校提出的营救人质计划,但具体行动日期却一推再推,迟迟定不下来,因为总统还要观察一下政治气候,不敢贸然行事。

几个月来,“三角突击队”犹如坐在火山口上,度日如年。他们昼伏夜出,一遍遍地从直升机上爬上爬下,向那座模拟的美国使馆模型冲击,冲击,再冲击。修起的“使馆”围墙炸掉后再建,建起又炸掉,不知折腾了多少次。美国大使馆有几条路,每条路多长,每座楼有几个旮旯,几个门,钥匙孔的方位,伊朗人的日常巡逻路线和停留地点,都装在他们脑子里,闭上眼睛也能说得出来。

命令终于下达了。4月20日晚上,贝克韦斯上校宣读了总统的电报:“三角突击队”立即开赴埃及,4月24日晚进入“沙漠1号”4

月 25 日晚向美驻伊大使馆发起攻击 ,救出全部人质。

“三角突击队”一片欢呼声。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上帝保佑美国”。歌声回荡在夜空 ,越来越响亮。

“你认为怎样?”贝克韦斯问“三角突击队”的心理学博士贝格。

“他们的士气比任何时候都高 ,上校!”

“河口、河口 ,山鹰呼叫 ,山鹰呼叫 ,我们已经到达‘沙漠 1 号’ ,我们已经到达‘沙漠 1 号’。”4 月 24 日晚 22 时 30 分 ,贝克韦斯上校激动而略显沙哑的声音 ,瞬时通过运行在波斯湾上空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 ,传送到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战情室。

载有“三角突击队”队员及武器装备器材、油料的 C—130 大型运输机 ,它们样子古怪 ,腹部隆起 ,活像大腹便便的孕妇 ,虽然这些钢铁大鸟其貌不扬 ,但机动性好 ,航程远 ,能在简易机场或较平坦的空地上起降。几分钟前 ,6 架载重量分别达几十吨的“大肚皮” ,竟然在伊朗空旷的沙漠硬地上降落。

与此同时 ,从停泊在波斯湾的“尼米兹”号航母上起飞的直升机群 ,正迅速向沙漠中会合处飞去。

沙漠的夜 ,深邃神秘 ,令人难以捉摸。“大肚皮”机组正在检修飞机。“三角突击队”队员们 ,身穿肩部缝有美国国旗的黑色战地茄克衫、牛仔裤、长统靴 ,在银白色月光的映照下 ,忙碌地从飞机上往下搬东西 ,只待直升机一到 ,马上就向“沙漠 2 号”进发。

5 分钟过去了。

10 分钟过去了。

20 分钟过去了 ,可是直升飞机还是没有来 ,贝克韦斯有些沉不住气了 ,他不时地抬头看手表。怎么回事?出了什么问题?迷航?不会。上有卫星定向 ,下有预警机导航 ,一般不会迷失方向。故障?有可能。这些直升飞机的液压系统就出过毛病。可是 ,为了避免这次行动出问题 ,他们为每架飞机都装了两罐压缩空气 ,作为应急情况下的辅助驱动源 ,即使液压系统再出点问题 ,也不至于起飞不了呀。刚才琼斯将军不是还说它们已经都起飞了么?噢 ,对了 ,直升飞机的旋翼会不会掉呢”难说。那么几片风扇似的叶子 ,系着一个大铁疙瘩

瘩,要是从空中掉到地上,后果将不堪设想。不过,直升飞机从航母上起飞时,都是空机,上面什么东西也没装,不会超载的呀!即使摔了,也不会8架飞机一块摔,总有囫圇的吧,为什么一架也见不到?不管是否是上述原因,他都有一种预感,一种不祥的预感,恐怕要出事。本来,当初在制订行动方案时,他就不想使用“海马”式直升机,因为这种飞机是用来进行海上扫雷的,但由于海军积极想涉足这次行动,并打了包票,说它完全能胜任营救入质的任务,为此,还列举了不少理由。如该种飞机载重量大,航程远,比其它型号的直升飞机性能优越,而且已进行了专门改装等等。没办法,只好听了他们的意见。这下可好,行动刚开始就出了问题。如果直升飞机来不了,“三角突击队”天亮之前就赶不到“沙漠2号”,赶不到“沙漠2号”,整个行动就要后推,计划就会被打乱,弄不好会中途泡汤!贝克韦斯不敢再想下去了。

“头,他们来了!”远方传来发动机的马达声,两束灯光射了过来,贝克韦斯从直觉中马上做出了判断:不是直升飞机,是汽车!

的确是汽车。可是,是什么汽车?军用的,还是民用的?上边是什么人?意图何在?贝克韦斯的思绪飞快地翻腾着。瞎!来不及细想了,他把手一挥,“给我拦住它!”贝克韦斯命令刚出口,十几名队员就冲了过去。

“噗哧、噗哧。”带消音器的冲锋枪响了,汽车轮胎发出爆裂声,“嘎吱”一下,汽车停了下来。车内,发出一阵惊恐的喊叫声。原来这是一辆过路的梅塞德斯牌大轿车,车上有45名乘客,大部分是老年人和年轻的孩子,还有几名妇女。他们是为避开白天的酷热而夜间行车的。

怎么不早不晚偏在这个时候钻出这么多人?真是活见鬼!贝克韦斯略一沉思,果断地吩咐道:“把汽车里的油给我放掉,人员集中看押起来,一个也不能放跑,等直升机来了再说!”贝克韦斯脑海里已经有了处置办法:只要直升飞机一到,就把这些人装上去拉到几十里之外卸下,让他们慢慢地在千里旷野上去爬吧,这样,既保证了他们的生命安全,又不影响营救行动。等伊朗当局搞清了情况,我们早就踏上归途了。

“头 ,不好 ,又来了两辆汽车 !”有人惊呼。贝克韦斯也看到一辆汽车加油车和一辆小型面包车正风驰电掣般地开过来 ,速度相当快。这次没等贝克韦斯下命令 ,6 个突击队员分成两路迎了上去。“站住 ! 站住 !”对他们的喊话 ,两辆汽车根本不予理会。一名队员端起手中的 M79 机枪 ,对准前面的加油车 ,“哒、哒、哒……”加油车被击中了 ! 顷刻之间燃起了大火。突然 ,被击中的加油车的司机猛地从车上跳下 ,奔向后方的面包车 ,他刚钻进驾驶楼 ,小面包车旋即作了一个猛烈的 U 字型转弯 ,掉头就跑。队员掉转枪口 ,一串火舌围绕面包车的左右跳动 ,车窗玻璃哗哗地变为碎片 ,里面立即鬼哭狼嚎。可是 ,司机没有被击中 ,一眨眼工夫 ,小面包车就消失在黑暗中。

“给我接‘河口’。”贝克韦斯拿过送话器。

“‘河口’ ,我是‘山鹰’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个情况 ,有几个伊朗人驾车跑了。”

“什么人 ?”

“没搞清楚 ,好像是过路的。”

“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意图了吗 ?”

“大概没有。”

“不用管他 ,按预定计划大胆地干 !”

“可是直升飞机还没到。”贝克韦斯话未说完 ,天空中就传来了马达声 ,他抬头一看 ,接着又补充道 :“他们到了 ,整整迟到了 70 分钟。”

“噢 ,不要紧 ,沉住气 ,天亮之前赶到‘沙漠 2 号’还来得及 ,迅速行动吧 !”

贝克韦斯刚与琼斯通完话 ,直升飞机带队机长塞夫特就跑了过来。“怎么搞的 ,晚了这么长时间 ?”贝克韦斯劈头就是一句。塞夫特一脸委曲地回答 :“真倒霉 ,途中遇到了沙暴。”贝克韦斯用眼睛扫了一眼直升飞机 ,恼怒地质问 :“怎么是 6 架飞机 ? 那 2 架呢 ?”“那 2 架飞机 ,一架中途迷航 ,一架机械故障 ,来不了。”塞夫特十分沮丧地解释着。

原来 ,从海路出发的 8 架 RH—53D“海马”直升机于当日傍晚准时开始行动。晚上 7 点 30 分左右 ,8 架“海马”满载油料 ,在舰上人员的一片呐喊声中 ,陆续从阿曼海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起飞 ,也

向一号集结点急速飞去。到一号集结点的距离约为 960 公里。飞机进入伊朗时采用编队飞行,为避开雷达跟踪采取低空飞行的方式。

开始似乎一切顺利。但飞行两小时后,直升机中 6 号机的螺旋桨故障警告灯突然报警,6 号机为查明故障不得不紧急着陆。飞在最后的 8 号机见 6 号机在地面降落,也紧跟着着了陆。经检查发现,螺旋桨连杆的压力已消失。按照规定,应立即放弃飞行。于是,8 号机收容了 6 号机的乘员,抛下 6 号机继续向前飞行。真是祸不单行。一小时后,直升机群遇上了一股大小和密度不明的沙尘,好不容易闯过去,接着又遇上一股巨大而浓密的沙尘,而且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小时。直升机群只好顶着漫天黄沙飞行。由于视野极差,飞行极困难,有的飞行员在云层中,特别是稠密的尘沙中,失去了平衡感觉,只能全凭仪器飞行。在这种情况下,5 号机显示航向的陀螺仪又失灵了。鉴于气象条件越来越差,5 号机被迫放弃执行任务,依靠辅助陀螺仪,艰难地飞回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贝克韦斯铁青着脸,心里盘算了一下,6 架飞机,是这次行动最起码的数字,不能再少了。用 4 架运“三角突击队”队员和人质,一架运装备器材,另一架作火力支援,马马虎虎可以说得过去。事到如今,也就听天由命吧。“马上加油登机!”贝克韦斯下达了命令。

直升飞机的旋翼呼呼飞转,声音震耳欲聋。3 架 C—130 加油机开始为直升机加油。它们靠得很近,就像母亲给小儿在喂奶。“三角突击队”队员已排好了队,有的已拖着武器装备爬上了飞机。

“上校,机长让我告诉您,我们只有 5 架能飞的直升飞机。”一位空军驾驶员过来报告。

“什么?只有 5 架,为什么?”

贝克韦斯像遭了雷击。“那 1 架飞机主螺旋桨出现裂缝,不能飞了。”

“他妈的,真倒霉,”先是直升机迟到,后又碰上一伙过路人,接着又是直升飞机出故障,预定的 8 架飞机一下子只剩下 5 架!这 5 架直升飞机无论如何是完不成营救任务的。怎么办?路只有一条,回撤。他心情异常沉重地拿起了送话器。听了贝克韦斯的报告,琼斯将军好半天才开口说:“上校,我请你考虑减掉一些人,乘 5 架直升机

前进。”

“什么？”贝克韦斯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减少一些人，意味着人员编组要做大的调整，原来3个人的任务要由2个人去完成，空中也将失去火力掩护，这样仓促地变更计划，不仅时间不允许，胜利的把握几乎没有。人质救不出来，再把突击队搭上去，可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

“5架直升飞机完不成营救任务，我以脑袋担保。”贝克韦斯语气非常坚定。“如果非要那样做，等于把我们往狼窝里扔！”此时，他对上司的敬畏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言词颇为不恭。

“那好吧！我请示总统后答复你。”

5分钟后，“三角突击队”接到了同意回撤的命令。接到命令后，贝克韦斯一声不吭，两眼直瞪瞪的，他操起身边一个军士手里的M79机枪，一步步地逼过缩成一团的那些伊朗人，伊朗人全都傻眼了，以为要处决他们，吓得哆哆嗦嗦地往后退。贝克韦斯蔑视地注视了他们一眼，然后转身走向那辆梅塞德斯牌汽车。哒、哒……一阵狂扫。此时，突击队员们也跟上来了，纷纷举枪射击，梅塞德斯牌汽车瞬间变成了一堆废铁。

他们倾泻的不仅仅是子弹，还有那满腔的怒火，不尽的遗憾！

“撤！”贝克韦斯几乎是吼叫。

飞机轰鸣，大地颤抖，“沙漠1号”如同开了锅，2架直升飞机落地了，又2架上去了。C—130运输机也载上了突击队员，准备滑行起飞。

情况不妙！正在指挥撤离的贝克韦斯上校透过飞扬的尘土，看见最后1架直升飞机摇摇晃晃地拉起，像个醉汉一样偏向刚才为它加油的C—130运输机。“停住！停住！不要再靠了！”贝克韦斯打着手势制止。天哪，晚了！一声巨响，迸出两个巨大的火团，犹如彩色的焰火，直上夜空。贝克韦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大肚皮”运输机上的5名突击队员和海马上的3名机组人员被大火吞噬了。

“头，快撤！不然飞机里的弹药舱一爆炸，我们全都得留在这里。”部属连推带搡，把贝克韦斯拖上了飞机。

“告诉机组,我要最后看一眼‘沙漠1号’。”根据贝克韦斯的意愿,飞机做了一圈盘旋飞行,贝克韦斯心痛欲裂,泪流满面,眼睛紧盯着那仍在燃烧的飞机残骸。

凌晨3点30分,突击队员在着陆4小时又56分钟后,抛下了未经处理的8具尸体、一批机密文件和武器,以及6架直升机和1架C—130机,带着惊慌和沮丧的心情,分乘5架C—130飞机离开了“沙漠一号”集结地,仓皇逃走。天亮后不久,C—130机群已远离伊朗,到达阿曼湾。返回路上没有受到伊朗方面的拦截。但这一武装营救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25日1点,美国政府向外界报道了美军在伊朗进行的军事行动失败了。

美国国民大失所望。但在随后进行的舆论调查中,绝大部分人支持军事营救人质的行动,只是一部分人担心人质会因此而被加害,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人质的获释将变得更加困难。

正当美国对解决人质问题一筹莫展之时,形势出现了转机。原来,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后,西欧各国和日本也对伊朗进行了制裁,使伊朗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伊朗和伊拉克的关系日趋紧张,边境冲突不断。1980年7月27日,伊朗国王巴列维在开罗病逝,使伊朗扣押人质的一个重要理由不复存在。

于是,霍梅尼迫于国内经济的困难,于当年9月12日提出了释放美国人质的4个条件,即由美国交还伊朗前国王巴列维的财产,取消一切对伊朗的财政要求,保证不对伊朗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解除冻结伊朗在美国银行资产的命令。

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后,加快了人质事件解决的进程。伊朗为对付伊拉克,急需奖金和得到武器援助。11月2日,伊朗议会通过了霍梅尼的4项人质释放条件。次日,霍梅尼要求学生把52名人质交给伊朗政府,并由阿尔及利亚负责人质的照料事务,美国立即派遣了一个秘密使团前往伊朗进行谈判。被伊朗扣押的人质,有1人因病于7月11日释放外,其余52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美伊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于1981年1月19日全部释放。持续

444 天之久的人质问题 ,最终以政治解决而告终。

说来有趣的是 ,美国突击队没有做到的事 ,在这次人质危机中 ,竟然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还从德黑兰逃出了 6 名美国外交官。

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的革命卫队和德黑兰的学生们突然占领了驻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 ,并且把 60 名使馆工作人员扣为人质。霍梅尼要求美国总统卡特马上把流亡海外 ,当时正在纽约治病的伊朗国王巴列维送回国时 ,谁也没有想到 ,其中 6 名美国外交官及其家属竟然乘乱溜出了大使馆 ,并被加拿大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偷偷地藏了起来。

1979 年 12 月底 ,美国中央情报局伊朗方面事务的负责人诺伯·加勒特突然紧急召见门德斯 ,令他设法将这 6 名美国外交官从德黑兰救出来 !

门德斯是中情局的“伪装大师”。1979 年初 ,当伊朗国王巴列维逃出德黑兰之后不久 ,门德斯就受命紧急飞往德黑兰 ,用伪装术救出一个特工。

跟上次行动不同的是 ,门德斯这次要救的是 6 名根本没有经过间谍伪装训练的普通外交官 :54 岁的领事馆官员罗伯特·安德斯、29 岁的马克·利耶克和他 25 岁的妻子科拉·安布尔·利耶克、31 岁的农业专员亨利·李·沙茨、30 岁的美国领事约瑟夫·斯坦福德和他 28 岁的妻子凯瑟琳。

1979 年 12 月一天下午 ,门德斯飞往加拿大 ,与那里的同行商讨到底怎么给 6 名美国外交官编出可信的掩护身份 ,使他们能经得起伊朗革命卫队的盘查。多个方案均因经不起推敲 ,最终不得不放弃。突然 ,门德斯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 :“为什么不向好莱坞化妆天才约翰·钱伯斯讨教一下呢 ?”

门德斯打电话给钱伯斯问道 :“约翰 ,一个电影外景勘察组大约有多少人 ?”“大约是 6 个人 !”钱伯斯回答说。“真是太妙了 !”门德斯兴奋得差一点就跳了起来 ,赶紧记下钱伯斯所说的人员的职务——场地管理员、布景设计师、电影剧作家、运输管理员……

门德斯立即写出了一份计划。他建议 ,中情局应该成立一家自

己的电影公司。

为了让行动更像样 ,门德斯甚至在哥伦比亚电影公司里租下了一套办公室 ,并且决定把电影片名定为《阿格尔》。至于电影公司的名字 ,钱伯斯脱口而出 :“就叫第六演播室吧 !”

1980 年 1 月 ,当门德斯回到华盛顿跟中情局其他官员会面的时候 ,有关“第六演播室”要拍电影的消息已经充斥着好莱坞所有的大小餐馆。

加拿大总理乔·克拉克很快就批准颁发 6 名美国外交官掩护身份所需要的加拿大护照 ;中情局负责为美国外交官假造伊朗的签证 ;加拿大皇家骑警负责提供与假名、假地址一致的驾驶执照 ,门德斯技术小组则为这几名外交官准备诸如加拿大火柴盒、向海关报批过的喷风机和俱乐部会员证等不那么起眼但又是必需的小物件 ;中情局的技术部门还印制了颇有品位的“第六演播室”的工作名片 ,甚至还准备了一个印有“第六演播室”字样的公文包 ,包里装着另一个技术小组撰写的《阿格尔》的电影剧本 !

1 月 23 日 ,门德斯在欧洲的中情局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秘密营救行动的最后批准令。姗姗来迟的华盛顿绝密电报终于来了。门德斯看到电报上写道 :“总统已经批准了你的行动方案。祝你好运 !”第二天晚上 ,装成欧洲某航空公司乘务员的门德斯和他的助手埃德飞到了德黑兰。

6 名美国外交官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来仔细研究各自的掩护身份的“个人简历”。接着 ,穿着一身伊朗革命卫队制服的罗杰尔·露西出场了 ,他用伊朗海关官员的口吻仔细审问每一名美国外交官。那些没有通过审问的外交官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接受露西的训练 ,直到所有的人都觉得满意为止。

星期天下午 ,门德斯开始把精力花在外交官们的化妆上。他用染睫毛膏把马克·利耶克的金黄胡子染成了黑色 ,又帮助凯瑟琳·斯坦福把黑色的长头发盘起来 ,并且让她加上一副厚边眼镜。麻烦的是罗伯特·安德斯 ,因为许多德黑兰人都认识他 ,所以给他化起妆来要麻烦得多。不过 ,安德斯再次走进卧室的时候 ,连门德斯也禁不住乐了起来 :他敞着蓝色丝衬衫的领口 ,胸前挂着一枚大勋章 ,完全

是一副好莱坞花花公子的样子。

1月28日凌晨3点钟刚过,门德斯就亲自到德黑兰机场进行侦察,他们将要乘坐的瑞士航班已经降落了。他向躲在机场暗处停车场里的美国外交官们打了个信号,6个人就拖着大包小包鱼贯而出。

直到6名外交官安全顺利进入候机厅后,门德斯和埃德才走向检查点。

这时,机场扩音器发出了一个声音:“瑞士航空公司363航班因为机械故障不得不延迟起飞。”美国外交官和门德斯心中不约而同地“咯噔”了一下:“不会是陷阱吧?”

候机厅里的人越来越多。几名革命卫队的队员突然间冲了进来,命令所有的人都出示证件。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机场扩音器里传来了令人振奋的通知:“搭乘瑞士航空公司363航班的乘客准备登机!”

6名美国外交官和两名美国中情局特工登上了航班。当飞机飞离伊朗领空的时候,门德斯转过头,向坐在后面的外交官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并且竖起了大拇指。

天空碧蓝如洗,万里无云,海面上细浪微微,温暖的风徐徐拂面。意大利“阿基利·劳罗号”游船,在船长德罗萨的带领下,载着700多名游客,从热那亚港启航,开始了漫长的地中海的旅程。这次航行预定10天,将经过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锡拉库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塞德,以色列的阿什林德、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希腊的罗德和比雷埃夫斯、意大利的卡普里岛,最后又回到出发地热那亚。

这是一艘1947年建造的豪华游轮。游客们离开喧嚣纷杂的城市,摆脱平时工作生活的紧张,抛开一切忧愁烦恼,尽情地在广阔无垠的大海上徜徉。游船上的生活是十分惬意的。白天,他们有的玩乒乓球或甲板高尔夫球,有的在游泳池畅游或在池边聊天;晚上,有的参加宴会,饱享口福,有的观赏节目,跳舞取乐。人们尽情地享受着这大自然赐与的一切。人们几乎忘了一切。

游客中,有一群来自纽约和北部新泽西州的朋友,年龄在60至70岁之间。其中,有位叫玛里琳的女士组织了这次旅游。玛里琳的

丈夫利昂·克里霍弗身体有病,曾两次患脑溢血,这次是坐着轮椅前来旅游的。10月6日,玛里琳在同伴的一片祝贺声中,在船上别有趣味地度过了自己的生日。那天,他们跳舞一直持续到深夜,玩得开心极了。

游船一路顺利地抵达亚历山大港。进港后,有606名游客离船,前往参观金字塔和逛开罗城。7日上午11点,游船载着180名乘客驶离亚历山大港,开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德港。离船参观的人,约定在参观结束后到塞德港登船。

玛里琳由于其丈夫行动不便,留在了船上。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米尔德里德霍迪斯女士,本打算与丈夫同去旅游,但临行前改变了主意,也留在了船上。当然,他们决料不到踏上了恐怖之程。

游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后,在晴空万里的地中海静静地航行,似乎一切都顺利,谁也没有料到,4名巴勒斯坦人已悄悄地混上了游船。

7日下午3点,也就是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后大约4小时后,两个拿着机枪和手榴弹的人,突然登上船桥,用扩音器大声喊道:“这艘船已被我们劫持,所有乘客到餐厅集合。不从者后果自负。”

顿时,船内一片混乱。

这时,恐怖分子在船上开枪示警,恐怖的气氛立即笼罩着游船。游客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被迫向餐厅集中。在餐厅里,一名恐怖分子高举着手榴弹,摆出就要引爆的架式;另一名恐怖分子则威胁道:“把手放在脑后,不要乱动,否则就开枪。”

4名恐怖分子控制游客后,把美国人和英国人同其他国家的乘客分开,并在他们身边放置了汽油罐,叫道:“我们的对头是美、英帝国主义者!”并说:“如果美、英政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杀掉船上的全部美国人和英国人。”

站在船桥上的一名恐怖分子,把枪口对准了船长,另一名恐怖分子威胁把船开往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船只在塞德港北面30海里的海面上航行,船长用无线电呼叫埃及当局,并报告船只已被恐怖分子所劫持。

这些恐怖分子自称是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成员。他们要求释放

关押在以色列的 51 名游击队员。并扬言：“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杀死乘客，然后炸掉游船！”

登岸参观的乘客们，在陆地上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后，傍晚返回塞德港等待上船。游船晚点，又不知确切的抵达时间，乘客们只好返回开罗，住进了“康科德宾馆”。

时至深夜，岸上的游客才得知游船被劫持，没有更多的消息，没有更详细的情况，船上乘客生死未卜，大家都为船上的游客的安危焦虑万分。

在游船上，恐怖分子气焰愈发嚣张，乘客们更加惊慌不安。尽管有些乘客曾试图反击，但无奈暴徒们装备精良，无从下手。

船终于靠近了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恐怖分子向叙利亚当局要求在港口停靠，但对方迟迟不作答复，转而他们又向驻大马士革的美国大使和意大利大使提出请求，要求以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 51 名同胞为条件进行谈判。但也没有马上得到答复。劫船恐怖分子与有关当局处于相持状态。

但是，严重的事态终于在 8 日发生了。

中午 12 点 30 分，船上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情形。恐怖分子开始穷凶极恶地恐吓乘客，说：“如果得不到答复，立即采取重大步骤。”12 点 32 分，一名恐怖分子狂吼：“不能等了，把刚才定的下午 4 点的期限改在 1 点。”接着，12 点 58 分又威胁说：“不能再等了，第一名乘客要在 1 点杀掉，国籍和名字以后通知！”

1 点刚过，恐怖分子为了炫耀他们的认真和残忍，杀害了一名美国籍的人质利昂。并叫嚷：“通知塔尔图斯和叙利亚当局，第二名人质是米尔德里德小姐。”

叙利亚政府仍没有回音，1 点 26 分，一名恐怖分子又喊：“谈判若不进行，我们将继续杀乘客！”但是叙利亚最终拒绝了“阿基利·劳罗”号进入其领海，塞浦路斯也同样如此，没有哪个政府愿意卷进这种事件。

恐怖分子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10 月 8 日下午 7 时，游船起锚离开叙利亚海面，又驶回塞德港。船在黑暗中静静地航行着。自称奥曼的恐怖分子头目，也许是害怕营救，要求船长通知在海上航行的

船只和空中飞行的飞机不要接近游船,否则将炸毁、击落一切靠近游船的目标。船长明白恐怖分子的意思,为了乘客的安全,于是立即关照各方不要贸然行动,并对各个有可能参加救援活动的方面通报说:“我们都很安全,不久将获释,不要为了救援而靠近游船!”

经过一夜的航行,“阿基利·劳罗”号于9日上午6点,出现在塞德港外15海里的海面上。

事件发生后,埃及、巴勒斯坦各组织等有关国家为寻求政治解决开展了积极的外交努力。埃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代表同恐怖分子在船上进行了商谈。“你们如果主动投降,埃及政府将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帮助你们逃往国外。”4名恐怖分子听从了劝告,在黄昏5时改乘一艘拖轮登陆,向埃及当局投降。后来,他们悄悄离开埃及,并在30小时以后出现在西西里岛。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在公共场所露面。事件发生后,曾喧嚣一时,但能在短时间内并以牺牲一人代价而获解决,确实是不幸中的万幸。

当初,意大利政府考虑到本国国籍的船只遭劫持的严重性,派出了几艘船只和数架飞机充当警戒。为了防止“阿基利·劳罗”号进入塞浦路斯港,又向阿克罗蒂里的英国空军基地派去了4架直升机,以救出被劫人员。克拉克总理为了同阿拉法特协商,也打算飞往突尼斯。美国第六舰队匆匆忙忙让旗舰“科罗纳多”号从那勒斯附近急速驶向出事海域。事实上美国研究过营救乘客的作战之后,在游船8日离开叙利亚领海时,美国已决定派遣反恐怖部队“三角洲”突击队和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海豹”突击队。如果同恐怖分子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将预定在9日夜实施营救作战。

“三角洲”突击队是美国尚未正式公布过的秘密反恐怖特种部队,创建于1980年,在此之前,尚未被正式动用过。“海豹”突击队是由空降兵和蛙人组成的,是海上作战用的特种部队。

据说,如果进行营救,首先进行直升机突袭,然后在船上实施空降。为了支援这次作战,在地中海的航母“萨拉托加”号、驱逐舰“斯科特”号也等待出击。美国为了监视游船,又出动了高空侦察机和直升机。尽管美国已做了充分准备,但未等出击,恐怖分子就投降了,

因而未能实施营救作战。

12 日,“阿基利·劳罗”号游船在接受了埃及政府的检查后,中止了旅行,返回了意大利。

至此,以地中海为舞台的这一恐怖事件似乎已经解决了。然而,对美国来说,事情并非就此结束。

美国有一套被称为“闸板”的世界性反恐怖电子计算网络,发生恐怖事件时,可以随时搜集情报。就在恐怖分子要求释放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并进行威胁时,在美国,白宫、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保密局已经掌握事件的梗概。

国防部为了调查乘坐“阿基利·劳罗”号的美国人的人数和安全状况,立即成立了紧张处理中心。前不久,为处理墨西哥地震而设的专用线也用来询问乘客们的安全状况的专线。

但是,事件发生以来,一向获取情报迅速、准确的美国,仍在为情报纷繁而又不确切大伤脑筋。

在纽约,利昂的两个孩子——莉萨和伊尔萨由于不知道父母的安危,几天以来一直是茶饭不思,夜不成寐,不断向国务院打听消息。当国务院负责人得知有一名美国人在游船上被害并用电话告知莉萨和伊尔萨,说他们父亲生死不明,二人立刻忧虑不安。他们确知其父已死的消息,还是在 10 日清晨,从其母亲打来的电话里得知的,当时,玛丽琳因受打击而神志模糊,但还是接通了华盛顿家里的电话。

8 日晚,鉴于有美国人被害,美国国务院立即指示驻埃及大使尼古拉斯,要他亲自去游船,弄清楚美国人是否安全。深夜,美国大使会同意大利、奥地利、联邦德国的大使馆人员一起乘汽艇来到船上。经过一番详细调查后,得知利昂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面上被杀害。美国大使立即用无线电叫通大使馆,要他们以他的名义同埃及外长通话,说明现场发生的一切。并要求埃及政府对暴徒进行惩罚,同时向华盛顿报告了登船调查的结果。

然而,埃及副总理兼外长阿伦斯,在恐怖分子投降后不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4 名恐怖分子全部投降,他们将离开埃及到国外去。他们的投降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人质全部获释。”他压根儿没提到人质被害的事。接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也说:

“人质全都平安无事 ,暴徒离开埃及。”10 日 ,他又说 :“得到美国人被杀的消息是在暴徒投降几小时之后 ,此时 ,暴徒们已逃到国外 ,假如在投降时就知道人质被害的事 ,解决问题的形式就会不同。”

但是 ,美国的情报当局监听到了埃及与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之间关于处理暴徒的无线电电讯 ,认为埃及明明知道有一名美国人被害 ,却答应让他们逃到国外 ,这是不能接受的。里根总统 10 日在芝加哥发表讲话说 :“已要求阿拉法特引渡恐怖分子。”以色列的佩雷斯总理在谈到被杀害的美国人是犹太血统时说 :“不能允许巴勒斯坦的行动 ,这是歧视犹太人的新浪潮。”并谴责了埃及支持暴徒出逃 ,声明保留报复的权利。

美国要求埃及严惩劫持游船的恐怖分子 ,在处理恐怖分子问题上 ,美国和埃及之间结下了微妙的芥蒂。

事实上 4 名恐怖分子是在 10 日深夜乘埃及的波音 737 飞往海外的。

“阿基利·劳罗”号游船被劫后 ,美国国防部就开始营救作战研究 ,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由于恐怖分子意外投降 ,营救乘客的计划没能实现 ,作战的重点转移到了如何逮捕恐怖分子的方面。

美国政府从 9 日夜间到 10 日 ,为了研究阻止“阿基利·劳罗”号上的恐怖分子逃窜 ,在白宫召开了对策小组会议。会议主席是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鲍威尔。

久拖不决的会议在凌晨 8 点似乎就要结束了 ,但白宫却笼罩在一片沉闷的气氛之中。

原来 ,美国驻埃及大使来电说 :“穆巴拉克发表了一项声明 :‘阿基利·劳罗’号劫持犯已到国外 ,我不知道利昂被害 ,特为死者祈祷。”这条消息使美国已实施的企图缉拿暴徒的计划遭到了挫折。

但是会议的参加者并未因此而死心 ,决定再次彻底核实情报的真伪。20 分钟以后 ,一个重大的情报被发现了 :恐怖分子仍留在埃及 ,而且不久将由空中逃往国外。

秘密作战的老手、负责同尼加拉瓜政府联系的奥地亢·诺斯不禁欢欣不已。立即来到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处 ,报告了恐怖分子仍在埃

及的消息。鲍威尔立即指示情报部门 ,让他们再一次核实此情报。

中央情报局负责恐怖分子情报的官员艾伦又从头翻看了所有新的资料加以研究。一个小时以后 ,艾伦发现暴徒仍在埃及 ,而且无论是埃及还是 PLO 都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理暴徒。

在白宫 ,诺斯中校想出一个危险而且奇特的方案。他问总统安全事务助理 :“你知道击落日本山本五十六座机的战斗吗 ?”原来他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太平洋拉包尔前线 ,在零式战斗机的保护下 ,前往前线视察的日本海军司令官座机遭美军 P—38 战斗机的伏击 ,被击落的那件事。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鲍威尔回答 :“你等一下 ,民用飞机是不能击落的。”诺斯 :“这当然 ,但有两个办法。一是让友好国家干(指以色列) ,另一个就是强行着陆。”“去哪儿呢 ?”诺斯回答 :“西西里岛的西古乃拉基地。”助理马上表示赞成 :“好 ,研究一下看。”

诺斯中校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恐怖小组负责人莫莱海军中将 ,报告了自己的想法。

莫莱中将回答说 :“我考虑一下。”不久 ,他招呼诺斯说 ,“让第六舰队干。”于是 ,莫莱、诺斯和对策小组成员立刻在作战室着手研究具体实施方案。就是说 ,为了在暴徒从埃及乘飞机逃窜时予以拿获 ,舰载机要在克里特海面上空设伏。

在此以前 ,美国从未利用军用机使民用机强行着陆过 ,因此是冒很大风险的。作战方案的制定工作慎重地进行着。送到作战室来的新情报要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家保密局核准。情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在国务院 ,负责政务的助理国务卿阿马克斯特和负责中东方面的助理国务卿也就战争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作了估价。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的结果 ,向新任的议会主席克劳作了报告。克劳主席回答 :“第六舰队的作战是可能的 ,应该实施。”

整个上午 ,美国政府一直掌握着恐怖分子仍在埃及国内的情报。情报当局探听到逃跑用的飞机现仍在开罗东部的阿尔马扎空军基地 ,待命的飞机是埃及航空公司的波音 737。不但知道飞机的号码 ,而且还知道机长的姓名。飞行的目的地 ,似乎是突尼斯。

诺斯中校向鲍威尔说明了截击的方法和步骤。这就是,让地中海上“萨拉托加”号航母上的 F—14 飞机和 E—2C 预警机起飞,在克里特岛海面拦截暴徒所乘的飞机,并强制其在西西里岛着陆,让从直布罗陀招回的“海豹”特种部队突入该岛。

此时,里根总统正坐着空军一号,为讨论税制问题而去了芝加哥。上午 11 点 30 分,诺斯叫通了正在随着总统的安全保障顾问罗伯特,用秘密通信装置报告了行动方案,并要求得到总统的批准。

里根总统同里根助理在芝加哥郊外的费尔德的一个面包店刚刚用过午饭,听了罗伯特的汇报后,里根总统原则上同意。但决定在弄清危险程度以后再定夺,而保留了最终批准权。

罗伯特又接通了鲍威尔的电话,告知他说:“总统已经允诺,但想更详细地了解飞行员的有关安全问题,并根据其结果,予以最后定夺。”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具体的计划作了进一步的推敲。莫莱中将和诺斯中校通过秘密通信装置再次报告了罗伯特,总统十分满意。

然而,国防部本身对作战却并不感兴趣,国防部长温伯格、副部长塔夫托都持消极态度。国防部长赴加拿大的渥太华访问途中,在缅因州的巴·哈伯山庄落脚时,给里根总统挂了电话,要求里根考虑同埃及的关系,慎重处理。为了保证正在制定的作战计划的秘密,军方作了周密的安排,他们对将成为着陆点的意大利当局也没有通报此情。

在当地时间 10 日下午 7 点,正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附近的亚德里亚海域游弋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宇宙盾”号等 25 艘舰只已进入了临战状态。

本土的情报局一直不断地分析埃及、地中海的情报。正坐在从芝加哥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的美国总统里根已经知道,暴徒们乘坐的 737 飞机不久将离开埃及。他知道此次作战存在着许多危险,但最后还是决心不惜一战。不巧,空军一号的秘密通讯装置出了故障,总统不得不公开向国防部长下达命令。

事到如今,国防部长温伯格仍是极其慎重的,他不无消极地说:

“对非武装的民航飞机虽然属于恐吓射击,也是不好的。”总统指示说,实施作战时,要注意不要伤害无辜的人们。

对“萨拉托加”号下达最后的命令是在晚上8点以后。8点15分,2架E—2C预警机首先起飞,接着4架F—14战斗机起飞,一架EA—6B电子干扰机也离舰,飞往克里特岛上空的待命空域。但得知埃及飞机尚未起飞时,战斗机又暂飞回航空母舰。

晚上9点刚过,情报当局获取了暴徒们在10分钟前抵达开罗附近的阿尔马扎空军基地的情报。

晚上10点10分,波音737飞机起飞升空。暴徒们由埃及政府官员陪同。

正在进行无线监听的E—2C机,3分钟后就捕捉了这个信息。不久,F—14战斗机队和支援队又从“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包括空中加油机在内的一场大规模空中截击战终于开始了。

飞行部队向克里特岛南部的警戒点飞去,呈门形阵势,张网等待着从埃及方向来的波音737。埃及飞机在起飞后约45分钟,飞抵克里特岛以南155公里处,高度为1万米,速度为400海里。它不知不觉之间钻进了F—14战斗机布下的伏网。F—14战斗机一开始就熄了灯,在整个座舱处于一片黑暗的情况下,悄悄地从波音机后方靠近,就像狮子追踪猎物似的。机内的人们却浑然不知。紧接着,F—14一齐亮了灯,扑向波音737机的两侧。机长似乎终于发现了自己受到拦截。波音飞机为了寻求开罗方面的指示,不断地拨着拨号盘,调着频率,但无论如何也通联不成,只能听到杂音。这是美军对波音飞行实行无线电干扰的结果。

晚上11点30分,E—2C命令波音机飞往西西里岛,并通告:“如果不服从,即予以击落。”

机长绝望地感到无法摆脱包围,便在美国战斗机的挟持下,飞向西西里岛。F—14机本来被允许在波音机前发射导弹,但他们并没有发射,只进行了包围就大功告成了。

由于是与劫持无关的埃及人驾驶飞机,而且里根总统强调不要伤及无辜人们的生命,所以波音机才得以逃脱被击落的命运。

直到飞机要进入意大利领空的时候,美国才向意大利政府通报

了自己的计划。早一点告知对方,在外交上是比较主动的,但害怕泄密,所以美国政府直到最后一刻才通知意大利。

意大利政府一开始就表示了自己的不快,甚至表示出拒绝的反应。管制官员不允许波音机飞入意大利,使机长大为难堪。机长考虑再三,不得不宣布:“燃料用尽,必需紧急着陆。”最后终于得到了着陆的许可。11日零点10分,飞机终于在西西里岛西古乃拉基地降落。

在陆地上,不久以前从直布罗陀坐C—141运输机紧急赶到的约50名“海豹”特种部队和意大利的骑枪队正守候在那儿,他们涌进了飞机,逮捕了暴徒,而暴徒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反抗。

在“海豹”和骑枪队涌进机舱时,发现了意外的收获。原来,他们发现了PLO的大人物阿布尔·阿巴斯和其他成员。这时候,美国方面想用正在待命的C—141机,将暴徒押送回国内,但差点和意大利方面发生枪战。最后还是美国作出了让步。

11日,意大利热那亚司法局为4名暴徒准备了一份计划杀人、绑架及非法携带武器爆炸品的嫌疑犯逮捕令,派了两名警官到西古拉美军基地予以收审。

在美军基地,在警官面前,顺道而来到西西里岛的4名美国人对暴徒进行了辨认。丈夫被害的玛丽琳给了暴徒一顿耳光。差点儿被杀的米尔德说:“一点儿不错,是这批暴徒!”

对乘客被杀害的美国和船只被劫持的意大利来说,哪一方有犯人管辖权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将他们引渡到美国来,将他们处以死刑。”这是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呼声。

舒尔茨国务卿向意大利外长安德列奥蒂通了电话,主张管辖权属于美国,但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舒尔茨终于同意意大利外长的要求:“管辖权属于意大利,决不让他们逃到国外。如果有杀人的嫌疑,就马上处理。”美国本想在国内严惩罪犯,但如果意大利答应严惩,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阿巴斯在暴徒劫持了“阿基利·劳罗”号之初,就在贝鲁特,并同他们取得了联系。而且据说劫持行动也是他指挥的。但是,当阿巴斯得知暴徒杀害了人质,就训斥了他们说:“原来的任务完不成了。”

他所说的任务就是潜入阿什德港 ,破坏军事设备。

暴徒们开始并不打算劫持船只和杀害乘客 ,他们隐藏在船上的武器被发现后 ,就不能再执行原来的计划了。

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在塞浦路斯发表的声明中 ,也承认劫持船只 ,并赔礼道歉 ,说当初的目标是阿什杜德港的军事设施。

11 日晚上 ,阿巴斯及其他成员 ,根据意大利当局的指示 ,乘埃及飞机转移到罗马。

据说 ,得知这一消息的美国斯蒂纳少将大为恼火 ,立即乘基地的 T—30 教练机 ,未经指挥塔的许可 ,即起飞尾随埃及飞机飞往罗马 ,且未经许可便强行着陆。

美、意外长虽有约在先 ,但后来意大利政府的处理并没有令美国政府满意。

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引渡阿巴斯 ,但意大利仍然予以回绝。

12 日 ,里根总统寄给意大利克拉克西一封紧急信函 ,指出 :“中心人物阿巴斯 ,有确凿的犯罪证据 ,”强烈要求引渡。里根认为 ,“两国缔结了相互支援协定 ,为了立案审查 ,意大利当局有义务将阿巴斯引渡给美国。”

但是 ,就在美国准备逮捕证的时候 ,阿巴斯穿着埃及航空公司的制服 ,乘租借的前南斯拉夫的飞机 ,由罗马飞往贝尔格莱德。这都是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埃及等政府的默认下进行的。

里根总统大为恼火。

阿巴斯在贝尔格莱德逗留两天以后 ,经南也门的亚丁 ,回到巴格达。终于躲开了美国的跟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尽管在克拉克西的同意下 ,暴徒们已逃离国外 ,但西西里岛的西拉克萨检查厅 ,27 日发出逮捕阿巴斯的命令 ,从而使正在组阁的克拉克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与事件有关的各国 ,使自己的内情和利益公开化。而且各不相同。意大利的石油大量依赖中东 ,因而同阿拉伯各国以及 PLO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不能破坏这种关系 ,意大利必须释放阿巴斯的理由也就在这里。据说 ,意大利极少受到阿拉伯的恐怖分子破坏也是因为有这样良好的关系所致。

恐怖分子开始被收容在当地帅库扎监狱 ,后来又从那儿转移到关押重罪犯的斯波莱托监狱。恐怖分子的名字是 阿尔哈桑、阿布达拉、阿尔毛尔其、依布拉希姆。

强行使埃及飞机着陆以及缉拿罪犯成功的消息 ,美国新闻媒体立即向全国作了报道 ,因人质被害和恐怖分子逃跑而一度消沉的美国大众一下子又欢腾了起来。然而 ,与美国的態度相反 ,许多阿拉伯国家是持否定态度的。

约翰牛之魂

哥曼德是英国建立的世界上最早的特种部队 ,它不仅
在历次战争中大显身手 ,而且在反恐怖活动中充当克敌奇
兵的作用

溶于月色 ,驾着小艇秘密横渡大海 ,突袭敌方的阵地。这支出生
入死的特别行动队便是有“约翰牛之魂”之美誉的英国特种部队——
神奇的“哥曼德”。

“哥曼德”这个名字 ,现在已成了突击队、特种部队的统称。而当
初 ,它是给非洲布尔人起的名字。1888 年到 1902 年 ,非洲爆发了布
尔战争 ,当时 ,布尔人以少数兵力对 25 万英国军队实施突然袭击 ,使
英国人大伤脑筋。于是 ,英国人称他们为“哥曼德”。后来 ,英国仿效
这个名字 ,给自己组建的特种部队取名“哥曼德”。英国的特种部队
以戴绿色贝雷帽的特征 ,在它取得辉煌成就以后 ,“哥曼德”这个名字
也随之作为特种部队的别名而闻名于世。

1. “猎人”行动

1980 年 4 月 30 日 ,几名伊朗胡齐斯坦省民族主义极端分子武
装占领了伊朗驻英国大使馆 ,并扣留其外交人员作为人质。伊朗大
使当即将情况通报了英国外交部 ,请求英国政府予以支援。

占领伊朗大使馆的胡齐斯坦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打电话给英国广
播公司 ,提出伊朗政府必须给胡齐斯坦省更多的自治权 ,并立即释放

被关在该省监狱的 91 名胡齐斯坦政治犯。他们扬言,如在 24 小时内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杀死手中的 20 多人质和炸毁大使馆大楼。

4 月 30 日,平静如常的英国特别空勤团总部突然接到一项紧急命令:做好一切准备,营救被扣在伊朗使馆的人质。这项命令是在几名武装分子占领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并扣留了 20 多人质后不久发出的。英国外交部接到了伊朗大使馆的求救电话后,英国政府立即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解决伊朗使馆危机。特别空勤团作为最终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待命出击的指示。

英国特别空勤团是英国当局进行反恐怖作战的一支特种部队。

接到命令后,特别空勤团立即与在伊朗大使馆附近负责监视的警察进行联系,并派去一个联络小组视察地形。不久后,特别空勤团队员们围坐在一个伊朗使馆模型的沙盘旁边,进行战术分析研究。

伊朗使馆坐落在伦敦最繁华的肯辛顿区王子门,是一座五层大楼。武装分子占领使馆后不久,伦敦警察立即包围了这座建筑,并对周围街道进行封锁警戒。同时,附近的使馆人员也都撤走了。

伦敦警察厅为了密切注视大楼里的动向,从大楼屋顶的烟囱里放进了窃听器。根据窃听到的情况分析,大部分人质都在大楼的二层和三层的房间里,占领使馆的武装分子有 5 人。

接到命令的特别空勤团总部就像一部开足了马力的机器,飞速运转起来。事发当天,一个营救计划基本拟就了,20 名队员组成的营救小组也成立了。行动的代号为“猎人行动计划”。但英国当局认为这一行动计划非到万不得已,不付诸实施。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人质问题。

英国政府代表通过电话和窗口对话,同这伙武装分子谈判。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拍急电给伊朗政府,转告了武装分子的要求。并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尽快解决这一事件。

经过多方努力,在 24 小时内,武装分子先后释放了 2 名人质,一个是怀孕 3 个月的伊朗妇女,另一个是患病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最后期限到了,胡齐斯坦武装分子并没有像他们所威胁的那样,屠杀人质,炸毁使馆。他们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让 3 个阿拉伯驻英

使馆的大使出面调解 ,派一架飞机把他们和人质送出英国。英国政府研究了武装分子的要求 ,认为让阿拉伯驻英大使去调解 ,有可能产生新的人质 ,使问题更趋复杂。于是 ,英国外交部以同其他的阿拉伯使馆协商需要时间为由 ,要求恐怖分子要有耐心。

时间一天天过去 ,使馆大楼里仍然十分平静 ,武装分子提出的最后期限一再推迟 ,谈判仍在继续进行。

这伙胡齐斯坦省的民族极端分子为首的名叫托菲格 ,看来他干这行并不老练。进入使馆后 ,他疏忽了两件事。第一件是 ,他们闯进使馆时抓住的第一个人质是使馆的警卫人员——英国警察洛克。他们把他关在二楼使馆代办的办公室里 ,对他没有进行彻底搜查 ,致使洛克能在贴身的上衣里藏下一支手枪。洛克原想以这支枪营救大家 ,但考虑到寡不敌众 ,为了避免造成多数人质的伤亡而未动手。第二件是 ,托菲格对屋子里窃听器发出的嗡嗡响的噪音没有足够重视。他也产生过怀疑 ,便问被扣押的使馆人员 ,使馆人员故意编造了一些话来迷惑他 ,就蒙混过去了。

谈判进行到第 6 天 ,即 5 月 5 日下午 ,这伙武装分子的耐心开始消逝了 ,他们向人质宣布 ,马上就要执行他们在 6 天前作出的决定 ,即每隔半小时枪杀一个人质 ,直到他们的要求被全部满足为止。

一名 25 岁的伊朗外交官挺身而出 ,表示愿作第一个牺牲者。他是使馆的新闻专员 ,名叫阿巴斯·拉巴萨尼。他向真主作了祈祷 ,吻别了他的伙伴们 ,然后写了遗嘱和家信。一个武装分子就带他到楼下去 ,同事们以同情和赞赏的目光送他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 ,从楼下传来三声枪响 ,拉巴萨尼倒在了血泊之中。武装分子把他的尸体从使馆大门口推了出去。

武装分子以为这样可以迫使英国政府和伊朗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但他们估计错了 ,英国政府对恐怖行为的态度是明确和坚决的。内务大臣威廉·怀特洛早已表示 ,决不让恐怖的讹诈得逞。

为了稳住武装分子的情绪 ,伦敦警察厅采用了缓兵之计 ,通过电话告诉武装分子 ,英国当局准备答应他们的要求。武装分子也盼望通过较稳妥的途径来摆脱他们的困境。可是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时英国警察和特别空勤团已在这座大楼上下和周围布置了包围圈。

一架警察用来监视的直升飞机在大楼上空盘旋。特空团队成员有的登上屋顶 ,拴好了往下爬的绳索 ;有的钻进了大楼地下室 ;有的拆除了邻近大厦的墙壁。他们的装束很别致 ,头戴防毒面具 ,身穿黑色防弹衣 ,手套和皮靴也都是黑的 ,一身漆黑 ,活像潜水员。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一号令。

武装分子开始杀人 ,英国当局为了避免人质进一步流血 ,决定马上实施“猎人行动计划”。

5 日下午 7 点 30 分 ,命令一下 ,特空团队成员和警察立即行动。两个队员从屋顶顺着绳索滑下来 ,一踏上二楼阳台 ,就向屋子里投掷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的爆炸 ,发出刺激的闪光和震耳的轰鸣。大楼立刻燃起熊熊烈火 ,吐出滚滚浓烟。这种手榴弹名叫“晕眩手榴弹”。它并没有杀伤力 ,但爆炸后几秒钟内可使半径 10 米以内的人完全丧失视力和听觉。特空团队成员就利用这个时间 ,寻找他们所要袭击的目标。

在二楼楼梯口的窗外 ,一名特空团队成员刚顺着绳子下来 ,还没有落地 ,就被在楼梯口警戒的武装分子发现了 ,武装分子便举起冲锋枪隔窗向他瞄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被扣人质英国警察洛克掏出已隐藏 6 天的手枪 ,向武装分子猛扑过去。就在武装歹徒回身对付洛克的当儿 ,特空团队成员赢得了时间 ,扳动枪机 ,子弹穿过了武装分子的胸膛。

被扣在二楼使馆代办办公室的另一个人质是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哈里斯 ,他担心熊熊的火焰会把他烧死在屋子里 ,急忙打开窗子 ,跳上阳台 ,挥动双手呼救。正在阳台上的特空团队成员就把他拉了下来 ,送到隔壁大楼。

在三楼使馆的电报房里 ,看守 14 名男性人质的武装分子 ,脸长得像孩子一样 ,名叫聂贾德 ,人们称他为“童子脸”。一听到玻璃窗被砸碎的声音 ,他猛然跳起来 ,打开枪机的保险 ,疯狂地对着人质开火。但极度的惊慌之中 ,他一个人也没有打中。守在楼梯口的武装分子听到枪声 ,立即奔进电报房 ,也胡乱开枪扫射 ;一名使馆职员被乱枪打死 ,使馆代办阿里弗罗茨中弹负伤。这时 ,特空团队成员已冲进房间 ,武装分子见势不妙 ,丢下枪支 ,一面叫着“我们投降 !”一面把阿拉

伯人的头巾扯了下来 ,妄图混进人质中间伺机逃跑。

战斗中 ,特空团队员按各自的任务分工 ,向武装分子发起总攻击。有的越窗而进 ,有的破门而入 ,有的从地下室冲上来 ,很快向二三层集中 ,消灭了仍然企图顽抗的武装分子。同时 ,一队武装警察也进入了使馆大楼。

武装分子在强大的攻势面前 ,早已乱成一团 ,有的当场殒命 ,有的还想混迹人质中间。特空团队员高声喊道 :“谁是恐怖分子 ?站出来 !”早就恨透恐怖分子的伊朗人质怒目指着两名妄想蒙混过关的武装分子说 :“就是他们 !”话音刚落 ,特空团队员的冲锋枪子弹就把他们打成了“筛子”。

特空团队员一边进一步搜索残余的武装分子 ,一边把大楼里所有的人集中起来 ,带到楼下。他们用已掌握的资料照片 ,一一进行核对。结果 ,“童子脸”聂贾德被辨认出来了。

8点15分 ,战斗结束。5个武装分子 ,3人当场被击毙 ;一人重伤 ,在送往医院途中死去 ;1人被捕 ,而警察和特空团无一伤亡。

一队救护车驶到使馆 ,男女人质在警察的搀扶下 ,走出使馆 ,送往医院。在6天的惊恐生活中 ,他们个个面色苍白 ,两目发呆 ,好似得了一场重病 ,有的已无法动弹 ,只得用担架抬进救护车里。

大楼的火也被迅速扑灭了。

一场漂亮的人质营救行动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边防第 9 旅”

营救慕尼黑被绑架以色列运动员的失败,使得联邦德国下决心成立一支来之能战、战则能胜的特种部队,这就是名震世界的“边防第 9 旅”。

前联邦德国从 60 年代后半期开始,经济复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与此同时,恐怖集团也在形成,暴力活动日见猖獗。当时,有人建议效仿英、美国家,设立反恐怖特种部队,以打击国内国际的恐怖活动。但因国人普遍患有特种部队过敏症,此建议因而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德国政府为避复活纳粹之嫌,迟迟未组建特种作战部队。

1972 年发生在慕尼黑菲尔斯腾菲尔德布鲁克机场的血腥屠杀,为孕育已久的特种部队注入了一剂催产素。1972 年 9 月,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了 9 名以色列人质驾机逃跑,巴伐利亚州的警察试图拦截劫持者和人质乘坐的波音飞机,结果发生了惨痛的悲剧,9 名人质和 4 名恐怖分子全部在弹雨中丧生。为吸取教训,有效打击赤军和阿拉伯游击队的恐怖活动,联邦德国决定采纳一位与以色列特种部队关系密切的反恐怖专家的建议,于 1972 年创建了一支专门从事反恐怖主义的特加紧干预部队,于是骚动于母腹数年之久的“边防军第 9 反恐怖纵队”终于降生了。它的孪生兄弟各州属“机动特种大队”也同时出世。这支部队除了在国内的行动获得充分授权外,也具备国际特警的外交豁免权,以保护德国在国外人员及资产的安全。

根据分工 ,边防军第 9 反恐怖纵队主要对付好斗的犯罪集团。各州的特种大队主要负责监视、缉捕或采取隐蔽的行动来对付单个的作案者。因此 ,边防军第 9 反恐怖纵队通常在发生严重的绑架、谋杀、劫持人质、暴力骚扰时和保护国宾以及德国政府首脑和政治家时才动用。派遣出击的命令由内政部长通过“热线”发出。

德国边防军第 9 反恐怖纵队又名“边防第 9 旅” ,简称“GSG9” 。共有队员约 350 名 ,编成多个战斗组。它始终处于临战状态 ,在人员上、技术上和战术上已全部实现了现代化 ,战斗力极强 ,是一支所向披靡、世界闻名的特种部队。

1977 年 10 月 13 日 ,联邦德国航空公司第 181 次班机从西班牙马略卡岛出发 ,在飞往法兰克福途中 ,遭 4 名恐怖分子劫持。机上 86 名乘客和 5 名机组人员全部成了恐怖分子的人质。17 日 ,飞机在恐怖分子的挟持下飞抵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恐怖分子为了尽快救出联邦德国监狱中的同伙 ,扬言若不答应要求便炸掉飞机并杀死全部人质。

德国政府立即组织了营救行动。他们派出的一支由边防军第 9 反恐怖纵队的 60 名队员组成的 2 个突击小组 ,于 17 日下午 7 点 30 分在夜幕的掩护下 ,降落在摩加迪沙机场跑道外距恐怖分子约 200 米的一个沙丘后面。

60 名突击队员 ,在 2 名英国反恐怖专家的协助下 ,于 18 日凌晨零点 05 分 ,用定向炸弹炸开了舱门 ,冲入飞机内 ,并将闪光炸弹投向驾驶舱。在突如其来的袭击面前 ,恐怖分子很快被消灭 ,整个行动仅用了 1 分 46 秒。

德国边防军第 9 反恐怖纵队的这一行动 ,受到了西欧各国的一致称赞 ,并一举名扬世界。

边防军第 9 反恐怖纵队的队员都是从志愿参加者中招收 ,择优录取。人员主要来自联邦边防部队或正规警察部队服役一年以上的军人。新队员入队后 ,要经过 22 周的专门训练 ,其中前 13 周课程主要着重于法律、武器操作、空手道等基础训练。最后 9 周则是针对个人特性做比较严格的个人专业技术训练 ,以及一连串极为严格、艰苦的反恐怖行动测试和考验。

边防军第9反恐怖纵队的队员平时穿黑色制服,戴绿色贝雷帽。根据不同的任务,有时穿防弹背心、防火眼、弹簧靴,戴四角防弹帽,以代替贝雷帽。在某些行动中,有时穿的是和空降部队相同的迷彩装。

边防军第9反恐怖纵队携带多种特种装备,如:有一点儿光线即可看得见的微光夜视眼镜、特制手榴弹、微型手枪、催泪弹、微型高灵敏度无线电报话机、特种攀登绳索、强光型鹰眼探照灯,以及可以穿透厚30厘米的砖或普通防弹玻璃的高爆子弹等。队员的制式装备主要是德国黑克勒·柯赫公司生产的MP系列9毫米冲锋枪和每支价值3000马克的毛瑟66型精确防卫突击步枪。所携枪支皆装有消音器。

边防军第9反恐怖纵队队员个个身怀突击、搏杀绝技以及百步穿杨的射击技巧,而且个个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非凡的机智、坚韧的耐力和卓越的体能。

到目前为止,这支特种部队仍保持着神秘色彩,每次出动都能对暴徒造成极大的震撼,有“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快如捷豹”的美称。

美国特种部队的军官称,边防军第9反恐怖纵队是一个不吝惜使用最优良装备的部队,其高超的行动技巧是其对手无法比拟的,它是所有国家特种部队渴望达到的标竿。

摩加迪沙成名之役

1977年10月13日中午,一架联邦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波音737客机停在地中海西班牙马略卡岛的帕尔马机场的跑道上。候机大楼内,旅客们陆陆续续地在服务台前办理着登机手续。根据飞行时刻表,本次飞往联邦德国法兰克福的181次航班“皇冠”号飞机预定15点10分抵达目的地。

有两个男人和伴随他们的两个黑发女人,直到机场广播最后一次招呼汉莎181次航班的乘客登机前不久,才在办理登机手续处出示他们的飞机票。后来的事情表明,他们是故意赶在这个最后时刻来的,目的是逃避机场警察的详细检查,以便蒙混过关。

他们穿着随意而整洁的假日服装。就外表而言,他们与其他旅

客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他们的手提包显得比其他乘客的要重得多。

在护照检验处 ,他们出示了三份伊朗护照和一份荷兰护照。从护照上看 ,两个女人的名字是佐拉雅·安扎吕和沙娜·沙朗 ,两个男人的名字是雷察·阿巴钗和约翰纳斯·盖杜。护照检查官在护照上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便急促地点了点头 ,祝愿这 4 位旅客“一路平安”。

其他的旅客谁也没有去注意这 4 个姗姗来迟者 ,只有在机舱内问候登机旅客的 3 位空中小姐对两个男子中的一个起了注意 ,因此人穿了一身入时的绿色夏令西服 ,没有扎领带 ,显得引人注目。她们在机舱厨房内悄声议论起他 :“坐在左排后座上的那个人像个可疑分子 ,坐在他身边的那位戴着银项链的乌发姑娘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女朋友 ?”

时针刚过 13 点 ,“皇冠”号飞机载着 86 名乘客、5 名机组人员 ,从跑道上腾空而起 ,飞向一碧如洗的蔚蓝色天空 ,把阳光珍珠的岛屿甩在身后。

37 岁的机长根尔·舒曼和比他小两岁的副驾驶莫尔根·菲托尔又驶上了归国的航途。对于他俩来说 ,驾驶这种飞机 ,实在是驾轻就熟、极为平常的事了。他们在来汉莎航空公司工作之前 ,就在联邦国防军获得了第一流的飞行经验。他们对这架只有 103 个座位的小飞机的技术数据了如指掌 ,这种飞机每小时耗油 2640 公升 ,在加足油的情况下 ,最多可以连续飞行 300 分钟。

飞机正在飞近法国南部城市埃拉附近上空。

突然 ,机舱后部骚动起来 ,声音很响。附近的乘客全部都转过身去观望。

最后一分钟才登机的两个男子和他们的女伴从座位上忽地一跃而起 ,大叫大嚷地穿过通道 ,径直朝前舱奔去。他们横冲直撞 ,全然不顾其他旅客 ,猛地掀开头等舱的门帘 ,冲了进去。

驾驶舱的门猛地被打开了。正在指挥飞行的副驾驶菲托尔——按照命令 ,在这个航程中 ,他的同事任执行机长——吃惊地转身一看 ,只见一只手枪的枪口正对着舒曼的脑袋。菲托尔还没有来得及采取什么行动 ,肋骨就被重重地踢了一脚 ,把他从座椅上踢了下来。

那两个男人站在驾驶舱内用英语和德语大声吼道：“滚出去，你们被劫持了！”

“把手举起来！”劫持者先是用英语，尔后又用德语命令道。

菲托尔只得俯首听命，两只手交叉在脑后，一阵拳打脚踢把他从两个女人身边赶进了头等舱。两个女人大叫大嚷地挥舞着打开了保险盖的手榴弹。

此间，一个劫机分子始终监视着机长舒曼。

对这种场面，作为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们是有所准备的。但事到临头，这两位素来沉默寡言的汉子几分钟后才回过神来，明白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机舱内的乘客都吓得目瞪口呆。这时机舱的门帘又被拉到边上，乘客们目睹了驾驶舱里的一切，先是惊异，继而震惊，最后则呆若木鸡了。

15点30分，米兰飞机安全中心报告：汉莎181号航班在厄尔巴岛附近空域离开了马略卡——法兰克福的航线，飞机正向罗马方向飞去。

普通舱内的乘客谁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没有讲一句话。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愣怔怔地望着中间通道。头等舱的乘客被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驱赶着，双手抱着后脑勺的菲托尔，也跌跌撞撞地走向机舱后门，就像一群牲口似的被圈在了一起。

手枪正对着他们，两个女人中有一个用打开了保险盖的手榴弹威胁他们。她把手榴弹高高举在头上，让飞机上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她那变了形的脸显示出了憎恨的心理和果断的神情。

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把大家吓坏了。直到守在驾驶舱里监视机长舒曼的那个劫机分子头目用机内话筒向大家讲话的时候，大家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女士们、先生们，”劫机分子的头目用英语在麦克风里说，“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是自由战士。我们要求释放关押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土耳其监牢里的战友。”接着他又恫吓说：要是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会发生的事情用不着他来说，其同伙们手里的武器会告诉所有的乘客。

劫机者按照计划 ,完全控制了飞机和机上的所有人员 ,并将手枪一直对着站在后舱里的空中小姐和菲托尔。他们又从惊恐的旅客中找出了两名妇女 ,命令她们将旅客用餐的空杯、空盘撤走 ,送入机内厨房。

接着 ,那个为首的劫机分子用那种结结巴巴的英语命令道 :“把你们的护照和证件统统丢在过道里 !”他还威胁道 :“你们要老老实实 ,不准隐瞒什么。我们会对你们从上到下进行搜查的 ,必要时 ,就把你们的裤子剥下来。要是在谁身上发现了什么 ,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又有两名妇女被迫去做恐怖分子的助手。她们弯着身子 ,穿过通道跪下去 ,把散落在地上的护照和证件收起来。她们竭力控制着自己颤抖的手 ,就像木偶似的任人摆布。

接着 ,手提包又被集中起来 ,搬进了头等舱。

15 点 15 分 ,汉莎航空公司的“皇冠”号飞机出人意料地降落在意大利罗马国际机场。

飞机着陆 1 小时后 ,德国内政部长麦霍夫接到了意大利同行的电话报告 ,此刻他正在为施密特总理预定当天晚上召开的核心小组会议作准备。尽管此时他对这次劫机的背景还一无所知 ,但他还是在电话中恳求意大利当局千万不要让飞机再度起飞 ,无论如何要挡住它。

10 分钟后 ,米兰飞行安全中心又转来了恐怖分子用夹着阿拉伯音的英语通话。这位恐怖分子自称“瓦尔特·马拉姆上尉” ,“我们已经控制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我代表行动小组要求释放关押在德国监狱里的战友。我们反对世界上的帝国主义组织。”

麦霍夫在结束与劫机分子的通话后 ,再次敦促意大利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被劫持的飞机起飞”。可是就是在这次通话后十多分钟 ,罗马向波恩通报 :“汉莎 181 号班机未经准许强行起飞了。”半小时后 ,波恩被告知飞机向塞浦路斯方向飞去。

19 点 ,内政部派专机送联邦刑事侦察局的专家赶往塞浦路斯。与此同时 ,德国外交部得到了塞浦路斯的允诺 :如果飞机在塞浦路斯

降落,他们将阻止它再次起飞。一分钟后,“皇冠”号就在塞浦路斯的拉维卡机场降落了。

劫机分子通过无线电要求提供 10 吨燃料,并让他们再次起飞。而塞浦路斯当局为等待联邦侦察局的专家,迟迟不给飞机加油。劫机分子似乎察觉了他们的企图,尖着嗓子大声叫嚷:“赶快给飞机加油,否则就把飞机炸掉!”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机场马上给飞机加了油。而此时德国内政部的专机还在赶往塞浦路斯的途中。

22 点 50 分,“皇冠”号再次起飞,飞往贝鲁特。但贝鲁特机场拒绝了皇冠号降落的请求。飞机从贝鲁特折向大马士革,这里同样没有准许“皇冠”号降落。飞机只好转飞巴格达,但巴格达也拒绝其着陆。接下来“皇冠”号在科威特机场再次受阻。被劫持飞机像只失去了巢的孤鸟,只好一直在天空中徘徊。

机长舒曼面对劫机分子的手枪,虽然神经紧张得快要绷断了,但他还是不断地强制自己去思索:怎么才能既避免引起劫机分子的猜疑,又能给地面站报告更多的情况。他终于在地中海上空成功地避开了劫持者的耳目,和后面不远的一架飞机联系上了。他用德语告诉对方驾驶舱内的同行:“劫机者共有 4 个人,两男两女,带有手枪和手榴弹。”他并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听懂他的报告。

事实上,这些宝贵的情况很快就转到了德国。劫机分子用手枪逼着乘客把所有的百叶窗都关上,谁也不知道飞机现在停在哪儿。

在巴林机场,飞机只停了 1 小时 40 分,加上油后,飞机再次起飞,朝着迪拜方向飞去。4 点 45 分飞机到达迪拜机场上空时,机场已经根据国家总统的命令关闭了。

在迪拜机场的指挥塔里,望远镜直指天空。人们看到了正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的“皇冠”号飞机的方位灯;下面,在机场的跑道上停放着阻止降落的几辆消防车。

“我的燃料只够维持 10 分钟了,再不让降落我们就完了!”话筒里传来舒曼机长告急的声音。但指挥塔仍不作任何答复。

“我们降落了!”

波音 737 越来越近,最多再有 5 分钟就要着陆,指挥塔上的负责

人不顾总统的严厉命令 ,吩咐几辆消防车马上开走 ,以免发生可怕的灾难。

5 点 51 分 ,飞机在迪拜机场的跑道上慢慢停止了滑动。消防车立即朝飞机开去。

“谁也不许靠近飞机 ,否则我们就开枪 !”

消防车像表示敬意似的在离飞机不大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他们只让“一个负责人”来谈判。

指挥塔答复说 :“负责人马上就到。”

星期五早晨 ,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收到了迪拜办事处转来的电报。这是劫机者和红军派指挥部致德国联邦政府的公开信。

致西德联邦政府总理的最后通牒

从帕尔马飞往法兰克福的汉莎 181 次航班内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完全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旅客和机组人员的生死存亡及汉斯·马丁·施莱尔的生命完全取决于您是否愿意满足我们的下述要求 :

1. 从西德监狱里释放下列红军派的战友 :安德雷阿斯·巴德、古德隆恩司林、扬·卡尔·拉斯普、维雷那·贝克 ,并发给每人 10 万马克。

2. 从伊斯坦布尔监狱中释放两名巴勒斯坦的战友 :马迪和胡赛因。

3. 按附加规定 ,交付我们 1500 万马克。

4. 请与下述任何一个国家商定接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战友 :

.....

5. 由您提供飞机送他们前往目的地。飞机必须经过伊斯坦布尔 ,接收在那里获释的两名巴勒斯坦战友。我们的要求已经通知了土耳其政府。所有获释的战友必须在星期日 ,即 1977 年 10 月 16 日 8 点以前到达他们的目的地。要求的两笔款项也必须在此期间内交付。

6. 如果全体战友没有获释并没有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如果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按要求交付款项 ,将立即处死汉斯·马丁·施莱尔先生以及 181 次航班上的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

7. 如果实现了我们的要求 ,全体人质都将予以释放。

8. 我们不再和您联络 ,这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接触。任何误解或者上述战友及交付赎金上发生什么差错 ,均由您负责。

9. 如果您企图拖延或搞欺骗的话 ,则最后通牒即告终结 ,并立即处死汉斯·马丁·施莱尔和机上的全体乘客及机组人员。

S·A·W·I·O

1977 年 10 月 13 日

波恩的政治家们还从来没有像本星期五那样意见一致过。作出的决断是艰难的 ,如果联邦政府屈从于恐怖分子的要挟 ,也许能拯救飞机上的人质以及企业主联合会主席的生命 ,但是以往的经验告人们 ,被释放的恐怖分子不久又会潜回国内 ,制造更为可怕的事件。在此之前 ,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家洛伦茨被绑架 ,为了营救他 ,政府释放了恐怖分子 ,并用飞机将他们送到了也门 ,在那以前 ,他们还只是恐怖事件的胁从犯 ,但后来他们潜回国内变本加厉地行凶报复。最后 ,施密特总理在反对党的支持下 ,决定对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 ,即使牺牲人质也在所不惜。

与此同时 ,德国政府派出了联邦军特种部队的反恐怖武装人员。

在远离波恩 4000 公里的“皇冠”号机舱内 ,迟迟得不到回音的恐怖分子兽性大发。舒曼冷静沉思的性格触怒了马姆特 ,他强迫舒曼跪在机舱的通道里 ,用手枪柄朝他的脸上猛打。一些女人和孩子们吓哭了。

就在离“皇冠”号几百米远的地方 ,在联邦德国内政部派来的专机舱内 ,联邦刑事侦察局的专家和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正在俯身研究着机场的平面图。袭击“皇冠”号的计划提出来又被否定了 ,他们周密思考 ,反复权衡利弊。阿联酋国防部长也参加了讨论 ,他坚决不同意武力强攻 ,主张天黑之后设计智取。

夜幕降临了。飞机上的电压太低了 ,连无线电都无法使用。马拉姆用枪逼着舒曼呼喊机场给飞机配电。

不一会儿 ,一辆汽车闪着耀眼的灯光从跑道直向飞机开来 ,直到飞机跟前才停了下来。两名穿着工作服的“机械师”跳了下来 ,机长舒曼用英语喊道 :“我们飞机上的电压只有 24 伏了 ,你们得上来一下。”机械师正要登机 ,马拉姆猛地拨出了手枪 ,拦住他们 ,声音嘶哑地喊道 :“不许上来 !”

两个穿工作服的人又驱车离去。一会儿飞机旁出现了一辆配电车。工人们在“皇冠”号外边给飞机配电。车的尾部挂着一辆平板车。机上的人把装着废物的口袋从飞机上递了下来。工人们一面装着垃圾,一面打量着飞机。不过,他们尽量避免引起恐怖分子的猜疑,因为,在这种时候,只要有一点破绽,他们就会立即开枪。眼看无机可乘,化妆成机场工作人员的突击队员们只好撤离了。

在机场大厅里,突击队员们仔细地检查从“皇冠”号卸下的垃圾。除了纸盒和空瓶子外,还发现4盒未开封的香烟和4张签有舒曼名字的登机牌。人们明白,他是想用这种方法通知外界,机上只有4名暴徒。

机场后面,德国边防军反恐怖第九纵队的突击队员和迪拜的士兵正在海湾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机上,反复进行模拟突击训练。两名化装成人质家属的伦敦反恐怖专家小组的特工人员也赶到迪拜,加入了突击队的行列。随着旭日的升起,最后期限越来越接近,死神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头。机场指挥塔里突然传来马拉姆迫不及待的喊叫声:

“立刻把地面的配电车给我调开!给你们20分钟的时间。不然我就枪毙一名乘客。”

“怎么回事?”阿联酋国防部长守在指挥塔上,一夜未归。

“我们要起飞。”德国大使汉斯·约阿希姆·诺伊曼一听急了,他一把抓过话筒叫道:“离最后期限还有一个多小时,你们为什么要飞走?”驾驶舱里传来了回答:“最后通牒是由我单独决定的。我们要起飞,马上把配电车调走!”

机场的两名工作人员只好开走了配电车。

“你们的飞行目标是哪里?”话筒里传来指挥塔的询问。

劫机者大声回答:“这你们管不着。”

大使最后用一种几乎是央求的语气对着话筒说:“请你们保证飞机上乘客的安全。”

马拉姆没有回答。喇叭里只听到飞机隆隆的马达声。汉莎181直刺蓝天,变得越来越小。站在指挥塔上的人们透过望远镜也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亮点。

在此危难时刻 ,四面八方都伸出了援助的手。在波恩 ,外国国王、总统、独裁者和酋长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信函已经成堆。80 岁的罗马教皇保罗六世甚至自告奋勇 ,愿意作为人质去替换乘客。从内罗毕也传来话说 ,医院已腾空了 100 张床位 ,随时可供使用。飞机先是往阿曼飞去 ,受阻后又折向南也门的利扬机场。可是那里也不能降落 ,因为跑道已用汽车封锁了。飞机在空中绕了一圈又飞往亚丁。

亚丁机场上载重汽车和装甲车开上了跑道 ,以阻止飞机的降落。

“皇冠”号在机场上空不停地盘旋 ,恐怖分子马拉姆的脸都涨成了猪肝色。他抓过话筒狂叫道 :“快清除跑道 ! 我们的燃料用完了 !”随后他又气急败坏地说 :“非降不可 ,否则我们就炸机 !”

“皇冠”号迫降在跑道旁边。飞机猛地跳了一下 ,铝制的机身震颤不已像是要散架似的。机舱里乒的一声 ,掉下了一块顶板。只见飞机周围白雾缭绕。

烟雾 ? 是飞机着火了吗 ?

窗外 ,白雾慢慢地消失了 ,那是刚才飞机迫降时 ,一下子腾空而起的沙尘。

“我们降落在一个沙坑里了 ,如果不去检查 ,飞机就别想再飞了。”

舒曼终于说服了劫机者 ,他被允许爬到飞机的外面 ,他一边用手电照着飞机的机腹 ,一边四下张望 ,看到远处观察他的大兵 ,他把手卷成个喇叭形 ,大声喊道 :“我是机长舒曼 ,我要跟德国的代表说话。”南也门的士兵对他的呼喊毫无反应。他又放开喉咙试了试 ,还是没有动静。于是舒曼朝着士兵走了过去。可是没走几步就被马拉姆发现了 ,他命令道 :“回来 ! 要不我就立即炸毁飞机。”说着就抓起了手榴弹 ,准备扔进机舱。机长只好转回身 ,耷着双肩返回了机舱。

发了狂的马拉姆带着因憎恨而变了形的面孔对乘客说 :“机长想逃跑 ,将你们弃之不顾 ,必须处死他。”

他用枪逼着舒曼跪在头等舱的门帘前 ,用枪口顶着他的头。“你想出卖我们吗 ? 知道自己的罪过吗 ?”马拉姆咆哮着。“我无罪。”舒曼终于从牙缝挤出了这最后的一句话。

“砰”的一声枪响了。舒曼的身体倒向了一边 ,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地毯。

劫机分子将舒曼的尸体搬到了通道上 ,想要杀一敬百。机舱里闷热难当 ,汗臭和尿臭中混杂着血腥味。

直到午夜时分才来了一辆加油车给飞机加上了油。10月17日深夜1点 ,副驾驶员于尔根·菲托尔又被逼着坐在了驾驶舱的位子上。

发动机狂吼起来 ,“皇冠”号慢慢地爬上混凝土跑道。士兵们也让开了。宽大的机轮在细沙上打了几次滑 ,好不容易才飞了起来。

飞机向着科威特飞去 ,在途中又转向索马里。4点35分 ,“皇冠”号载着乘客86名、4名机组人员、一具尸体 ,在索马里摩加迪沙机场上静静降落。劫机者立即通过机场又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 :至星期一当地时间17点 ,如果恐怖分子的战友尚未从德国监狱里释放出来 ,他们就将飞机的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统统炸毁。

与周围的寂静恰恰相反 ,机内和指挥塔的气氛十分紧张。劫机分子在下达最后通牒后 ,他们又用枪逼着一个男人 ,将舒曼的尸体从紧急出口的滑梯上推出机外。裹着尸体的毯子浸透了血 ,地板上留下了一道红色的血迹。机场上军用卡车运来了众多的索马里士兵 ,他们远远地将飞机团团包围了起来。一辆救护车驶至飞机后部 ,运走了舒曼的尸体。

新的最后期限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大部分乘客都做好了死的准备。他们再也不忍心看到空手赤拳的同伴惨遭毒打的场面。发了狂的劫机分子现在已经不再把人拉到头等舱的门帘后面 ,而是当大家的面毒打。人们觉得只有死才能摆脱这种痛苦。

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马拉姆狞笑着从行李包里翻出了炸药 ,拿在手里挥舞着说 :“注意听着 ,我们就要炸毁一切了 ,什么都不留下 ,一声巨响我们大家全完蛋。”另一个女劫机者耸耸肩说 :“我已经死过多次了 ,我一点都不怕。”

这时 ,索马里的警察部长通过无线电再次向劫机者提出交换条件 ,说 :“只要释放人质 ,由索马里负责劫机者的安全。”

可是马拉姆只是嘲讽地付之一笑。

就在最后期限到来的前刻,马拉姆同意将最后期限延长 30 分钟。为了答谢索马里的好意,他再给 30 分钟时间,让机场上所有的车辆撤离现场。

离死亡还有 30 分钟。

德国特使韦施纳夫斯基的衬衣早就湿透了。这位素来镇静的人第一次感到了神经紧张。

他必须赢得时间!他还必须说服劫机者,再次延长最后期限。

他急中生智,拿起话筒编了个谎:“请您听着,我刚刚获悉,几分钟后,将有一名联邦政府的全权代表抵达这里,他要向您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通知。”

恐怖分子未作回答。看到这种情形,一直犹豫不定的索马里总统巴尔将军终于同意,允许载着联邦军反恐怖部队的专机在摩加迪沙降落。

载着突击队员的远程飞机在红海之滨吉布堤上空已盘旋多时了。飞机是当天中午从北约设在希腊克里特岛上的空军基地起飞的。这时油箱里的油已所剩无几,飞行员正迫不及待地等着降落的命令。

机舱里坐着 60 名士兵,他们的年龄在 25 至 40 岁之间。他们的表情与其说是紧张,不如说是无聊。他们盼望尽早着陆,迎接战斗。这些身着便装的士兵是德国反恐怖斗争中的精华。他们直接受内政部长的领导,只有在发生凶杀、抢劫、扣押人质和其他紧急情况下,经内政部长同意才能使用这支力量。

为了这次行动,除动用了德国最先进的反恐怖武器装备外,英国还送来了最新研制的“眩目炸弹”,这种炸弹在爆炸时发出的强光可达 50 千瓦,并发出震聋发聩的响声,可使人在 10 秒钟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炸弹只有 15 厘米长,用一种软质材料制成,爆炸时软质材料化为灰烬,没有任何碎片。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波恩的警察局长乌利希·韦格纳。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最恨的事情是说大话。他先在警察局服役,1958 年从北约防务学院毕业后转入国防军,后出任内政部长根舍的边防

事务副官。

他决计要拖到天黑 ,只有等到天黑之后 ,反恐怖突击队才能行动。他让人通知“皇冠”号上的恐怖分子 :11 名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罪犯已获释。他们正在来索马里的途中。

为了使恐怖分子确信不疑 ,韦施纳夫斯基还提供了附有飞行时间和航线的飞行图。恐怖分子在机内依据资料进行查实 :飞机将于今夜降落。

再过几分钟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在汉莎 181 次航班的机舱里 ,恐怖分子们正在作最后的准备。机舱里弥漫着浓烈的酒精气味。人们坐在洒满烧酒的椅子上 ,犹如坐在火药桶上。在头等舱内 ,暴徒们正忙着把雷管安在炸药上。大多数乘客闭上了眼睛 ,不愿意看到这令人毛骨悚然的爆炸准备工作。

突然 ,飞机加强舱里传出了马拉姆发狂的吼声 :“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我们不死了 ,我们死不了啦 !”

他兴奋得直拍大腿 ,跳起舞来。他又拍拍乘客的肩 ,叫道 :“我的孩子们 ,你们得救了 !”他见乘客们还呆若木鸡 ,毫无反应 ,又冲他们喊道 :“你们的政府已经让步 ,我们的战友将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他们午夜就到。到那时候 ,你们就自由了。”

捆绑的绳子已一一松开 ;但是男男女女们还呆呆地坐在那里。因为他们不敢相信 ,死亡已经过去。好一阵子他们才反应过来 ,自己就要自由了。人们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相互拥抱 ,亲吻——激动、兴奋的眼泪夺眶而出。

机上的恐怖分子放松了对人质的看管 ,允许人们在飞机上自由活动 ,让人们舒展一下早已麻木了的肢体。他们已经同意将最后期限延长到深夜 3 点 30 分。

为了稳住机上的恐怖分子 ,机场指挥塔定时呼叫“皇冠”号 ,向他们报告其战友们的新情况 ,要他们再忍耐一会儿。

此刻 ,乌利希·韦格纳根据行动区域侦察 ,已经确定了反恐怖作战行动程序 :

1. 由索马里军队封锁整个行动区域 ;
2. 反恐怖突击队出击 ;

3. 由一名通讯官率领一支联络部队配合行动指挥组；
4. 由行动指挥组和索马里军队采取措施，分散机上恐怖分子的注意力；
5. 袭击飞机；
6. 疏散人员；
7. 返回汇合地点。

17点30分，载着联邦军反恐怖特种部队士兵的远程喷气式飞机在“皇冠”后面2000多米远的地方着陆了。飞机停在一座沙丘后面。“皇冠”号上谁也没有发现这一情况，就连飞机隆隆的引擎声也没有引起劫机者的猜疑。

与此同时，荷枪实弹的索马里士兵把机场封锁得水泄不通。摩加迪沙的机场大楼成了战地医院，医务人员正在等待行动。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克制着自己越来越强烈的不安情绪。

22点，德国反恐怖突击队员穿上了防弹衣，开始执行最后一道命令。指挥官韦格纳要求他们最后再熟悉一下机场的地形。行动的每一个步骤甚至每一个角度都经过上百次的演练，直到这些手持武器的突击队员相互配合得像一架精密仪器那样谐调。

尽管如此，冒险性还是很大的。一旦他们向“皇冠”号发起突击，机舱里的人们将面临怎样的局面？在决定性的那几秒内，恐怖分子置身何处？怎样才能使恐怖分子丧失战斗力而又不伤害机上的乘客。机场指挥塔内，行动指挥组正在作最后的讨论。人们试图确定：在袭击飞机前的一刹那间，劫机者在干什么？他们会呆在什么地方？但是许多情况是事先根本无法预测的。

23点50分，通往波恩的电话接通了，韦施纳夫斯基向联邦总理报告：“我们已经准备就绪，10分钟后开始行动。”

侦察分队首先接近“皇冠”号。他们无声无息，就像一只只灵巧的猎豹，在经过一天曝晒之后的地面匍匐前进。不一会儿他们就爬上了坚硬的飞机跑道。“皇冠”号就停在眼前。他们屏住气爬到机腹下和翼下，架起了高灵敏度的窃听器。在他们头顶上没有任何动静。4名劫机分子似乎没有一人发现他们已经接近了飞机。

30分钟后，侦察分队第一次向指挥组报告：“皇冠”号上毫无动

静,恐怖分子在驾驶舱内活动。到现在一切都十分顺利。

突击分队出发了,只见一串黑影跃上跑道,朝着飞机猛扑过去。现在关键是要使恐怖分子全部集中到驾驶舱,并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窗外,只要坚持几秒钟的时间,突击队员就能袭击并控制飞机。

23点50分,索马里士兵们点燃了事先架在“皇冠”号前方并浇上了汽油的干柴。顿时大火冲天而起,火光映入飞机驾驶舱。马拉姆和他的女同伙一下跳了起来,隔着窗户向外张望。到底有人中计了。

“上!”乌利希·韦格纳一声令下,第一个扶着梯子跃上了机翼。突击队员4人一组闪电般地冲到机翼上面的紧急出口处。他们在出口处装上了定时磁性炸药。使用这种特制炸药可以保护机门的碎片飞到机体外面而不伤害机舱内的乘客。

18日凌晨零点05分,“轰隆”一声巨响,两个机门被炸飞,“快卧倒!”随着一声呐喊,两枚炫目炸弹投进了机舱。炫目的白光把恐怖分子弄懵了。突击队员们一拥而入,对着驾驶舱猛烈扫射。

突击队员射击的角度事先都经过准确的计算。一女劫机犯未及转身就被乱枪打死。知道中计的马拉姆拿着枪冲向舱门,手里的枪没来得及扣动扳机就已身中数弹。马拉姆倒下的地方正是他先前开枪打死机长舒曼的地方。

马拉姆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还是拉开了一枚手榴弹并扔进了机舱。但因伤势过重、力不从心,手榴弹滚到近处的一个空椅子下爆炸,没有造成大的人员伤亡。另一名女劫机者躲在厕所里半掩着门负隅顽抗,在盲目的射击中,她打中了一名突击队员的脖子。

事情发生的如此突然,就连“皇冠”号上的86名人质也明白,突然降临在他们头上的是什么。耀眼的闪光使他们眼前一片漆黑,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使他们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一时间他们不知所措,不知道冲上飞机的人就是他们的救星。直到听见有人用德语喊:“快!从这儿出去!”时,人们才跌跌撞撞地朝着紧急出口跑去。

空中小姐迪尔曼当时蜷着双腿躺在一个座椅上睡着了,当恐怖分子的手榴弹在她附近爆炸时,她才醒了过来。她睡眼惺忪地望着周围的一派惨象,受了伤的恐怖分子和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

她想从紧急出口逃出去,可是这时她才注意到自己的一条腿麻木了,不听使唤了。是手榴弹把她炸伤了。一名突击队员伸手将她抱到了门外的担架上,当那个突击队员两支强壮有力的胳膊抱起她时,她已失去了知觉。

所有的人质都被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沙坑里。人们一直都在担心飞机随时会被炸飞。因为恐怖分子安装在飞机里的炸药一触到火就会爆炸,然而飞机里毫无动静。

凌晨零点 07 分,全部行动结束了,整个突击作战只用了 1 分钟 46 秒。“皇冠”号铝制的外壳百孔千疮,驾驶舱正面的玻璃被打得粉碎,鲜血染红了座椅和地板。起落架前面躺着三具血肉模糊的恐怖分子的尸体。

玩火者必自焚!这 4 名恐怖分子的狂妄,对他们来说,换来的却是三死一伤的结果。

被营救出来的人们当天就乘一架波音 707 专机踏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归途。特种部队的 60 名勇士们也同机返回。从马略卡岛的帕尔马到法兰克福,本来只该用 135 分钟的航程他们却用了 5 天时间才到达。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条几千公里之遥的、充满了恐怖、惊吓和苦难的航线,是一段令他们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

而对于德国边防军第九反恐怖纵队的突击队员来说,这只是一次日常的行动。等待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场新的战斗。

法兰西之鹰

法国特种部队出手制敌 ,招不虚发 ,扬威圣诞夜。恐怖分子从此胆寒。

血战圣诞夜

1994 年 12 月 24 日发生的法航班机被动事件举世震惊。在 3 名乘客被动持者杀害 ,并危及机上另外 224 名乘客和 12 名机组人员生命安全的情况下 ,法国国家宪兵队行动小组临危受命 ,不到 10 分钟 ,便击毙 4 名劫机犯 ,救出被扣留在机上的全部人质。法国各大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使全世界直接目睹了这场惊险万分的较量。各国新闻媒介均对此次行动作了详尽报道 ,此次反劫机斗争的成功 ,使法国国家宪兵队行动小组声誉鹊起 ,同时也揭开了这支“反恐怖奇兵”神秘面纱的一角。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发生的运动员被凶杀事件 ,以及 1973 年 9 月发生沙特阿拉伯驻巴黎使馆被恐怖分子占领的事件 ,促使法国于 1974 年正式建立了反恐怖力量——国家宪兵行动小组。该组隶属于国防部 ,有很大的独立性。

法国国家宪兵行动小组共有 87 名宪兵 ,其中有 4 名军官 ,平均年龄为 34 岁。每年在宪兵部队里征召义务兵参加该小组 ,他们配备着先进的特别装备 ,这些装备至今仍然保密。

该行动小组由 4 个分组组成 ,每组 15 人 ,外加 20 余人的管理小组。他们一年 365 天 ,每天 24 小时值班 ,随时可以出动。

国家宪兵行动小组是法国宪兵部队中的精锐部队,专门执行特殊任务,主要对付绑架人质或劫机飞机事件,保护受到严重威胁的知名人士的安全,完成反恐怖行动和对付大规模暴力行动等。同时,他们还负责保卫总统的人身安全。该行动小组建立 20 多年来,总共执行了 250 多次任务,其中解救了 350 名人质、逮捕了 550 名犯罪分子。因此它被誉为“反恐怖奇兵”。许多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纷纷请它去训练反恐怖行动的部队。

1994 年 12 月 24 日中午,法国国家宪兵行动小组接到了法航 8969 号航班被武装分子劫持的通报,正在值班的该行动小组副队长奥利维那·金上尉立即按紧急状态作了部署。一些正在休圣诞节假的成员包括行动小组负责人,德尼·法维那少校和副队长塔迪上尉全部迅速赶回岗位。到下午 5 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当日晚 21 时,宪兵们得知,劫机者杀害了两名人质:一位去法国度假的阿尔及利亚便衣警察和一名越南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参赞。整个晚上,他们在马略卡岛上反复酝酿了好几个攻击行动计划。

翌日,一架“神秘—20”型飞机将一部分宪兵运到了马赛,因为有最新的消息说这架被劫持的飞机可能要飞往马赛的马里尼亚纳机场。21 时 31 分,机上又有一名人质——法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的一位领事员被劫持者打死。

为了保证机上人员安全,阿尔及利亚政府已允许飞机进入跑道。不久,这架飞机飞往马赛。此时,留在马略卡岛上的行动小组部分队员也立即赶往马赛待命。26 日清晨 3 时,全体宪兵队员已集结在马赛马里尼亚纳机场周围,总共有 50 人,后来又加入了 17 名国家宪兵队空降大队的成员。半小时后,被劫持的飞机在马赛机场着陆。根据法维那的要求,机场方面允许这架飞机停留的位置作了仔细研究。宪兵队员已判断出将要采取行动。神枪手们埋伏在草地上,并动用了夜视仪器,声响专家也在随时监听机舱内的声响。在漆黑的夜里,队员们可以通过飞机舷窗观察恐怖分子在舱内的活动。一位化装成机场工作人员的宪兵借给飞机提供补给品的机会登上飞机观察了情况。

宪兵们已各就各位 ,随时准备采取行动。然而 ,15 时 45 分 ,飞机却意外地启动了 ,它未经许可就慢慢地朝机场指挥塔开来。显然是劫机犯发现了机场的“异常情况”。

16 时 30 分 ,宪兵队指挥官的步话机里传来指令——这指令来自首都巴黎 :“不能让飞机离开马里尼亚纳机场。”对于法维那和他手下来说 ,这就是为采取干预行动正式开放了绿灯。从现在起 ,事情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了。法维那经过分析 ,认为 18 时整是发动攻击的最好时刻——因为 3 天来 ,恐怖分子每到这个时候都要集中到飞机前舱去作祷告。

17 时 5 分 ,一名劫机者突然向机场指挥塔开了火 ,接着他们又向机场和停放在附近的飞机扫射。法维那少校当即下令提前开始攻击行动。宪兵们分成小股从各个方向向飞机靠近。法维那和其他 6 人攻击飞机右前门 ,塔迪上尉负责攻击后门 ,空降大队的 17 名宪兵则潜入飞机底下 ,他们负责解救机上人质 ,检查他们的身份证。防止恐怖分子混入乘客当中趁机溜掉。

17 时 17 分 ,第一组宪兵队员弄来了一架活动舷梯 ,8 名宪兵随即登上了飞机。布置在外面的射手们开始射击 ,他们知道恐怖分子在什么地方。空降大队的成员此时已经潜入机舱 ,他们沿着过道跳跃着向恐怖分子所在的驾驶室冲击 ,一边叫乘客们趴下 ,一边打开了所有的舱门 ,放下紧急滑梯。乘客们趁机撤离了飞机。

90 秒钟后 ,机舱里只剩下 20 多名宪兵在同 4 名恐怖分子对峙。一名恐怖分子不时地把驾驶室打开一条缝 ,向机舱里扔手榴弹、伸出冲锋枪向外扫射。他们还隔着舱壁向外射击。宪兵队神枪手们一边还击 ,一边强行打开驾驶室舱门 ,将 4 名劫机犯全部击毙。由于法国电视台对这次反劫机行动进行了实况转播 ,因而 ,以德尼·法维那为首的行动小组一夜间成为举世瞩目的英雄。在南奥利机场宪兵室内 ,法维那的行动小组受到了被劫持人质的家属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已是 1994 年 12 月 27 日凌晨 2 时 15 分 ,劫机事件已结束了 8 个多小时 ,但惊险场面仍然留在人们脑际。33 岁的队员菲力普说 :“我刚要射击 ,一个恐怖分子抢先向我开枪 ,子弹钻进我的枪管里 ,救了我一条命 ,不然这颗子弹正好打中我的脑袋。这样的事一生很难

遇到一次。”

在马塞 ,马里尼亚纳机场二楼上同国防部长莱奥塔尔一同进餐之后 ,宪兵队员们乘机飞往巴黎。参加了这次行动的随队医生维亚拉上校说 :“我们刚一上飞机 ,机组人员和死里逃生的乘客们全体起立欢迎我们。我们非常感动 ,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然而 ,宪兵队也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 ,参加行动的 40 来人当中 ,9 名队员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他们都在当晚接受了手术治疗。

领导这次行动的负责人德尼·法维那上机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是常和鲜血、眼泪及死亡碰头的。”是他带头打开离驾驶室最近的一道机舱门冲进飞机去的。他说 :“恐怖分子隔着舱壁向我们开火。还不时地打开驾驶室门向我们扔手榴弹。我们中有 6 人受了伤。我们经历了最可怕的几分钟。”几天前还不被法国人所知的法维那少校现在却成了宪兵队行动小组 90 名成员的职业精神和勇敢的化身。他今年 35 岁 ,已婚 ,有了 4 个孩子 ,1992 年 6 月 1 日加入这支特种部队 ,在 4 个月之前升任负责人。他在圣西尔军校学习过两年 ,于 1983 年选择了宪兵这一职业 ,当时他的军衔是少尉。1988 年 8 月 1 日 ,他升为上尉。后来他来到宪兵队行动小组 ,经过两年的努力 ,通过了各种能力测验 ,拥有了各种资格证书 ,如滑雪、摩托驾驶、空降、突击队、救护、潜水、救生等。这次解救入质行动又给他补上了一枚荣誉勋章。

正好在一个月前 ,法维那带领小组在一架 A300 型空中客车上进行了一次反劫机行动训练演习。冲锋枪、短刀、防光辐射面罩、眩目手榴弹、烟幕弹、夜视镜、激光瞄准器等都是他们进行这类“手术式”打击时使用的武器。这类演习都是在各种型号的飞机上以及机上有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但在地面进行 ,也在空中甚至海上进行。每次进行这种演习时 ,都由法航、法国国内航空公司、国家宪兵队空降大队提供后勤援助和其他支持。行动小组的 90 多名成员根据需要分成 4 个不同的行动小组 ,另外一些人负责运输、后勤和通讯。但所有的人都是多面手 ,遇到紧急情况时都能上。正是由于平时的刻苦训练才有了这次反劫机行动的成果。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赞扬他们 :“在勇敢精神和效果方面他们都堪称榜样。”